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纪实



两位历史巨人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纪实》序言
师哲

毛泽东和斯大林是两位伟大的历史巨人，是中国和苏联一代革命人民的领袖。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他们有共同的认识，也有过意见分歧；有深厚的友谊、亲密的合作，主动的配合，相互的谅解，也有过矛盾和斗争。这些友谊、合作、矛盾、斗争，由于国情的不同，民族的差异，历史的氛围和个人的性格，往往迸发出耀眼的火花，绚丽的光彩，曲折的情节，感人的细节。刘杰诚同志写的《毛泽东与斯大会晤纪实》，以1948年4月至1950年2月间毛泽东和斯大林会晤为线索，运用历史的考核，作家的敏感，采撷晤谈的浪花，摄取绚丽的光彩，既写深厚的友谊，又写激烈的思想矛盾和性格冲突，通过一系列曲折的情节和感人的细节，真实而生动地塑造出了毛泽东、斯大林、周恩来等人的高大形象。因此，我诚挚的向广大年轻的朋友推荐这部书。希望年轻朋友们，看看这部真实、生动而有趣的书。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写历史人物，一定要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符合历史真实，写出人物的本质和主要特点。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十八年，常聆听他的教诲；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间，我又有幸随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的多次晤谈，并担任翻译。那是我终生难忘的大事。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但当年领袖们晤谈的情景，至今往往还浮现在我的眼前。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纪实》写的情况是真实的，实事求是的。真实是历史题材著作的生命。只有真实地写出当时的情景、生活的气氛、人物的性格、事件的脉络，才能再现历史，感染读者。《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纪实》，由于真实可信，人物生动，所以具有相当的深刻性、说服力和感染力。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书中还有一些缺点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我相信，作家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一定会把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形象塑造得更鲜明、更生动、更感人！

一 夜深人静，毛泽东挑灯疾书 东方日出，领袖欲赴苏会谈

城南庄的深夜，万籁俱寂。毛泽东在小油灯下奋笔疾书。当他写完“斯大林”三个字的时候，停笔沉思，推开了窗户——

1948年4月。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此时虽说已是春季，可是西伯利亚来的一股寒流，却使气温下降，出现了“倒春寒”。吐出嫩芽的柳枝，在寒风中挣扎摇摆。鲜艳夺目的桃花，经不起霜冻的袭击，花蕊凋谢，纷纷飘落。连那迎春飞来的燕子，也都钻在新筑的窝巢里，瑟缩着身子，不再去飞舞鸣叫。

然而，城南庄的军民却还是那样的热情洋溢，精神抖擞，沉浸在革命的热流和胜利的欢乐中。这里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聂荣臻司令员带领广大军民，不仅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解放了大片国土，而且于4月13日，迎来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

毛泽东是从陕北转战而来的。在陕北转战中，他带领西北军民，接连打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大战役，歼灭了胡宗南部的的主力，然后东渡黄河，经五台山来到这里。村里人听说毛泽东来了，像欢迎救星似的，敲锣打鼓，扭着秧歌，热烈欢迎。毛泽东住下了，他们又想方设法做各种好吃的东西招待他，有的送来了鲜美的羊肉，有的送来了香甜的米酒，还有的蒸了高大的煮糕，表示对领袖的敬意。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并参加了华北党政领导人会议，部署华北解放后的工作，为了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毛泽东日夜奋战。

这天夜晚，月色朦胧。全村的灯光先后熄灭了，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渐渐地进入了梦乡，只有靠近北边的那两间平房里，仍然灯光明亮。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坐在灯下奋笔疾书。一支普通的毛笔，在他的手里，时而如蛟龙出水，时而似彩凤飞舞，把他那闪光的思想、英明的决策和指挥的艺术，挥洒自如地落在了纸面上。然而，当纸面上出现了“斯大林”三个字的时候，那支毛笔突然停住了，呆滞了，久久不再挥动。

斯大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他带领苏联人民艰苦奋斗，把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力挽狂澜，带领苏军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对于中国，斯大林一直关心和支持中国革命。然而近两年来，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却犹豫不决，甚至令人失望。首先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5年8月，当蒋介石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并且提刀在手，威胁人民，要打内战的时候，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要反抗，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日本投降了，斯大林却要苏联红军把中国东北的主权交给蒋介石国民党。这不是明显地轻视中国人民的力量吗？现在，美国出钱出军火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起抵抗，以自卫战争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并以排山倒海之势的人民解放战争，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斯大林会怎么对待呢？苏联又会怎么对待呢？

事关重大，问题复杂。那位中年人放下毛笔，站起身来，踱着步子，反

复思考着……

“ 喔喔喔—— ”

不知谁家的雄鸡高声一啼，全村的雄鸡都叫了起来，高吟低唱，形成了黎明的前奏曲。

那位中年人推开窗户，只见东方的天际露出了一片晨曦，便捻小了煤油灯，走出房门……

黎明，毛泽东沿着崎岖的山路，攀上险峻的峰巅，望着喷薄而出的朝阳，反复思考：到苏联去，和斯大林晤谈。

黎明前的山村，万籁俱寂，人们沉睡。大自然用那无边无际的夜幕，罩住了喧嚣纷繁的昨天，又用那力大无边的巨手，拉开了今天的序幕。然而，那位在小油灯下整整忙了一夜的中年人，虽未休息，毫无倦意。他在院子里活动了几下身躯，想用体育运动驱散脑海里正在浪翻波涌的思绪，让头脑得到休息。然而，不行。思想的狂涛、革命的激情和那将要诞生的新中国在他的脑海心潮中涌动，使他无法平静下来。

这时候，东方的晨曦，变成了大片的鱼肚白色。天快亮了。那位中年人看了看东方，开了大门沿着小路向村外走去。

在一旁站岗的两个警卫员，忙将此情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兼首长俄语翻译师哲，要师哲去劝首长回来。师哲摇了摇头，没有去劝，带着两个警卫员，悄悄地跟在首长后边，漫步向前，保护首长的安全，但又不把他的思绪打断。

谁料，那首长越走越远。他好像在思索着什么问题，无目的地顺山路走去，过了一条小河，又向山上爬去。山坡，越来越陡；小路，越走越险。那首长不怕山陡路险，奋力攀登。突然，一条数十丈高的石崖，拦住了去路。小警卫员对师哲说，“你瞧，高崖拦路，该回来了！”

首长并没回头。他只是绕了个弯，迂回到石崖的后边，又攀了上去，把高石崖踩在了脚下。这时候，东方的鱼肚白色变成了瑰丽的朝霞，天已大亮了。那首长站在高山之巅，望着晨光、朝霞、群山，高兴得仰天长吟：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风景这边独好。

……

晨光、朝霞、峻岭、蓝天，把诗人映衬得清晰，自然。使人们看清了他的轮廓：

他，一个农民的儿子，从湖南那穷乡僻壤里走出来，到工农群众运动中去，读无字的书，学马列主义，探索改造社会的“本源”，穷究宇宙万物之真理，领导工人斗争，发动农民运动，创建革命军队，带领人民艰苦奋斗，历尽千难万险，打出了一片红彤彤的江山。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批判了孔孟之道的封建糟粕，揭露了资本“自由”的吃人本质，摒弃了苏联的教条模式，实事求是，锐意革新，将农村作为革命的基点，把农民作为夺取政权的主力，使那些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惊讶不已。

他，伟大的军事战略家，身经百战，深谙韬略，善于从宏观上把握战争

全局，但从不干涉下属的战术部署。他善于集中兵力，出奇制胜，用“小米加步枪”，一个又一个地战胜那强大的敌人，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个奇迹。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在枪林弹雨中奋战了数十年，战胜了强敌数百万，骁将上千员，而身上竟没有一支自卫的枪！

他，不仅是哲学家、理论家，而且是诗人和艺术家。他深入浅出，能把宇宙万物变化的奥秘讲得风趣而明白。他的诗词想象丰富，气势宏伟，意味无穷。他的书法遒劲飘逸，任意挥洒，力透纸背。他的艺术造诣和语言艺术使他的领导思想、军事思想、文艺理论都熠熠生辉，魅力无穷。

他——毛泽东，是伟人，也是凡人，绝不是神。他遭过挫折，犯过错误，受过处分，有过苦恼，特别善于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挫折中学习，使自己聪明起来，少犯错误。但现在——1948年4月的这天夜晚，他正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思考之中，抉择之中，然而，此时经过过河、爬山、登高、望远，特别是看见那一轮红日光芒万丈，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他那紧锁的眉头舒展了，慈祥的脸上绽出了笑容，此时，他那宽阔的前额上那几条淡淡的皱纹，渐渐地隐去了；丰满的鼻子上方，那一双明亮的眼睛，更显得炯炯有神、明亮而深邃；厚厚的嘴唇露出了憨厚、宽容的笑意。

一阵阵晨风吹来，吹乱了他那满头长长的黑发，抖动了他那宽松的裤子和带有补钉的灰布上衣，而他那魁梧的身躯，高大的身影，却迎风挺立，纹丝不动。

师哲走上前来，见毛泽东神采奕奕，满面春风，知道他的思考已经告一段落，有了新的打算，便问道：

“主席，是什么事使你一夜没有睡觉？”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师哲的问题，却反问道：“师哲同志，我想尽快到苏联去，和斯大林同志谈谈，你以为如何？”

问题提得太突然，竟使师哲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记得1947年10月上旬，毛泽东转战到陕北佳县神泉堡的时候，曾要他陪同斯大林派来的苏联医生阿洛夫到神泉堡，询问过苏联的一些情况，并且把中共中央自3月撤出延安以后至沙家店战役结束期间的国内局势的变化作了介绍和分析，接着，又亲自给斯大林写了一封较长的信。在那封信中，毛泽东对中国解放战争总的形势以及陕北、山东战况作了描述和估计。毛泽东写道，虽然国民党对山东的压力仍然很大，但形势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已形成了对我比较有利的局面。在陕北，由于我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的胜利，敌人已没有力量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了。“总之，解放战争已有了很大转折，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47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了十二月会议，重点是解决敢不敢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根据报告的要点，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电报从军事原则、土改政策、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各方面阐述了中共的政策，最后一段分析了国际形势，明确指出：“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师哲斟酌再三，回忆说：“我记得主席去年在陕北给斯大林发的两份电

报中，已经把我党的观点和解放战争的情况说清楚了，虽说没有正面批评斯大林的观点，但有些话也是很有份量的。”

“哦，什么话？”毛泽东明知故问。

记忆力很强的师哲当即答道：“开宗明义的活份量就重；后边的，‘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份量更重；至于肃清内部的软弱无能思想和批评‘一切过高估计敌人和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的话，几乎是有所指了。”

毛泽东笑了。他说：“你的记忆力真好！不过，你似乎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师哲反问道：“我还不明白，主席要去苏联，准备和斯大林谈什么问题？”

毛泽东朝东方一指，幽默他说：“要谈谈这东方日出的问题。”

师哲抬起头来，巡着毛泽东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轮红日，喷着万道金光，已从东方升起；薄云低雾全被染成了瑰丽的彩色；山川大地，披上了金色的光芒，显得更加娇美。然而，当时他并不明白，“这东方日出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和斯大林谈这个问题？直到新中国诞生后，特别是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和斯大林晤谈之后，他对毛泽东这句话的深刻含意，才有了确切地理解。

然而，东升的太阳，并不管人们理解不理解，赞成或反对，它都会按照它自己的轨道，冲云破雾，越升越高，把那金色的阳光洒向了人间，照耀着大地！

望着这日出美景，毛泽东笑了。

注释：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43页。

二 组成班子，细推敲晤谈方案 边发电报，征求斯大林意见

毛泽东组织了个精干的班子，调查研究，考虑和斯大林晤谈的方案，往返的路线。

毛泽东有个习惯，每当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时候，总要先进行调查研究。他说，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当他提出要到苏联去，和斯大林会晤商谈中国革命问题——也就是“东方日出问题”的时候，他要师哲和有关人员调查研究，准备材料，为他的决策提供素材。

他要和斯大林晤谈的问题十分重大，师哲感到茫然，有点像老虎吃天——无处下爪。为此，毛泽东详细地跟他谈了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说：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强调指出。中同革命发展到今天，性质和矛盾已经十分明显。“我们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这就是说，由参加这个革命的人们所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中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士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可是，斯大林是怎么看待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的呢？据《中国雅尔塔文件》记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5年7月，斯大林在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文部长宋子文的会谈中，表示同意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抗日力量。他说：“中国共产党只是爱国主义者，至于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那还是相当成问题的。”“中国只能有一个国民党领导下的政府。”并且保证“苏联将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斯大林曾向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说，他从未向中共支援过武器，并保证，所有苏联对中国的支援，无论

是道义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只给中央政府。”而且，他还表示：“希望中国只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把共产党的军队合并到国民党军队中去是必要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准备发动内战，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刀，斯大林下仅保证“尽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而且威胁中共和毛泽东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若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后来，蒋介石不顾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发动内战，斯大林还于1945年11月和1946年5月两次邀请蒋介石访问苏联；蒋介石因害怕引起美国不满，两次都没有接受邀请，斯大林还不大高兴……

斯大林近两年来的一系列言行，令毛泽东惊讶和愤慨。毛泽东决心要和斯大林谈谈：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该不该解放？蒋介石国民党要打内战，挥起屠刀要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为什么不能奋起自卫、武装反抗。为什么不能用正义的人民解放战争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抗战，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了大片国土，锻炼出了一支独立自主、英勇善战的革命武装，为什么要交给卖国贼蒋介石去领导？近百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只有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广大统一战线，才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人民的国家和政府；而现在，这个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已经如早晨看见了朝霞即将从东方升起的太阳，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对于这样的人民共和国，对于这样的东方日出，应该抱什么态度呢？到底是支持呢，反对呢？还是动摇不定、犹豫徘徊、耍两面派呢？……

师哲听到这里，心中豁然开朗。他不仅明白了毛泽东访苏和斯大林晤谈的目的、内容、意义和重要性，而且眼前似乎又看见了晨曦之中，一位巨人站在高山之巅，眺望东方日出的情景，耳边似乎又听到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我想尽快到苏联去，和斯大林同志谈谈东方日出问题。”

思想明确了，准备工作加快了。

当时，刘少奇、朱德带领的中央工委已在西柏坡展开工作。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周恩来和任弼时，得到了一致赞同。他们当即决定：周恩来、任弼时率中直机关全体人员到西柏坡去与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带领江青、师哲、汪东兴、米大夫等人暂时留在城南庄，积极准备访苏事宜。

毛泽东对斯大林十分尊重。从1920年以来，有关列宁、斯大林的身世、事业、思想、观点、丰功伟绩，毛泽东不仅经常听人介绍，从书上看过，而且经常谈论，认真学习，还提出“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做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他不仅读过斯大林的许多著作，赞赏斯大林的不少观点，而且发表讲话，撰文指出：“斯大林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救星”，“他领导着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帮助中国打日本。”“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但是，直到1948年5月，毛泽东还没见过斯大林的面。现在，要和斯大林晤谈，他想对斯大林的个性、特点、作风以至生活，习惯等，作一些更加具体、细致、深入的了解，便尽可能找一些接触过斯大林的人做调查。

毛岸英说，斯大林给他一支小手枪。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彼德军俘虏了，德国法西斯要用雅科夫换德军元帅保卢斯，斯大林不干。

毛泽东善于搞调檀研究，调查不拘形式，有时随问随记，井井有条；有时谈笑中得，俯拾即是。真所谓：处处留心皆学问，谈笑之中有真知。

为了和斯大林晤面会谈，毛泽东作了一些调查研究。有一天，他的儿子毛岸英来看他，闲谈之中，他又和毛岸英谈起了斯大林。

毛岸英说，斯大林这人很了不起，不仅和列宁一起领导苏联人民革命，推翻了俄国的沙皇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当法西斯希特勒德国接连灭亡了奥地利、波兰、挪威、法国等十几个国家、妄图横霸世界的时候，他带领苏联人民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接着又出兵中国东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这些我知道。”毛泽东笑着说，“我希望你谈谈耳闻目见的具体事。”

毛岸英腼腆地笑了笑，谈起了亲身经历的事：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了闪电战，正在莫斯科学习的毛岸英从梦中惊醒。他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也耽心世界的前途。每天清晨，他先去听广播，然后回到房间里，在那张世界大地图上作红白标记。

毛岸英的标记阵线清楚，红白分明。从1938年以来，他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在地图上已经贴了许多小白旗、小红旗。在德国侵占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巴尔干半岛各国，他都痛心地将小白旗插在上面。白旗越来越多，红旗越来越少。猖狂的德国法西斯侵占了大片苏联领土，逼近莫斯科，毛岸英痛苦极了。他给“莫斯科”贴了一面大红旗，在城郊插的旗是红白相间，表示敌我正在激烈争夺，这一时期，毛岸英不仅抓紧学习，刻苦读书，还担任国际儿童院共青团支部书记和伊万诺夫市列宁区团区委委员，组织团员、青年，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

1941年冬末，战争更加紧张。联共（布）中央有个建议，希望16岁以上的外国公民加入苏联国籍。那时，毛岸英已经19岁了，学校老师建议他加入苏联国籍，说这无比光荣。毛岸英摇摇头，表示不愿意。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爱我们的祖国。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就要回到祖国去，为祖国人民服务。如果加入苏联国籍，就不方便了。”接着，他又补充说，尽管我是中国人，但我愿意为苏联人民的独立和自由献身，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献身。

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毛岸英用流利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上战场。他写道：

最高统帅部

敬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你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领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致

革命敬礼！

谢廖沙

一九四二年五月于伊万诺瓦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斯大林当时很忙。他既要指挥苏联红军对围攻莫斯科的德军进行大会战，又要部署苏军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还要运筹苏英、苏美关于互助合作

的协定，以及关于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就在毛岸英写信前后的 5 月 26 日，苏联和英国在伦敦签订了互助条约。毛岸英不知这些情况，求战心切，信发出十天后，不见回音，又发了第二封信。过了两天，又发了第三封信，但都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

正在毛岸英焦急等待回信的时候，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曼努意尔斯基将军来了。毛岸英和他互相认识，这次一见面，毛岸英就拉着他的手，说起他给斯大林写信和他急切要求上战场去打法西斯的想法。曼努意尔斯基是个热心肠人，又知道毛岸英是毛泽东的儿子，就帮助他多方联系。毛岸英很快地进入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学习。后来，又转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并于 1943 年 1 月加入了联共（布）党（1946 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大学毕业后，毛岸英获得了中尉军衔，被任命为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的大反攻，千里长驱，穿越了波兰、捷克等好几个国家，和苏联红军一起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

那时候，在苏联红军中广泛传诵着斯大林和儿子雅科夫誓死消灭法西斯的故事，对毛岸英教育很大。毛岸英在讲述雅科夫牺牲前后的事迹时，曾激动得热泪盈眶。

原来，雅科夫·朱加什维利，是斯大林和第一个妻子生下的儿子。母亲早逝，他是外祖母抚养成人的。到莫斯科后，他以优异的成绩在炮兵学院毕业后，成为苏军上尉，并加入了苏共布尔什维克。1941 年 6 月 22 日，经斯大林同意，随苏军奔赴苏德战争前线作战。当时，德军第三坦克群向雅科夫所在的苏军防线猛烈进攻。7 月 15 日，当雅科夫端起冲锋枪呐喊着向敌人冲击时，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被炸倒失去知觉，后被德军俘获。由于叛徒出卖，德寇知道他是斯大林的长子。德寇多次审讯，严刑逼供，雅科夫坚强不屈，坚信苏联人民一定会赢得战争胜利。德军审讯官由少校直换到陆军元帅贡特，都没有能使雅科夫屈服。最后，希特勒亲自下令将雅科夫送入死亡集中营，说他只要写一封信或发表一个声明，就可以逃脱死神的魔爪。雅科夫宁死不屈，始终不从。

这时候，苏军俘获了德军元帅保卢斯。德国法西斯要用雅科夫换德军元帅保卢斯。当时年已 62 岁的斯大林非常疼爱长子、惦念长子，关切长子的性命，但他更害怕儿子被德国法西斯俘虏，德国人用儿子来要挟！他记得他曾发布过一条被俘即叛变命令，说是在日耳曼的铁蹄蹂躏着大片苏联国土的时候，人人必须誓死抗战，斗争到底，不能为求生而投敌，被俘也是不允许的。如今，自己的儿子如果真的成了德军的俘虏，让自己有何面目来领导这场战争呢？斯大林每想到这一点，便心如刀绞，觉得心口出现一阵阵令人窒息的疼痛。好在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了伟大的转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苏军胜利了。德军元帅保卢斯成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被生擒活捉的元帅。

伟大的胜利给斯大林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也给克里姆林宫带来了欢乐的气氛。

大厅里正在准备盛大的庆功酒宴，斯大林将在这里宴请莫斯科创卫战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表现出色的将军和士兵代表。

斯大林身穿一套灰色的列宁服，唇间的胡须梳理得十分整齐，精心修饰的脸庞，容光焕发，始终不离开烟斗的嘴角，挂着微微的笑意。

胜利，总是让人愉快的。

斯大林格勒一役，长达 200 多天，共消灭德军 26 个师、32 万人，其中光俘虏的将军就有 24 名，尤其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是在此战役中生擒了德军元帅保卢斯。

大厅中央摆了一个大 U 字型餐桌，洁白如雪的桌布上，摆满了各种水果、炸猪排、火腿肠、鱼子酱等美味食品。大厅靠墙的一张长条桌上摆满了各种品牌的美酒。

斯大林满有兴致的察看着这一切。

正在此时，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匆匆走了过来，对斯大林耳语了几句什么，斯大林惊讶地问了几句，而后沉思着走了出去。

在贵宾室里，中立国瑞典红十字会主席贝尔纳多特伯爵在忐忑不安地等候着斯大林的召见。他这次飞临莫斯科，是受希姆莱所托，履行一项重大的使命。

双方见面，客套地寒暄几句后，贝尔纳多特伯爵便说：“斯大林先生，听说你有一位亲生儿子叫雅科夫，是吗？”

斯大林马上明白了对方的来意，于是沉着地答道：“是的，可惜他在前年的战争中失踪了。”

贝尔纳多特用强调的口吻说：“不，斯大林先生，你的消息不太准确，雅科夫没有失踪，他现在呆在德军的一所战俘营里，生活得很好。瞧，这是他现在的照片。”

十多张照片摊放在茶几上，斯大林没有动手，只是低头打量了一眼，心头暮然一震，不错，照片上的人的确是自己的儿子雅科夫。

贝尔纳多特望着斯大林不动神色的表情，有些失望他说：“德国的希姆莱先生委托我来做一件事情，用你们的一名战俘，换回你的儿子。”

“哦！你们会对谁这么感兴趣呢？”斯大林故意用开玩笑的口气问，并将手中的一撮烟丝塞进烟斗。

贝尔纳多特用试探的口吻说：“这个人你可能会猜想得到，他就是保卢斯元帅。”

斯大林心头一阵酸楚，但他立即站起身来，用踱步的姿势，掩住泪水盈盈的眼睛。

“哦！德国人可够精明的，他们想用一名士兵来换回一名元帅，这不太公平吧？”斯大林故意使语音显得极其冷漠，更不愿让德国人的这个特使看出自己心中的软弱和情感的风波。

“雅科夫是您的亲生儿子，他也不是一名士兵，而是一名中尉军官。再说，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能让他们两人都得到自由，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

“人道主义？”这个字眼激起了斯大林心头的强烈怒火。

“跟背信弃义的德国法西斯分子有人道主义可讲吗？这场战争，让多少苏联人民流血死亡，遭受了无法言喻的苦难，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看看斯大林格勒，正是这个保卢斯，指挥着他的强盗般的野蛮军队，在那儿屠杀了我们 48 万名士兵和平民，使这座美丽的城市变成了一个血腥的坟场！这就是你要交换的那个保卢斯元帅犯下的滔天罪行……”

贝尔纳多特低垂着头，听任斯大林言词激烈的批驳。他明白自己此行是在做一件极为了光彩的事情，可迫于德国法西斯的压力和红十字组织的准则，他无法推辞。

当斯大林讲累了换气喘息的时候，贝尔纳多特才抬起头来，询问道：“斯大林先生，您真的不愿意考虑希姆莱先生的建议吗？”

斯大林背过身去，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斗，然后，沉着他说：“保卢斯是红军战士俘虏的，是国家和人民的战利品，我个人无权这样做。再说，我在前年曾经发布过一个文告，在这场让人民蒙受巨大苦难的战争中，我方要么出现叛徒，而绝不做俘虏。我想，我不应该背叛我自己发布的誓言。”

贝尔纳多特离去后，斯大林仿佛大病一场，身体软瘫，倒在沙发上，久久没有挪动。

血浓于水，他舍弃的毕竟是亲生骨肉呀！况且，他更觉愧对已故的前妻。

可是，在国家与人民蒙受着巨大苦难的时候，自己应该同自己的人民一样去面对生死和灾难的挑战。有人问斯大林：“你这样认真地坚持原则、保卫苏联，你那落入魔掌的儿子怎么办？”

斯大林沉着他说：“我相信我的儿子决不会给苏维埃祖国丢脸！”

法西斯党徒得知斯大林的回答后暴跳如雷，决定要严刑处死雅科夫，并要把处死的惨酷经过拍摄下来，然后转给斯大林，想让斯大林亲眼目睹亲生儿子的惨死状况，使其良心受到永久地惩罚。1943年4月14日行刑那天，德国党卫军的几个头目在电网附近布置了桌子、刑具和摄影机。机智的雅科夫见此情景，便识破了敌人的阴谋，遂迅速扑向带电的铁丝网。惊慌的法西斯匪徒又向他开了一枪。就这样，年仅36岁的雅科夫壮烈地牺牲了。

毛岸英和苏军官兵都被斯大林父子的爱国热忱深深感动了，一个个英勇杀敌，前赴后继，建立了不少战功。

斯大林听说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英勇，十分高兴。1946年，毛岸英回国前夕，斯大林特地接见了，并赠给他一支蓝闪闪的小手枪。……

说到这里，毛岸英拿出了那支闪光发亮的手枪，递给父亲，说：“爸爸，你到苏联去，也代我向斯大林同志问好！”

毛泽东说：“我们一边准备，一边去电报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在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就住在毛泽东的附近，他们每天都有接触，经常谈些问题，有时一谈就是半夜。

一天夜晚，毛泽东和聂荣臻促膝交谈。毛泽东对晋察冀边区群众的革命热情印象颇深。他说，一过龙泉关，看见群众笑逐颜开，就像当年在江西兴国一样。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试一试，看在敌人的后方究竟能不能站得住脚。结果，你们在敌后不但站住了，而且发展了，壮大了。

聂荣臻说，在敌后能不能站住脚，关键是执行党的政策，把一切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

毛泽东说，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结果在根据地周围造成了严重的赤白对立，自己孤立自己，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王明的错误很多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斯大林后来也发觉自己搞的“左”了。“斯大林曾经讲过，苏联当年搞富农吃了亏，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

谈着谈着，已经过了午夜时分。毛泽东神采飞扬，毫无倦意，要聂荣臻搞一点酒菜来，边吃边谈。

聂荣臻让警卫员搞来一点酒，又搞来一点菜，互相敬酒，边饮边谈。他们从土地改革问题谈到党内斗争、遵义会议、解放战争，又谈到斯大林和苏联。毛泽东说他想到苏联去和斯大林晤谈，问聂荣臻有什么意见，看去好，还是下去好？

聂荣臻说：“如果主席要去（苏联）的话，我可以护送到东北。但是，如果主席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因为根据现在的情况，护送主席到东北，一般说没有问题。不过处在战争环境，难以有绝对把握。其次是你现在的健康状况已经相当差，再长途跋涉，就更不利。请主席三思。”

毛泽东笑着说，考虑一下，再作决定。

是啊，到莫斯科去，和斯大林晤谈，不仅路途很远，战争环境又十分艰险，而且事关重大，毛泽东得多方调查，慎重考虑。

第二天，师哲来了。毛泽东问，去苏联的路线选好了没有？

师哲说：“我们初步选定，先由阜平到绥远，这条路，已经在我军的控制下，比较安全；然后由绥远去莫斯科，乘飞机，由苏联方面接送。”

毛泽东说：“那好！我们一边准备，一边去电报征求斯大林的意见。”于是，红色的电波，带着毛泽东的意向，飞向了莫斯科。

注释：

毛泽东当时谈话的大意和他在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讲演的一段话基本相同，故引公开发表的原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9页。

毛泽东的这段话与他同年同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基本相同。参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3页。

见梁敬鐸：《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72—675页。

三 少见多怪，斯大林怀疑毛泽东 两电对照，发怒入关怀新英雄

斯大林拿起电报，看了看说：“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

斯大林当时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位高权大，功勋卓著，再加上他个性坚强而又自信自负，许多人都尊敬他而又害怕他，恭维他，形成了他主宰一切，他说了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胜利。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使他的威信大大提高，也使他过高地估计了个人的作用，以致骄傲起来，听任人们对他恭维吹捧，歌功颂德，搞个人崇拜。他目光敏锐，才华出众而又善施谋略，不但在国内，就是在和外国领导人的交往中，也常常是人们围着他转，看他的眼色行事，很少有人敢说半个下字。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这样一些世界著名的领袖人物，对他斯大林也不敢冷眼旁观，等闲视之，因为他说话算数，不但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而且消灭了日本关东军。现在，他正在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宽大明亮的书房里，一个个高雅的书橱里，整齐地排列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高尔基等的著作。

斯大林正坐在沙发上认真地读书。

英俊的马林科夫走了进来，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中国的毛泽东来电报征求您的意见，他想要到莫斯科来。”

斯大林放下手中的书，接过毛泽东发来的电报，认真地读了起来。

马林科夫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等待斯大林的指示。

可是，斯大林读完了电文，闭上了眼睛，沉默不语。

等了一会儿，马林科夫笑着问：“斯大林同志，您看这电报如何回答？”

斯大林拿起电报，又看了看，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发问地说：“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

马林科夫说：“是的，他从未来过苏联。过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王明同志曾经多次介绍过毛泽东，说他不仅出身于农民家庭，而且长期领导农民运动，农民意识比较重。不重视组织工人搞城市暴动，而喜欢钻山沟，走什么稍山路线，公开提出中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而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多在城市，只有组织工人在城市搞武装起义，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苏联的十月革命就是这样胜利的。可是，他根据苏联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一次又一次地都失败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一个一个都失败了，垮台了！在他的心目中，王明是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在苏联呆过多年，学习认真，才华出入，知识渊博，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斯大林的著作背得滚瓜烂熟，运用自如；对他斯大林的指示、建议，言听计从，不打折扣；显然是个理想的领袖人物。然而，不知怎么搞的，他在中国站不住脚，干不成事，1934年前后硬干了一段，差点儿把中共和中国红军的家底子全给砸了，差点儿把老本输光！中国工农红军被迫长征。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众人拥戴毛

泽东，遂率领残部，转战两万五千里，到了陕北。据说他说的话土里土气，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斯大林的经典，但中国人爱听，听了管用，很快使中共和他领导的革命队伍发展壮大起来，到如今几乎有了半壁河山。锋芒所向，不但使日本军队后方起人、连连受挫，而且使美国全力武装的蒋介石先生的数百万军队，屡战屡败，土崩瓦解……

想到这些，斯大林又问：“蒋介石国民党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马林科夫说：“国民党的‘行宪国大’，从今年3月29日至5月1日，一直吵闹了一个多月，勉强才收场。蒋介石先生软硬兼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当选了总统，5月1日在总统府举行宣誓典礼。可是他下边的派手互争，咬红了眼，日月不宁。中共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闹得蒋先生不知他演的这出戏，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

马林科夫的幽默叙述，使斯大林笑了起来。然而，他的笑声嘎然而止，一片强大的优云羞雾很快地笼罩了他的面容。他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可能发动的对苏战争抱有高度的警惕，对蒋介石国民党也曾寄有很大的期望。他知道，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了巨大的创伤，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不如美国。而美国，作为战后世界上的头号帝国主义强国，并不隐讳侵略扩张的意图，在“遏制苏联势力”的口号下，千方百计地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美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美国领导世界”，已经成为美国统治集团中流行的口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能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不，苏联必须遏制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抗衡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扩张行动，在维护世界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是亚洲的大国，又是和美国侵略政策斗争的关键，所以他斯大林曾千方百计地争取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仅在外交上只承认国民党政府，而且多次向蒋介石代表表示：“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时候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生产的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中国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为了拉拢蒋介石国民党，他不惜牺牲中共权益，说中共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苏联只承认并支持国民党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希望中国在保证蒋介石“领袖地位”的条件下实现统一，要求中共随着美苏间的妥协在国内斗争中也向国民党妥协，交出军队，到国民党政府中去作官办事。但是，毛泽东对他斯大林的意见、劝告，乃至措词强烈的严正警告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坚持领导中共和革命军民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直打得蒋介石国民党狼狈不堪，也使他斯大林处境尴尬，脸上无光！现在，毛泽东要来见他，他斯大林该怎么会见呢？又该怎么会谈呢？他考虑再三，觉得很难，便吩咐把毛泽东的电报印送政治局委员传阅，准备意见，讨论决定。他特别叮咛，要负责对外事务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拿出具体的意见。

两天后的一个傍晚，斯大林午睡后从他的“近郊别墅”出来，驱车到克里姆林宫的电影院里，坐在了他的特坐上。政治局几个常务委员——赫鲁晓夫称为“斯大林小圈子”里的几个人物，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等人，也陆续乘车来到，各自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斯大林说了他挑选的片子，电影很快开始了。那是一部美国影片，没有

说明字幕，由电影事业部长 1·1·鲍尔沙科夫站在一旁大声地翻译：“现在他正在离开房间……现在他正在穿过街道。”贝利亚取笑他，也跟着说：“看，他开始跑了，现在他正在跑着！”

电影结束了。斯大林照例提议：“好吧！让我们去吃点东西吧，为什么我们下去呢？”这时候，已到凌晨一两点钟，正是该睡觉的时间，众人都不饿，但都随声附和，跟着说：“是啊，是啊，去吃点东西吧！”

马林科夫走到斯大林身边，低声提醒说：“斯大林同志，你不是说要召集大家来，研究答复毛泽东电报的事嘛！”

“没关系！”斯大林满不在乎地说，“到近郊别墅，边吃边谈，不更愉快吗？”

斯大林怀疑毛泽东，说他“是个麦琪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众人随声附和。马林科夫提到延安来电，斯大林恼羞成怒，稍后又如梦初醒。

权力是会腐蚀人的。

许多聪明、正直、学识渊博、于过大事的伟大人物，在权力的腐蚀下，天长日久，走向反面，变得愚蠢、自私、残暴，心胸狭窄，孤陋寡闻，于起了寡廉鲜耻、卑鄙龌龊的勾当来。斯大林也是这样。到了晚年，巨大的权力，个人的崇拜，加上他那多疑、粗暴的性格，钢铁的手腕，使他走进独断专行的“一言堂”。他说要到近郊别墅去谈给毛泽东复电的事，便走出客厅，坐上了他那辆特制的汽车，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随斯大林上车。其余的人分别坐上了自己的专车，紧随其后，驶入一条支路，兜了一圈，驶向“近郊别墅”。

孔策沃，斯大林的近郊别墅，警戒森严。周围筑有两道墙，在两道墙之间，还有一群看门狗，又安装了一个电气警报系统和各种安全装置。武装警卫和便衣保卫人员在四处巡逻。

车队到达别墅后，斯大林带领人们进入会议室。这里已经摆好了佳肴美酒。斯大林坐在主席台上，其他人各就各位，边吃边谈。

斯大林喝了一杯葡萄酒，说：“现在，我们来谈谈毛泽东要来的事情吧！”

莫洛托夫吃完一块牛排，慢慢地说：“毛泽东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

说罢，停了一会儿，喝了一杯优待加酒，又说：“说是聪明人，的确很聪明，他没有上过大学，但却知识渊博，通古晓今，在中国那么广大而复杂的环境中，能够联合各种力量，打倒多个强敌，使革命不断胜利。说他是农民领袖，不仅因为他出身农家，当过农民，而且因为他把农村当作革命的根据地，把农民当作革命的主力，一直领导农民运动，并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布尔加宁严肃地说：“这就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学说。工人阶级在工厂，在城市。工人阶级革命的政党，怎么能离开城市，忽视工人，而单纯依靠农民呢？”

“显然，这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斯大林边思考边说，“毛泽东领导中共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说老实话，我怀疑他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

米高扬谈了苏联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会谈的情况，说蒋介石国民党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最近经过国大代表的选举，蒋介石成了民选的总统，应该按斯大林同志的意思，“及时了解蒋介石需要什么，以

便向他提供援助”。 “至于毛泽东，很显然，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战争中，毛更多依靠的是农民，而不是城市工人。由于某种原因，他认为农民比工人阶级更革命。”

“是啊！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斯大林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看了看面前的每一个人，不见回答，便又自问自答他说：“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下懂。也许他根本不想懂得这些道理。”

“是啊，是啊……”众人都随声附和。

只有马林科夫没有吭声。

斯大林转身问：“马林科夫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我没有什么意见……”马林科夫连忙站立起来，恭恭敬敬地说，“我只是想起了一件事。”

“什么事？”斯大林立刻严肃地问。

马林科夫紧张地后退了一步，说：“这件事你是十分清楚的，可是你好像又把它忘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几乎吼了起来：“到底什么事吗？你说呀！”

见斯大林发了脾气，马林科夫更紧张了。他知道斯大林不仅粗暴，而且权大，喜怒无常，最痛恨“反对派”。托洛茨基等一批人，反对斯大林，成了“反对派”，被打倒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反对斯大林，成了“新反对派”，被一个一个的消灭了；为了抬高自己作为伟大领袖的威信，为了显示自己的天才、英明和一贯正确，斯大林不许任何人反对他，批评他。他认为批评就是反对，反对他就是“人民的敌人”，就该打倒、消灭。马林科夫记忆犹新的是：就在这1948年，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首脑，一度是最有希望继承斯大林职位的安德烈·日丹诺夫突然死去之后，紧接着在列宁格勒的党政机构中，在日丹诺夫工作过的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的支持者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中央委员会书记、曾经长期担任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的第二把手并且是战时坚守围城的一位英雄A·A·库兹涅佐夫彼处决了，列宁格勒市与列宁格勒省党组织的全部书记被处决了；俄罗斯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M·I·罗吉昂诺夫被处决了；年轻有力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也于此时被枪决了。他马林科夫虽然在这次血腥清洗中受惠升官，掌握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大权，但也同时看到了批评斯大林。当反对派的危险。此时，在斯大林的炯炯目光之下，他更害怕了，结结巴巴地说：“斯……大……林同志，您……还记得吧，1941年6月间，毛泽东所在的延安，发来了一份电报，我们没重视，吃了很大的苦头——”

没等马林科夫把话说完，斯大林的脸就红了，很快地红到了耳根边。不知是真的恼怒还是为了掩饰窘迫，他猛地朝起一站——面前的酒瓶酒杯被撞倒了，滚落在地，打烂了。

众人都惊愕地睁大了眼睛，屏住了声息，注视着自己的“伟大领袖”。

斯大林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与粗暴，没有让脾气继续发作，走到马林科夫面前，一句话也没说，拐了个弯，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步子，像是在深入思考，又像是在强压怒火，使自己平静下来。

会议室里静悄悄的，只有斯大林那沉重的脚步声。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平静下来的斯大林，为了扭转眼前过份森严的气氛和有点尴尬的场面，走到唱机旁，放上了一盘俄罗斯唱片，随着那悠扬

的音乐，他笑了起来，转身对众人说：“休息一下吧，让我们一起来唱歌！”

众人全都听着，并开始跟着唱片唱了起来。

一会儿，斯大林又换了一张舞蹈音乐唱片，要众人跳舞。于是众人也跟着那音乐的节奏跳了起来。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是位公认的舞蹈家。他以高加索的一种民间舞蹈“莱兹琴卡”为基础，跳起来舞姿优美。布尔加宁和马林科夫在青年时期学过一点跳舞，跳起来的舞步隐约是俄罗斯式的。卡冈诺维奇没有迈开双脚，跳起舞来就像一只老母牛踏在冰上。

斯大林看得高兴了，也张开双臂，跳着小步转。

正当这时，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里露也娃出现了。她打扮得很漂亮，但神情显得有点累。一见她，斯大林就高兴地说：

“女主人，快来吧，招待客人！”

斯大林马上就要女儿跳舞。

斯维特拉娜陪父亲跳了起来，但她疲劳得几乎挪不动脚步。跳了一会儿，她想停下来，但她的父亲兴致正高，坚持要她跳。她走过去站在唱机旁边，把肩膀靠在墙上，想歇一歇。

斯大林走到女儿身边说：“怎么，接下去，斯维特兰卡，跳吧，你是女主人，所以跳吧！”

斯维特兰卡说：“我已经跳过了，爸爸，我累了。”

听惯了恭维话的父亲一听这话，就伸手一把抓住女儿的额发把她拉了出来。

斯维特兰卡面色转红，眼睛里涌出了泪水，但还得陪着笑脸，跟父亲进入舞池，跳了起来，并且对父亲说：“爸爸，你跳得真好！”(11)

两份电报一对照，斯大林的主意来了，口授复电……

斯大林高兴了，又走到马林科夫身边说，他刚才利用唱歌跳舞的时间，回忆了一下1941年6月间，延安发来电报的情景，感到心情沉重。“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今天，在答复毛泽东电报之前，请您把那次延安来电的情景介绍一下。”

于是，随着马林科夫的介绍，延安来电的情景出现了：

1941年6月22日（星期天）凌晨3点半，希特勒以190多个师的兵力，背信弃义，对苏联不宣而战。德国的海陆空军一齐出动，像狂风暴雨似的袭向苏联。德国的盟友和仆从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跟着希特勒袭击苏联。于是，一场规模空前、意义巨大的大决战，在苏联国土上展开了。

斯大林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凌晨4时许，联共中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集合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斯大林神态严肃，脸色苍白，手里握着没有点燃的烟斗，站在桌子旁边，半天没有说话。他那双深沉难测的眼里，露出了震惊和愤怒的目光。这是他一生中受刺激最大、精神最痛苦的时刻之一。面对这数百万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匪徒的突然袭击，该怎么办呢？敌人这么强大的攻势，作为苏联红军的最高统帅，为什么不事先指挥部队作好防御呢，难道我们的情报部门、兄弟党和友好人士都没有提醒吗？！

斯大林沉思着。突然，他像被什么狠刺了一下，猛地站起身来，拉开自己办公桌的抽屉，取出一叠电报，迅速翻阅起来。

人在慌忙的时候，要寻找一件急需的东西，往往很难，越急越找不到。

斯大林将那些重要的文电翻了一遍，沮丧地摇了摇头。

马林科夫问：“斯大林同志，你在找什么？”

“电报！一份从延安拍来的电报！”斯大林焦急地说着，仍在一叠电文中翻阅。

“是中共关于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的电报吗？”

“是的，是的。我记得放在这里，却怎么找不见了？”斯大林说着，仍在寻找。

马林科夫立刻打开自己的文件夹，取出一份电报，递给斯大林，说：“不，电报在这里。你当时看后说：“这是英美造谣。延安在山沟里，能有什么可靠情报？全无根据。交你保管。”

斯大林接过那份简短明确的电报，看了又看，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那电报上只有一句话：“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希立即采取对策。”(12)

然而，斯大林没有重视中共的情报和建议，甚至怀疑这是英美方面的挑拨离间。他认为，希特勒德国不会撕毁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会突然袭击苏联。他的错误认识，导致了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对希特勒德国失去警惕。鉴于英国等国报纸盛传“苏德间行将开战”，1941年6月13日，苏联塔斯社奉命发表声明如下：第一，德国并未对苏联提出任何建议及要求缔结任何新协定。鉴于此，苏联方面认为此种谓德国意愿撕毁条约，进攻苏联之谣言，全无根据。第二，至于德军分遣队由已尔干调赴德国东部及东北部（现正在调动中）与其他动机联系，对苏德关系并无意义。第三，苏联根据其和平政策，遵守并愿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文，故谣言所谓苏联准备进攻德军一节力伪造和挑拨。第四，红军后备军之露营训练，以及行将到来之演习，除意在训练后备军而外，别无其他目的，故认为红军此举为仇恨德国一节，其荒谬绝伦，固勿待言。(13)

其实，中共关于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是经过认真核实的。1941年6月，阎宝航从国民党一位高级官员那里得知：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阎宝航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在重庆的周恩来。周于6月16日报告了中共中央。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从香港方面和上海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情报，认为十分重要，于是，很快将这一情报转告给在延安的苏军情报组，要他们马上向莫斯科汇报。(14)

当年，斯大林没有重视中共的情报和建议，吃了大亏，给苏军和苏联人民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许多人只知怒斥希特勒德国的背信弃义，而没有注意斯大林的错误。现在，事实证明中共的情报是准确的，毛泽东关心苏联的命运，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及时的。而自己由于判断失误，坐失良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所以斯大林当即对站在一边的伏罗希洛夫元帅说：“请您以您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感谢！”(15)

伏罗希洛夫表示愿尽快照办。

斯大林那阴沉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在这数百万法西斯匪军闪电袭击的面前，在这苏联国家民族的命运面临生死考验的关头，他以有中共这样一个兄弟党而感到欣慰，他以有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的邻国而增强了信心。于是他和政治局委员们商量，根据总参谋长朱可夫从基辅打来的电话报告和中共的电报信息，当即发出命令，要前线各部队作好准备，抗击德军发动的进攻，不惜一切牺牲，保卫社

会主义祖国……

应该说明的是，苏德战争的爆发是出入意料的。当时，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美日两国可能妥协，造成牺牲中国反对苏联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因而对于德国的动向，中共也有所注意。6月中旬，中共从几十渠道获得情报：德国即将发动对苏战争。6月16日，周恩来在一封电报中告诉毛泽东，国民党内部传说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定在6月21日。党中央毛泽东立即把这一情报电告斯大林。这个日期与德国大举进攻苏联的实际日期只差一天。(16)当时，苏德两国政府正对所传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说法辟谣，苏联塔斯社还痛斥这种谣传是英美企图挑拨苏德关系。今天，回忆那上当受骗、被动挨打的一幕，无异于揭斯大林的疮疤，打斯大林的脸。所以，尽管马林科夫吞吞吐吐地提了一下，斯大林仍然恼羞成怒，举止失常。

历史的教训和严酷的现实，很快使斯大林清醒了：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不能等闲视之，任意摆布，而必须慎重对待，尊重他们，商量办事。于是，斯大林笑着说：“其实，延安虽然在偏僻的山沟里，但他们耳聪目明，给咱们提供的重要情报，不仅这一份。你们还记得吗？1941年秋的一天。我们收到了从延安发来的一份绝密电报，给我们提供了重要情况，使我们作出了一项大胆的决策，从与百万日本关东军对峙的西伯利亚边境，抽调出几十万军队，投入了与德军激战的西线，从而使我们有足够的实力扭转败局，奠定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的基础。”(17)

赫鲁晓夫当即响应，点点头说：“记得，记得。当时，形势真险！希特勒的第一坦克集团军从克列明楚格北上，和南下的德国第二坦克集团军在基辅以东的洛赫维察会师，把我军西南方面军的4个集团军包围起来，使我军损失65万多人，基辅陷落，我当时在基辅，险些儿作了德国法西斯的刀下鬼，丢了我这颗光滑溜的脑袋！”

赫鲁晓夫那风趣的谈吐和滑稽的表情，使众笑了起来。这是胜利后的欢笑，当时，苏联的形势确实危险。

据朱可夫元帅回忆，当时，德军的矛头直指莫斯科，在苏联最高统帅部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7月29日，朱可夫作为苏军总参谋长、最高统帅部的副统帅，就当时对战争形势和基辅的弃守问题，当面向斯大林作紧急汇报。他指出：“我军防御最薄弱和最危险的地段是中央方面军，掩护乌涅恰和戈梅利方向的第十三和第二十一集团军人员很少，准备也不足。德军可能利用这个薄弱点，向扼守基辅地域的西南方面军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突击。”

斯大林警觉起来，问：“你的建议是什么？”

“首先加强中央方面军，至少给它增加三个得到炮兵加强的集团军：从西部方向抽调一个集团军，从西南方面军抽调一个集团军，从统帅部预备队抽调一个集团军。委派一位经验丰富的能干的方面军司令员。具体地说，我建议瓦杜丁将军担任。”

“怎么啦？！”斯大林厉声责问，“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向的兵力吗？！”(18)

朱可夫解释说：“不！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方向的敌人暂时不会前进，而十二天至十五天以后，我们能从远东抽调至少8个战斗力很强的师，其中包括一个坦克师。这样，就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莫斯科方向了！”

“那么，把远东送给日本人吗？！”梅赫利斯挖苦地说。

“是啊！远东怎么办？！”斯大林沉思地来回走着，沉重的皮靴敲击着

地板，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像是在敲击人们的心脏：

“远东有日本的百万关东军，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入侵苏联，与德国法西斯遥相呼应，从东西两面夹击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马林科夫拿出了一份从延安发来的绝密电报，递给了斯大林。

斯大林看罢电报，脸上露出了兴奋的光彩，让马林科夫把电报给众人传阅，并准备意见。于是，很快的，苏联国防委员会作出了一项大胆的决策，从远东抽调几十万精锐的红军到西线来，集中兵力、消灭德寇。

原来，这份电报上讲了日本法西斯内部的重要决策和动向。早在 1930 年初，一个名叫理查德·佐尔格的德国共产党员，由共产国际派到上海。不久，他认识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并由她介绍结识了日本《朝日新闻》驻华记者尾崎秀实。尾崎是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私人秘书，参加过日本内容最核心的机密会议，并常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来往于中国与日本之间。

佐尔格在 30 年代中期，曾以一名忠于元首的德国纳粹党徒的面目和有渊博知识的学者名义，深得德国驻日大使和武官的尊重。二次大战爆发后，他发出过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1941 年 7 月至 9 月，日本法西斯内部发生了一次决策性的大争论；陆军主张北进，直捣乌拉尔山脉一带苏联军人工业的大后方，与西线的希特勒两面夹击，迫使苏联投降。海军认为西伯利亚地寒人稀，进军困难，北进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力主南进，双方争论激烈，海军意见占了上风，决定发动大规模的南侵，攻打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地。

佐尔格从尾崎那里获悉这一决定后，通知中共情报人员密切注意关东军的动向。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有的在侵华日军总司令部，有的在汪伪政权内部工作，获悉此情，迅速核实，报告延安。延安认为此情报很重要，遂电告斯大林。就这样，由于来自延安的可靠情报，斯大林情况明了，决心定了，很快地从苏联东部抽出了数

十万军队去打德军，从而一举扭转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19)

现在，斯大林回忆起这些情况，更增加了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尊重和友情。于是，由斯大林口述，很快拟就了一份既婉言谢绝又不伤情面，既不会出错又不担风险，既不答应对方的要求又能加深友谊情感、还能鼓舞对方前进的妙文密电。

斯大林的“近郊别墅”里，又传出了阵阵的笑声。

注释：

参阅《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 374 页。转引自《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华岳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0 月版第 222 页。

宋平著：《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5 月版第 487 页。

参阅《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第 426—429 页。

参阅莫洛托夫：《忆旧》，1992 年 7 月 20 日《参考消息》。

参阅《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等 373—374 页。

参阅同上书第 351—352 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1)参阅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里露也娃著的两本书：《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和《仅仅一年》，另可参阅《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411—415 页。

(12)(13)参阅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版第 211—212 页。

- (1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版第 154~155 页。
- (15)(16)蒋晓星：《延安发来的绝密情报》，载 1985 年 8 月 17 日南京《周末》。
- (17)解力夫：《纵横捭阖斯大林》，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 2 月版 253—255 页。

四 深谋远虑，毛泽东只走了两步半棋 形势大变，斯大林因失算调整决策

敌机轰炸城南庄，命中率高。毛泽东上山观战，下山捉“鬼”。

毛泽东秉性刚毅，办事认真，一旦确定了目标，不但有契而不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决心和毅力，而且脑怀文韬武略，有千方百计排除万难的策略和方法。1948年4月下旬，当发出向斯大林征求访苏意见的电报之后，他便带领师哲、汪东兴等人暂时留在城南庄，积极准备赴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

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中直机关全体人员到西柏坡去与中央工委会合。任弼时觉得中直机关大部队走后，毛主席的安全没有保障，建议主席和中直机关一起走。

毛泽东摇摇头，说我们处在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就是铜墙铁壁，很安全，很放心，很愉快。警卫人员也不必多，只留下阎长林警卫班就够了。

就这样，中直机关撤离后，城南庄只留下阎长林警卫班担任守卫工作。过了两天，敌人的飞机到此轰炸，硝烟弥漫、弹片横飞，村子里的人慌了，到处乱跑。毛泽东指挥群众防空，安全隐蔽，没有伤亡。第二，来了更多的敌机，在村子上空盘旋扫射，投掷炸弹，似乎是有目标的空袭。毛泽东指挥群众有秩序地隐蔽，避免了伤亡。5月18日傍晚，毛泽东带领随行人员搬到花山居住。

花山，离城南庄不远，但在深山中，抗战时期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驻地，有防空洞等设施。毛泽东带人搬到花山后的第三天清晨，十几架敌机袭击城南庄，轮番轰炸。

吃罢早饭，毛泽东走出防空洞，要上山去看。师哲不让去。毛泽东说：“敌机反复轰炸城南庄，里边有鬼，我想上山去看看，设法捉鬼！”

中午时，毛泽东带人上了花山山顶，居高临下，看城南庄，十分清楚：往日平静的村庄里，硝烟滚滚，爆炸声声，战火闪闪。十几架飞机往来穿梭，轮番轰炸，不但其势凶猛，而且目标很准。一枚炸弹落到驻地东南，一枚落到房后山坡上没有爆炸，一枚炸弹竟在毛泽东住过的小院里爆炸了。

毛泽东说：“这一定有敌探在送情报，暗作向导，一定要把这个‘鬼’抓出来！”

敌机投完炸弹，就飞走了。聂荣臻带人去察看，见敌机投下的是杀伤弹，小院里别的房子完好无损。只是毛泽东住过的那两间房子，门窗的玻璃被震碎了；房子里的两个暖水瓶被飞进去的弹片炸碎了；还有买来的一些鸡蛋，也被弹片崩了个稀烂。看着看着，聂荣臻的心里不免后怕起来，如果不是当机立断，请毛泽东早点离开。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面对险情，聂荣臻反复思考：毛泽东来到城南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我们加强了保卫工作，但知此事的人也不少。我们对毛泽东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除经过审查的服务人员外，一般人不会知道他住的准确位置。而从敌机轰炸的情况来看，敌人不但知道毛泽东来到城南庄，而且知道他住的地方，所以，很可能是内部有奸细。

聂荣臻把察看和分析的结果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对，很可能‘鬼’在我们内部，请你们尽快查一下。”

有关方面迅速布置，多方调查，终于抓注了两个“鬼”。原来，当时军

区司令部管理科，在王快镇开设了一个烟厂。这个烟厂的经理孟宪德，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了，暗中加入了特务组织。后来，他又把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也拉了进去。这两名奸细被任命为国民党的上尉谍报员。他们除向敌人提供情报外，在毛泽东来以前，孟宪德还曾把几包毒药亲手交给刘从文，令他寻找时机把毒药放在军区领导人的饭菜里，毒死他们。毛泽东到城南庄后，聂荣臻指派专人给毛泽东单独做饭，采取了比较严密的防范措施，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孟宪德、刘从文给敌人送情报，引敌机轰炸。后经查对，犯罪证据确凿，罪犯供认不讳，经过正式审判，枪毙了那两个特务，这是后话。

当时，师哲见敌机轰炸城南庄，情势危险；而毛泽东去莫斯科。风险更大，建议毛泽东再慎重考虑一下。

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要解放，怎能不担风险呢？但只要我们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认真地一个一个地排除它，战胜它，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接到斯大林来电。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有难处，特别是现在有难处。

不久，接到了斯大林的回电。

电文说：我们欢迎毛泽东同志来访。但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迅猛，进展顺利，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战争还很激烈，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在这个时候，你离开指挥岗位，恐对全局有不利影响，是否还是留在国内指挥战争为宜。如果你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我们准备派遣一位相当有经验的、老练的、信得过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往听取你的意见。如何？总之，我们认为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你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是不适宜的，望再三考虑。如何？望电告。

师哲翻译好电文，又读了两遍。他觉得斯大林的回电，说得诚恳坦率，合情入理，虽没有答应毛泽东立即赴苏会谈的要求，但又十分尊重毛泽东，替毛泽东着想，为中国革命着想，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着想；既不同意毛泽东在紧要关头离开指挥岗位赴苏，又准备派老练的政治局委员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真可谓体切关怀，表现了“老大哥”的情谊和气派。于是，他很快把电文送给了主席。

毛泽东读了电文，半晌没有吭声。

师哲问：“主席，你看回电如何？”

毛泽东沉思地说：“斯大林同志有难处，特别是现在有难处！”

“难处？”师哲不明白地问，“什么难处？”

“局势还不明朗，他还要看看。”毛泽东笑着说，“还要派个政治局委员来看看！”

当时毛泽东访苏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生活用品，也派汪东兴到百家庄买回了八只皮箱和其他必需品。现在斯大林来电，婉言谢绝，访苏的计划取消了。毛泽东有点不高兴，但他沉吟片刻，笑着说：“走，到外边去散散步！”

花山的早晨，山青水秀，空气新鲜，景色宜人。毛泽东和师哲沿着一条山间小路边走边谈边看。

一轮红日，光芒四射，冲破迷雾薄云，从东山后边升起来了。

毛泽东望着那东升的太阳，高兴地说：

“看！你看这红日破雾，良晨美景，多诱人哪！你说说，这旭日东升，光芒万丈，是靠自己的力量，还是靠别的外力呢？”

师哲没有理解毛泽东的寓意，顺口答道：“我不懂天文，听说太阳是发光的恒星，自转，月亮不发光，围绕地球转，地球围绕太阳转……”

“是啊！”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的新中国，也应该如旭日东升，依靠自己的力量，升跃中天，光照大地，而不是依靠外力。当然，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不能依赖它。现在，斯大林同志要等等，要看看，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老办法：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毛泽东取消了访苏的计划，于5月27日下午，乘车离开花山，前往西柏坡。他心里明白，斯大林要看的首先是东北。因为中国东北与苏联接壤，物产丰富，工业发达，又是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后占领的地方。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本想把东北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国民党，但毛泽东巧妙运筹，调兵遣将，1945年9月后，中共中央迅速将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两万多名干部派往东北，与当地的群众和抗日武装相结合，消灭日寇和伪满残余势力，建立民主政府，受到了东北人民的欢迎。到11月底，由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已达26万人，从关内开往东北的人民部队也有20多万人，形成了强大的人民力量。

这时候，东北的斗争十分激烈，十分复杂。蒋介石坚持要独霸东北。他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用军舰、火车、汽车和飞机，从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进军。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虽然同情东北的人民军队和革命力量，但斯大林根据他给美国、英国的保证：“尽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准备将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10月12日，蒋介石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蒋经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赴长春就职。斯大林邀请蒋经国赴苏，对蒋经国说：他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苏联愿意把本国生产的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把自己生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当时，斯大林的言行表明：他不相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能够打败蒋介石而夺得政权，更不相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能够迅速地控制东北，扭转危局，所以支持国民党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更加骄横无忌，向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地方组织，发动猖狂的进攻，先后攻占了早已被人民军队解放的山海关，锦州等地。

于是，东北的斗争，不仅关系着国共两党，而且牵动着苏美两国，不仅关系着毛泽东和蒋介石，而且关系着斯大林和杜鲁门。它像一颗拉着了引信的巨型炸弹，全国关注，举世瞩目。

第一次较量，毛泽东只走了两步半棋，斯大林因失算调整决策。

面对如此紧张、复杂、危急的局面，毛泽东胸有成竹，只走了两步半棋，就使形势大变，局面改观。那两步半棋是：

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东北局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在指示中，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把东北工作的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将来的反攻。东北局带领东北人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歼灭了日寇和伪满大批有生力量，恢复失地，建立了各级民主政府。到 1945 年 11 月底，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已发展到 26 万人，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这时候，苏军从东北撤退了，美国已经帮助蒋介石将正规军 160 多万人调集到东北、华北等内战前线。蒋介石得意忘形，指挥这些美国武装起来的军队大打内战，于 1946 年 5 月 19 日攻克四平，21 日攻克公主岭，23 日攻占吉林省会长春。同一天，蒋介石偕宋美龄到沈阳，亲自指挥对东北解放区的进攻。

毛泽东此时走了第二步棋，指示东北局采取“诱敌深入、内线作战，不借放弃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以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到处歼灭蒋介石的国军。到 1947 年 11 月 5 日，歼敌 15.3 万多人，收复城市 59 座，解放人口 1000 多万，土地 20 万平方公里，将敌人压缩在沈阳、长春、四平、锦州等 24 座城市内。

另外的半步棋是，对苏联红军友好相处，对斯大林的错误等待其自觉，让事实提醒他，让他自己调整决策。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红军驻在东北。斯大林以“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为条件，要苏军把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毛泽东认为，苏联红军到东北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使“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对苏联红军应当热情友好，尽力帮助。但斯大林同志要把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却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东北人民不会同意，苏联红军的广大官兵不会赞成，蒋介石呢，也不会按斯大林的意图办事，不会在美苏之间中立，而是会一头扎进美帝国主义的怀抱，坚持反苏反共的。斯大林“再三声明”的“最大的一个要求”，是蒋介石国民党“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然而，蒋介石很清楚，通过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人民，已经成了中国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他和他的“国民政府”很快就会被中共吃掉。因此，蒋介石一再叫嚷：“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而只有取得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他才可能在和毛泽东及中共的角逐中取胜。所以，斯大林“再三声明”的前后，蒋介石不仅让大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打着“受降”、“遣俘”的旗号，在中国的港口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占城市、铁路、要塞，而且还让大批美军和美国军事顾问团到中国，帮助指挥国民党军打内战。因此，这半步棋，不用毛泽东走，蒋介石以及美国的侵略扩张行动，会向斯大林讲清楚的。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斯大林渐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调整了决策。本来，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在日本投降以后，苏军在三个月内撤完”。这就是说，1945 年 12 月 3 日，应该是苏军完成撤退的日期。由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调整决策，并且以运送“战利品”为借口，抢运东北的工矿设备。所以一再推迟撤军日期，直到 1946 年 5 月 3 日，苏军才撤出了东北。

现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开始了。毛泽东运筹的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首先在东北拉开了序幕。早在 1948 年 2 月 7 日，毛泽东在致林彪、罗荣桓、

刘亚楼的电报中，就明确了东北战略决战的方针。他指出：

“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毛泽东制定的首先控制北宁路山海关、锦州段，关闭东北的大门，切断东北敌人与关内联系的“关门打狗”方案，完全符合实际。但是，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对于中间突破、深入要害去打敌人设防坚固的锦州有顾虑，再三提议先打长春。毛泽东耐心地，批评帮助，使林彪思想通了，遂调兵遣将，用25万人围攻锦州，紧紧地卡住了东北的咽喉。

蒋介石急了，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1948年10月2日，乘飞机到沈阳，“御驾亲征”。当晚，他召集师以上将领训话，说：“形势的发展，实在出乎吾人所料。锦州是东北的咽喉，势在必保。我此次来沈，是来救你们出去的。”在叙述了他的如意算盘后，又说：“大家一定要振奋精神。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他说到这里，有点伤心，禁不住老泪涌出，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死了没有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后悔晚矣！”

毛泽东身在西柏坡，对蒋介石的阴谋诡计，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他电示林彪，无论蒋介石耍什么鬼花招，你们都下理，只是集中兵力，求得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就在这个时候，莫斯科转来一封信。师哲打开一看，原来是国民党政府给苏联政府的一封信，主要内容是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解国共之争，要求首先停止内战。

国民党政府的信中说：国共应立即停止内争，同心协力共商国事。国家连遭战祸，决不应再起内江。当今应息事宁人，共同建国为重，决不可再次掀起内战，危害国计民生。其次，说兄弟阋墙，犹外御其侮。所以决不可同室操戈，致使两败俱伤，更令人痛心者，鹬蚌相争，使渔人得利。这样，对上有负于天，对下有负于地，我们将成为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亦将遗臭万年，况且我中国人民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应当立即消除私恨，相互连（联）合，共商国事。解人民倒悬之苦，切不可继续内争，置生灵涂炭于不顾。如若此，既有愧于祖先，又对不起全国父老兄弟姐妹……

那封信，是用文言文写成而后译成俄文的，虽语言改变，仍然情理交融，不失文言文风，令人读了似乎可以听见哭声，看见流泪，颇有迷惑人的魅力。

师哲很快翻译成中文，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看信便问：“斯大林同志和苏联政府是什么态度？”

师哲说：“斯大林没有说话。苏方只附一纸，说这封信是国民政府给苏联政府的，现将原信转给你们，供你们参考。未作任何其他说明。”

一会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都来了，毛泽东把那封信给他们四位书记传阅。大家看了，轻蔑地放在一边，没有表态。只有周恩来看后，淡淡地笑了笑：“一看这信，就知道是王世杰的手笔，文绉绉的。”也不屑一评。

很显然，蒋介石国民党在危急之时，想利用苏联调解，获得喘息之机，以便卷土重来。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对此原信照转，未置可否，表现了比较慎重的态度，表现出比以往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统一中国”的政策有了明显的改变。这与毛泽东的上述两步半棋以及要亲赴苏联和斯大林当面

会谈的电报显然有关。

这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一次较量。

注释：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版第 667—680 页。

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版第 366—367 页。

参阅《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第 152 页。

毛泽东的这种思想由来已久，近者参阅《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946 年 7 月 20 日），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188 页。

解力夫：《解放战争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8 月版第 293—295 页。

五 智退强敌，毛泽东巧唱《空城计》 探真究底，米高扬密访西柏坡

蒋介石调集精锐部队突袭西柏坡，轰炸石家庄，要“活捉毛泽东”。
“一举震动国内外”。

蒋介石，是毛泽东的主要对手和劲敌。

历史把他们推上了各自代表的势力的峰顶浪尖，因而，他们50多年的生死较量既是两个阶级、两种主义之争，也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战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历史上最生动、最激烈、最曲折也是最悲壮的一页。

蒋介石心黑手毒，纵横捭阖，软硬兼施，几乎降服了中国所有的新老军阀，战胜了他所有的敌手，唯一输给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并且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几乎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现在，1948年的秋天，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东北地区又展开了一场大决战——辽沈战役。

林彪、罗荣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率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包围了锦州，扼住了国民党东北军队的咽喉。蒋介石闻报大惊，坐卧不安，立刻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他于9月30日亲飞北平，找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令傅作义出两个军的兵力救援锦州。在北平“华北剿总”司令部对傅作义等十多名高级将领训话时，蒋介石靠美国给部下打气，他说他“预料八年后美苏必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胜利，我们也胜利”。10月2日，蒋介石又飞临沈阳，对师以上军官讲话，说：“我这次亲到沈阳来，是救你们出去……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10月3日，他对辽西作战方案作了部署，下达了作战命令，下午飞返北平。5日飞往天津，视察塘沽新港；6日乘军舰到葫芦岛给将领们训话，要各将士有“杀身成仁的决心”。7日在重庆号军舰上骂桂永清：“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要亡国！”下午回到北平。8日，因接到宋美龄来信，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抓了扰乱金融的孔令侃，蒋介石又飞到上海去救大外甥。气得傅作义将军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

蒋介石回到南京，屁股还没坐稳，锦州告急的电报雪片似的飞来。如若锦州失守，他在东北的40多万军队将成为瓮中之鳖。于是10月15日，蒋介石又偕宋美龄再度飞临沈阳，亲自指挥督战。他下机伊始，马不停蹄，当即派飞机给锦州的范汉杰空投一封“手谕”，叫范“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出锦西”，同时，又双管齐下，派飞机给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空投一封“手谕”，令郑赶快突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

然而，螳臂挡车谈何易！毛泽东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就在蒋介石空投“手谕”的当天夜里，锦州被解放军攻克。10月17日，长春守将曾泽生将军率所部六十军二万六千人起义，投向了解放军一边。

蒋介石闻讯，气急败坏，五内如焚。旋即于10月18日再次飞抵沈阳，召集卫立煌、廖耀湘、赵家骧等人开会，令他们重整旗鼓，收复锦州。将领们都说力不从心，无法实现。气得蒋介石头昏眼花，双眼发红，从沙发上霍地站起，拍着桌子，将卫立煌大骂了一顿，然后举起拳头，仰天长叹：“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原来在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军队推进到锦州后不再向前推进；马歇尔为了美国的利益，与苏联抗争，一定要我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弄得我现在连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

人！”

10月19日，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见大势已去，被迫率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到此时，整个东北，只剩下沈阳一座孤城“孤悬关外”。

蒋介石面对此情，心如刀绞。他从10月19日到30日，一直坐镇北平，绞尽脑汁，指挥东北、华北的国民党军进行垂死挣扎。

一天，一个特务头子跑来报告：“蒋主席，我们找到毛泽东的住处了！”

蒋介石喜出望外，迎上前去：“毛泽东？”

“毛泽东！”

“找到了他的住处？”

“不但是他的住处，还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什么地方？”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好啊！”蒋介石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在这兵败无路、民怨沸腾、将不服管、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如果真能抓住毛泽东和中共的首脑机关，无异于上帝显圣，天降神兵！这不仅将使我蒋介石力挽狂澜，扭转乾坤，转败为胜，而且会使我在美国人、英国人的面前大大露脸，身价倍增，成为真正的大国领袖！于是，蒋介石当即要来军用地图，找到了西柏坡，详细地问明了附近的地形、兵力、民情……

当时，毛泽东部署的辽沈战役已经接近胜利，策划的淮海战役正在调兵遣将。而斯大林准备派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毛泽东打算让米高扬的飞机到石家庄机场降落。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毛泽东几乎把所有兵力都调上前线，去打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而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一带则几乎没有多少兵力，比较空虚。

蒋介石闻得此情，喜形于色，立即召集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等将领来，亲自部署“活捉毛泽东”的重大军事行动。他命令傅作义组织精锐部队，以“泰山压顶之势，乘冀中兵力空虚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西柏坡，活捉毛泽东，全俘中共首脑机关人员，同时轰炸石门（今石家庄市），一举震动国内外”。

傅作义等将领得令，大受鼓舞，立即分头行动，挽救危局。

毛泽东面对险情不慌乱，潇洒地唱起了《空城计》，并给新华社写新闻消息：《蒋傅匪军妄图突袭石家庄》……

为了挽救危局，蒋介石机关算尽太聪明，然而，国民党的将领们刚一行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组织，很快就得到了蒋介石的全部计划，并立即把情报发往华北城工部，转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闻讯有点紧张：敌人如果突然袭来，不仅平山县西柏坡，就连石家庄一带也是兵力空虚，防守薄弱，如何应敌？过去看《三国演义》，知道诸葛亮用过空城计，凭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吓退了司马懿父子的大军。那是在古代，通讯落后，交通不便，再加上司马懿为人多疑，才使诸葛亮脱险。可如今，蒋介石心黑手毒，坐镇北平，海陆空军并用，电讯设备齐全，傅作义的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机械化部队，不用一天，就可以赶到平山县，这该怎么应敌呢？思虑再三，毛泽东首先让师哲拟文以电讯告诉苏联，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时间暂缓；又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商定：中

直各机关立即作好转移准备，要做到一声令下，随时能搬迁和疏散；命令东北野战军攻下沈阳后，由刘亚楼率领火速南下入关，进逼、包围天津，威胁北平。

应急措施虽然英明，但是远水不救近火。如果蒋介石、傅作义孤注一掷，当即率精锐部队突袭石家庄和西柏坡，正在沈阳攻城的东北野战军怎么能救西柏坡之危呢？！

在这危急时刻，大智大勇的毛泽东不但镇静自若，而且悠闲潇洒地给新华社写起了新闻消息。那新闻开门见山，直劈要害，标题竟是：《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

10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这条新闻，引起了国共双方的严重关注。蒋介石拍案怒吼：“是谁走漏了消息？！”傅作义紧锁双眉：“共军既已知底，突袭会遭伏击！”西柏坡和石家庄一带的革命军民则秣马厉兵，加强战备。10月27日，新华社又发布了毛泽东写的一条消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

蒋介石、傅作义组织起来的精锐部队，原听说冀中空虚，扑上去就能升官发财，士气辽高；可如今听了这两条消息，知道冀中军民有了准备，又听说锦州、长春、沈阳的数十万国军死的死，降的降，眼看全部完蛋，谁还愿再去冒险为蒋介石卖命？部队拖拖拉拉，一时难以行动了。

这时候，毛泽东在西柏坡，用他那浓重的湖南腔调，唱起了一段京剧《空城计》：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忽听得城外乱纷纷。
旌旗招展空翻影，
原来是司马父子发来的兵。
既领兵就该把城进，
却怎么在城外扎大营……

1948年10月31日，新华社又广播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评论：《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在评论中，毛泽东写道：

“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元事可做，昨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

评论广播后，傅作义那偷袭石家庄的精锐部队，一枪未放，便惊慌地撤回了北平。

蒋介石责怪傅作义军临战不力，行动迟缓，而傅作义不服。蒋介石派人再探，发现刘亚楼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在11月2日攻克沈阳后已先行入关，进逼华北，包围天津，威胁北平。蒋介石闻讯捶胸顿足，又吐鲜血；傅作义慌了手脚，急忙收兵，连驻守保定的兵力也收回北平。

这时候，毛泽东指挥的东北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此役从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历时52天，歼敌47万多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辽沈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一次大决战，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一次大较量，也是斯大林要等着看的一个焦点。

辽沈战役的胜利，敲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丧钟。蒋介石气急败坏，两次

吐血。美国、英国也都很重视这个焦点。美国《纽约时报》写道：“东北的沦陷，不仅关系远东这场内战的胜败问题，重要的是世界均势改变了，而且它是朝着美国希望的相反方向变化的。”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中共占领东北，又将出现一个由北向南的征服形势……从现在看来，中国如要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

这和斯大林当初强调的支持“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是背道而驰，方向相反的。

1948年年底，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介绍了当时中国国内形势以及同国民党谈判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毛泽东说：和平谈判我们一定要进行，但我们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我们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我们正在和北平的军事力量雄厚的傅作义进行谈判，而且有望得到和平解决。如果能和平解决，那么在华北就没有国民党的势力了。

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毛泽东一连谈了三天，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后的打算……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歼灭保定的敌人，北平和平谈判胜利在握，西柏坡的安全万无一失。这时斯大林才派米高扬秘密来华。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米高扬抵达西柏坡。

米高扬化名安德列大，随行人员有苏联铁道部副部长、负责恢复中长铁路的伊万·瓦西利基。柯瓦廖夫、汉学家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和一名警卫人员。

米高扬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他穿着圆领皮大衣，戴顶圆筒皮帽子，昂首阔步，十分威风。他是从大连苏军机场起飞，直抵石家庄的。师哲和汪东兴到机场迎接，并陪他到西柏坡。路上，米高扬几次让停车，到群众家里去参观，到村镇访问农民，同男女老少攀谈，并且不加掩饰地暴露自己。

师哲劝阻无效，便问：“你既然想保密，为什么又要到处乱跑，暴露自己呢？”

米高扬做然地笑着，作了个奇怪的回答：“在你们这里哪能做到保密？！我看明后天我就会在路透社或美联社或其他什么通讯社的新闻消息中出现，而且不只说我访问了中国，或许还会说，俄国鬼子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了。既然如此，躲躲闪闪又有何用呢？”

师哲解释他又不听。但两年后，米高扬见到师哲时，却抱歉他说：“至今任何一个外国通讯社，无论路透社还是美联社都没有报道过我那次石家庄——西柏坡之行的消息。这说明你们党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群众相信你们，听你们的话，跟着你们走，你们的力量和影响当然是强大无比的。你知道，这在我们苏联就办不到。如果有一个什么外国人出现在我们的村镇，那立刻就会向全县、全区、全省宣扬出去的。”

31日13时许，米高扬一行到达西柏坡。毛泽东到大门口迎接，引他到会议室，并把他介绍给了其他四位书记。

米高扬在西柏坡逗留了一个星期，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同志一共会谈了三整天，其他时间是个别交谈、休息、游览。

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首先，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的问候，祝愿中共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接着呈上斯大林赠给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米高扬说：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去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

第二天正式会谈，主要是毛泽东一人讲话，周恩来、任弼时偶尔插话，作些解释。毛泽东一连谈了三整天，即2月1日、2日、3日。

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会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南拿下几个重要城镇后，就不会遇到敌人特别的实力了。

毛泽东说：我们军队的斗志是坚强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军队的主要特点是成分好、觉悟高，战士和指挥员都比较年轻、活泼，他们精力充沛、战斗力强，下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善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性和灵活性。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和战术上都不犯重大错误，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口号、政策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颇得人民的拥戴。全国工农群众和先进知识阶层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后吉中的反动分子大多会跟国民党走，或到台湾，或出国，对于我们，目前可以说是人心所向，民心所归。这是我们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机会。“时乎，时乎，不再来！”这个时机不能失去。其实，在1947年蒋军占领延安后，我们在陕北于10月就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后来还提出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都是我们的战略性的指导口号，而且将要在实际行动中逐步实现的。我们撤出延安时就说过：蒋军一打进边区来，我们就可以在蒋管区作战；他占领延安，我们就可以进攻南京。我们对他们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中共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他主要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等的明确化，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我党已思考过。首先，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其次是它的组成，它的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形形色色的民主党派，有的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虽然他们的力量都下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工农群众中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

国共产党的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

这样的一种联合性质的政权，能合得来，能步调一致么？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工作方法与制度问题。一方面，制度、秩序可以逐渐建立、完善、健全起来，工作方法也可以在工作中逐渐协调和改进。工作中的矛盾、磨擦一定会有的，但也一定可以克服和改善。总之，将来政府的组成大概就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新政权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第二，胜利后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战争一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这不是发出几个口号，几次号召，或作出几项决定就可以完成任务的，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正在研究苏联经历的两次（指十月革命成功后与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恢复工作的经验，作为参考和借鉴。中国有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和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

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拥有最强大、最可靠的战无不胜的雄厚力量。我们的工、青、妇组织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生产建设中也将发挥更充分、更伟大的作用。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群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至于现成的组织形式，工人阶级有职工代表大会；妇女有妇女联合会；而青年，这个几乎占全国近半数人口的群众，除青年团那样的组织形式外，恐怕还得建立发展其它类型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组织形式等。

米高扬插话说：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磨擦？为了便于对青年的组织、安排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一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对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自然，也要保证他们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米高扬急忙声明：他只是带着耳朵来的，没有权力发表意见。从此以后，米高扬再也没有插过话。

毛泽东谈的第三个问题即是军队问题。

接着，他谈了国际关系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他形象地用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进门的譬喻后说，我们的屋子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人进来。

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

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台湾是中国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的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我们的解放战争正在胜利声中向前发展，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好几次的。例如：天津城外某地，山东青岛市附近都发生过冲突。那都是他们出来试探的，一遭到我方的抵制和打击，就龟缩回去了，接着就逃之夭夭，索性撤走了。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剩余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生作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个形势，在往昔，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帝国主义同我们国家之间是有几笔大帐要算的。第一是他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必须全部彻底废除。第二是他们欠我国的一切债务和款项必须偿还。第三是帝国主义的武装部队、警察等必须撤离中国。至于侨民居留问题，则按一般外侨居留办法和国际惯例来处理。帝国主义分子历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对他们也得教训教训，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

毛泽东还谈到了党的民族政策、土改政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介绍了中共党内的情况。其中特别谈到我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如王明、李立三这些犯有路线错误、给党造成巨大损失的同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一点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米高扬来华参加“八大”时，专门提到当他向斯大林汇报这点时，斯大林没有表态。

毛泽东特别谈了独立自主和真假朋友问题，米高扬听了忐忑不安。米高扬摆阔气要吃活鱼。后来，毛泽东下令：“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2月初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去到米高扬的住地拜会他，特别谈到了独立自主问题。他谈得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寓意深刻，余音无穷。兹按当时的翻译师哲的回忆录，将这段话记在此处：

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各个阶段执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事实证明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步骤是牢靠的，虽然遇到的困难不少，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将要遇到的坎坷不平或许还要更多。尽管如此，我们仍是充满信心，稳步地朝着我们的既定目标前进，不达胜利，誓不罢休。这是我们党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全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心。这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接着，毛泽东给米高扬谈了交朋友的问题，特别分析了真朋友和假朋友的问题，富于哲理，非常深刻。他说：

我们认为我们的解放战争越胜利地向前发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

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朋友，同时也更需要朋友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朋友对我们是同情、支持和帮助的，是真心诚意的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们口是心非或者还出些坏主意，使人上当受骗，然后他们幸灾乐祸。我们会警惕这点的。

毛泽东侃侃而谈，米高扬凝神静听。听着听着，米高扬显得忐忑不安。他觉得毛泽东的话似有所指，但又觉得高深莫测，不明所以。他没有插话，也没有表态，只好回去再向斯大林汇报。

其实，这也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一种批评。

毛泽东生活俭朴、待人和蔼、不讲究吃穿，反对那种以富凌穷、抖阔气、摆架子、耍威风的坏作风。米高扬到西柏坡，穿着高级的圆领皮大衣，戴一顶显赫的园筒皮帽子，走起路来昂首阔步，十分威风。起先，毛泽东对他很尊重，热情地欢迎这位来自友好邻邦、并由斯大林派来的使者。但是后来，米高扬那抖阔气、摆架子的作风，使毛泽东有点反感。

为了招待斯大林派来的客人；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安排了三次酒宴。西柏坡是个小山村，又在战争环境中，没有什么高级食品，只有简单的白菜、萝卜、豆腐，部队养的猪和鸡，还有从滹沱河里捕来的鱼。厨师听说招待苏联朋友，精心制作，用鲜鱼做了红烧鱼，还特意做了溜鱼片等花样。苏联人也很热情，拿出了他们带来的许多罐头食品、伏特加酒、葡萄酒，满满摆了一桌子显得很阔气。

米高扬特别能喝酒。他喝酒不是用酒盅，而是用大玻璃杯。大半玻璃杯汾酒，他端起来，像喝凉水一样，“叽咕叽咕”几下子就灌下去了。毛泽东沾酒脸就红，碰杯之后，尝一点，就不能喝了。中共五大书记中，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不能多喝酒；周恩来算是酒量大的了，但哪能与米高扬比？碰杯之后，谨表敬意，喝酒是有限的。

毛泽东见苏联客人举起酒杯，大出风头，工夫不大，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米高扬尝了尝中国的饭菜，夸赞说：“谁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

毛泽东十分高兴，给米高扬挟了一块红烧鱼，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

米高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才动叉子吃鱼。

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这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命令：“你们只能给我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果然，苏联人送鱼来了，是特别警卫队的一位上校带入送来的。中餐厨师一看，是死鱼，就遵照毛泽东“扔回去”的命令，拒绝接收。

苏联上校慌了，想同情况，语言不通，忙从克里姆林宫找来了翻译，才明白毛泽东只要活鱼，不收死鱼。他当即表示歉意：“对不起！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

从此以后，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因此，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赫鲁晓夫特意叮嘱：“毛泽东这个人难对付，他是不吃死鱼的。”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后来，在与师哲闲谈中，米高扬谈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米高扬认为：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坚定的方向，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米高扬在西柏坡还和周恩来、任弼时作了交谈。

2月7日凌晨，米高扬由朱德、任弼时陪同抵达石家庄，游览市容之后，登机回国去了。米高扬访华，是斯大林第一次派政治局委员直接来华了解情况和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也是中苏两党重要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它对斯大林了解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作用。

注释：

参阅宋平著：《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511—513页。

参阅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69页。

参阅董志英：《毛泽东轶事》第114页；黄丽镛：《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72—173页。

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60页。

六 殴打华人，美国总领事沃德被押 义愤填膺，毛泽东号日驱逐美帝

沈阳解放了。工人齐玉衡舞狮庄解放。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殴打齐玉衡，被关入监狱。

沈阳解放了。

这是东北人民的大喜事！接连好几天，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和解放军战士走上街头，欢庆胜利，群众敲锣打鼓，舞着彩旗，游行庆祝，不断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也有的踩高跷，打社火，扮演各种故事，其中那工农兵押着蒋介石过街的形象特别引人注目。

有一支舞狮子的工人大队过来了。最前边的一头雄狮，张着大口，甩着长毛，摇头摆尾，龙腾虎跃，随着那上下翻飞的绣球，跳出多种雄健刚毅的舞蹈，演出许多憨厚可爱的神态。后边的一群大狮子、小狮子，也都随着节奏起舞，吸引得满街的人都来围观。

当队伍来到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门前的时候，那带头的雄狮慢慢地蹲了下来，似乎是要休息；然而，当那绣球从它面前舞过的时候，它却突然大吼一声，张开血盆大口，一个饿虎扑食，蹿了上去，咬住了绣球，博得了满街男女的掌声和喝彩声。掌声未落，那头雄狮竟然唱了起来：

太阳出来照山川，
千家万户笑开颜。
东方睡狮一声吼，
帝国主义吓破胆。
人民领袖毛泽东，
带领工农把身翻，
奴隶如今当主人，
扭转乾坤换新天。

……

装扮雄狮的人边唱边舞，一呼百应。后边的大小狮子，男女群众，连街道两旁看热闹的人，也都陆续地跟他唱了起来。那人越唱越高兴，禁不住脱掉了狮服，站在高台上，领着群众唱……

这时候，人们才看清了此人的面目。他，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躯，浓眉下一对大眼睛，炯炯有神；穿着紧身的狮舞服，显得神采奕奕。众人都跟着他歌唱，为他喝彩、鼓掌……然而，在人群后边，在美国领事馆的楼顶上，却有两个人指着他说：“那不是我们雇佣的劳力齐玉衡吗？”

“是的，沃德先生，正是他！”

沃德先生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中国通”，懂得汉语。沈阳的解放和群众的欢庆已使他怒火中烧，雄狮的表演和歌唱更使他忍无可忍。现在，当看见那位敢在美国领事馆前伸胳膊扬拳的青年竟是他领事馆的雇工齐玉衡的时候，他倒冷冷地笑了起来：“哈哈！睡狮吼，把身翻，哈罗！没工资，没饭吃，我看你还怎么吼，身怎么翻吧……”

过了几天；领事馆发工资了。美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都领了工资，中国的其他雇员也都领了工资，唯独齐玉衡去领工资时，当局却不给。

齐玉衡走上二楼，找沃德要求付给他应得的工资。

沃德冷冷一笑，讥讽他说：“米斯特齐，你不是翻了身、当了主人了吗？还要工资干什么？”

齐玉衡据理力争：“总领事先生！你别这么挖苦人！你们雇我做工，就应该给我工资。我是靠劳动吃饭，靠工作吃饭，并不是白拿你们的钱！你们不要以为有了钱，就可以把中国工人当牛马的作践！你要马上给我付工资！”

“不行！你的工资不能付！”沃德说罢，转身要走。

齐玉衡气极了，迎上前去，拦住沃德：“这工资非付不可！”

沃德也气极了！他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在美国总领事面前这样理直气壮、扬眉吐气，甚至有点骄横拔扈、咄咄逼人，便伸手打了齐玉衡一记耳光！

谁料，一向逆来顺受的齐玉衡，这时却像吃了豹子胆，不但没有被洋大人的威风吓倒，反而理直气壮地扑了上来，拉住总领事大人的领带，要到军管会去评理——

沃德急了，扬拳就打；同时叫身边的四位领事馆工作人员一齐上手，将齐玉衡打倒在地，拳打脚踢……

在领事馆工作的中国工人，看到这种情景，非常气愤，当即联名提出书面抗议，并把身受重伤的齐玉衡抬回他家里。

齐玉衡家里很穷，也很苦。他祖籍河北省阜平县，爷爷齐广德为了逃饥荒，带领三个儿子闯关东，来到东北谋生。老大齐打虎去到贝加尔湖一带去做工，音讯全无；老二齐驱豹说到大连去闯码头，也不知下落；只有老三齐蹯狼跟着父亲在沈阳卖苦力，娶妻生子，有了个家——这就是齐玉衡的家。

齐玉衡兄妹三人，他是老大。弟妹都在上学，爷爷积劳成疾常年有病，家庭生活的重担，主要由他和父亲承担。现在，他被打成重伤，抬回家里，全家人都慌了手脚，不知该怎么办。幸亏在美国领事馆工作的35名中国工人齐心救助，一方面捐钱给他医伤治病，一方面联名写信给军管会，要求伸张正义，严惩打入凶手。齐玉衡送走工人弟兄，对家人说：“爸爸，妈妈！今天我挨美国人的毒打，伤痛好忍，心痛难忍啊！儿希望弟弟、妹妹很快参军，跟着毛主席，给咱穷人创江山，给咱中国人出口气啊！”

齐蹯狼虽然年过半百，体力不佳，但他深明大义，当却把二儿子齐玉功和小女儿齐玉芳叫来，说，“孩子！今天的事情看得很清楚：只有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咱们穷人才能翻身，国家才能富强！你们都要为国家出力啊！”

齐玉功和齐玉芳早已热泪盈眶，泣不成声了。他们给父母和受伤的哥哥磕了个头，转身就走——出门远行。

再说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工作的35名中国雇员，看见沃德等人毒打中国工人齐玉衡的事件之后，个个义愤填膺，怒气难消，不仅联名向美国总领事馆提出书面抗议，而且向沈阳市军管会联名提出书面申诉：要求军管会主持正义，严惩凶手，为中国工人作主！

军管会将诉状转到当地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依怯调查事件真相。沃德不但否认对他的指责，而且反过来指责中国雇员殴打他和他的同事。他说：“10月11日，我手下的中国人殴打我，多亏里伯格子疾眼快，我才免遭另一位手持大棒的中国人的袭击，西考格纳遭到一群中国人的围攻，克里斯丹被打并受到侮辱，身受重伤。”

当时，沈阳解放还不足一月，社会秩序相当混乱，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间谍和当地的武装土匪，伺机进行破坏捣乱，蓄意挑起国际争端，以牵制解放军大军南下。为了及时审理打入事件并保护美国侨民的人身安全，11月

24日，当地警方将沃德总领事和4位领事馆工作人员（美国人：拉尔夫·里伯格、希罗·塔休密；意大利人弗兰克·西考格纳和德国人，阿尔弗雷德·克里斯丹）从领事馆带走，关入监狱。其罪名是殴打领事馆雇员齐玉衡。

美国国务院议论纷纷。有的要柯乐博向中共“口头照会”，有的要“施加压力”。但软硬兼施，都如石沉大海……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用炮舰轰开了神州的大门，西方列强在中国取得了各种各样的特权。火烧圆明园无罪，南京大屠杀无罪，至于一般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殴打中国工人，那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更不在话下了。如今，高贵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先生，殴打了一名普通的中国雇员齐玉衡，初解放的沈阳当地警方，竟敢将享有治外法权的美国沃德总领事关入监狱！这简直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于博将此事用电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了。美国国务院当即指示柯乐博面见周恩来或其他负责外交事务的中共高级官员，就此事提“口头照会”，说明美国政府“以极其忧虑的心情”，注视着中共当局对美国驻沈阳领事官员的“专横行为”和拒不提供给他们撤离之方便的失信行为。但是，柯乐博没能见到周恩来或其他中共高级官员，只得递交了一封信。信中他不但要求“迅速解决”这个问题，还“特别要求给予英国驻沈阳领事代表一个机会，以使其能探望沃德先生和其他被指控犯殴打罪的人”。

然而，“口头照会”和递交的信，都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

柯乐博感到，“现在是施加压力的时候了”。他建议国务院“在沃德等人被释放并撤离沈阳之前”，暂时停止“所有商业谈判以及与中国的贸易”。

一石击破水中天！美国国务院一时间议论纷纷。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一直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妄图消灭中共和人民武装力量，“统一中国”。然而，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人民革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在东北和华北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美国为了保护他的在华势力，与英国一起做出一个关键性的反应步骤——原地不动，让美国驻沈阳的领事馆在人民解放军占领该城时原地不动，继续开门办公。美国国务院当时认为，这不仅有利于美国企业和慈善机构继续活动，而且可以和中共当局谈判，讨价还价，利用中共领导的新政权要取得美国英国等列强承认，向中共施加压力，讨些便宜。

谁料，中共领导的新政权和蒋介石的旧政权根本不同，他下但不按列强的眼色行事，而且对于帝国主义强列的侵略行径，霸道作风，该顶的顶，该碰的碰，毫不示弱，把蒋介石国民党几十年来的奴性外交一扫而光。关押沃德只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一种讯号，一种表现。

对此，横行霸道惯了的美国国务院当然受不了。他们就像一位经常骑在马上作威作福的骑士突然被马当众踢了一下那样，顿时恼羞成怒，要挥鞭报复了。

毛泽东害怕美国施加压力进行报复吗？这是当时许多人都关注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闻讯，义愤填膺，强调指出：“历史是按照斯大林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

当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等人殴打齐玉衡的消息传到中共中央的时候，许多人都气愤地要求严惩。

毛泽东闻讯，义愤填膺，彻夜难眠。他拿出一本《斯大林选集》来读，读着，读着，思潮起伏，提起笔来，给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写一篇文章。文章是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而作的。一开头，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写道：

“现在，当着全世界觉悟的工人阶级和一切真诚革命的人们对于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十一周年举行欢欣鼓舞的纪念的时候，我想起了斯大林在一九一八年，在十月革命第一个周年纪念的时候所写的著名的论文。斯大林在这篇论文中说：‘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毛泽东强调指出：“历史是按照斯大林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条革命战线是在列宁，而在列宁死后是在斯大林的英明的指导之下，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写文章，思如泉涌，笔似蛟龙，龙飞凤舞，并不吃力。然而，当他听到美国官员沃德殴打中国工人的事件后，禁不住那握笔的手颤抖起来，怒火中烧，热血升腾，写不成了。他放下笔，抬起头来，那一双平月和善略带微笑的眼睛里，顿时如喷怒火，熠熠灼人，盯着站在一旁的师哲，没头没脑地问：

“你说说，一个美国的官员来到中国的土地上，吃中国的饭，为什么还要打中国人？！”

师哲知道，毛泽东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早在1910年秋，16岁的毛泽东步行50里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去

求学时，就写了一篇《救国图存论》，还写了一篇《言志》，表达了他对祖国贫弱落后的忧虑，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国呼声。不久后，为了表示以救国济民为自己的责任，毛泽东特地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名：“子任”。1915年，日本为了独吞中国，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袁世凯想当皇帝，卖国求荣，于5月9日全部承认了二十一条。毛泽东读了一本揭露袁世凯卖国罪行的小册子《明耻篇》后，在封面上写了四句话：“五月九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在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毛泽东一直主张“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救国救民，日本侵占东北后，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和红军北上抗日，联合一切爱国力量，经过八年浴血奋战，

才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美帝国主义不但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驻沈阳的美国总领事沃德又野蛮毒打中国雇员，是可忍，孰不可忍！师哲听到毛泽东的问话，顿时怒火中烧，气愤他说：“那些美国官员，尽管口喊‘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可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想骂就骂，要打就打！”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日子过去了！我们要驱逐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扬眉吐气！”

毛泽东豁达大度，很少发火；然而，这一次，他却义愤填膺，火冒三丈，眼睛都气红了。每当听到中国人民受到摧残、侮辱，他就像自己的父母兄妹受到了摧残、侮辱一样，怒不可遏，这一次，还没有等师哲把话说完，毛泽东就接过了话茬。

“不行！”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日子过去了！我们要驱逐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扬眉吐气！”

师哲高兴地说：“是啊，这个方针是英明果敢的，表达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愿望，也反映了中华民族迫切的要求。我记得在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席一提出来，就得到了热烈的拥护！”

毛泽东那愤怒的情绪，在师哲的谈笑中，在有关9月会议的叙述中，渐渐地被革命的自豪、胜利的喜悦所融解。他说9月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我们这个党是经得起各种考验的党。有了这样的革命党，有了这样的按照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才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师哲半开玩笑地说：“不仅如此——”

“还有什么？！”毛泽东立刻认真地站立起来，走到师哲面前问：“你说说，还有什么？”

师哲也认真地说：“还必须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哦？你——”毛泽东把脸一沉，进一步逼问：“你这是空洞的恭维，还是具体的分析？”

“当然是具体地分析。”

“好！”毛泽东进一步逼问：“那就请结合9月会议前后的情况，说说你的分析吧！”

这不仅是反对阿谀奉承，简直是不许准备，当场测验，当面考试！

然而师哲沉着冷静，毫不慌乱。他笑着说：“9月会议是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近三年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首先由主席作报告，谈了八个问题——”

毛泽东又一次打断师哲的话，追问：“我不是要你谈这些一般情况，而是要你具体分析你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师哲也毫不退让，据理力争：“别急嘛！‘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也是要从分析情况中来说明的……”

“那么，好！你说——”

“你听！”师哲仍然笑着说，“我记得主席在报告中首先重申了1946年提出的对国际形势的三点估计。即：‘世界战争的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美苏之间在若干国际问题上将或迟或早达成妥协；美苏之间的妥协是苏联及一切民主力量向反动派力量作斗争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各国人民都必须向反动派妥协。我认为，这三点估计，特别是最后一点估计，是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实际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是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完全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因而使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要不，如果接王明他们搞的那一套，照搬苏联的经验，照搬斯大林的做法——苏联和美国妥协，我们也跟着向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妥协，那么，还会有今天的胜利吗？还会有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吗？”

师哲讲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毛泽东忍不住点了点头，脸上绽开了笑容。

师哲接着说：“我记得主席在报告中强调：‘反动派自古以来，对民主势力就是两条原则，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将来消灭之……我们对反动派也应采取同样两条原则，我们今天是第一条。’现在看来，这个第一条是用对了。主席，你说呢？”

毛泽东轻轻地点了点头。他不仅赞赏师哲的记忆力、分析力，而且不得不同意他提出的论点和论据。他记得在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谈到，有几次看到美国气势汹汹，担心世界战争会打起来，担心美国会出兵直接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但是，两年多来国际形势的发展，两年多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实践，证实了自己当初的估计，证实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外强中干，这就解除了人们思想上的一个很大的疑虑。不过，自己和党中央当时并没有排除美国在局部地区实行直接干涉的可能性，自己也同意让周恩来发言时特别提醒：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是美帝出兵，我们不能不作这种估计：但大批的，几十万上百万的出兵干涉恐怕不可能。美国可能由此控制一些最大的城市，使我们更须组织大的力量去围歼，夺取胜利所需的时间可能长些，但美国改变不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前途。

毛泽东办事认真，胆大心细，在实际斗争中，宁肯把困难估计充分些，办法想细些。但他决不会让困难吓倒、向敌人低头。

毛泽东还记得，在那次会议上，他曾估计可能遇到两种困难，一种是大的，我们对整个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还有一种是比较小的。小的错误好改，大的比较困难。他当时说，“我们党曾遇到过两次大困难，是在两次大错误之下产生的，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和1935年的万里长征，后来的困难比较不同，也比较容易克服。今后的困难就是假设我们估计错误，世界战争爆发了，而且爆发得很快。战争不爆发，对中国革命有利得多，国际方面可能援助我们，再有三年就能打倒国民党。如果我们估计不足，大战来了怎么办？还不是要干？还不是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打仗的党，也不怕，我们对此有了精神准备，有备无患嘛！”

现在，国际局势的演变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分析判断，实现着毛泽东的战略计划和大体安排。因而，毛泽东的威信更高了，权力更大了，党内党外的赞誉、称颂、褒扬越来越多了。

毛泽东对此有点警惕。他常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名、胜利、成功、赞扬也有两重性，闹不好，会把人引入歧途，会把人毁了。因此，当师

哲谈到“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时，毛泽东态度严肃，再三追问，直到他觉得这是科学分析而不是阿谀奉承时，才轻轻地地点了点头。实际上，毛泽东对这类事情的思考，对于因为胜利可能骄傲的警惕，远不止此。在不久后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为此，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规定不准为领导人祝寿，不准宣传个人，不准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等等；要求党员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下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再说毛泽东经过和师哲的一阵交谈，精神更大了。他激情满怀，意气风发，立刻又坐在桌前，奋笔疾书。他明确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回顾历史经验，毛泽东指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的德意日，这是十月革命的结果。假如没有十月革命，假如没有苏联共产党，没有苏联，没有苏联领导的西方和东方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还能设想战胜法西斯德意日及其走狗们吗？”

展望世界风云，毛泽东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代替法西斯德意日的地位而疯狂地准备着新的世界战争、威胁全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地的走狗们，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极端腐败及其濒于灭亡的恐怖情绪。这个敌人还是有力量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遵循正确的政策，否则就不能胜利。这个敌人的基础是虚弱的，它的内部分崩离析，它脱离人民，它有无法解脱的经济危机，因此，它是能够被战胜的。对于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和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11)

在这里，毛泽东分析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地的走狗们”的情况，指出“它是能被战胜的”；肯定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的德意日”，指出“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遵循正确的政策，否则就不能胜利”。他既肯定了斯大林的丰功伟绩，又委婉地指出了斯大林等人的错误，“对于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和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沃德等人彼关押，美国国务院根据多年来和蒋介石国民党交往的经验，准备继续玩弄强权政治，用施加压力的办法迫使毛泽东和中共就范。然而，毛泽东却笑着说：

“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

“人们不要很久就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全部反动统治将被中国人民所彻底地打碎。中国人民是勇敢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勇敢的，他们一定要解放全

中国。”(12)

注释：

参阅《美国外交文件集 1949 年第 8 卷第 984—986 页；〔美〕爱德温·W·马丁著：《抉择与分歧》，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0 页。

疑是 11 月 11 日，待考。因为沈阳是 11 月 2 日解放的，事件发生于解放后。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 年第 8 卷第 1032 页；〔美〕爱德温·W·马丁著：《抉择与分歧》第 90—91 页。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 年第 8 卷第 1000—1002 页。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357 页。

参阅《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版第 531 页。

(11)(1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38 页和第 1357—1359 页。

七 恼羞成怒，杜鲁门扬言要用武力 高瞻远瞩，毛泽东坚持革命到底

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要对中共“采取最强硬和可能的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国务卿艾奇逊如老虎吃天，无处下爪。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头等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它倚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打着“遏制苏联势力”的旗号，到处扩张侵略，横行霸道，目空一切。在中国，它肆无忌惮地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利用蒋介石国民党来统治中国。如今，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力量不但把蒋介石的“国军”打得落花流水，而且胆大包天，竟敢把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沃德等入关押起来，绳之以法。这使美国统治集团十分恼火。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愤怒地建议向中共施加压力。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对柯乐博的建议首表同情。助理国务卿帮办利文斯顿·麦钱特给国务卿艾奇逊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赞成以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为影响手段，使中共很快释放沃德等人。麦钱特认为，这个机会就在眼前：当时，中国人想从日本进口6子万吨铁轨、1万吨钉和胶合板等物资，驻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是美国人，他对这笔交易感兴趣，并要求美国国务院给予政策指导。麦钱特认为，只要美国向中共表明，如果沃德等人仍被关押，“这些贸易谈判似乎不可能达成满意的结果”，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国务院经济事务司对这么做的效果表示怀疑。他们说：“在德国，捷克人和苏联人也扣押过美国人”，当时也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都遭到拒绝，而最终还是采用了“其他一些措施才使他们获释”。

就这样，众说纷坛，莫衷一是，闹得国务卿艾奇逊左右为难，十分苦恼。驻北平的总领事柯乐博连电催促，要求明示；总统杜鲁门再三询问：“国务院对此大事如何处理？”而多年来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的艾奇逊，对此竟像碰到了个十八丈高的金刚，一时摸不着头脑。

迫安·古德哈姆·艾奇逊，是美国第51任国务卿。1893年4月11日；他生于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镇，1915年毕业于那鲁大学，1918年获哈佛大学法学士学位，1933年5月任罗斯福政府财政部副部长，1941年踏入美国国务院大门后，使青云直上，由助理国务卿到副国务卿到国务卿，参与了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历次重大外交活动，在制定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30年代，通过摩根财团，他结识了杜鲁门，并且关系很好。1945年，杜鲁门出任总统时把艾奇逊视为“亲信”，并任命为副国务卿，在乔治·马歇尔手下工作。不久，由于马歇尔率使团出访中国，艾奇逊就顶替了马歇尔的空缺。1946年，他出任内阁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在1948年11月联合国将军联席会议上通过了艾奇逊草拟的《利连撒尔报告》，建议建立一个国际性原子能发展权力机构。艾奇逊在国务院成立了“援外委员会”，专门为特别委员会起草陈述国务院看法的备忘录。在委员会草拟“援欧计划”时，艾奇逊发表了一篇演说，被杜鲁门称为“重要的试探气球”，为“马歇尔计划”的出笼及“第四点计划”的抛出作了舆论准备。它发表后，不但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而且为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勾画了一幅蓝图，成为马歇尔计划的序幕，在“援欧计划”上，艾奇逊大出风头，名噪一时。

然而，在中国问题上，艾奇逊却感到前后维谷，左右为难，十分棘手。他希望蒋介石国民党得胜，统一中国；可是“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详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它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内，所曾经做过的或能够做到的种种措施，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美国所没有做的种种措施，也不会影响和改变内战的结果，这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品，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中国国内已经达到了一种定局，纵使这个定局只是因为未尽职责的结果。”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已经使艾奇逊先生感到黔驴技穷，力不从心，无计可施了！然而，沃德等打人凶手又被沈阳当局关押着，不救下行，救又无计，这怎能不使艾奇逊大伤特伤脑筋呢？

就在此时，国防部又有人提出了以武力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张。当杜鲁门总统 11 月 14 日表示应探讨一下封锁从中国华北港口向上海运输煤炭的航道的可能性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两周前，杜鲁门曾对詹姆斯·韦布说：如果美国能用飞机将沃德等人撤出沈阳，他准备“在有必要和有把握的情况下，采取最强硬和可能的手段，包括使用武力”。

事情闹大了，总统发火了，甚至准备蛮干！艾奇逊又怕蛮干下去后果不堪收拾，所以 11 月 17 日，国务院又派出了一批人，由艾奇逊牵头，包括司徒雷登，劝杜鲁门不要采取极端手段——“无论是军事的还是非军事的”。11 月 18 日，由布莱德将军签署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直接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导致战争，而且也不能保证沃德早日安全返回。它建议通过谈判达到释放沃德的目的。

三天后，艾奇逊在致总统的备忘录中指出：上海并没有从华北港口输入多少煤炭，甚至封锁所有中国海港也不会“给中共政权制造出经济危机，相反，会使中共在国内外得到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以证明他们关于美国抱有帝国主义目的的说法”。艾奇逊认真地总结了美国过去在中国失败的教训，强烈反对封锁政策或对“其他外国船只”诉诸武力的政策——很显然，在对华贸易中，这最可能是英国的船只，那样诉诸武力，把中共没有伤着，美国 and 英国先开火了，那怎么行呢？

一正压百邪！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打跨了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国军”，关押打入凶手、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等人，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急得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以至总统杜鲁门日谋夜算，反复磋商；文要谈判，使其就范斌要动武，施加压力；经济封锁，军事制裁，软硬兼施，文武并用……各种手段、措施、策略、办法，都想到了，用过了，然而，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人民力量却坚如磐石，稳如泰山，毫不畏惧，又不就范，甚至连他们通过多种渠道、运用多种方式发出的各种信号，也不予理睬。

这样以来，足智多谋的艾奇逊先生，简直像威镇群山的老虎要吃大，无处下爪。他绞尽脑汁，没有办法，如坠五里云雾之中了！

毛泽东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写道：“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

当时，中国的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进入了高潮，得失成败，关系着世界的

大局；是非曲直，引起了世人注目。两种命运大决战，各种力量大改组，形势错综复杂；斗争千变万化。人们都注视着毛泽东。

原来，毛泽东高瞻远瞩，统观全局，对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政策，有一个清醒的估计。

毛泽东写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疯狂侵略，反对卖国、独裁和以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为目标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现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两年时间内，已经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三百三十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由防御转到了进攻。”“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一九四五年的一百二十一万万人，增加到现在的三百万人。”

在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11)

这个任务，伟大、光荣而艰巨，困难也很多。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知道，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不怕这些困难。我们认为困难是必须克服，并且能够克服的。”(12)

辽沈战役一结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即指挥人民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这是中国战略决战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数量最多的一个战役。这次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战役从11月6日发动，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6天，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这一胜利，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使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的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调兵遣将，从12月初开始，进行平津战役，一步一步地歼灭蒋介石、傅作义在华北的部队……。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作为1949年的新年献词，由新华社公开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论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过的曲折道路和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美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可能采取的新策略。

毛泽东写道：“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13)

敌人的这种政治斗争的方法是什么？毛泽东指出：在外面，他们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在战场上打败仗之后，装着要“和平”的样子，进行和平谈判，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将革命扼死。另一方面，钻入内部，使用孙悟空钻入铁扇公主肚子里边捣乱的战术，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捣乱，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阵营。

毛泽东写道：“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

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14）

怎么对待敌人的新策略、新阴谋呢？毛泽东没有一个一个他讲述对策，也没有零敲碎打地进行分析，而是高瞻远瞩，统筹全局，向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二者必居其一。如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那就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在指出两种可能性和两种前途之后，毛泽东写道：“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那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了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15）

毛泽东在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划了一条界线之后，简要回顾了一下1927年4月12日反革命政变至1948年底的历史；回顾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来，1945年10月重庆谈判和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的历史，强调指出：在这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民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耐心的劝导，都没有改变他们刽子手杀人的本质，都没有改变他们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本性。毛泽东指出：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毛泽东特别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

一再表示，从 1945 年 12 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毛泽东讲了一段古希腊寓言：一个农夫怜悯一条冻僵了的毒蛇，把它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暖活，而又被毒蛇咬死的故事后说，“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在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16)

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事物尚在萌芽初发、青苹之末的时候，他就能抓住端倪，预见未来；看到趋势，提出对策；并且把那全世界，包括全中国在内的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多种势力、多种矛盾的纠葛，概括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划出一条清楚明晰的分界线，用一篇不长的文章，就讲得一目了然；万众信服。因而，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后，引起了各方重视，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校正目标，统一思想，组成了真正的广泛的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由于他将问题提得这样尖锐：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二者截然相反，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什么“中间路线”。所以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迅速地作出了选择，表明了态度：不仅纷纷发表声明，支持中共领导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且有许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和著名爱国领袖，如宋庆龄、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沈雁冰等人，通过香港、澳门等多种途径，从国统区到解放区北平。这样，过了半年到 1949 年 6 月 15 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就在北平开幕了。参加会议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 22 个单位，134 人。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常务委员会。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是正确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

第二，动员人民，共同奋斗，加速了革命的发展。1 月 31 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城，历时 64 天的平津战役宣告结束。在这次战役中，解放军歼灭和改编敌军 52 万人，华北地区基本解放。4 月下旬，百万雄师过大江，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 月 23 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 22 年反动统治的灭亡。5 月 27 日，又解放了中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上海。

第三，驳倒谎言，揭露阴谋，使敌人分崩离析，更加孤立。1 月 21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濒临覆灭的情况下，以“因故不能视事”为名宣告“引退”，把伪“总统”职务在名义上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蒋介石由南京回到老家奉化，退到幕后指挥；并拟定了一项利用谈判争取 3 个月至 6 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百万军队，以图卷土重来的反攻计划。不久，李宗仁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商谈。4 月 20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除了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外，还要求先达成临时停战协定，就地停战，自己揭穿了自己“呼吁和平”的假面具。8 月 4 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起义，湖南省会长沙解放。9 月 19 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率

部起义，绥远省和平解放。9月下旬，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新疆省军政人员先后通电起义，新疆省和平解放。这样，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致使美国统治集团坐卧不安。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竞选获胜、准备连任的前夕，急忙与他的“亲信”艾奇逊等人苦苦思索，筹谋对策。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反复密谋之后，他们拟定了一个美妙的计划。杜鲁门吹嘘说，这个计划“在迄今已采用的方法中，它是对共产主义最强烈的消毒剂。”(17)

注释：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996页。

《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4月版第181—182页。

《美国外交文集》1949年第8卷第1008页。

《美国外交文集》1949年第9卷第1355页。

《司徒雷登日记》，第57页。

《美国外交文集》1949年第8卷第1011—1013页。

《美国外交文集》1949年第8卷第1010—1016页。

(11)(1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59页。

(13)(14)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74页。

(1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7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77页。

(17)《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10月版第276页和284页。

八 心悦诚服，米高扬称赞毛泽东 固执己见，斯大林继续走钢丝

米高扬称赞毛泽东，“是个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斯大林坚持“保卫苏联”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

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但震动了西方列强，而且使莫斯科感到惊讶！克里姆林宫犹豫了。

沉着老练的斯大林，面对自己不大喜欢的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势如暴风骤雨似的迅猛发展，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连续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歼敌 160 多万人，解放了大部分国土，使全中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而自己再三向美英等西方盟友保证“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战争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主席继续领导”，到如今，赖狗扶不上墙，不但蒋介石赖以维护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已被基本消灭，连“蒋主席”自己也不得不宣布下野，由“代总统”李宗仁收拾残局，这叫我该怎么办呢，是继续实践诺言，“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吗？还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说自己当初说的如果打人民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的话，是错话、昏话、愚蠢话，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作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苏联，应该支持中国人民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很显然，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然而，事关重大，情况复杂，一时又难决断。于是，斯大林不仅每天都注视着中国时局的发展，而且叫贝利亚、米高扬以及“克格勃 7 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驻美国大使等有关人员和部门，及时提供有关中国的材料和情报，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态度 and 动向。

1949 年 3 月的一天，苏联负责亚洲和中国事务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兴致勃勃地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屁股没坐稳，就高兴地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我到中国解放区看了几天，十分激动地告诉你，毛泽东很了不起，中国共产党很了不起，中国人民的革命不但发展很快，而且继承了苏联十月革命的优良传统：还有一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很坚决，公开提出要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这和蒋介石国民党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

米高扬说得很激动，斯大林依然很平静。他抬起头来，望着这位健壮的部长会议副主席，淡淡地问：“米高扬同志，你到中国去，接触过毛泽东。你说说，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毛泽东嘛——”米高扬比划着说，“个头很高，身材魁梧，但不修边幅，穿着一身松松垮垮、十分陈旧的粗布灰军装，朴实得简直像个农民，但精力充沛，眼里有神。几句话就能把你引入他的意境。我们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山村——西柏坡谈了好多次。我认为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坚定的方向，高明的策略，是个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斯大林依然不动声色，平静地说，“这个毛泽东嘛，没有到过苏联，我不了解他。照你说，你对他的印象不错。然而，说话要有根据，你的根据——特别是毛泽东对美国态度的根据是什么？”

米高扬打开公文包，取出了一本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48 年第 21 期，递给斯大林，说：“这上面有毛泽东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

31 周年写的一篇文章，其中特别引用了您在 1918 年写的著名论文的观点，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斯大林打开刊物，边读边说：“好吧，请继续讲！”

米高扬又拿出了一本小册子——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说，“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特别对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对策，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特别强调，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的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我到中国解放区特别注意观察了一下，确实没有一个美国兵，人民组织得很好，革命积极性很高。我曾怀疑，美国派往中国的那么多的军事人员到哪里去了呢？山沟沟出来的土八路又怎么对付那些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呢？毛泽东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在解放战争的发展中，还没有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好几次，例如，在天津城外的一个地方发生过冲突，在山东青岛市附近发生过冲突，特别是青岛驻扎有好几万美军，曾试探性地进行挑衅，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毫不示弱，对于美军的威胁和挑衅，坚决抵制和打击。美军欺软怕硬，见威胁无效，怕事态扩大。不仅龟缩了回去，接着索性撤走，逃之夭夭了。这在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史上是罕见的，也是国民党蒋介石先生作梦也不敢想的。

米高扬说，毛泽东告诉我，他们的经验是，美军虽然叫得很凶，其势吓人，但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大量供给蒋介石的军队，指望这些饭桶发生作用。其它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谁也没有能力到中国冒险。所以，毛泽东认为，这个形势，来之不易，他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将革命进行到底！

性格多疑的斯大林，尽管听得全神贯注，津津有味，但心头的疑云并未散开。他问：“按你这么说，毛泽东不但是个反侵略的民族英雄，而且是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是的。”米高扬点点头说。“我是这样看的。斯大林同志，关于我和毛泽东及中共五大书记晤谈的情况，我们整理了个书面材料，请您过目。”

斯大林接过了米高扬递上的材料，没有翻阅，却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你说说，当苏德战争处在最紧张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又准备从东方向苏联进攻，当社会主义的苏联处在最困难的关头，可能面对德日法西斯从东西两面夹攻，使我们腹背受敌、危机深重的时候，我曾数次打电报给毛泽东，说由我们提供几个师的武器装备，运至中蒙边界，希望中共组织兵力到蒙古接运装备，抗击东线日军。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我曾连电催促，毛泽东一直顶着不办。你说说，这是为什么？”

米高扬解释说，也许，当时中共有什么难处。

“什么难处，”斯大林严肃起来，厉声责问：“有一个检验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政党之间的分水岭，你还记得吗？”

米高扬立刻恭顺地站起来，不无歉意地说，“对不起，斯大林同志，我把这一点忽视了。而这一点，只有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它可以检验出各个政党、集团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

这里所谈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就是斯大林多次论述过的“保卫苏联”问题。这个问题是斯大林在 1927 年 8 月 1 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在题为《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说中，斯大林专门谈了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问题，他说：“检验某

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不是根据它们发表什么样的声明或宣言”，“是根据他们的行动、实践和实际计划”。“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们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

在这里，斯大林把苏联一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凌驾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之上，并且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对立起来，作为检验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要它们“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不仅如此，斯大林还进一步说：“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犹豫动摇，提出附带条件，寻求第三种立场，就是企图逃避责任，逃避无条件地捍卫苏联的斗争，在保卫苏联的重要关头开小差。而逃避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等于不知不觉地滚到苏联敌人的阵营里去。”

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不但多次强调这种观点，而且一直坚持这种做法。因此，1943年，毛泽东没有同意他接运苏联武器，装备几个师的兵力，抗击东线日军的建议，便成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猜疑、不满的重要依据。其实，这是误解。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的简单办法，而指示吕正操、萧华、李运昌、程子华等尽快地将部队摆上了山海关、长城一线，开展游击战争，箝制日军兵力，实际上起到了更好的配合苏军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

一条带有大国沙文主义色彩的“分水岭”，加上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而强要对方接受、执行的决策，对方不执行便怀疑对方的革命性的猜疑和不满，使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误解越来越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影响了苏联的重要决策。

斯大林心头的疑云未散，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当时斯大林威望很高，罗斯福、杜鲁门、丘吉尔等都曾对他备加赞扬，敬重三分。

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和对中共及毛泽东的怀疑，不仅对社会主义的苏联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众所周知，1945年初，苏联红军大反攻，追击德国法西斯，接连攻占了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广大地区，把政权交给了当地的共产党人，后来成立了东欧的好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过了不到半年，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仅仅9天时间，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按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武装夺取的政权，应该交由该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党来领导，东北应该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照例，依照二次大战中苏联和美英解放的地区都按本国性质建立政权的先例，依照苏联在东欧解放区将政权交由该国共产党领导的先例，东北亦应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然而苏联没有这样做。斯大林以种种借口，要把中国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国民党蒋介石。当时，已经宣布投降的日军和伪军，

仍然控制着华北、华东和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他们得到命令，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而不能向共产党人投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美国的这一政策，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是偏袒、庇护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帮助它扩大在东北、华北、华东的影响，而压制、阻挠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已经实行土地改革和其它改革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在盟国中，只有苏联有资格、有实力坚持正义，抵制美国的错误政策；然而，斯大林由于偏见、误解和猜疑，不但没有坚持正义，而且把苏联红军解放的东北三省的行政主权也交给了国民党蒋介石。

当时，东北三省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工业基地，经济实力雄厚。如果苏联人当时完整无缺地把东北交给中国共产党人，那么，已经在抗日战争中强大起来的中共，既控制了广大农村和华东、华北、西北，又掌握了相当大的工业力量，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必然会更快地打败国民党。

然而，苏联政府只同蒋介石政府谈判，而没有同中国共产党人亲密合作，致使中国革命走了一些弯路。现在，斯大林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权已经土崩瓦解；毛泽东和中共在反对美国侵略上态度坚决，措施得力；历史已经证明，自己前两年的猜疑、动摇是不对的。

更令斯大林头痛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美国，依靠它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英国一起，刮起了“冷战”之风，企图将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连根拔掉。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一唱一和，掀起了反苏反共的狂涛巨澜，不时地向苏联挑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打得筋疲力竭、千疮百孔的苏联，亟需和平建设，恢复生产，哪能再向当年的盟友应战呢？然而，西方政治领导人丧失理智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甚至连罗马教皇都宣称，凡是同情共产党人的天主教徒，都将一律革除教门。醉心于实力的美国不但高喊反苏反共，而且在五角大楼制定了对苏联进行核轰炸的计划。斯大林清楚地知道，这个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样稳重老练、处事周全，有时会头脑发热，拼命蛮干。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当德、意法西斯早已投降，日本法西斯已经溃不成军、准备投降的前夜，杜鲁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杀鸡给猴看，威胁苏联，迫不及待地悍然下令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先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杀伤了无辜的老百姓20多万。现在，二战结束刚满三年，美苏关系急转直下，由过去的盟友变为仇敌，杜鲁门手里的原子弹会不会向莫斯科扔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继续采取慎重稳妥的政策，一方面苦练内功，不断加强苏联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注重礼仪，竭力不刺激昔日的盟国。他听到过毛泽东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谈话，也赞赏毛泽东的英雄气概和深刻分析。他也曾多次向人民说明，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民群众，但他没有用“纸老虎”式的语言去刺激对方。在中国内战的问题上，他虽然对毛泽东有过某些猜疑和不满，但也不是反对或不支持中国革命，而是怕中国内战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过分地刺激了美国，引起了美苏对抗，甚至引发他斯大林极不愿意看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他才警告中共和毛泽东，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他才不得不在中国的两个武装集团之间走钢丝。即：一方面公开地“支持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实现对美英的保证；一方面又给中共以可能的援助，秘密的支持，但以不引起美苏对抗、战争为限。现在看来，毛泽东和中共在

这个火候的把握上，比他斯大林预料的要好，既打垮了蒋介石国民党，驱逐了美国的侵华势力，又没有引起美苏在中国问题上公开对抗。这说明毛泽东了不起。而同时，也证明了他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谨慎的态度是正确的。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处理中国问题，不但要看国共两党斗争的形势，要看蒋介石和毛泽东搏斗的情况，而且要看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对美苏对抗的作用，对两个阵营的作用。那么，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呢？1949年2月1日，“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里·史密斯从巴黎拍给斯大林一封电报。“白宫官方代表查理斯·罗斯今天宣称：杜鲁门总统很高兴有机会同您在华盛顿商谈，阁下是否愿意为此目的前往华盛顿？如果不愿前往，那末，您愿意在什么地方同总统会晤？”

斯大林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知道研究一个人的历史，是判断这个人行动方向的一把钥匙。于是，他找来了有关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材料，有关美国对苏联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各种情报进行研究，并且找来了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探讨。

斯大林明白，他的威信，在战前只是在国内，在共产国际的范围内是无可争议的，现在则具有国际性和世界性了。西方列强的首脑们，在个人会见和大量通讯中，对他斯大林也备加赞扬。罗斯福多次赞扬过他，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也写道：“您显示了酷爱自由、高度勇敢的人民摧毁野蛮的恶势力（不管这种恶势力多么厉害）的能力。值此我们取得共同胜利之际，我谨向苏联人民及军队以及他们卓越领导人表示祝贺之忱。”

斯大林还记得，在和杜鲁门初次会晤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了居高临下的姿态。那是1945年7月17日12时，斯大林在波茨坦同杜鲁门会晤，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说道：“请原谅我迟到了一天。我由于同中国人谈判耽搁了。我想飞来，但是医生不让。”

“完全理解。”杜鲁门客气地说，“很高兴同斯大林大元帅认识。”

其实，斯大林的迟到是为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在波茨坦会议上他总是迟迟到会，以至英国代表团成员怀特回忆说，“我们也就不得不长时间地等待他的到来。”在这次谈判中，由于苏联人民在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功绩，斯大林倍受尊敬，几乎成了人们注视的英雄，连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不得不对他敬重三分。

斯大林脚踩两只船，继续走钢丝：一面派罗申大使随国民党政府去广州；一面派柯瓦廖夫到北平，拜会毛泽东。

斯大林沉着老练，善用智谋，城府很深，处变不惊。有许多一般人感到十分棘手的难题，到他的面前变得不难。他往往用极简炼的语言，甚至在谈笑之中，点出本质，化解难题。

有一次，他正和莫洛托夫等人谈论中国革命的形势。这是他当时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他曾表示“支持蒋主席统一中国”，而蒋家王朝却快要完蛋了；他不同意中共打人民解放战争，然而中共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面对此情，该怎么办？斯大林多时也拿不出好主意。

这时候，莫洛托夫拿出了苏联驻南京国民党政府大使罗申的报告和请示，要求斯大林表态。罗申大使的材料，详细地叙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将渡江南下，南京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内部倾轧、土崩瓦解的情况，并说

他们已得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正式照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外交使团随行。此事关系重大，罗申请求指示。

这是个十分敏感的难题。一个国家大使馆的去留，标志着一个国家对驻在国政权的基本态度。当时的中国，形势已经明朗化：原有的南京国民党政府行将垮台，中共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即将诞生。因此，连多年来一直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都让自己的驻南京大使馆原地不动，以便争取与中共接触。美国的上上下下，为此也颇费运筹，考虑再三。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其自传中写道：“政府为保持其声望，自然要求外国使团迁往广州，在法律上，我们都被委任给它，所以也应该合乎体统地跟它到‘临时首都’去。”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合乎体统地”跟着国民党政府到广州去，而是多次和他的北大西洋条约国家的同事们反复讨论“去与不去”的问题。在1月19日的一次会议上，他们一致同意向他们各自的政府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在事实上迁往广州，每一位大使就从其下属中选派一名高级官员随往，可能的话，再伴随其他一些人。从未来的角度看，大使本身要原地不动，以便继续保持接触。这个建议与上十月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应急计划是一致的。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斯在给代国务卿的备忘录中说，如果司徒雷登大使从南京撤出，看上去就像美国倾向于继续支持中国国民党，并由此使美国失去在共产党统治地区的位置。“如果美国要在这些地区保护自己的利益或促进这些利益，就必须有官方代表和这些地区的中央统治当局进行接触。”美国国会中有人对此不满，严词指责。杜鲁门总统经过再三考虑，最终批准了关于司徒雷登在南京原地不动的决定，但要和北大西洋条约国家同步。

斯大林不顾苏联驻华大使去留的影响，悍然决定派罗申大使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在外交上造成了苏联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现象。这一现象，由于其宫各国的大使都未随着迁往而特别突出，成了国际上认为斯大林在中国政策上左右摇摆的重要依据。

但斯大林有他独到的办法。在指示罗申大使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的同时，他又让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中长铁路苏方负责人柯瓦廖夫等人从东北来到北平，带着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的负责人齐赫文等人住在北平香山附近，要求拜会毛泽东。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他们。他们祝贺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伟大胜利。毛泽东用共产党人的同志热诚，向他们介绍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部署，进军计划，以及对战局的展望和对结局的估价。他说，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下，解放江南。只要不出现意外变化，或意料不到的复杂形势，胜利是有把握的。至今为止，尚看不出会发生什么特殊的意外。例如，我们下允许美军在秦皇岛登陆，也不许他们的舰队靠岸，结果，他们溜走了。在天津郊区，美军出城试探了一下，与我们的武装力量发生了一点冲突，打了几下，他们就缩回城里去了。在青岛郊外，美军也出来过几次，但一受冲击就龟缩到城里去了，不久，便把他们的兵舰撤离了青岛。至于其他港口，如烟台、威海等地，就没有遇见美舰。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美军有想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未看出他们有阻挡我们前进的征候。现在，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战争，推行着我们的政策。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在谈话中，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与任务和当年苏联十月革命不尽相同；但中国革命不会停止在目前阶段，而是要继续深化，向前发展的。(11)

柯瓦廖夫利用苏联医生阿洛夫的电台，不断地向国内报告毛泽东和中共的言行。斯大林得知上述情况，非常高兴，指示柯瓦廖夫重申他邀请毛泽东或其他中共领导人在方便的时候，访问莫斯科的意愿。

毛泽东闻讯十分高兴，决定委托刘少奇代表他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和斯大林先行会晤，并由柯瓦廖夫陪同前往。

中共中央批准了毛泽东的决定，于是中苏两党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便在加紧进行。

在中国国共两党和两军进行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斯大林采取脚踩两只船的自相矛盾的走钢丝政策，给中共和中国革命造成了相当的损失和困难；然而，由于斯大林那老练的技巧，机智的策略，并没有激怒毛泽东，反而使毛泽东有了好感，当作“苏联同志的策略”，以至美英外交界惊呼：苏联对中共以没有外交关系作为拒绝打交道的政策持完全支持的态度。基于和中共没有外交关系的理由，苏联关闭了它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城市中的领事馆。(12)同样的，当中共占领故都南京时，苏联大使早已随国民党政府南下广州。这些步骤非但未被看成是对中共的冷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恰当的外交举动，显示出它与中共在观点上的一致。(13)

英美的猜测未必符合实际，但新中国的诞生，惊天动地却是事实。此情此景，却恰如毛泽东在一首词《念奴娇·昆仑》中所描述的：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注释：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6—47页。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47—48页。

〔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534页。

《苏联对外政策》，1947年莫斯科版第5卷第598页。

约翰·莱顿·司徒雷登：《在中国50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纽约：兰德姆豪斯1954年版）第216页。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8卷第659页和665页，第667—668页。

《美国外交文件》1948年第8卷第859页。

(11)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90—392页。

(12)《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54F7099。另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291页。

(13)参见艾伦·劳伦斯著《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事务》（伦敦：劳特利奇——基根·保罗1975年版）第22页。

九 花样翻新，杜鲁门抛出了“第四点计划” 坚如磐石，毛泽东划出了“一条分界线”

兵败人轻，杜鲁门给宋美龄吃了个闭门羹。他说：“我也没有为斯大林在波茨坦的谈话所欺骗”。

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凌厉攻势，蒋介石那由美国武装起来的“精锐国军”土崩瓦解的条条消息，和毛泽东那鲜明、泼辣、机智、犀利的言词文笔，像是一支支利箭、一把把匕首，直刺进哈里·杜鲁门总统的心窝。

杜鲁门心神不宁，坐立不安。

近40天来，为了蝉联美国总统，杜鲁门旅行了3.14万英里，发表了356篇演说，平均每天要作十次讲演。有一天竟然讲演16次。虽说他对竞选干劲十足，不怕艰苦，但忙碌至此，也确实是够累的，然而，就在忙中偷闲，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求见。

杜鲁门知道，在他和他的竞选对手——纽约州州长杜威进行唇枪舌剑的竞选角逐中，蒋介石特命驻美大使顾维钧向杜威授以“吉星勋章”，特派陈立夫赶到美国，以现金支援杜威，并让孔祥熙和孔令杰父子在美国大肆活动，为杜威竞选助威，压他杜鲁门。气得杜鲁门喋喋叫苦：狗儿子喂成了狼儿子！我曾竭力援助他们，“他们使许许多多众议员和参议员听他们的吩咐，他们有几十亿美元可花……我不是说他们收买了任何人，而是说有许多钱在流动，华盛顿有许多人……按照院外援华集团的旨意行事。”现在，总统竞选揭晓，杜鲁门获胜了，蒋介石又派夫人来了，因此，杜鲁门用挖苦的口吻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大喜欢住在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1948年12月10日，杜鲁门夫妇约见了宋美龄。这一次，华盛顿没有给蒋夫人铺红地毯，也没有邀请她给国会讲话。会见伊始，总统客气而冷淡地看了看表。说他很忙，给宋美龄半个小时为自己的要求进行辩解。

宋美龄的脸红了，紧张得不知所措，只好简单地旧话重提，要求美国：（1）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反共救国的正式宣言；（2）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的制订工作；（3）再提供三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杜鲁门淡淡地笑了笑说：“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四十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总统不仅没有给宋美龄面子，而且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了一篇声明，说美国向蒋介石提供的援助已经超过三十八亿美元。这就是说，只能再给两亿美元了。

宋美龄吃了个闭门羹，愤怒地离开华盛顿，去到纽约弗代尔的孔祥熙家的别墅隐居起来，再未踏上中国大陆。

杜鲁门送走了蒋夫人宋美龄，心潮翻滚，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蒋介石等人不仅是些喂不熟的狼，喂多少东西，饿了又咬人；而且是个填不满的坑，40亿美元给了，又要30亿，还要把中国丢给共产党，这怎么得了呀？思考再三，无计可施，便打电话叫他的“亲信”艾奇逊来。

迪安·艾奇逊和杜鲁门关系甚密，都是投靠摩根财团发迹的，近年来力

主从“实力地位”出发，对抗和“遏制”苏联，重新武装西德，建立统一的欧洲军事力量，在制定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现在，他正在为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等人被当地公安机关关押而着急，希望总统给他以“英明的指示”。

杜鲁门问：“能不能用飞机把沃德等人撤出沈阳？”

“不行！”艾奇逊肯定地说，“中共的武力正盛，士气正高，如果派飞机空降部队下去，那将是火中取栗，不仅烧手，还会有去无回，惹起大祸。”

“可不能听任沃德他们被关押而不救啊！”杜鲁门气愤地说罢，站立起来，踱了踱步，沈静了一刹，又说：“具体办法，你们拿吧！我的态度是，在有必要和有把握的情况下，采取最强硬和可能的手段，包括使用武力。”

艾奇逊谦恭地笑着，搀总统坐下，说：“总统先生，请别生气！据我观察，中共不吃硬，并不怕武力！我们武装了几百万蒋介石的军队，送去了那么多的飞机、大炮、坦克，真如火上浇油，不但没有将他们吓倒、打垮，反而使他们更加强大。因而，再不宜采用极端手段，不宜再使用武力——无论是军事的还是非军事的”

杜鲁门觉得，艾奇逊讲得有点道理，便让这位亲信注意中共的情报、信息，考虑新的政策建议。

1949年的元旦过后，艾奇逊拿来了新华社发表的新年献词，说：“你看看，《将革命进行到底》，多厉害呀！不但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连我们酝酿中的计划方针，也不幸被它言中了！”

杜鲁门说：“我知道中共的厉害！我也没有为斯大林在波茨坦的谈话所欺骗。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不真正是‘道地的’共产党。后来他在给哈里曼的声明中又说，他认为在中国打内战是愚蠢的。我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从事争夺中国的政权已几乎近二十年。我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想看到中国变成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共产主义不受人民大众的欢迎，因为人民的需要，以及人民的呼声，已经得到了满足和回答。”

“明白了！明白了”艾奇逊高兴得哈哈大笑：“我们不仅有大炮、飞机、炸弹、原子弹，还有甜甜的橄榄。有时候，摇动橄榄枝会产生比大炮、炸弹更大的威力！”

“哈罗！哈罗！”杜鲁门也高兴得笑了。长期以来，他为对付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势力而绞尽脑汁，然而，那共产主义的幽灵，不但没有被消灭，彼削弱，反而不断地发展、扩大。特别严重的是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广大贫穷地区的国家中，共产主义的发展更快。贫穷、饥饿、灾害，把那里几乎烤成了干柴，共产主义的火种一到，熊熊的革命烈火很快就燃烧起来了！中国是世界的大国，举足轻重，影响很大，怎么能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烈火在那里继续燃烧呢？怎么能让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联合、改变世界的均势呢？可是，毛泽东和中共的势力发展得如此迅速，如此强大，压又压不住，打又打不垮，如今必须制定一种新的策略，新的计划，把中国，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中间地带争取过来，才能真正遏制苏联，制服斯大林！于是，他把自己的一整套想法、策略、计划，告诉了自己的亲信，要他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并且告诉他说：“亲爱的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先生，你将很快被任命为美国第五十一任国务卿！你将接任颇有威望的马歇尔将军的职位，在连任总统宣誓就职的第二天上任！”

艾奇逊高兴得拉着杜鲁门的手，表示要全力以赴为总统尽快草拟出新的计划，使总统在即将举行的总统就职典礼仪式上，一鸣惊人，不同凡响！

杜鲁门高兴得连连点头：“哈罗，哈罗！”

哈利·S·杜鲁门（1884，5.18—1972.12.226）出身贫苦，无力进大学，被人们称为“密苏里的小人物”。当年，他受堪萨斯城的党魁、黑社会头子汤姆·彭德格斯特斯的提携进入政坛，当了参议员。很多人批评他与政治贿赂团体挂钩。杜鲁门却辩白说：“宦海之中，当选当然是第一目标。除非你名望高，又会拉选票，否则只能与这些人站在一起。”这个集团依仗着金钱和一帮打手，组织了一个选举机构，操纵着当地民主党的选举。杜鲁门被选中以后，刻苦努力，青云直上，在国会里又找到了一个新靠山，和民主党的头面人物罗伯特·汉尼根拉上了关系，热烈支持罗斯福的新政计划。二次大战爆发后，杜鲁门主持参议院的战争条约调查委员会，调查浪费和效率低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他的努力，据有人估计，为纳税人在战争年代节省了150多亿美元。1944年，新闻人员已经认定，他是美国仅次于罗斯福的第二号人物。那年春天，罗斯福准备竞选第四次连任总统，挑选了“才能平庸”，“党派色彩不鲜明”的杜鲁门任副总统。杜鲁门曾说：“我不愿干什么副总统，我敢打赌，到街上问问，十个人中没几个人能知道最近这两任副总统是谁。”谁料，罗斯福就任不到三个月，突然病逝。杜鲁门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登上了总统宝座。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国大势已去，日本也日暮途穷，如何建立战后国际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等待着他进行决策。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当天，杜鲁门宣誓就任总统，并宣布原定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如期在美国举行。4月28日，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那天，杜鲁门以东道国首脑的身份和世界各国政府的领导人进行了会晤。5月7日，德国向盟国无条件投降。翌日，杜鲁门在广播中宣布欧洲战争结束。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杜鲁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迫不及待地悍然下令于8月6日和9日先后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杀伤了近20余万无辜百姓。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击溃了日本关东军。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日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进入了“冷战”时期。杜鲁门政府一方面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另一方面，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为手段，资助和扶植某些国家的党派集团采取反共政策，进行侵略和扩张。在中国的扶蒋反共，是美国上述政策的重点体现。在内政方面，杜鲁门除继续推行罗斯福的“新政”计划外，为了推行反苏反共政策，政府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和镇压，执行“联邦忠诚法”，对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实行忠贞调查，并公然对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进行迫害。

在1948年的总统竞选中，杜鲁门利用自己是在任总统的有利条件，煞费苦心，巧妙设计，以“平民代表”自嘲，采用广泛争取选民支持的方针，乘坐“杜鲁门竞选专车”横越全国。不管骄阳似火，还是大雨滂沱，他每到一地，必和当地居民见面，宣传他关心选民的利益。并且大骂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说住房紧张和通货膨胀都怪共和党人，“我们一定会把他们打入地狱！”一路上叫骂不绝，把坏事的责任都推给了共和党。结果，他和民主党获胜了，

他连选连任。有一次，民主党开会，有人与杜鲁门持不同政见，杜鲁门当即骂人家的政治见解是“一堆马粪”。急得夫人悄悄要拉他去刷牙，清一清那一嘴的脏话。

花样翻新，杜鲁门抛出了“第四点计划”，打着援助落后地区的旗号，向“中间地带”扩张。杜鲁门说：“它是对共产主义最强烈的消毒剂”。

杜鲁门先生是美国历史上敢说敢干而不计后果的总统之一。虽然日本已经准备投降，为了杀鸡给猴看，他仍悍然下令给日本的长崎、广岛扔了两颗原子弹，炸死炸伤数十万平民。虽然骂声不绝于耳，杜鲁门却习以为常，满不在乎，并自我安慰道：“受不了厨房里的油烟气，就别在厨房里干”。在骂声中，他不但干得很起劲，而且花样翻新，不时地推出一些新名堂。

1949年1月20日，是总统就职日。杜鲁门吃完早饭，头戴丝质高筒礼帽，穿条纹裤子，携夫人、女儿和参议员巴克莱、最高法院院长文森及一些内阁成员一道，驱车来到圣·约翰埃波斯柯帕尔教堂，举行总统宣誓宗教仪式。然后，来到国会议堂，在那圆形的大厅里，聚集着许多外交官、国会议员、最高法院法官和政府官员。12点14分，海军乐队奏起了宣誓仪式的前奏曲——“万岁！总统”。穿着正式法衣的最高法院院长文森和副院长斯坦莱·里德走上国会议堂东面的宣誓就职台上，宣布仪式开始。哈里·杜鲁门和副总统巴克莱衣冠楚楚走上宣誓就职台。在副总统6分钟的宣誓之后，杜鲁门由文森院长监督宣誓。

这时候，在国会议堂、最高法院大厦和国会图书馆之间的大广场上，聚集约十多万人，收听总统的誓词和演说。

杜鲁门举起右手，跟着文森院长逐句重复着那简短的誓词，表示要诚心诚意地保卫美国的宪法，然后，吻了圣经，走上讲坛，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说。

“副总统先生，最高法院院长先生和同胞们！我以谦卑的心情接受美国人民赐与我的荣誉。我以最大的决心来接受这荣誉，我要竭尽全力为我国的繁荣和世界和平效劳……”

说着，杜鲁门话题一转，矛头指向共产主义。他大骂共产主义是“已在全世界盛行的虚伪哲学，它已将许多人引入歧途，并给他们增添了忧虑和困难。”(11)

人们都知道，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高度文明、民主的社会。杜鲁门却当众造谣，说“共产主义是以这种信仰为基础的，即认为人类是懦弱低能的，是不能管理自己的，因此需要强有力的统治者来统治他们。”(12)根据这种认识，杜鲁门提出了“改进世界”的“一项新的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第四点，就是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非洲、南美洲的落后国家渗透、扩张，与苏联争夺广大的“中间地带”。不过，杜鲁门善于辞令，又会伪装，不仅能把侵略、扩张、渗透、剥削，说成“扶植”、“援助”、“提高”、“献出”，而且能把争霸世界的侵略者装扮成天主、圣母、佛爷、菩萨，以悲天悯人的口气说话。

杜鲁门概述第四点计划时说：“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口正濒临悲惨的境地。他们食不果腹，疾病缠身。他们的经济生活是落后的，停滞不前的。他们的贫困对他们自己和比较繁荣的地区来说，都是一种障碍和威胁。”(13)“我认为，我们应该使我们丰富的技术知识为爱好和平的人民造福，帮助他们实现改善生活的愿望，并与其他各国合作，我们应该奖励对需要开发的地区投资。”(14)“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产生动力，鼓舞世界备国人民成功地行

动起来，不仅去反对人类的压迫者，同时也去反对他们的老敌人——饥饿、悲惨和绝望。”(15)简明地说，“第四点计划”，就是打着援助落后地区的旗号，对受援地区进行渗透和控制。

最后，杜鲁门说：“我们始终不渝地信奉全能的上帝，我们将向人类自由得到保障的世界迈进……在上帝的庇荫下，未来的人类将确保生活在一个公正、融洽、和平的世界里。”(16)

中午12点50分，典礼结束。杜鲁门和副总统巴克莱登上汽车，带领长长的游行队伍，沿着宾西法尼亚大街游了半晌。回到卧室后，他躺在床上，“满眼金星，月亮和星星都一起压了下来。”

过了6天，杜鲁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一次强调了第四点计划的新颖和大胆。他并不隐晦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他说：“我是从身居自由世界领导地位的我国的对外政策出发来考虑问题的。”(17)“我们既有资本，也有技术知识。我认为我们所能遵循的唯一道路就是这两笔大资本用到落后地区去，以便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否则，在我看来，就只有继续让这些广大的地区走向贫困、绝望，恐惧和人类其他的种种不幸，而这些都是培育无休无止的战争的温床。”(18)因此，“第四点计划是我们对受共产主义统治威胁的国家援助的具体表现”(19)，“在迄今已采用的方法中，它是对共产主义最强烈的消毒剂。”(20)

只要将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和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对照，是非曲直便昭然若揭了。

杜鲁门喜欢出言不逊、胡吹乱侃，利用总统就职典礼和记者招待会等多种形式，把他的“第四点计划”吹嘘得五彩缤纷、天花乱坠。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审判官。只要把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和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对照，并且联系当时的世界形势和中美两国的真实情况一观察，是非曲直便昭然若揭了。明眼人不难看出。

第一，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是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檄文逼出来的政治产品。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过八年苦战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然而，美国用数十亿美元和大批的人力物力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蒋介石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本书前边说的沃德等打人行凶后反咬受害者，美国政府千方百计维护其不受任何处罚特权的行径，就是其中一例。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的新政权，不但不承认帝国主义的特权，公然把沃德等打入凶手抓起来，绳之以法，而且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望风披靡，行将垮台。于是，发动内战的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改换花样，大谈“和平”；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改变花样，装作“全能的上帝”，拿出“菩萨的心肠”，为了“一个公正、融洽、和平的世界”，抛出了“第四点计划”。所以说，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实际上是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逼出来的产品。

第二，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战略家，在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出笼的数十天前，他就不仅预见到他们要转变策略，而且指出了他们将要装出的模样，采取的手段，并且指出了对付他们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强

调指出：中国人侵解放战争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他们将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大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

第三，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火眼金睛”，透过层层迷雾和伪装，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指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使中国人民接受他们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杜鲁门曾说，他的“第四点计划的目的在于使落后国家的千百人民能从殖民主义下的水平提高到自力更生的水平和最后走上欣欣向荣的道路。”(21)毛泽东的分析，使人们看清了这个“第四点计划”的目的，一是要争霸世界，消灭共产主义，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二是要侵略、扩张，打着援助的旗号，转嫁经济危机，剥削受援地区。对此，杜鲁门后来也供认不讳，他说：“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计划。有人曾估计过，亚洲和非洲的生活水平只要提高2%，就可以使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工厂开足马力运转一个世纪。”(22)杜鲁门还以古巴为例，说“我们的邻国没有一个惧怕我们，它们喜欢和我们做买卖，因为我们接受他们的竞争，并不要求它们屈服。”(23)然而，众所周知，没过几年，古巴人民一革命，美国政府便组织西方国家把古巴“封锁”“隔离”了36年，直到1995年3月13日，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到法国访问时，还要求取消美国对古巴实行的“罪恶封锁”。他说，实行封锁是对“整个一个民族的人权的粗暴侵犯。”这是“排斥异己的最露骨的表现。”(24)杜鲁门自己的言行，证明了毛泽东指出的美国援助的本质。

第四，中国人民没有理会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而是高举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旗帜，打倒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驱逐了美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然而，在过了近半个世纪之后，有人还哀叹：“如果当初不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接受了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中国不是开放得更早，建设得更快吗？”这是无知妄说！40年代末至50年代，美国千方百计的侵略中国，武装蒋介石集团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独立，争取民族解放，是正义的、革命的事业。毫无疑问，是必要的，正确的。没有民族的解放，祖国的独立，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苟延残喘，怎么能谈得上建设和发展？如今，伟大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和各国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平等互利的做买卖，与过去的蒋介石政府出卖民族权益，接受美国的“第四点计划”的“援助”，是性质不同、意义相反的两码事，不能等量齐观，同日而语。

杜鲁门为救沃德等人日谋夜算。他和斯大林、丘吉尔的“音乐战”，已发展成他和丘吉尔发动的“冷战”。

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出笼后，大肆宣传，到处鼓吹。他们本以为摇身一变，把手里杀人的枪刀换成迷人的橄榄枝，多摇几下，贫穷的中国人民也许会乞求援助，放了沃德等人，放弃革命斗争。谁料，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革命人民，铁骨铮铮，浑身正气，对于他们鼓吹的“第四点计划”根本不

予理睬，不肯就范。美国的总领事沃德等打人凶手，仍然被关押着，不得回来。美国国会议论纷纷，有关人士连连催促，急得总统杜鲁门如同碰到个丈二的金刚，一时摸不着头脑！

杜鲁门没见过毛泽东，但从马歇尔、赫尔利的介绍中，从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他知道毛泽东的厉害，更害怕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中苏联合，将使局势对美国不利！因此，处理沃德等人的问题，对待毛泽东和中共的态度，直接关系到苏联和斯大林，关系着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怎能不慎重对待呢？

大国首脑之间的交往与斗争，往往是复杂而微妙的。杜鲁门记得 1945 年 7 月间，他和斯大林、丘吉尔在波茨坦开会，除了在决定世界前途的问题上进行斗争外，还在宴会上有一次巧妙的“音乐战”。

那是 7 月 19 日的晚上，杜鲁门首先设宴招待客人。为了显示美国的文明和艺术，杜鲁门让一个叫利斯特的人在宴会上演奏钢琴曲。利斯特聪明伶俐，很有天赋。他的演奏使喜欢古典音乐的斯大林大为赞赏，甚至提议为钢琴演奏家干杯。于是，三巨头离开座位，来到利斯特跟前，为他干杯祝贺。年轻的中士受宠若惊，杜鲁门总统满面春风。欢乐的宴会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一点才告结束。

斯大林决心要拿出更好的音乐，胜杜鲁门一筹。他派人用飞机从莫斯科请来一名获奖音乐家、一位著名钢琴家和两位具有高超演奏才能的女小提琴手，在 7 月 21 日的晚宴上演奏。美妙的音乐使杜鲁门如迷如醉，心旷神怡；斯大林兴高采烈，频频举杯；而音乐细胞不太多的丘吉尔却有些坐不住了。他停一会儿看看表，见已凌晨一点钟了，就悄悄地问杜鲁门：“你何时回去？”杜鲁门正听得入迷，惊奇地问：“怎么啦？你听不进去吗？多好的音乐！我爱听极了，我要呆在这里，宴会何时结束，我就何时回去！”

“我可腻透了！”丘吉尔烦躁地发牢骚：“我可不爱听这些音乐，我想回去！”

斯大林主持的宴会，直到凌晨一点三十才结束。

英国首相决心“报复”。7 月 23 日轮他当东道主，他搬来了整个皇家空军管弦乐队，在宴会上起劲地演奏。尽管斯大林和杜鲁门对这种音乐都不大感兴趣，丘吉尔却带着一副恶作剧的得意相，让他的这些演奏家们务必坚持到第二天的凌晨两点。

杜鲁门知道，在那次微妙的“音乐战”中，沉着老练而知识渊博的斯大林拿了最高分，得到了好评！尽管他当时对斯大林坚持的共产主义有看法，但他仍不得不为斯大林主持的美妙音乐所征服，为斯大林主持的宴会表示赞美！

杜鲁门回忆往事，面对现实，觉得美苏对抗，自己对付斯大林已很吃力，如今毛泽东又扭转乾坤，带领中共和中国人民打解放战争，不但要打倒国民党蒋介石，而且抓住沃德等“打人凶手”，矛头直指“美国帝国主义”，这该怎么办呢？

想着，想着，杜鲁门走出白宫，穿过草坪、花园，来到一条河边散步，看见一个老头正在河边钓鱼。那鱼儿不上钩，都往另一边游。钓鱼的老头不慌不忙，让两个孩子用竹竿在对面打水。鱼儿受了惊，又游了过来，见老头的鱼钩上有又香又肥的鱼饵，张口便吃，上钩了，被老头抓住了……。杜鲁门高兴得哈哈大笑：“哈罗，哈罗！这两手妙！”他派人请来了艾奇逊，一

起欣赏了老头的钓鱼妙法之后，便问：“沃德他们救出来了吗？”

“难啊！”艾奇逊耸耸双肩说，“中共软的不吃，硬的不怕，至今连谈判的官员还没找到啊！何况，总统已经宣布了‘第四点计划’，要用橄榄枝吸引亚洲落后的国家……”

杜鲁门打断了艾奇逊的话，说：“不错，这些事要搞，可是，亲爱的，你别忘了，我们西方世界不仅有肥美的鱼饵，还有威慑的实力。我记得两年前，英国的丘吉尔先生来到美国，和我一起住了几个月。他说他想发表个世界性的政策演说，我当即予以鼓励。因为很明显：有些话，让别人去说，比我们说更有利。有些事，让别人去做，比我们做更有力。于是，我和丘吉尔先生商量的演说的基本内容，又陪他到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城，让丘吉尔先生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你知道，这次演说奠定了‘冷战’的开端。——你看，又有大鱼上钩了！”

艾奇逊转身一看，一条肥美的大鱼正被老头钓上了半空，高兴地说：“哈罗！哈罗！总统英明，我们也会钓上大鱼的！”

注释：

宋平著：《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6 月版第 506 页、519 页。

《美国外交文集》1949 年第 9 卷第 1355 页。

《司徒雷登日记》第 57 页。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4 年 10 月版第 104 页。

〔美〕保罗·伯勒著：《总统们的趣闻轶事》群众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版第 190、191 和 195 页。

(11)(12)(13)(14)(15)(16)《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 270—272 页。

(17)(18)(19)(20)(21)(22)(23)《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 275—284 页。

(24)卡斯特罗访法吐露心声：《隔离政策结束了》，载 1995 年 3 月 15 日《参考消息》。

十 软硬兼施，美国英国连败退 文韬武备，毛泽东挥师过江

毛泽东集虎气猴气于一身，带领人民，打得蒋介石政府摇摇欲坠。美国官员导演了“倒蒋扶李”、“划江而治”的闹剧。

毛泽东重视理想，坚持真理，只要瞅准了目标，不仅有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决心、勇气和魄力，而且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方法，因而能一个一个地战胜强敌，取得胜利。

不少人曾探讨过毛泽东性格的秘密，想知道毛泽东身上有一股什么神气？

其实，毛泽东曾自己破译过这个秘密。他说，他集虎气猴气于一身，不过虎气为主罢了。的确，老虎雄武勇猛，威镇群山，气势豪迈，所向披靡，具有力破万难、一往无前的精神。猴子则灵活机智，活泼好动，顽强敏捷，弄险有方，具有眼尖手快、灵敏多变、巧胜强敌的技能。毛泽东集虎气猴气于一身，并且以虎气为主，表现在他对于各种强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上，从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豪迈风格上，也表现在他善于斗争、灵活机动的策略、战术上。过去，在和国内强敌大军阀、大党阀、大财阀蒋介石的斗争中表现了这种性格；抗日战争中，在和妄图灭亡中国、称霸东亚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显示了这种性格；现在，在和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同样地表现了这种性格。

毛泽东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美国人民是勤劳、勇敢、聪明好学而又热爱和平、正义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毛泽东一直主张同美国友好，同美国人民友好。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奉行扶蒋反共的帝国主义政策，用大批的美元、飞机、大炮、机枪……武装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支持他们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把中国人民再次抛入水深火热的灾难深渊。为了救中国，救人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赴重庆谈判，搞政治协商，接待赫尔利，支持马歇尔……多次和平努力失败后，才带领人民自卫反击，打起了人民解放战争。现在，战争打了不到三年，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已成定局，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华政策。1948年12月18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社论《中国的高潮》中写道：“在生活步调一向是缓慢的中国，局势正急转直下地接近了高潮。这一次将是一次伟大的高潮，因为南京政府遭到的悲剧显示出一个时代的结束。……目前无可掩饰和最无情的事实是，美国对于中国问题只有听其自然发展。”

话是这么说，美国的当权者并没有真正地“听其自然发展”。早在1948年10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他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马歇尔害怕美国政府要对由此“产生的新局面担负责任”，不同意这样做。11月中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进行长谈，劝他上台支撑危局。李宗仁表示，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表示对新领导“毫不含

糊的支持”，那么，“他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为此，司徒雷登又向马歇尔建议发表一项表示支持新的非共党政权的政策声明。

美国的舆论工具也同时加强了关于国共“和谈”及“蒋介石下台”的宣传和鼓吹。

在美国官员的导演下，1948年12月中旬，蒋介石不得不找李宗仁商谈，准备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和谈”。接着，桂系首领、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于12月下旬两次发电报，要求蒋介石下台，以“争取时间”。接着，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等，都先后致电蒋介石，要求他改弦更张，与中共“恢复和谈”，并直接要求蒋介石“毅然下野”，以利“和谈”。

蒋介石万般无奈，于1949年元旦发表了要求和谈的《新年文告》，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内战，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声称只要和平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公意是从”。但同时，又提出要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及保存反动军队等作为谈判的条件，这就暴露了他求和声明的虚伪性。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对1948年9月会议以后全国形势的发展作了总结，提出了党在新一年的任务，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在1月会议上，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值得全党警惕的几个问题：（一）“不要使胜利冲昏了自己的头脑”。他说，胜利冲昏头脑，历史上有过，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袱越大。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列宁说过“推翻敌人容易，建设国家难”。要把胜利带来的思想包袱丢下，否则就会损坏一些干部。（二）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容妥协。他指出，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广大群众脱离国民党转到我们方面来了；自由知识分子也来向我们找出路；站过来的民主人士中，有的是右的，来不轻易，风色看好才来的。我们已经有了胜利的把握，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三）要警惕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和实施“内部破坏”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关于美国出兵的问题，我们不去讲他不出兵，而是准备它出兵，并准备与之打，以取得主动，而不至于手足无措。“应该认识到，我们力量越大，美国干涉的可能越小，帮助国民党打的可能也越小。”半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摇摆不定，对蒋介石的兴趣也不那么高了。美帝在中国已经臭了，但害怕美帝的心理并未解决。对看不见的东西，人们就容易怕，国民党即以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吓人。美帝的政策有两面，一面是帮助国民党打我，另一面是唆使右派组织反对派，要求否决权。将来，美帝甚至可能承认新中国，以便派人搞破坏工作，必须提高警惕。在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上述三十问题，目的就是——一个，防止胜利前夕再出现曲折，防止取得全国政权后又出现李闯王式的失败。后来，在党内指示中，毛泽东还要求全党继续提高警惕，要“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并强调说，虽然三十月来美国政府的姿态有某些变化，但“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防万一事变到来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

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

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声明表示，虽然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全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条件包括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等八条，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

蒋介石无计可施，不得不于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1月22日，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以中共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他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但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仍然操纵在蒋介石及其亲信的手里，“以党控政”；李宗仁搞和谈的目的是企图防止人民解放军渡长江，“划江而治”，同共产党分庭抗礼，所以经过一段谈判，4月20日，南京政府最后决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和谈搁浅。

至此，由美国官员导演的“倒蒋扶李”、“划江而治”的连台闹剧，不得不半途而废，暂时收场了。

解放大军欲渡长江。英国“紫石英”号等军舰开炮施暴。齐玉功腿断仍奋战，齐玉芳替兄递炮弹，军民共谱英雄篇。

毛泽东是长期和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领袖。他对帝国主义有深刻的认识，对于和帝国主义作斗争有丰富的经验。他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他又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了这条定律。”

根据这种基本的认识，1949年初，关于美国出兵的问题，毛泽东主张有备无患，主张准备它出兵，并准备与之打，以取得主动，而不至于手足无措。

当时，美国在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兵力，并且一直帮助国民党军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英国在中国的兵力很少，虽然也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但由于自身的力量日渐衰落，并不像美国那么锋芒毕露。然而，在美国侵华处处碰壁之后，英国军舰竟然铤而走险了。事件发生在解放军渡江前夕。国民党军在从湖北宜昌到上海的千里长江沿线，部署了70万兵力，又依仗长江天险，说是“固若金汤”。人民解放军针对敌情，调集了百万大军，准备渡江。

1949年4月20日早晨，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即将发动的时候，英国“紫石英”号等4艘军舰，闯入长江人民解放军防线，不顾解放军鸣炮警告，强行溯江上驶，越过我三江莹左翼的炮位。二炮手齐玉功当即要向英国军舰开炮。炮长拦住他，说：“等一等，再看看动静！”

“还要看什么？”齐玉功的眼睛都气红了。他放下炮弹，走到炮长面前，指着长江里那艘耀武扬威溯江而上、大炮口直指我军阵地的英国军舰，大声

吼道：“帝国主义的大炮，已经对准我们的脑门心了！难道我们的大炮是吃素的？难道中国人民是好欺侮的？”

沉着的炮长，虽然也气得咬牙攥拳，怒火攻心，但他只是怒目注视着英舰的动向，仍不肯发射击的命令。

齐玉功急得“扑通”一声，跪倒在了炮长面前，哭着说：“炮长，快下命令吧！要不，我的脑袋要爆炸，我的心要烧焦啦！你知道吗？我一家被帝国主义糟践的家破人散啊！我母亲被日本鬼子糟践得上了吊，我父亲带我们兄妹三人闯关东，我大哥齐玉衡被美国鬼子沃德打得半死，为报仇我爹送我兄妹参了军，可今天，你……”

众战士都义愤填膺，要求开炮，斩断帝国主义的魔爪！

沉着的炮长，早已被齐玉功的哭诉感动得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听见众战士要求开炮，又看见英国军舰耀武扬威溯江而上，便把拳头狠狠地一挥，说：“好！各就各位，准备开炮！”

于是，一连串的炮弹向英舰飞去。

“紫石英”号军舰向解放军阵地还击。

双方展开了猛烈的炮战。

齐玉功和他的战友们正在奋力炮击英舰，突然，一颗炮弹飞来，在他们的身边爆炸了。随着一声巨响，弹片横飞，砂石乱舞，气浪把齐玉功抛出好几米外。当他从烟尘中抬起头来，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半条腿已经和自己的身体分离，挂在了—棵树杈上，鲜血直流。炮长和三位战友已经倒在了血泊中，血肉模糊，微微抽动。

齐玉功不知恐惧，也不觉疼痛，咬了咬牙，撕开了身上的军装，扎住了大腿上的伤口，奋力向炮长和战友们爬去。由于左腿断肢，失血过多，他爬动非常吃力。然而，父亲的教诲，母亲的惨状，哥哥的期望，妹妹的誓言，一个接一个地显现在自己的眼前，响在自己的耳边。他艰难地向前爬去，救护炮长。刚才还沉着指挥的炮长，这时早已牺牲了。他又去救护另一位战友，可是浑身无力，两眼昏花，几乎无法支持了……

正在这时，友邻部队的两位军官带着一位女卫生员跑来了。那两位军官检查过几位牺牲的战友，来到齐玉功身边，见他将要跌倒，忙搀扶住，叫：“齐玉芳，快过来，他还有救！”

“哎——”女卫生员应声跑了过来。

齐玉功听见了熟悉的名字和声音，慢慢地睁开了双眼，妹妹那俊美的面孔映入了自己的眼帘。他不知是梦里相逢，还是战场相见，忙大声地问：“齐玉芳？你真是齐玉芳吗？”

正在忙着包扎腿部伤口的女卫生员，听见那熟悉的声音叫她，转过身一看，立刻惊呆了：“啊！二哥！原来是你呀！？你的左腿？”

“在那边——树杈上！”齐玉功吃力地说着，指向身旁的一棵小树。为了不使妹妹吃惊伤心，他那冒着豆大汗珠的脸上，还勉强堆出了一丝笑容。

齐玉芳循着二哥指的方向看去，见一棵小榆树的树杈上，架着半条正淌着鲜血的腿，还在轻轻地抽动……姑娘心如刀绞，忍不住哭了起来。她拉住齐玉功的手说：“二哥，你……”

“不许哭！”

齐玉功喘着粗气，低声地命令罢，又伸手揩去了妹妹脸上的泪水，恳求地说：“好妹妹！敌人还在前边，战士不能流泪，请你帮哥把那条断腿取过

来，绑扎上……”

齐玉芳急跑过去，从树杈上取下了二哥的断腿，要给他包扎，见二哥已经昏迷过去了，忍不住边啜泣，边包扎……

两个军官跑过来，和齐玉芳一起把齐玉功抬下火线，准备送入医院。可是，没有担架，人背着伤员走，断腿朝下，血流如注，十分危险。他们正在焦急，几个推小车的农民过来了。一位军官过去求救，一位推小车的老头笑着说：“不用求！同志呀，实说吧，我们就是专来支援解放军打坏蛋的！你说干啥咱就干！”

军官说是送伤员，去医院。

老头二话没说，立刻就把小车推了过来，搀扶伤员，可是，当他看见了伤员的面目时，立刻愣住了：“啊！这不是我儿玉功吗？”

差不多与此同时，齐玉芳擦干了泪眼，打量着老头：“啊！这不是我爹吗？”

老头子转过身来，看见齐玉芳，忙说：“芳芳，你也在这儿？快说说吧，你二哥怎么啦？”

“他……他……”齐玉芳话到口边，看见父亲那瘦骨嶙峋的身躯和饱经风霜的脸色，一时不知该怎么说，忙又改口问：“爹，你是怎么到这儿的？”

“我是来支援解放军的！”

老人只简单地答了一句，又逼着问：“孩子，快说说，你二哥是怎么啦？”

“他被鬼子的炮弹炸伤啦！”老人没有流泪，只是拉住解放军军官的手说：“同志啊！血债要用血来还！让咱们的炮兵狠狠地打！”

这时候，随着一声炮响，附近的几门大炮，猛烈地向英舰射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连续中弹30余发，弹痕累累，只好悬挂出白旗，驶向了南岸，停靠在西南约7000米处。

战地医院里。医护人员听说齐玉功是和英国军舰炮战中负伤的英雄，又被齐玉芳父女兄妹爱国支前的事迹所感动，立刻全力以赴，组织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物对齐玉功进行抢救治疗、断肢缝合……

手术刚作完，三江莹方向又传来了隆隆的炮声。

齐玉功被炮声从昏迷中惊醒。他睁开双眼，看了看周围的医护人员，突然坐了起来，掀开被单，就要下床。

女护士忙拦住他：“同志，请安静！”

“这能安静吗？”齐玉功大声吼道，“你听听，帝国主义的炮舰又开炮了！国土被侵犯，同志在流血！我是炮手，我要上炮位，我要去还击……”说着，不顾伤痛，又要下床……

等在门外的齐玉芳和父亲齐狼闻声扑了进来，拦住齐玉功齐玉功见了父亲，忍不住哭了起来，说：“爹，儿子对不起你呀！儿子没有把鬼子的军舰打沉，自己倒挂了花，儿没有完成爹和上级交给的任务啊！”

齐狼扶儿子躺在病床上，安慰说：“功儿，别着急！你负伤了，先躺着歇歇！”

“不，爹！你听听吧！敌人的大炮还在吼！那是帝国主义军舰上的大炮，在向我们开人，在屠杀我们的同志、兄弟、姐妹！我是炮手，炮手怎么能躺着啊？”齐玉功焦急地叫着，见父亲瘦骨嶙峋、劳累过度而又痛苦不堪的样子，忙又搀父亲坐在床边，深沉而恳求地说，“爹，你还记得吧，在送儿参军的路，你给儿说过：功儿，洋鬼子把咱中国人不当人，你要给咱中国人

争口气啊！可现在……”

站在一旁抽泣的齐玉芳，听到这里，忍不住“扑通”一声，跪倒在病床前，哭着说：“二哥呀，别说啦！咱爹的心早都痛碎啦，现在，咱爹千里迢迢推着小车，来到江边，支援咱们；你又左腿伤重，不能参战，你就在这儿招呼咱爹，让妹妹代你去上前线吧……”

说罢，姑娘给父亲和二哥磕了个头，辫子一甩，转身跑出了病房，向三江莹方向跑去……

这时候，另一艘英国军舰又从上游顺流驶来，增援受伤的英舰“紫石英”号，同解放军炮兵展开了激烈的交火。三江莹左翼的炮位上，新的火炮和炮手正在紧张地向敌舰射击。齐玉芳跑上前来，二话没说，扛起炮弹，跑了过去，递给二炮手。

二炮手见是个陌生的姑娘，惊奇地问：“哎！这位同志，你是齐玉芳立正敬礼，随口答道：“二炮手齐玉功！”

“不对呀！”新的二炮手更惊奇了，“齐玉功同志是男性，他已经挂了彩，可你……”

“你别盘问了！”齐玉芳辫子一甩，很快又搬来一颗炮弹，递上前说：“快装炮弹，快打敌舰！我是二炮手齐玉功的妹妹齐玉芳，来代替哥哥打敌舰的，请多指教！”

“好！”众战士受到鼓舞，快速开炮。

英舰连续中弹5发后，全速下驶，脱离了解放军的火网，然后又调转舰头，沿北岸上驶，利用解放军野炮阵地的死角，击毁了七连野炮两门。三江莹左翼炮位和附近一连的榴弹炮迎头痛击，使英舰又连中数弹，只好又回头下驶，夹着尾巴逃跑了。

这时候，南京政府已经公开拒绝了国内和平协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企图依靠长江天险，负隅顽抗。人民解放军定于4月21日强渡长江。英舰“紫石英”号的位置严重影响解放军步兵的渡江和登岸。因此，解放军炮兵又向紫石英号发炮，英舰上腾起了爆炸的浓烟，只好缓缓移动，消失在薄雾飘渺的水天之中。

英国远东舰队获悉“紫石英”号和“伴侣”号在长江中先后受伤的报告后，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立即乘旗舰“伦敦”号并率领驱逐舰“黑天鹅”号全速驰援。4月21日早晨，英国舰队驶过了江阴，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的江面前进，耀武扬威地窥察解放军阵地，并将舰上的巨炮一齐指向北岸。

解放军向英国舰队鸣炮示警，在中国横行惯了的英舰自恃船坚炮利，不仅不顾警告，而且向解放军阵地猛烈轰击。于是，解放军沿江炮兵齐向英舰开火。霎时间，英国舰队纷纷中弹，落荒而逃。“伦敦”号带着累累的伤痕和弹孔溃驶上海。

据在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根据英国海军当局的情报报道：在这次长江炮战中，英舰“紫石英”号死亡17人，重伤20人，溺水登岸者60人；“伴侣”号带回死者10人，伤者12人，前炮两门被击毁；“伦敦”号带回死者15人，伤者13人；“黑干鹅”号7人负伤。

丘吉尔要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毛泽东怒斥丘吉尔，严惩侵略者。

英国“紫石英”号等军舰在中国内河长江中突然开炮施暴，是一件很难想象而又完全真实的重大事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枕戈待旦要渡长江的1949

年4月20日至21日，四艘英国军舰，无视解放军的警告，竟然耀武扬威地闯入解放军防区之内，挑起武装冲突，爆发了猛烈的炮战，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严重关注；形成了当时国际新闻报导和政治评论的焦点；“这是为什么？”“英国军舰来干什么？”“英国军舰的挑战和美英的对华政策是否有关？”

英国军舰的挑衅行为和惨痛失败，引起了英国公众对英国政府的强烈批评和质问，反对党和执政党对此更是唇枪舌剑，争论不休。英国官方最初只是公布了“紫石英”号被“敌对”的炮火击伤，甚至连炮弹来自长江的哪一边也未指明。4月21日，英国驻南京大使否认他已向北平中共当局提出抗议，只说“沿江部队未接获所期望的命令以停止对这些英舰的炮击”。

1949年4月26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在议会中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因为它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同时，他在谈到英国方面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交涉的情况时，又造谣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

同日，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在下院发言，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驶入人民解放军防区的英国军舰说成是“暴行”，并且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

英国下院关于“长江事件”的辩论非常激烈。

反对党领袖麦克米伦指出：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已为1943年的条约所废除；至于“国民政府”的同意，那个即将放弃南京、而且随即迁往广州的政府曾经警告我们说，“往后实行那项承诺是有困难的”。

议员们批评政府不该把军舰留在长江。罗伯兹议员指出，英国政府在几个月前“曾经送给国民党好些军舰，这些军舰无疑地要被用于内战”。“一百多年来英国军舰都常卷入中国事件中，英国军舰在中国的领水内向中国人作战，到处引起中国人的愤恨”。因此，罗伯兹明确指出：“在强渡长江的巨大军事行动以前几小时，英政府批准两艘军舰在长江内上下行驶”，“显然是容易激起待命渡江的共军的愤怒的”。

丘吉尔要派航空母舰的狂言，也遭到了一些议员的驳斥。维也特议员说，“空中掩护也是荒谬的”，这种办法今天已经行不通了。他说：“过去由于中国缺乏团结，而我们又有武器上的优势，所以一艘炮舰就能在不小的地区内把中国人吓得手足无措了。但现在可不能再这样做了。”

麦克米伦概括地说，现在看来，“炮舰”观念似乎是太过时了。

在这次不该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在中国内河横行无忌的英国军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252人，“紫石英”号英舰也被人民解放军击伤，被迫停泊于镇江附近的江中，其它三艘英舰被打得仓皇逃走，威风扫地。英国当局曾由其远东舰队司令布朗特经过“紫石英”号舰长同人民解放军代表康矛召进行了多次谈判，要求将“紫石英”号舰放行。谈判正在进行之际，7月30日夜，“紫石英”号舰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镇江下驶，强行靠近客轮，以客轮作掩护，躲避炮火，借以逃跑。当人民解放军警告其停驶时，“紫石英”号军舰竟开炮射击，并撞沉木船多只，逃出长江。

毛泽东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又是伟大的爱国志士，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坚决反对，英勇斗争，不怕任何威胁。当获悉英国军舰的暴行之后，1949年4月30日，他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了一篇《声明》。《声明》一开头，就开门见山，直劈要害：“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

明。四月二十六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二百五十二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艾德礼说：人民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艾德礼是在撒谎，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允许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人民解放军不希望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帮助汲江，或做任何别的什么事情。相反，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

当时，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都在探寻、注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处理英国军舰的暴行也关系到对外政策，因此，毛泽东在《声明》中，接着写道：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直到现在还没有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当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11)

英国首相艾德礼曾经埋怨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不愿意同外国政府的旧外交人员（国民党承认的领事）发生关系。其实，对此，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是经过长期的认真考虑的。

早在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英、苏、法等一些外国政府先后通过一些渠道向中共进行试探，表示愿与中共和人民政权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就在这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等领导人也开始从建立新国家的角度考虑对外关系问题。直到1949年1月至7月间，外交方针政策才大致形成。而把“不承认”作为一项主要的外交政策，是在1949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下来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说：现在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不必忙于要他们承认。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但政策不乱，侨民要保护。将来要通商，但亦不忙，忙的是同苏联及民主国家通商建立外交关系。(12)周恩来说：外交政策以不承认为好，对帝国主义国家要观察，根据需要将来再说。总的观念是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该有这样的气概。(13)

根据这种精神，建国前夕，中共领导的人民政权在外交方面采取的一项主要政策是，不承认外国政府现在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我

们的外关承认。我们在外交方面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必须实现。采取不承认政策的目的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有利于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毛泽东用简练而生动的语言把这一方针和立场，概括了两句话，即“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进一步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14)

基于上述的方针、立场和政策，针对英国军舰的暴行和英国首相艾德礼的埋怨，毛泽东在《声明》的最后，明确指出：

“艾德礼埋怨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不愿意同外国政府的旧外交人员（国民党承认的领事）发生关系，这种埋怨是没有理由的。过去数年内，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对我们的，难道艾德礼先生也忘记了？被击沉不久的重庆号重巡洋舰(15)是什么国家赠给国民党的，艾德礼先生难道也不知道吗？”(16)

注释：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802、805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25、327页。

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537页。

《新中国外交风云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36页。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62页注释 条。

(1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0—1461页。

(12)(13)(1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546—547页。

(15)重庆号巡洋舰，是英国政府于1948年5月19日赠给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是国民党政府海军中最大的巡洋舰。1949年2月25日，该舰上的官兵在上海吴淞口举行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而加入中国人民海军。同年3月14日，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出动重轰炸机多架，将该舰炸沉于辽东的葫芦岛附近海中。

(1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61页。

十一 冷战遏制，斯大林处境艰险 睡狮猛醒，对苏联巨大支援

在两个阵营的搏斗中，斯大林得到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巨大支持。他怒斥丘吉尔：“狂妄！”

站在世纪的高度，纵观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八年中，内外交困，生活得是极不平常的。在国内，经过极其艰苦的、长期的与法西斯德国浴血奋战之后，百废待兴，必须动员人民继续苦干来恢复和增强国家的实力。

在国际方面，这八年的主要特点是：冷风愈刮愈烈。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经过这场战争，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独家垄断了世界上具有最大杀伤力的武器，依靠它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到处侵略扩张，要获取最大的利益，并且要打着“遏制共产主义”的旗号来称霸世界。1946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会上的演说，表现得十分镇静，热爱和平，但西方却认为这几乎是一种挑战。两个世界之间的信息阻塞，造成了严重的误解。美国想要“领导世界”，甚至说“必须按照美国的生活方式来改造世界”，于是有人按需要办。美国驻莫斯科的代办乔治·凯南给华盛顿拍去下一份很长的电报，对斯大林在二月份的演说，作了歪曲的解释，凯南硬说，斯大林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1946年3月6日夜，当斯大林正要动身回别墅的时候，波斯克列贝舍夫突然来到办公室，把一份刚刚收到的密电交给了他。斯大林再次坐到桌旁，展开电文细读。驻华盛顿的大使报告说：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顿作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演说，当时有杜鲁门总统在场。丘吉尔的演说充满了火药味，是对苏联严重的挑战。斯大林同这位英国前首相虽曾多次见面，知道他头脑聪明，为人狡猾，诡计多端，但他这次演说的态度之强硬，措辞之恶劣，使斯大林感到吃惊。

丘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说，奠定了“冷战”的开端。原来，丘吉尔首相卸职后，从1945年底到1946年初，在美国住了几十月，会见了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国务卿和其他政治活动家。通过这些会见和磋商，丘吉尔打算发表世界政策的演说，并且确定了演说的总方针。1946年2月10日，丘吉尔和杜鲁门商量的演说的基本内容。接着，丘吉尔在佛罗里达州疗养地住了几星期，修改并完成了自己的讲稿。3月5日，他和杜鲁门一起去到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城，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奠定了“冷战”的开端。

他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对美国民主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拥有最大的力量，也就是对未来负有最大的责任。”

丘吉尔接着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共产党第五纵队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趁今天还为时未晚，我们在这里要考虑的是永久制止战争和尽速在一切国家为自由和民主创造条件的问题”。他极力鼓吹西方要加强军事实力来对付“共产主义的扩张”，强调说“现在需要的是作出解决问题的安排。拖得越久，就越困难，对我们的危险也就越大。”

斯大林知道，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不是孤立的个人谈话，也不仅代表英国的观点，而是和美国总统杜鲁门串通一起的向苏联的公开挑战。这位英国首相的演说态度强硬，火药味十足，令斯大林十分震惊。尽管在演说开始时，丘吉尔也给了斯大林好的评价，说过“我衷心地钦佩和感谢英勇的苏联人民和我的战友斯大林元帅”。但是，丘吉尔马上又警告说：在西方民主制度的上空笼罩着“红色的威胁”。

丘吉尔说的“铁幕”，似乎接近实际情况。二战一结束，斯大林马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减少同西方世界的接触。不管看到的是“铁”幕也罢，“制度”的幕也罢，“意识形态”的幕也罢，这个幕确实是降下来了。“三大国”中有一个成员是经常害怕那种“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而限制人们的思想交流。在苏联多年来思想封闭，人们关于西方只能知道苏斯洛夫式的人物认为需要知道的东西。两个世界之间的信息阻塞，造成了严重的误解、猜疑和对立。丘吉尔利用了这种误解和猜疑，要煽动起新的反苏反共的浪潮，这该怎么办呢？

斯大林放下密电，长久地凝视着窗外。三月的夜空，清冷而阴暗，只有点点的寒星，闪闪如眨眼。春天，悄悄地降临到人间，但很快遭到了严寒的袭击。斯大林知道：丘吉尔的演说是一个信号，也是一次挑战，必须考虑应对的决策。于是，他走到桌旁，打电话给莫洛托夫，要他尽快地到他这里来。

莫洛托夫来到以后，斯大林和他又交谈了足足一个钟头，也没有谈出好的办法来。其实，当时无论是丘吉尔、杜鲁门，还是斯大林，他们虽然处心积虑、绞尽脑汁，但都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他们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权力很大但也有限，在以相互消灭对方相威胁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的企图是徒劳的，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当时，斯大林的处境非常困难，苏联急需和平建设，极力避免卷入大战。那时，美国拥有威力巨大的原子弹，它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远远大于苏联。战争年代里，美国的工业潜力增长了50%，装备增长了3倍，运输工具增长了6倍，农业生产增长了36%，而苏联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成千上万的居民点变成了废墟。1946年发生了可怕的饥荒，食品匮乏。在苏联西部有许多武装队伍在赶走了德军之后继续同苏维埃政权打游击战，硝烟弥漫。

困难重重，西方又在露骨地挑衅，“冷战”在不断的升级，五角大楼又制定了对苏联进行核轰炸的计划。面对此情，斯大林继续采取慎重的政策，一方面不断加强军事实力，不惜一切力量抓紧研制原子弹；一方面竭力不刺激昔日的盟国。的确，他没有说过像毛泽东说过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话，但是他多次向人民说明，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民群众。

在两个阵营的搏斗中，当冷风冻结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理智以后，眼看“冷战”渐渐地向“热战”转化的时候，斯大林得到了中国革命的巨大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打击了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和结构，也大大地改善了斯大林和苏联的处境。因此，斯大林非常关注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每天一到办公室，先要取来《真理报》及有关报纸、材料，看看有关中国的消息报道、重要文章、内部材料。他特别注意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反应和动向。

有一天，斯大林在苏联《真理报》上看到了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叫嚣，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的消息，一时怒气

难遏，忍不住将报纸朝桌上一擢，连连怒斥：“狂妄！真狂妄！”

内心升腾的怒火和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同情与关注，使他坐不住了。他用那微微颤抖的手，取出了那支特制的烟斗，慢慢地装上烟，点燃火，吸了一口，想用那烟草的气味，压住那升腾的怒火，然而下行；强烈的情感，把那些历史的画面，一个又一个地接连不断地推到了他的眼前。他仿佛看见了帝国主义的炮舰在中国内河上横行霸道，任意开炮；英法联军的铁蹄在神州大地上践踏，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人烧圆明园，浓烟蔽日，烈焰冲天……

不行！帝国主义横行无忌的日子过去了！悲惨的历史不能重演！斯大林狠狠地吸了一口烟，似乎又看见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三、毛泽东……等一个又一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从血泊中奋起，带领人民革命，斗争、抗击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压迫、剥削。他们的斗争艰苦卓绝，虽然一次又一次地被镇压下去了，然而他们绝不屈服，从血泊中爬起来，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净身上的血渍，带领人民又掀起更大规模的斗争。如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带领人民，坚持打人民解放战争，接连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美国武装的蒋介石国民党军一百多万，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国土，准备向江南进军。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四艘军舰在中国内河长江中开炮挑衅，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开炮还击。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竟然要英国政府派航空母舰到远东去武力报复，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帝国主义侵略吗？这不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人民能不对这种野蛮侵略还击吗？

斯大林拿起《真理报》继续往下看。他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还击，用强烈的炮火打得英国军舰弹痕累累，升起白旗，仓皇逃跑的时候，特别是当他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时，禁不住高兴地站了起来，连连称赞：“好！好！……真好！”

斯大林觉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声明，理直气壮，义正词严，表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英雄气概和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比仇恨，也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豪迈精神。当时，他不知道这篇《声明》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但他听米高扬从西柏坡返回莫斯科后汇报说：“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坚定的方向，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现在看来，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越打越勇，真正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用不着他斯大林再在这方面做什么文章，因而，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的怒火也渐渐地平熄了下来，在不知下党中变成了由衷的喜悦。

斯大林是个伟大的哲学家，常常喜欢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察和思考问题，他强调指出：“辩证法要求我们观察现象时不仅要各个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方面去观察，而且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它们的产生和衰亡方面去观察。”在观察、思考了丘吉尔的狂言和英国军舰在中国的暴行之后，他的思绪自然地沿着他和丘吉尔的接触印象发展开来。

斯大林和丘吉尔有过多次数较量。他深感这位英国政治家聪明过人，诡计多端。斯大林说：“阁下忽视了人心的向背！”

斯大林和丘吉尔，一个是当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一个是当时世界反共的急先锋和打手；一个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一个是资产阶级的政治

家：二人的思想政治观点几乎完全相反。然而，矛盾斗争，相反相成。“不是冤家不聚头”，“不打不成交”。在德国法西斯称霸全球，要灭亡英国和苏联的历史关头，他们居然多次握手联合，成了盟国盟友：而在二战胜利之后，他们又怎么反目为仇？值得深思。

丘吉尔是英国的大政治家，英国保守党的著名领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坚决反对法西斯，主张联合美国和苏联，结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特别是希特勒法西斯威震西欧，英国孤军奋战的时期，丘吉尔勇敢坚定，为抗击法西斯奔走呼号。面对那乌云压城城欲摧的年代，丘吉尔取代了绥靖分子张伯伦，挑起了抗战的大旗，带领英国的海陆空军，义无反顾地与德国法西斯战斗。当他看到美丽的伦敦惨遭破坏，英国人倒在血泊中呻吟的时候，便大声疾呼：

“即使伦敦化为灰烬，也比沦为德国奴隶强多少倍！”“不管付出多大牺牲，不管道路如何艰难，我们一定要战斗下去！胜利一定会到来！不获胜利誓不罢休！”

斯大林敬佩英雄。每当谈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时，斯大林总是赞赏英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也很赞赏温斯顿·丘吉尔这位叱咤风云的英国政治家。他记得很清楚，1942年8月12日晚上7时，在克里姆林宫里，他第一次会见了丘吉尔。当时，出席会谈的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丘吉尔、哈里曼（美国总统代表）和英国大使。首次会谈只进行了四个小时。

据丘吉尔的回忆录披露，会谈最初两小时的气氛“阴森而沉闷”。丘吉尔开门见山地把最棘手的第二战场问题提出来了。本来，按照1942年6月12日苏英和苏美公布的关于苏英条约、苏美合作协定以及关于1942年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英美部队应该在1942年的8月或9月在西欧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但是丘吉尔在这个问题上口是心非，花言巧语，千方百计地拖延开辟第二战场。因为1942年，对反法西斯同盟国来说是最艰苦、最关键的一年。苏德战场仍是世界最大的反法西斯战场，苏联红军承受着400多万装备最精良的法西斯军队的进攻，斗争十分艰难。斯大林多次提出要英美两国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苏联战场的压力。但是，丘吉尔在有了苏联和美国两个强大的盟国之后，感到英国得救了，却又背信弃义，打起了渔人谋利的小算盘。他希望俄国人孤立地同德国人厮杀，打得你死我活，财尽力竭，然后英美出来收拾残局，坐收渔人之利。此计虽妙，也有风险。最大的风险是，如果苏联在短期得不到英美的军事援助，可能不愿单独对德作战，而同德国签订和约、退出战争。那么一来，英国又将被放在德国法西斯的炮口刀尖上，苦不堪言了。因此，丘吉尔虚伪地许诺在1942年向苏联提供军援，并同意在1942年内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但又千方百计地拖延，搪塞，不予兑现。在这次会谈中，丘吉尔转弯摸角他说明，英美两国政府认为，他们不能在9月份开辟第二战场，但在积极准备，调兵遣将，预计在1943年发动大规模的战役。

斯大林阴沉着脸，虽没有打断丘吉尔的话，但不时地紧皱一下眉头，对这位英国首相面对危难耍滑头有点失望。他严肃地问：“是否法国海岸的任何一段都不能攻击？”

丘吉尔取出了一张地图，指出除了真正横渡海峡以外，在任何地方作空军掩护都有困难。

斯大林摇了摇头，脸色更加阴沉了。他单刀直入他说：“现在看来，你

们是不能用大量的兵力来开辟第二战场，甚至也不愿意用6个师登陆了？”

丘吉尔连忙解释说：“我们能够用6个师登陆，但这样的登陆有害无益，因为它会大大地妨碍明年计划实行的巨大战役。战争就是战争，不是开玩笑，如果惹起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灾难，那就大愚蠢了。”

斯大林眼睛里喷射出灼人的光芒，但还是用平静的口吻说：“很对不起！我的战争观与阁下的战争观不一样！不坚持正义，难获得民心；不准备冒险，就不能获得胜利。为什么你们这样害怕德军呢？！我真不明白。我的经验认为，军队必须在作战中流血。假如不使军队流血，就不了解军队的战斗力。”

“那么，元帅阁下曾否问过自己，为什么希特勒在1940年不打到英国去？当时希特勒正当力量全盛之时，而我们却只有两支经过训练的军队，200门大炮和50辆坦克。”丘吉尔笑了笑，反唇相讥他说，“他没有来，这说明希特勒也怕进行这样的战役。横跨英吉利海峡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不，不能这样类比。”斯大林进一步分析说，“阁下忽视了人心的向背！希特勒在英国登陆，将受到英国人民的抵抗；而英军在法国登陆，将受到法国人民的拥护。人心的向背，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啊！”

话不投机半句多！性格刚毅而又专断、粗暴的斯大林强压怒火，忍着性子，说到这里，取出他那待制的烟斗，用装烟的动作掩饰着不满的表情。

会议厅里出现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斯大林吸了一口烟，才用缓和的口气说：“假如你们今年不能在法国登陆，我也无权强求；但我必须说，苏联政府不同意英国首相的论点。”

为了打破僵局，丘吉尔笑了笑，换个话题，谈起了英国轰炸德国的经过。斯大林见丘吉尔谈得绘声绘色，表现了英国人民抗击法西斯的决心，也随即强调打击德国法西斯斗志的重要性。他说，苏联很重视对德国的轰炸，知道英国的空袭对抗击法西斯的巨大影响，但也明白，轰炸德国不能代替开辟第二战场。

机智、狡猾的丘吉尔这时才提出了“火炬”作战计划。他说：“我要回过头来谈谈1942年的第二战场问题，我是专门为这个问题而来的。我并不认为法国是进行这样一次战役的唯一地点，还有别的地点，因此，我们和美国人决定了一个‘火炬’计划。美国总统授权我来把这个计划秘密地告诉斯大林元帅……这个计划不迟于10月30日开始，但罗斯福总统和我都力争在10月7日实行。”

斯大林极感兴趣地听着，他虽然对英美推迟在法国北部登陆的计划不悦，但这时的气氛已好了许多。

经过两次谈判，斯大林同意了英美在1942年10月间实行“火炬”作战计划，并于8月14日晚上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款待丘吉尔一行。

宴会约有40人参加。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诚挚而亲切地招待客人，举杯祝酒，气氛友好而热烈。斯大林经过译员帕夫洛夫的翻译，与丘吉尔边吃边谈。斯大林说：“若干年前，萧伯纳先生和阿斯特夫人来访问过，阿斯特夫人建议我邀请劳合·乔治先生访问莫斯科。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请他来？他是干涉我们的头子。’阿斯特夫人回答说，‘那是不确实的，是丘吉尔使他误入歧途的。’我说，‘不管怎么说，劳合·乔治是政府的领袖，属于左派，他应对这事负责。我们宁愿喜欢真敌人，而不喜欢假朋友。’阿斯特夫人说，‘唉，丘吉尔这下完蛋了。’我说，‘我不能肯定就是这样。假如大难临头，’

英国人民或许还要求助于这匹老战马。’ ”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苏维埃工农政权，丘吉尔疯狂地煽动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把俄共布尔什维克称为“残暴的大猩猩”，并到处鼓吹“不能再让大猩猩掐死我们”。1919年4月，任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的丘吉尔千方百计地要首相劳合·乔治派军队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给俄国苏维埃政权造成了重重困难。此刻，在宴会上，斯大林旁敲侧击，使丘吉尔有点尴尬。

丘吉尔能言善辩，立刻插话说：“阿斯特夫人讲得很有意思。的确，我是干涉你们的最为活跃的人物，我不希望你有不同的想法。阁下，你已经宽恕我了吗？”

斯大林被丘吉尔的坦率诚挚逗笑了，幽默他说：“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应该属于上帝！”(11)

处在战争严峻关头的斯大林，为了争取这位暂时的盟友，争取战争的胜利，只好放弃意识形态的分歧，捐弃前嫌，用幽默的玩笑，掩饰过尖锐的政治对立，并且用“属于上帝”讨好对方，使宴会的气氛更融洽了。

丘吉尔举行仪式，给斯大林赠“斯大林格勒之剑”。罗斯福看了看斯大林说，“真是一个钢铁铸成的人！”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家与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有某种相似之处：为了一定的利益，有时候剑拔弩张、雷鸣电闪，乃至刀枪相向、兵戎相见；有时候又握手言欢，亲密无间，成了好朋友。

斯大林经历了历史的巨变。他和丘吉尔的关系也很曲折复杂，经历了多次变化。上次谈判后，苏美英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共同战斗。如今，德意日法西斯投降了，二战胜利了，那是千百万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啊！美英帝国主义长期侵略的亚洲人民觉醒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以排山倒海之势打到了长江边。当年曾派侵略军干涉十月革命的丘吉尔在莫斯科请求宽恕的声音言犹在耳，如今又要英国政府派航空母舰到中国去“实行武力的报复”，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狼忘不了伤人，秉性难移啊！斯大林想到这里，几乎对丘吉尔嗤之以鼻。然而，他一转身，有把剑，很快映入他的眼帘，使他不得不对自己的轻蔑重新进行审视。

那是一把金光灿灿的宝剑。剑鞘上隽刻着两行秀美的字：“国王乔治四世将这件礼物赠送给斯大林格勒的市民——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们，这是英国人民的一片钦佩赞誉之心的表示……”(12)

斯大林记得，那是在斯大林格勒大血战胜利之后，在那48大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苦战之后，苏联人民的牺牲奋斗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3年11月，在德黑兰的三国首脑会议期间，举行了一次向斯大林赠送“斯大林格勒之剑”的隆重仪式。

据英国《泰晤士报》当年报道：“仪式十分激动人心。‘斯大林格勒之剑，是英王乔治四世和英国人民赠给斯大林格勒居民的礼品，由丘吉尔先生在德黑兰苏联大使馆交给斯大林元帅。”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参加德黑兰代表会议工作的美国代表团，以及英国武装力量司令部的官员和政治顾问们的出席仪式，使这个举措具有更大的意义。

仪式十分隆重。大厅的一面墙前，有一列由20名英国士兵组成的仪仗队，由一名少校军官指挥。在队列前头，站立着一位手持闪闪发亮的宝剑的

尉官。该队列的对面是苏联仪仗队，都穿着黑色军靴，深蓝色马裤和草绿色军服。苏联仪仗队也是由一名少校指挥，在队列的最边上站着一名准备接剑的尉官。英国仪仗队一律持卡宾枪，苏联仪仗队则全部持苏式冲锋枪。

在庄严的音乐声中，斯大林元帅和丘吉尔先生几乎同时从相对的两扇门外进入大厅。丘吉尔首相在大厅中央停住，身着皇家空军武装力量将官礼服，神态凝重；斯大林元帅的出现给人们留下了敏捷神速的印象，全场十分安静。斯大林在门口停留片刻，神情很激动。他和丘吉尔都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意义，因而都在主动配合，认真行动。

这时候，隔壁房间里的红军乐队奏响了《国际歌》和《上帝，拯救王国吧！》。斯大林元帅由莫洛托夫先生和伏罗希洛夫元帅陪同慢步往前定去，迎接丘吉尔先生。在斯大林元帅之后，在大厅里出现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他靠墙站着。

当斯大林走近丘吉尔的时候，英国首相以清晰而庄严的声音宣布：

“斯大林先生！我受国王陛下乔治四世的委托，将这支光荣的剑交给您，请转给斯大林格勒市。该剑的式样是国王陛下亲自审定同意的。剑身上写着：‘国王乔治四世将这件礼物赠给斯大林格勒的市民——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们，这是英国人民的一片钦佩赞誉之心的表示……’”（13）

英国的尉官手持宝剑走近首相，将剑放在丘吉尔伸出的手上。首相把这件武器交给斯大林元帅。斯大林拿起剑，轻轻地吻了一下，又转交给伏罗希洛夫元帅。而伏罗希洛夫把礼品递给正步走上前接剑的俄国尉官。那尉官将锐利的宝剑举到齐眉的位置，并向后退，然后转身，又重新迈起庄严的队列步伐，走向自己的仪仗队。仪式隆重而简短，前后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但是在剑从大厅拿走之前，斯大林又从俄国军官手中将剑拿过来，并把它展示给罗斯福总统看。

罗斯福看了看剑，又看了看斯大林，说道：“真是一个钢铁铸成的人！”（14）

岁月的风云，湮没了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才三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早已作古；英国首相丘吉尔不顾人民的意愿，安于小成，不思改革，又狠劲地反苏反共，所以被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拿着丘吉尔当年送给他的“斯大林格勒之剑”的复制品，沉思良久，对于丘吉尔这个反复无常的资产阶级政客，似乎渐渐地谅解了。

为了不使美苏矛盾激化，公开对抗，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继续采取暧昧态度。

在美国统治集团野心勃勃地要“领导世界”、称霸全球的时候，在“冷战”之风愈刮愈烈，“遏制”浪潮压得斯大林和苏联处境困难的关头，东方的睡狮猛醒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在三年多的时间内，摧枯拉朽，打得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土崩瓦解，摇摇欲坠。世界力量的对比和结构改变了。美国、英国侵入中国的魔爪被斩断了，称霸世界的野心受到了严厉的打击。苏联的处境改善了。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虽然也给予相当的支持和帮助，但是，为了不使美苏矛盾激化，公开对抗，他对国民党政权仍藕断丝连，暗中支持。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之后，建国问题已迫在眉睫。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之首的苏联的态度，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关键。然而，在这个时候，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对中国革命仍然采取“走钢丝”的暧昧政策，暗中支持国民党政权，这表现在以下几件事上：

一.1949年初，李宗仁任临时总统期间，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又同刚任代总统的李宗仁起草了一份两国协定的草案，表示苏联要同国民党中国“真正合作”，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要国民党中国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保持中立以及消除美国影响等(15)。这项协定未能实现，是因为美国政府认为李宗仁要求美国援助而同时又与莫斯科谈判消除美国影响，是“不可思议的”；而苏联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最后关头，仍在谋求与国民党政府的“真正合作”，却是事实。

二.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要求各国驻南京的大使馆人员随他们迁往广州。各国大使馆——连英美等国的大使馆也不听国民党政府的话，原地坚持；而苏联大使罗申是唯一陪同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的外交代表。

三，更令人奇怪的，还有一件事。直至1949年5月，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的时候，苏联还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谈判新疆的经商权问题，谈判为“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问题。

因此，毛泽东在1957年4月11日的一次谈话中回顾说：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要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

话是这么说，当时，毛泽东还是十分尊重斯大林的，并且准备去和斯大林面谈。1949年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秘密访苏，委托刘少奇、王稼祥、高岗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后来，毛泽东看到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国内百废待兴，新中国将要诞生，自己实难离开，便委托刘少奇代表自己率中共代表团前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会谈，磋商和决定一些重大问题，并为毛泽东访苏作好准备。

斯大林闻讯，非常高兴。

注释：

《凯南回忆录》（1925—1950）1969年纽约版第583—598页。

摘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年第2卷：《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24—26页。

参阅〔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518—519页。

参阅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85页。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1年中文版第135页。

(11)解力夫著：《临危受命——丘吉尔》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10页和第315页。

(12)(13)(14)参阅《斯大林格勒之剑》，伦敦《泰晤士报》50年前的一

则报道，载《中流》1995年第三期第5页。

(15)见《美国与中国关系》上卷，中国现代史编辑委员会 1957年版第238页。

十二 事关重大，毛泽东让少奇先去谈判 知错认错，斯大林主动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率团赴苏联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说：“我什么时候‘指示’啦？我们是兄弟党，不是上下级……”

毛泽东对于和斯大林的关系非常重视。早在 1948 年 9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明确指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因此要特别注意搞好和苏联、斯大林的关系。会后 9 月 28 日，毛主席特地向斯大林通报了九月会议的情况，其中特别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通报，准备于 11 月末赴莫斯科。10 月 16 日，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 11 月到你那里商定。”12 月 30 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 1949 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1949 年春季）。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开二中全会。

斯大林派米高扬于 1948 年 1 月 31 日到西柏坡会谈。毛泽东全面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和各项方针政策。然而，米高扬回去以后，苏联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眉来眼去的暧昧态度和明显的“走钢丝”政策并未改变。苏联大使罗申不仅随同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而且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苏联仍然为“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问题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下决心要尽快地去做苏共和斯大林的工作。不久，决定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

到苏联去和斯大林会谈，是一次关系重大而又关系微妙、关系长远的谈判。既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又要尊重“老大哥”，不伤同志感情；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又要虚心听取斯大林和苏共的意见、建议，努力争取外援。为此，毛泽东颇费运筹，并多次和刘少奇商谈。1949 年 7 月 1 日，毛泽东还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给代表团作了全面的指示和交待，指明了任务和行动方针。他强调指出：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摆事实，讲道理。有时候，只要把事实摆明了，道理也就容易通了，要尽量用事实说话。

1949 年 7 月 2 日，刘少奇率代表团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旅顺，然后乘苏联飞机经朝鲜上空抵苏联伯力。因沿途在伯力、赤塔、红雅尔斯克、新西北尔斯克等地降落休息，接受当地领导人的欢迎，所以飞了 6 天才到莫斯科。这是刘少奇第三次到莫斯科。当他看见那熟悉的红场侧畔直耸云天的克里姆林宫楼塔顶尖的红星时，高兴得连连点头，频频招手。岁月流逝，风物改观，人和事都大变了。莫斯科已经不再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境况，苏联国家的面貌已经明显改观，到处都是热火朝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人们都显得精神焕发，朝气蓬勃。刘少奇越看越高兴，越看越自豪。中国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将来也要建设社会主义。刘少奇也已不是当年出国探求革命真理的游子，而是和毛泽东一起成了正在扭转整个中国乾坤的几个巨人之一。

代表团下榻在莫斯科的臭斯特罗夫 8 号公寓。休息两天后，第三天下午，

即7月10日下午，刘少奇等人应邀赴莫斯科郊外孔策沃附近的斯大林别墅。他们从汽车里出来，见斯大林在最前面，后面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岗诺维奇、米高扬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依次站在大门前，笑容可掬地迎接客人。

刘少奇紧走几步，热情地上前同斯大林双手紧握，互致问候。两位巨人，在第一次握手的时候，表现了不同的风度：一个精神抖擞，紧紧握手，表现了东方古国文明所特有的不卑不亢的含蓄、深沉、细腻的风度；一个热情友好，握手轻摇，体现出外高加索山区人的刚毅气质和长期来为人崇敬的雍容气度。

斯大林向刘少奇介绍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等同志，并热情地请刘少奇等人赴宴。他显然是在有意弥补着什么，对刘少奇等中共代表团的接待，从一开始就不寻常。宴会准备得非常丰盛。长桌上杯盘棋布，鲜花点缀，几色美酒装点其间。原来，斯大林有吃长宴的习惯，这次宴会持续了近四个小时，边吃边谈，热情友好，杯盏交替，倒也很自然，把一切生疏、见外之感都驱散了。斯大林坐在刘少奇身边，不时地和刘少奇亲切交谈。他说话很慢，吐字清晰，态度谦和，脸上带着微笑，显得沉稳庄重而热情友好。在宴会上的随意交谈中，有一般的应酬，也涉及到一些实质性的重大问题。这样的会见场面，事先估计下到，难做准备也无法记录。

筵席散了，告辞了殷勤好客的主人，回到寓所，刘少奇不顾一天的疲劳，立即召集代表团同志开会，回忆对斯大林谈话的内容，共同分析重点，理清头绪，分析斯大林对哪些问题已经明白了，哪些问题还不明白，哪些问题需要深谈，为以后的正式会谈作好准备。

王稼祥建议刘少奇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使会谈有计划地进行。他说，有个报告作基础，可以把问题谈深谈透，使他们对中国问题有个较系统、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这样能保证会谈内容既不遗漏，也不重复。

刘少奇采纳了这个建议，立即组织力量，赶写报告。由于在国内已有准备，报告很快就打印出来了，在第二次会谈时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很重视，将报告批转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元帅传阅，并请他们准备意见，参加讨论。

7月11日晚10时，斯大林邀请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会谈。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岗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列席的有索科洛夫斯基和苏军总参谋长，海军元帅等人。

斯大林亲自主持会议。他说，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因为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到军事和战争的部分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他拿起刘少奇的报告扬了扬说：“少奇同志的这份报告，写得十分清楚，十分明确。苏方的同志看了，没有什么问题。”

刘少奇对斯大林十分尊重。他说：中国革命虽然快要胜利了，新中国尚未成立，更伟大、更艰巨的任务辽在后面。我们的报告谈到了一些基本情况，不一定全对，希望“斯大林同志指示”。接着，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到遵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斯大林坐不住了，忙挥挥手，笑着说：“刘少奇同志，我什么时候‘指示’啦？我们是兄弟党，不是上下级，我怎么能‘指示’呢？正因为是兄弟党，互相关心，对于中国兄弟的一些事情，我们有时谈点看法，提点意见，

供你们参考，对不对？下一定，你们可千万不能当成什么‘指示’，当成什么必须执行的东西，那可就不得了喽，不得了喽！”

对于斯大林这种谦逊、平等的态度，刘少奇表示赞赏，并当即改正了自己的措词。斯大林高兴得哈哈大笑。会谈的气氛更亲切了。

斯大林对刘少奇表示了极大的信任和尊重。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

刘少奇和斯大林会谈了六次，前五次是交换意见，第六次是告别。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首先向斯大林具体地介绍了中国的革命形势，用雄辩的事实和具体的数字说明了在中国发生的不可逆转的伟大巨变：蒋介石是输定了，谁也不应该对蒋介石再抱任何幻想。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现在已经基本上取得了胜利，用不了多久，就可获得完全的胜利。截止1949年5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29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富庶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30%；解放区的人口已有2.7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7%；解放的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有1043个，占全国县城以上的城市的51%。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6月起的三年来的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550万人，国民党军队包括它的后方机关人员在内，现在只剩下150万人左右，其中稍有战斗力的大约只有2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已发展到390万人，其中四个野战军240万人。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夏秋两季，可望继续解放福建、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可以在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西藏须用政治方式去解决；台湾、海南岛与新疆须待明年解放。除开军事上的巨大胜利而外，我们也已取得了在政治上的完全胜利，所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斯大林对刘少奇表示了极大的信任和尊重。他聚精会神地倾听刘少奇的谈话，听着听着，由衷他说：“好，好！”他对于中国革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成熟给予了热诚地赞赏。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苏联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很多，今后，还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加强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刘少奇心里很明白：中苏虽都搞马列主义，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希望中国革命按照苏联的模式运行。而毛泽东不肯这样干。他要按照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办事，这就使斯大林产生了怀疑。怀疑影响行动，使苏联作出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走钢丝”的决策。因此，在会谈中，刘少奇向斯大林详细地介绍了建立新中国的有关问题。

刘少奇说：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中央政府。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中国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来发起和召集，而是由中国的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一起筹备与召集。政协筹备委员会已经组成。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为群众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性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全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及制定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

关于国体与政体问题，刘少奇介绍说，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还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估计需要十到十五年。

斯大林很注意新中国的外交问题，刘少奇作了特别介绍。他说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包括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权，均须彻底地加以摧毁。这个决定是载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是坚定不移的。今后的外交活动，将根据下列几项原则进行：（1）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3）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4）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

刘少奇说，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都不予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这样执行的结果，可使人民感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帝国主义的，也使我们免去许多麻烦。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即发生和各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理，或提出一些足以束缚我们手足的条件来作为承认的代价，这当然不能答应。如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那时，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我们将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刘少奇还提出，毛泽东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拜会莫斯科，希望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关于苏联给予中国三亿美元贷款的事，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办，感谢苏联的帮助。

斯大林听得非常认真，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并说了许多动情的话。他赞赏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各种政策、策略；明确指出，这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完全成熟，并表示苏联将坚决支持新中国。他说：“新

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

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斯大林还解释说：苏联在旅顺的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力量，既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斯大林说：“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同志要求，苏军现在就可以撤兵。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现在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在会谈中，刘少奇和斯大林对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口头的协定。如在聘请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派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在医疗卫生方面合作互助等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意见。根据中国恢复生产建设的需要，签订了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条件协定，初步议定选派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地赴华工作。

斯大林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有时好心也办错事。”

一次，在会谈中，刘少奇特别谈到打倒国民党的问题。

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特别注意。他手里拿着那支特制的烟斗，装上烟，慢慢地吸着，聚精会神的倾听着。个别听不清的词句，还请复述。

刘少奇说：我们和国民党是又斗争，又联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叛变，我们毫无准备，受了很大的挫折、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们的头脑清醒了，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要打内战，我们有准备，就针锋相对，自卫反击，进行了人民解放战争，把国民党蒋介石打倒了。

斯大林听着，心情沉重，脸上露出愧疚的神色。他清楚地记得，1945年8月，国民党蒋介石要发动内战，挥起屠刀，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要自卫反击，武装抗争，中国的内战一触即发。就在那个时候，他曾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说是中国如果打内战，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现在，历史的发展和自己的预见相反，历史已经证明自己错了。而今天，中共代表团就在自己面前，谈起了这一段历史，使他感到内疚和不安。他深思他说：“这是敌人教训了我们，沉痛的教训啊！”突然，他又问：“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

刘少奇客气地说：“没有。”

斯大林摇摇头说：“不，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有时好心也办错事。”

斯大林讲到这里，态度非常严肃、诚挚，表现出深沉的内疚！

会谈厅里，静悄悄的。人们都陷入宁静的沉思。

斯大林又说：“毛泽东到重庆去是有危险的，CC等特务有谋害毛泽东的可能！”

刘少奇解释说：“毛泽东到重庆去的后果是很好的，使我们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又关切地问：“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到了损失？”

我们是否干扰了你们？”

刘少奇答复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只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孤立了美蒋，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

斯大林笑了。他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你们做得对，你们胜利了。”

聪明的斯大林，也感到了刘少奇的客气和礼让。停了一会儿，他又内疚他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老实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当然，你们应该注意我们讲话的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实情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当时都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代表团按照毛泽东的中国革命问题主要由中国同志负责的主张，并没有向斯大林提出什么批评意见，更没要求斯大林作自我批评。

斯大林主动地公开地作自我批评，不但没有使他的荣誉遭受损失，反而赢得了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的尊敬，认为他表现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斯大林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侮辱了自己，后又与希特勒一起撤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因而，在反希特勒战争胜利后，那些国家所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未投降日本，后来又未与日寇一起撤退。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企图与美国建立联系，取得美国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的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航运上也是极不利的。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于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内这是需要的，这就要制定一种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劳资政策等。

斯大林还具体地分析了劳资间矛盾与处理方法。他说，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为了使工人斗争不致破坏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要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在合同上使工人利益得到保障，要说服资本家变为文明的照顾工人利益的资本家，使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能比较长期的继续。

刘少奇对斯大林的主张与分析，表示赞成。

斯大林问中共代表团还有什么问题。

刘少奇提了几个事先准备提的问题，其中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一个是对世界革命力量如何估计，对两大阵营如何估计。

斯大林回答说：“目前，不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暂时谁也没有这个力量，革命力量是向前发展的，人民的力量比战前更强大了。帝国主义要发动世界大战，至少要有二十年的准备。人民不愿战争，战争就打不起来。至于和平能维持多久，要看我们的努力和形势的发展。我们要建设，和平是最重要的，要努力争取和平多维持几年。当然，谁也不能保证世界上没有疯子，没有战争狂人。斯大林举了几天前刚发生的一件事为例——美国的

一位军官风闻“苏军从阿拉斯加登陆了”，他就跳楼自杀了。

斯大林说：“我们应该立刻把这个问题通报毛泽东同志，让他了解我们的观点。”接着，口授电文。出口成章。

在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中，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时间，是个重要问题。刘少奇告诉斯大林：我们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斯大林说：“你们很快就过长江了，你们的政府设在哪里？国家不可长时期无政府。”

刘少奇告诉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的意思，在成立中央政府问题上，不要着急。因为我们当年在瑞金成立过中央苏维埃政府，但因条件不成熟，没有起多大作用。

斯大林对围桌而坐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刻把这个问题通报毛泽东同志，让他了解我们的观点。同志们，你们有意见吗？”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总是不发表意见，都明白，领袖怎么说，就该怎么办。

“那么谁来起草电文？”斯大林又说。

没有人打破沉寂。

“既然一致同意发通报，那么现在……马林科夫同志，你来动手怎么样？”

马林科夫坐在那里没有反应，不过，人们都看见，他的耳朵竖起来了。

一个人如果有一点自信的话，就应该主动出来请战，但是谁也没有表示勇挑重担。

“那么说，是不愿意喽……那么，我们请……算了吧，还是不求人，我自己来。”斯大林断然他说。于是，他把打字员叫来，一面口授，一面沿着会议桌走来走去。

费德林把斯大林口授的内容给刘少奇翻译，后者十分专注，一字不漏地听着。斯大林说得很慢，一字一句斟酌着，仿佛要把每个字都刻下来一样。每讲完一句就停一下，提醒打字员严格按照他的话打上标点符号，不要任意改动词句。他说得干脆利落，而且只说一遍，不再重复。

口授完毕之后，斯大林要求迅速打印出来，给在坐者人手一份。不一会儿，每人面前都放了一张印好的通报，文字只占半页左右。文字异常简练，没有多余的字，也没有多余的标点符号。顿时，人们对领袖敬佩得五体投地，这是扎扎实实的本领，决不是卖弄聪明信口开河可以得来的。

斯大林又对在坐者说：“看完后，请大家发表意见，有没有补充或删节。”

谁都不吭声，仿佛是在看一份学习的课本。

刘少奇首先打破沉默，他说：“写得好极了，斯大林同志，通报简明扼要。感谢您，祝贺您，斯大林同志。”

“是的，是的，好极了。”别的人马上一个接一个地附和：“我们祝贺你，斯大林同志……”还有其他一些赞美词，如“永远光荣”之类，他们都在为自己创造一个可以膜拜的偶像。

刘少奇将此事电告中央，党中央加快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原打

算在 1950 年 1 月 1 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后来根据各种条件和人民的愿望，将时间移到了 1949 年 10 月 1 日。

斯大林说：“世界革命的中心从欧洲移到了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并为此举杯祝酒……刘少奇谦让再三，不肯接受……

斯大林很重视各国人民的团结和互助。

在第四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指出：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和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团结、互助、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各国人民互相信赖、竭诚相待。当然，这代替不了正确的政策与策略，但这的确是朋友交往的一项准则。

交谈了一阵之后，斯大林请中共代表团看电影。影片就在会议室里放映。斯大林的话刚落，灯光一暗，电影就开始了。第一部影片是试验原子弹爆炸的现场记录片。试验的地点可能是在苏联东北部接近北极圈的地方。一望无际的荒原上，白雪皑皑。飞机来了，投掷了一颗炸弹，命中了目标，蘑菇云腾空升起，冲击波威力无比，地动山摇，楼倒舍塌……影片具体地表现了原子弹的爆炸过程、威力和破坏范围。据说，这是苏联人第一次给外国客人看这种纪录片。

当时，世界分成两大阵营，美苏争霸，美国进行核讹诈。斯大林请看这部影片，是在用纪录片的事实说明：原子弹我们也有，不要迷信西方。如果敌人真的要用原子弹袭击我们，他们就会得到相应的报复，而我们的朋友也会得到原子弹的保护。

看完电影后，人们都在低声议论原子弹的威力。

斯大林高兴地告诉代表团：科学技术在迅猛地发展，其速度之快，有时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不过，像试验原子弹这种大规模杀伤的武器，大家都不公开说，而是关起门来秘密地干，因而也有人叫它“秘密武器”。言下之意，苏联也正在研究和发展更新的新式武器。

7 月 27 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层楼上举行宴会，招待代表团及江青。

江青给斯大林敬酒后，斯大林高兴地和大家碰过杯，一饮而尽。江青的祝酒词：“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使斯大林触景生情，谈起了革命中心东移的问题。他说：“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中心也由西方移到了苏联，现在又将移到中国。”

斯大林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早一些、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斯大林说：“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后来者居上嘛！现在，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而干杯！”

说到这里，斯大林态度诚恳，情绪激动，举起酒杯，为此祝酒！

刘少奇听了非常紧张，不肯接受。

斯大林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祝愿！”

刘少奇还是不接受，说：“老大哥还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

在场的苏联同志都劝说：“弟弟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是规律。斯大林同志的祝酒应该接受。”

刘少奇同志还是不肯接受，他一着急，脸都红了。

就这样，斯大林要祝酒，要祝贺世界革命中心东移，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刘少奇坚持不接受，推让了足足有半十小时，刘少奇还是没有喝这杯酒。

苏联同志不能理解，感到茫然，他们知道，按照高加索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宴会、婚礼等场合的祝酒，是人们表示的一种盛情和祝愿，如祝愿对方进步、胜利、幸福、健康、长寿等等，以加强相互间的友谊，增加欢乐的气氛。但是中国的刘少奇为什么不敢接受这种良好的祝愿呢？

欧洲大国的领导人往往不了解被压迫、被奴役的东方民族的性格。刘少奇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袖之一。长期的革命斗争，无数的战火硝烟，把他锤炼得沉着而机智、坚强而勇敢。然而，在那性格深处，灵魂深处，仍然不能不留些被压迫、被奴役的烙印。勤劳、纯朴、憨厚、老实、忍让、谦逊等等，是这些烙印的美称。而在“大人物”面前直不起腰，又往往是这种精神烙印的另一面。

刘少奇访苏，是受毛泽东委托并代表毛泽东会见斯大林的，任务可以委托完成，事情可以代人去办，而性格、人物的个性是无法代表别人体现的。有人猜想，如果毛泽东遇到这种场面，会怎么样呢？难道还会这样谦虚——过分地谦虚，甚至有点卑躬吗？不一定。因为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倡过放下包袱，敢想敢干，敢为人先，敢做前人没有干过的大事业！

毛泽东曾经多次批评过被压迫者中的奴才性格。他曾举古典戏曲《法门寺》中的贾桂为例，批评那种在“九千岁”——公公刘瑾面前，躬着腰、低着头、不敢坐，说“奴才是站惯了的”奴才性格，提倡人们解放思想，敢想敢干！

然而，刘少奇很谨慎。斯大林的祝酒他到底都没有喝。这种由于领袖人物性格的差异，导致重大事态的不同发展，在数月后毛泽东赴苏与斯大林会见的情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两位历史巨人相遇时的性格闪光，奇特场面，曲折经历，和刘少奇与斯大林会见的情景，在人物性格上成为鲜明的对比。

注释：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版第 36 页。

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14 页。

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第 51 页—52 页。

十三 升起国旗，毛泽东心有疑虑 即发贺电，斯大林准备会见

毛泽东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但他心里还揣着一个大问号。仅过了两个多小时，就收到了莫斯科的贺电。

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那天的下午3时，毛泽东走到位于古都北京城中央的天安门城楼上时，聚集在这儿的百万群众，已经整队肃立，翘首仰望，凝神注视，都想看一看这位农家出身的革命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军事家、理论家、诗人、艺术家，传奇式的民族英雄毛泽东。

毛泽东神采奕奕，热情地摘下帽子向欢呼的人群招手。他，身材魁梧，面容慈祥，宽阔的前额，长长的黑发，使他那一双明亮的眼睛显得分外明亮。丰满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圆圆的下巴上有一颗显眼的黑痣。正如一位缅甸人说的，“他没有周恩来的清秀，但显得慈祥宽厚。”今天为了开国大典，他没有穿他那宽松的裤子和朴实的上衣，而穿了一身笔挺的中山装，显得十分精神。他的胸前佩带着一条鲜红的绸带，上面印着八个金黄色大字：“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3时整，毛泽东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低声对身边的周恩来打了个招呼，然后手持讲话稿，对着中央话筒，用他那乡音浓厚的湖南话，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万众欢腾，山呼海啸。

毛泽东亲手按动了面前的升旗电钮。他那有力的大手，伸出一个指头，稳稳地按在那白色的按钮上，久久地没有松开。一面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冉冉地升向天空，迎风飘扬。54门大炮齐鸣28响，每一响都惊天动地。这28响，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烈们前仆后继牺牲奋斗的28个年头。广场上空，响彻了激越高昂的国歌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现在，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中国人民终于筑成了新的钢铁长城，终于站立起来，第一次以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然而，欧风美雨，咄咄逼人。复杂的世界，是否承认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的政权呢？

毛泽东的心里悬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毛泽东深知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开天辟地的革命伟业。它不仅需要推翻

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扫除近百年来的民族屈辱、陈规陋习，而且打破了世界的格局，惹恼了帝国主义列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些一直想鲸吞蚕食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们不但不会承认它，而且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它，推翻它；那些受侵略受压迫的弱小国家，虽抱着同情，有心支持，但无能为力；而苏联的斯大林对自己又有怀疑……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下承认，就有问题了。

仅仅过了两个多小时，就从苏联首都莫斯科拍来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师哲把这份热情的贺电译出来，亲自送给了毛泽东。

紧接着，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拍来贺电，纷纷正式承认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

当红色的电波把毛泽东宣布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传遍世界的时候，许多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冷眼旁观，蒋介石更试图依靠美国来孤立新中国。苏联的首先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与声援，打破了美国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孤立图谋，使一个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红色政权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

毛泽东高兴得笑了。

他回到住处，已是晚上 11 时许。尽管他劳累了一大，但仍精神饱满，毫不疲倦。他顺手取来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打开封面，便看到斯大林那庄重而神秘的半身照片，端详起来。

斯大林的形象，是那样庄严而深沉，嘴边的胡子好像掩盖着无数的秘密。淡淡的的笑容，似乎又表现出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没有见过斯大林，他只是在书本上、电文中和别人的传言中，听到过斯大林的心声；而现在，在新中国正式诞生亟须得到国际承认的关头，以苏联力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首先伸出了友谊之手，同志之手，使他倍感温暖，倍感亲切，也倍受鼓舞，大大地增加了他的自豪感和自信力。

他记得很清楚，在三个月之前，在决定新中国前途、命运的时刻，1949 年 6 月 30 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作出过明确的判断：

“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下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毛泽东知道，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友谊和援助，要学前人的经验。而在这方面，苏联的经验是可资借鉴的。因此，他明确指出：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而且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写道：“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想到这里，毛泽东立刻拿起电话耳机，打电话把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请到自己的住处，商谈着手准备出访苏联，亲自会晤斯大林的问题。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

英俊潇洒的周恩来，轻轻地点了点头，说：“是啊，今年是斯大林同志 70 寿辰的生日，苏联准备庆祝。记得他 60 寿辰的时候、主席在延安不是还

写了一篇祝贺的文章吗？”

毛泽东感慨他说：“是啊，一晃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呀！”

“今年12月21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同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

毛泽东笑着说：“我可是只管去祝寿喔！有关中苏双方的会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情，还得靠你这位政务院总理了。”

周恩来知道，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因为过分劳累，体力不支，需要休息，就说：“主席可以先在苏联休息一段时间，好好休息，恢复恢复体力；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好哇！”毛泽东点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叮咛周恩来组织人作访苏的准备工作，并要和苏联方面及时联系。

新中国的成立，打破了旧的世界格局。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破天荒地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奴役，使帝国主义者气急败坏，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内外串连，软硬兼施，千方百计地要孤立新中国，封锁新中国，不择手段地要把这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搞垮。

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不但准备自己于年底访苏，与斯大林会晤，而且在10月20日，又致电斯大林，介绍王稼祥出任驻苏大使，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接洽两党事务。这样，中苏两党、两国的联系渠道完全打通了，可以不失时机地开展打破帝国主义孤立、封锁新中国的严重斗争。

秘密的电波，把毛泽东的意思带到了苏联的首都莫斯科。

杜鲁门曾向斯大林进行原子讹诈。新中国诞生前夕，苏联也有了原子弹。斯大林复电，欢迎毛泽东。

性格多疑的斯大林，看着毛泽东那热情友好的电文，禁不住内心愧疚，左右为难。他轻轻地把电文放在桌面上，取出他那特制的烟斗，装烟、点火，抽起烟来。

一团团的白烟，从斯大林的嘴里吐出，袅袅上升，变化出各种形态。

斯大林望着那变化无穷的烟雾，已陷入了对往事的沉思。他觉得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简直是个神秘难测、变化无常的奇特世界；中国革命，又像个勇猛豪强、力大无比的雄狮，令人难以驾驭！为了中国革命，他不惜殚精竭虑，日夜操劳，花费过多少心血啊！然而，往往事倍功半，收效甚微。有几次，甚至是事与愿违，妨碍了中国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斯大林一直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因为蒋介石不仅掌握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命脉，而且有美国的全力支持。斯大林记得很清楚，就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初期，他还看不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他对美国代表霍普金斯说过，中国，包括共产党在内，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能统治全国的领导人。由于苏联不愿与一个分裂的中国谈判，斯大林准备支持蒋介石总统及其政府。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曾向美国总统作出保证。这在美国总统杜鲁门极其机密的各忘录——《关于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协定的说明》中记载着：“一，斯大林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二，战争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主席继续领导。”当蒋介石发动内战，挥起屠刀，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奋起抵抗的时候，他曾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过电报，要他们不要抗争，说如果打内

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坚强勇敢的毛泽东，顶着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进行人民解放战争，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艰苦的较量。现在，中国形势的发展，和斯大林当初预计的相反，貌似强大的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打垮了，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毛泽东以新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人民领袖的资格，要到苏联来，要和他斯大林会晤，这必然会使他感到尴尬、难堪。所幸的是，在中国解放战争中，他见蒋介石和美国打得火热，把大量的美军引入中国；而毛泽东则领导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很快地在东北打开了局面，于是，斯大林下决心调整决策，由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开始转向支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也给了斯大林和苏联以巨大的支持。斯大林记得，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斗争激化的时候，在五角大楼制订了对苏联进行核轰炸的计划之后，在冷战之风越刮越猛、苏联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的时候，是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一步步地把他驱逐出中国，给苏联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军事实力争得了宝贵的时间。

斯大林清楚地记得，美国总统杜鲁门向他施行原子讹诈的情景。那是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斯大林和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国首脑第三次会晤——波茨坦会议，讨论二战后世界的具体安排问题。7月21日，也就是波茨坦会议的第四天，当三国首脑在会议上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一份关于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区阿拉莫戈尔多空军基地爆炸成功的详细报告，送到了波茨坦。下午3时，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向总统杜鲁门报告了此事。

杜鲁门对斯大林的气宇下凡有点不满，在听了原子弹爆炸的详细情况之后，大为振奋，连喊“OK！”他认为这个报告使他身价倍增，在会上有了全新的地位，可以更大胆、更直率地和斯大林讨价还价了。他急不可耐地想使苏联人明白：他杜鲁门手里握有一张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王牌！

在经过了几天的等待、筹划之后，7月24日，全体会议刚结束，杜鲁门立即把他和丘吉尔等人谋划的计策付诸实施了。他笑迷迷地走到斯大林面前，十分神秘地告诉斯大林，美国已经研制出了一种威力异常大的新炸弹！为了使斯大林感到震惊，杜鲁门在“炸弹”这个同的前边，故意加了好几个夸张的形容词。他虽没有用“原子弹”的名字，但他那说话的神态、语气，足以显示这种新炸弹的巨大威力。

杜鲁门说话的时候，串通一气的丘吉尔首相和贝尔纳斯国务卿都站在只有几码远的地方，仔细端详着斯大林的反应。然而，斯大林仍像往常一样沉着冷静，嘴里叼着他那特制的烟斗，神情安祥而自若，没有显示出任何的惊讶或不安，以至杜鲁门、丘吉尔他们都断定，斯大林没有真正理解杜鲁门那句话的含义。

回到寓所后，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朱可夫元帅详细地叙述了杜鲁门那次谈话的内容和神气。莫洛托夫说：“他们是想抬高身价！”

斯大林哈哈大笑说：“让他们抬高身价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同志加快我们工作的速度。”即加紧搞出原子弹来。果然，经过四年多的紧张努

力之后，1949年9月23日，苏联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上第二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

现在，苏联的军事实力渐渐恢复了，手中有了原子弹。中国的革命胜利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斯大林的腰杆更硬了。他十分重视毛泽东的到来，准备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他指示《真理报》于10月5日发表了一篇社论，《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同时，又并排刊登了毛泽东一幅稍大些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三幅稍小些的照片。

《真理报》的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那末，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社论接着写道：“斯大林同志早在1925年就宣称：‘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这一力量现在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但它将来一定会表现出来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执政者，准要是看不到和低估这一力量，他一定会遭到失败的……’斯大林同志的这一天才预言已经实现了。”

斯大林翻阅着《真理报》，品评着毛泽东和他的那两段话，回忆着历史的转变，心理乐滋滋的。

一阵脚步声，打断了斯大林的沉思。马林科夫进来，询问如何给毛泽东复电。斯大林拿起了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看了又看，觉得无论措辞、语言，都是正确而得体的，便吩咐马林科夫给毛泽东复电：欢迎毛泽东到莫斯科来。

1949年11月2日，毛泽东又电谢斯大林：“感谢您欢迎我到莫斯科去。”于是，对于毛泽东会晤斯大林的各项工作，都抓得更紧了。

毛泽东登上专列，奔向银装素裹的北国。车厢里，他和费德林、王稼祥谈古论今……

12月6日，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洁白的雪花，把京城打扮得玉砌银装，分外妖娆，在阳光的照耀下，大地生辉。北京火车站，红旗飞舞，人流涌动。一列专车，整装待发。

毛泽东来了。他穿着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头戴呢帽，外罩一件大衣，从小车上下来，神采奕奕地走向欢送的人群，微笑着与送行的人一一握手告别。

毛泽东访苏，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出国访问，非同一般，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都前往车站送行。毛泽东同周恩来握手时，风趣地对这位外交能手说：“一言为定，我在莫斯科等你！”

周恩来轻轻地摇动着毛泽东的手，爽朗地笑着，说：“请主席放心！只等你一声令下，我们随即出发！”

告别了送行的人，毛泽东登上了专列，站在车门口向大家挥手致意。

列车长鸣一声，徐徐驶出站台，奔向遥远的北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访苏的决定是：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祝寿之后，就在苏联休息和参观；有关中苏两党两国问条约、协定的谈判，则由总理兼外长周恩来随后去办。因此，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并不多，只有陈伯达、叶子龙、江东兴、欧阳钦和师哲等几个人。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和苏方负责中长铁路恢复工作的柯瓦廖夫也同行。此外，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负责送行。

列车朝东北方向飞快地奔驰。毛泽东在车厢里读书看报。不料，专列经过天津时，发现铁路上有一颗手榴弹。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后果难料。专列上顿时紧张起来。罗瑞卿忙检查保卫措施，并亲自下车去调查处理这桩事件。

坐在车上的毛泽东却遇险不惊，泰然自若地继续读书。听了手榴弹事件的报告后，他只淡淡地一笑，就去向随行人员了解沿途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了。谈到开心处，还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主席的镇定自若，深深地感染了车上的人。专列上的紧张气氛，很快地缓和下来了。

夜幕像一张无际的黑纱，悄悄地罩住了大地。毛泽东的专列射出一道明亮的光束，撕开了夜幕，飞速向前。车厢里，毛泽东手持书卷，在灯光下聚精会神地读着、读着……

12月9日专列到达满洲里，毛泽东一行换乘苏联领导人用的专列。那车厢内设有浴室，还有大夫专为毛泽东配餐。到边境迎接毛泽东的有苏联副外长拉夫伦捷夫、赤塔州苏维埃主席乌若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代表及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夫。过境后的第一站是奥特波尔，在那里有仪仗队隆重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整理了一下衣着，穿好大衣，大步走下车来。这时，站前广场上，军乐高奏，鼓号齐鸣。一排排穿着新军装的苏联仪仗队，威武雄壮，整队肃立。当毛泽东走来时，“唰——”地一下，仪仗队持枪行礼，向中国人民的领袖致敬。毛泽东注目还礼。检阅仪仗队后，他又与前来欢迎的当地领导人握手问候。稍事停留，又登上了专列启程。

西伯利亚的寒流是著名的，对新来的中国客人也不留情。车顶上，车窗前，挂起了一根根晶莹的冰柱。毛泽东似乎对这出奇的寒冷毫不介意，他有时观观窗外的冬景，有时埋头读书，有时查阅资料。当专列到达新西比尔斯克时，莫斯科已把电话打到了车站上，询问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如何，途中是否顺利等等。

毛泽东闻讯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告诉苏联同志，我们一切都很好，谢谢他们的关心。”

列车呼叫着，顶着凛冽的寒风，向前疾驰，把一片片森林、一道道山川甩在了后边。

毛泽东正在观景，有人报告：苏联派来陪同的俄文翻译、汉学家费德林教授求见。毛泽东说了声“请”，费德林很快就来了。

毛泽东请客人就座，并用绿茶招待。

费德林谢座之后，又请问这是什么茶。

“这呀，当然是我们湖南绿茶喽！它有点涩嘴，有的人不大习惯。不过，凡是好茶都有一种叫丹宁酸的东西，对血管和微细血管都有好处的，可以防治血管硬化和高血压。你知道，中国人高血压的发病率不算高，大概同经常喝绿茶有关吧？你尝尝，怎么样？”

毛泽东说着，给客人斟满了茶。

“谢谢你，毛主席！一些有经验的行家也是这么说的。我以前听说湖南茶不错，只是不懂行。我过去只品尝过龙井茶的滋味“那你的口味很高喽！哪个中国人不想尝尝杭州的龙井茶呢？”

那是上层人士喝的东西……至于我们这些乡巴佬、大老粗和丘八大兵，能喝上当地产的湖南茶就不错了。有人还当它是普通的蒿叶子哩！”毛泽东那渊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很快地驱散了费德林那拘谨的感觉，拉近了

情感。费德林曾多次接触过斯大林，但那种和领袖相处的拘束、惶恐、紧张的心情一直没有离开过身，也从来没有和毛泽东一见如故，这么热乎、亲近。

火车放慢速度，快到秋明站了。毛泽东望窗外，突然惊呼：“瞧！那边石头上有几个中国字！”

费德林向窗外望去。见一块石头上刻着两个大大的中国字：“洞门”，一般用来标明山洞入口或者峡谷的通道。

“看见了吗？……它不像石碑，也不是建筑师的手笔，你看是什么？博士？”

“说不好，我没有看清楚……也许是前来寻找野人参的中国人留下的暗号。西伯利亚的人参很出名呢。”费德林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那怎么会一直保留到现在？难道现在还有中国人到这块禁地来采人参吗？”

费德林无法详细回答毛泽东的问题。但他似乎觉得毛泽东的话里似乎还有话。

“有意思。”毛泽东继续说，“石头会说话呢。当年的勘察者早被人们忘掉了，倒是石头还在纪念他们。那很可能是第一批勘察家哩！……你读过《红楼梦》吗？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又叫《石头记》。”

费德林觉得，毛泽东在这里提起《石头记》，只是借题发挥而已，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国人早先曾经进入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并在这里居住过、勘察过、开发过，后来这片领土却被人掠夺去了。费德林不想在这些问题上深谈，便请求对方谈谈《诗经》。

毛泽东说，《诗经》是中国诗歌的精华。它来源于民间创作，都是无名作者。创作的年代已经无法查考。它代表了中国早期的美学，这种诗感情真切，深入浅出，语言很精炼。”

费德林又谈起了屈原。

毛泽东说：“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变革都会产生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于屈原，政治变迁是他个人的不幸。屈原艰苦地走过了他的时代。他忧国忧民，力求挽救楚国的危亡。

“连年战乱使国家凋敝，民不聊生，楚国灭亡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接着开始了另一个历史过程，就是把那些分散的、互相争权夺利的争战不休的诸侯王国统一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最后，它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终，从而形成了第一个集中统一的帝国。这对中国后来的命运产生了重要作用。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要专门来谈。”毛泽东那渊博的知识，生动地谈吐，把费德林引入中国知识的海洋，使他后来成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家、翻译家。从屈原到鲁迅，从郭沫若到艾青，他都曾发表过专著。

列车到了雅罗夫斯基车站后，专程从莫斯科前来迎接毛主席的王稼祥到了。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苏联大使，专程来这儿陪同毛主席访苏。他登上了专列，就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说：“主席啊！可把你盼来了！”

毛泽东兴致勃勃他说：“稼祥同志，你辛苦了！我这一回来，可少不了你这个苏联问题的专家哟！”

说着，两个人坐下来，亲切地交谈。毛泽东同王稼祥的关系相当密切。早在1935年春，中国革命处在最困难的关头，毛泽东心急如焚，有劲使不上。在红军长征路上，他和躺在担架上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进行过几次推

心置腹的长谈。王稼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地站在被排挤被压制的毛泽东一边，旗帜鲜明地同王明路线作斗争，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会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周恩来和王稼祥当时就成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上的副手。抗日战争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国，大搞“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又是王稼祥从苏联回到延安，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确立毛泽东正确领导的指示，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发展。现在，在开往莫斯科的专列上，毛泽东和王稼祥的再次相会，抚今忆昔，感慨万端。

毛泽东递给王稼祥一支香烟，自己又划火柴抽着烟，说：“时间真快呀！记得斯大林 60 岁生日时，我们还在钻山沟，人家也不大看得起我们。当时，我在延安发表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表示我们的心愿。没想到他 70 岁生日时，我们已经夺得了政权，这也是下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吧！”

王稼祥回忆说：“从 1920 年共产国际派维金斯基来华，帮助中国革命，到新中国成立，29 年间，苏联同志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不少。”

“是的，是不少。”毛泽东点点头说：“这种帮助和支持，我们过去需要，现在，我们同样需要。”

王稼祥说：“记得主席在延安发表的庆祝斯大林 60 寿辰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学习斯大林两个方面，一个是道理方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理论；一个是事业方面，把理论见之于实际。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完成，而斯大林把它完成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的确，在苏联的两个五年计划之前，在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前，各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天天说苏联不行了，社会主义快完蛋了，但是今天怎么样呢？张伯伦的口被封住了，希特勒完蛋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更强大，新中国又诞生了。”

“是啊！胜利来之不易，今后的路程更长！”毛泽东说着，放眼窗外。

列车长鸣一声，在茫茫的雪原上奔驰。金色的阳光，照耀着银白的原野、苍莽的森林、起伏的山峦，令人心旷神怡。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1475 页和 1481 页。

梁敬鎔《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

《蒋总统秘录》第 41—42 页。

转引自〔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胜利与悲剧》，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 8 月版第 536 页。

〔俄〕费德林回忆录：《我们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第 12—15 页。

十四 仪式隆重，两伟人亲切会面 开门见山，激起了层层悬念

斯大林望着毛泽东，说：“伟大！真伟大……”毛泽东却摇摇头说：“不，我是个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1949年12月16日清晨，莫斯科银装素裹，雪压枝头。大街小巷白雪覆盖，冰清玉洁，到处都显得庄重、高雅、肃穆。太阳出来了，金色的阳光，照在雪街玉树上，金光银色相辉映，好似为这座古城披上了一件绚丽的新装。

快到中午时分，气温渐渐升高，莫斯科人纷纷走上街头。他们都在议论着今天的热门话题——新中国的主席毛泽东将来到这里。火车站上，红旗飘扬，彩带飞舞，一队队男女青年手持鲜花彩带，边歌边舞，热烈地欢迎贵宾的到来。

正午时分，伊万大帝钟楼上的那口古老的大钟敲响了。“咣咣咣——”第十二下洪亮的钟声刚刚响过，“鸣——”一列专列进站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呼啸着开进了莫斯科北站。钟声、车声、欢呼声响成一片，这是苏联方面精心安排的。

到车站迎接毛泽东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长孟希科夫、副外长葛罗米柯等。

毛泽东检阅了仪仗队，并且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毛泽东最后高呼：“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

由于天气寒冷，毛泽东在途中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便乘车前往下榻处——莫斯科郊外斯大林战时的住所休息。

莫洛托夫陪同毛泽东去到下榻处，招呼毛泽东休息，并说下午六时斯大林约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毛泽东下榻的孔策沃别墅，环境优美，内部舒适，设备齐全。毛泽东在卧室里休息了一阵，便叫工作人员做好会晤前的准备工作，他自己则点燃了一支烟，走到窗前，望着那白雪覆盖着的田野，进入了冷静的沉思。他知道，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生性主观而多疑，直至自己赴苏前夕，斯大林还怀疑中国共产党会不会走“南斯拉夫式的道路”，怀疑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铁托”。他也知道，他根据中国特点选择的和苏联不大相同的革命道路、方针、政策，斯大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太赞成。但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知道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更懂得顾全世界革命的大局。毛泽东本人早就说过：“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

苏联为首的反帝国车义战线一面的……”

此时的毛泽东决心去打消斯大林的忧疑和顾虑，搞好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他又看了看莫斯科郊外的自然风光，然后转回身来，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一会儿，警卫人员前来，迎接毛泽东去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毛泽东只带了顾问兼翻译师哲，随警卫人员走出客厅，登上了小汽车。

汽车穿过繁华的莫斯科街道，进入克里姆林宫。这座古老的皇宫里，路面全是用鹅卵石铺成的。车队沿着伊万大帝钟楼的右边驶过，从斯帕斯大门进去，经过一个很大的街心花园，驶向一个美丽的大理石游廊。

毛泽东坐在车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游廊的顶部。原来，在那游廊的顶部，镌刻着罗曼诺夫王朝历代皇帝的画像。这些画像，形神各异，颇有魅力。毛泽东虽是坐车观画，一扫而过，但他似乎在通过这些画像，领悟着这块土地上历史轨迹的演变，那么专注而又神态自若。

开车的司机，不时回过头来打量这位传奇式的中国领袖，他为毛泽东那胸有成竹的自若神态而惊讶！因为当时的斯大林威严而神圣，即使是外国高级领导人去见斯大林时往往也都有几分紧张。

毛泽东被送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这客厅的气派很大，金碧辉煌，高雅大方，大理石的墙壁光彩照人，地面上铺着鲜红的地毯。整个客厅显得隆重华贵、严肃静谧，只有壁炉架上端那一口老式的俄国古老挂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毛泽东抬起头来，看了看时间：5点57分，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三分钟。毛泽东知道，斯大林很讲究遵守时间，言而有信。现在，自己提前三分钟到达，说明中国人也不含糊。想到此，他坦然地笑了。

斯大林的秘书走了出来，很有礼貌地请毛泽东先到他的屋里休息一下，然后他就去通报斯大林。

客厅尽头有一条不大长的用道，通向斯大林的办公室。平日里，斯大林召开会议时，所有的与会者都是从这里进去的，而且必须准时，不能迟到；必须衣帽整齐，不能稀稀拉拉，这是斯大林的工作作风。可是今天，会晤的时间马上到了，怎么没有动静？

“咣咣咣——”挂钟敲了六下，里间的大门打开了。秘书走了出来，有礼貌地打了个手势，说：“斯大林同志请毛主席进去——”

毛泽东站起身来，迈着銜洒的步伐，沿通道走了进去，师哲紧跟在后。

斯大林宽敞的办公室里，华灯放彩，金碧辉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列成了一排欢迎毛泽东。站在最前面的正是斯大林。他，穿着威武的元帅服，容光焕发，头发、胡子梳得很整齐，在他身后，依次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

毛泽东一跨进大门，斯大林首先迎上前来，笑容可掬地伸出双手，表示热烈欢迎；毛泽东也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斯大林的手。霎那间，两位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袖的手，两位肚界共产主义运动伟人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您好！”斯大林首先热情他说。“您好！”毛泽东接着热情地问。“我们欢迎您的到来！”“谢谢斯大林同志！”四只大手紧紧地握了又握，摇了再摇。

斯大林仔细地端详着毛泽东那魁伟的身材、红润的面容，高兴地赞叹道：“好，好啊！你还很年轻，很健康……”

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也很健康呀！”

斯大林点头致谢，并回过头来，向毛泽东一一介绍莫洛托夫等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亲切地与他们逐个握手问候；然后又向斯大林介绍了中方的随行人员。于是，大家在客厅里站成一圈，互相问候，气氛融洽而热烈。

斯大林以手示意，亲切地请毛泽东就座。毛泽东和师哲在会谈桌的一边坐了下来。斯大林和苏方的人员坐在另一边。斯大林见毛泽东潇洒自如、机智稳重而又谦逊随和，非常高兴，落座之后，他又望着毛泽东，赞叹他说：“伟大！真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真诚地祝你健康！”

毛泽东知道，斯大林对于他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有过疑虑和意见，但是没料到，会晤刚开始，斯大林就这样地赞扬他。他没有因斯大林的赞扬而眉飞色舞，也没有趁机对斯大林进行恭维，却摇摇头说：“下，我是个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这种热烈友好、人人激动、庄严神圣的场合中毛泽东只用了半句话——并且是低沉而缓慢的半句话，就使那热烈的气氛，一下子凝结了；就使斯大林精心布置的那庄严、神圣、歌功颂德的浓郁空气，一下子冻住了。

客厅里，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注视着这位朴实无华、沉着机敏、注重实事求是而下肯向任何人投机取宠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斯大林惊讶地望着毛泽东，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话好。多少年来，他和多少国家的领导人会见、谈判，都是人们围绕他转。他很少称赞别人，安慰别人，附和别人；然而今天，面对这位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他尽管热情地称赞、祝福，毛泽东却还显得委屈、不快，情绪不安。这是什么原因呢？他真像遇到了个丈二高的大汉子，一时摸不着头脑了。

毛泽东却毫不诧异，继续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反对我的人厉害咧，有些是非不明，至现在还不明——”

斯大林有点尴尬。他知道毛泽东指的是王明一伙用共产国际压中国党的事。在这些事情上，自己也有了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这些事，数月前，刘少奇率代表团到莫斯科时，斯大林和刘少奇他们已经谈过了，他不仅遣责了王明，还公开作了自我批评。现在，在这样的场合，毛泽东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直劈要害，举重若轻，闹得自己不好回答。聪敏过人、经验丰富的斯大林，知道这些事不好解释，在这里又不可能详谈，所以在毛泽东言犹未尽，他就把话接了过来，说：“不不不！既往丁咎！”他用那捏着烟斗的右手，习惯地挥了一下，又提高声音，接着说：“胜利分清是非，胜利就是一切。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巧妙的回答，掩盖了实际而复杂的内容，使客厅里的气氛又热烈、活跃起来。是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胜利了，毛泽东的革命道路是胜利了。斯大林承认这个胜利，并指出不能遣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这是对的。

毛泽东听了这话，深沉地笑了。在场的苏联领导人也都笑了起来，有的还轻轻地鼓了掌。

毛泽东说：“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应该搞出个什么东西的，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斯大林困惑不解。

会面之后，开始会谈。长长的会议桌，一边是苏联人，坐了一长排；一

边是毛泽东和师哲。斯大林坐在中间。

斯大林关心并询问毛泽东的健康，希望毛泽东注意保重。他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国际革命力量的砝码加重了，我们真心诚意地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进一步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斯大林说话时态度诚恳，语气亲切友好。

毛泽东爽朗地微笑着，望着斯大林，诚恳地点头说：“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地感谢苏联人民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朋友的……。”

毛泽东侃侃而谈，语言诙谐，举止大方，温文尔雅，分寸得当，旁征博引，令人神往。这种风度，很快地打破了斯大林那种过分严肃的气氛，吸引了苏联领导人。他们都情不自禁地微笑着，用欣赏的钦佩的目光注视着毛泽东，感到他不仅仅是一位伟人、领袖，而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诗情洋溢的诗人。他们听着毛泽东的话，不由得轻轻地地点起头来。

斯大林取下了嘴上的烟斗，笑望着毛泽东问道：“毛泽东先生，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事情？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

这是两个正常而简单的问题，一般的访问者不难作出明确的回答。然而，聪明过人、才智横溢的毛泽东，四面看看，回答得却非常抽象、笼统，令人捉摸不定。他说：“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应该搞出个什么东西的，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

中苏两党、两国首脑商谈的事情，应该搞出个什么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实在令人费解，捉摸不定。

苏方翻译费德林为难了，觉得如果直译出来，苏联人肯定不会明白，急得脸都红了。面对此情，师哲忙解释说：“好看就是形式好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说内容有味，实实在在。”

苏联人听得目瞪口呆，仍然不能理解那是何物。贝利亚竟然笑出了声来。

斯大林沉着冷静，没有笑。他深思片刻，又婉转地继续询问。毛泽东说他打算邀周恩来来莫斯科一趟。斯大林还是不明白毛泽东的意图，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请周恩来来干什么？”

毛泽东没有再作回答。

会谈中的这个小插曲，是历曳和性格形成的。斯大林的愿望是：不管中苏签订什么条约和协定，都应由两国的领袖来签署，由他代表两亿人民的苏联和由毛泽东代表五亿人民的中国来签署。至于签署什么样的条约和协定，一向居高临下：宣言不讳的斯大林，这次也不愿意先提出来，以避免再有“强加于人”之嫌；因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错误，所以面对不卑不亢、雍容自如、谈笑风生的毛泽东，表现得尤其谨慎小心，礼貌周全。然而，毛泽东却不大了解斯大林的愿望，或者根本就不愿意由自己出面谈判，亲自签约。他准备把这些事情交由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办理，所以尽管斯大林一再询问，他却“猴性”大发，机智地兜着日子，不愿做更明确的回答。

尽管毛泽东和斯大林的首次会面、性格差异甚大，进程很不一般，情节细节曲折，留下了层层悬念，但是，会见的气氛是友好的，平等的，所以，双方都感到愉快和满意。

就这样，毛泽东在莫斯科度过了第一天。他觉得这是个紧张、愉快而有意义的日子，特别是斯大林那热情、好客、谦虚、谨慎、尊重中国人、尊重事实、尊重真理的态度，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脸上，不时露出愉快的

微笑。

然而，在苏联生活工作过十多年，精通俄语和汉语的翻译家师哲，心里却很不平静。他的脑海里老翻腾这样一个问题：在会晤中，斯大林为什么多次称毛泽东为“先生”呢？毛泽东称斯大林为“同志”，而斯大林为什么称毛泽东为“先生”呢？师哲知道：按照苏联共产党人的惯例，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在相互交往中都互称同志，表示志同道合、亲密无间；而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才尊称为“先生”。斯大林一向措辞考究，这是一时口误吗？不，师哲清楚地记得，斯大林和刘少奇会谈时，一直称刘少奇为“同志”，从未称过“先生”。更何况苏联在为毛泽东安排座位时和发表的公报上，也都称毛泽东为“先生”。这是何故？师哲百思不得其解。他想在适当的场合，问一问斯大林，然而，斯大林是能随便问的码？这样的敏感问题，人家能直言相告吗？师哲的心里，真像有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注释：

毛泽东：《在莫斯科车站上的演说》，《新华月报》1950年新年号。

十五 实践探索，毛泽东发现真理 教条束缚，斯疑毛“主义”不真

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等人说：“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斯大林的革命警惕性固然很高，但其性格的特点是疑心太重，于是，吃饭、喝酒要经过化验、或让别人先尝，以防中毒；坐车行路，要司机完全按照他说的路线行驶，并且随时改变路线，以防被暗杀。不仅如此，他对哪个人有了怀疑，不是去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消除疑点，团结同志，而往往是运用他手中那巨大的权力，采用粗暴、野蛮的方法，将被怀疑的人隔离审查、关押、流放，乃至杀害。据赫鲁晓夫称，在苏共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作为大会代表，亲眼看到斯大林把疑心化为报复行动的过程。在那次大会快要结束时，一批州委书记利用会议休息时间，推开了主席房间的门，找到了基洛夫，要求他向斯大林转达意见，说大家对他的粗暴、急躁和傲慢都有意见，希望斯大林能够注意。基洛夫摇摇头，不想转达，要他们自己向斯大林当面去说。州委书记们推举基洛夫去转达意见，说基洛夫和斯大林是朋友，说话容易被接受。

正在这时，斯大林来了。基洛夫顺便把州委书记们的意见告诉了斯大林。当时，斯大林很热情他说：“谢谢您，谢尔盖。你是真正的朋友，我不会忘记这一点。”在场的人都很高兴。尽管如此，在代表大会选举时，仍有数百名代表从候选人名单上勾掉了斯大林的名字。

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对此耿耿于怀，并且很快地把猜疑心变成了报复的行动，对代表们采取了残酷的打击报复措施：不久，代表大会的 1966 名代表中，有 1108 名被处决了。代表大会选出的 138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 98 名被列入被处决的名单之中。

赫鲁晓夫指出：在 30 年代，斯大林利用谢尔盖·基洛夫被人暗杀的事件，搞了一次“大清洗”，狠狠地打击了一大批对他不满的人，打击了一大批曾经加入过党内派别而早已改正了错误的共产党员，特别是一些曾经与列宁接近过的人。他总把这些人当作潜在的对手、“敌对分子”，并且利用权力机构和保安机关，大批地清洗、处决这种有胆有识、能说会写、具有独立判断是非能力的人。这样，造成了成千上万的牺牲者，又逼出了千千万万的对他歌功颂德的崇拜者，造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即使是在国际交往中，许多外国领导人也常常是围着斯大林转，很少有人敢说半个不字。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这样一些世界著名的领袖人物，对他斯大林也不敢冷眼旁观，随便沉脸！然而，现在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竟然敢在众人面前，无视他斯大林的友好祝愿，把脸一沉，说他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这不是当众给斯大林难堪吗？！……当然，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斯大林也意识到自己有错误，因为实践证明，毛泽东是胜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可是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那主要依靠农民革命而不是主要依靠工人阶级起义的道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吗？……斯大林那带有三分火气的思绪，渐渐地转入理论的质疑。

服务员轻轻地进来，请斯大林进晚餐。斯大林站起身来，慢慢地走进为

他设置的小餐厅，见马林科夫等几个心腹人物都站在那里，等待着陪他进餐，便招呼他们都坐下。

丰盛的晚餐已经摆好了。斯大林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他常常是下午七八点钟才结束午睡，到克里姆林宫电影院里，去和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等领导人一起看看电影，然后，到小餐厅去吃晚餐，说是晚餐，其实，这时已是凌晨一两点了。这时候，斯大林头脑清醒，精神焕发，边吃边谈。有时一顿晚餐能吃两三十小时。他们往往在吃饭时商量一些事情，或者谈论一些重要问题。厨师的手艺很好，做的菜很好吃。斯大林疑心重，总怕有人给暗地下毒，所以在他想要吃某种东西之前，往往先要赫鲁晓夫他们品尝。他并不直说，而是用关切的语气问：“尼基培，你瞧，这是鸡杂，你尝过没有啊？”

善于拍马逢迎的赫鲁晓夫，立刻明白了斯大林的意思，知道斯大林自己想吃鸡杂，但又怕里边不干净，于是，他就晃动着他那光溜溜的脑袋，显出忠实的样子，说：“喔，我倒忘了！”说着，自己先尝了一点：再请斯大林品尝。

斯大林喜欢吃青鱼，而且喜欢不加盐。赫鲁晓夫自己爱吃加盐的，觉得特为斯大林而作的无盐青鱼不对口味，但他仍做出十分诚挚的神态说：“哈，香极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请你品尝吧！”

斯大林吃了青鱼，也接受了赫鲁晓夫的阿谀奉承，更加宠信这位心口下的一的老部下，造成了一段历史的悲剧。当然，这是后话，是斯大林所不知道的。

这一天，斯大林喝了两杯红白葡萄酒掺和在一起的特制酒之后，便翻来复去地问：“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都耸耸双肩，答不上来。

斯大林又喃喃他说：“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那么，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哪儿来的呢？”

小餐厅里的所谓“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一个个张口结舌，谁也解答不了这个特殊的问题。

其实，在访问莫斯科的日子里，毛泽东曾多次向师哲谈起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毛泽东还意味深长他说，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来到斯大林同志的身边，就倍感亲切，倍感温暖，就可以畅所欲言。

由于当时在苏联，又都住在斯大林的战时别墅里，闲谈时，师哲就请毛泽东谈谈他自己寻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

毛泽东点起一支烟来，吸了一口，侃侃而谈。师哲听着，记着，颇受教益；后来又把这个过程和他的感受告诉了本书作者。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其过程有五个鲜明的特点。

毛泽东，号润之，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户农家。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纵观他世界观形成的过程，有五个鲜明的特点：

一、起点下高，步子下快，长期探索，坚持不懈。的确，毛泽东不是留苏学生，也不是什么“神童”。父亲毛顺生，母亲文七妹，都是普通农民。毛泽东少年时代，和中国农村一般的孩子一样，边劳动，边学习，读一些《三字经》、《论语》、《孟子》等书，也迷信。

1909年，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害病许了愿，求南岳圣帝保佑；但是病情日笃，不见好转。十五拗毛泽东，见母亲整日操劳，辛苦备尝，却把节约下的钱周济穷苦人，自己累病了却不太在意，十分感动。他热爱母亲，孝敬母亲，希望母亲健康。但是，母亲却被病魔缠身，久治不愈“毛泽东急了，听人说南岳庙神仙很灵，能治百病，就拿着小板凳，到南岳庙去“朝山进香”，每走十来步，便向南岳庙方向作一个揖，磕一个头，还要边走边唱：“南岳圣帝，阿弥陀佛，保佑我妈，早日康复……”就这样，边走边跪拜，一直走了一百多华里路，才到了南岳庙，求了神，进了香，然而，母亲并没有恢复健康。1919年10月，母亲病逝了。毛泽东写了一幅挽母对联，表达了爱母之情。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往世，一掬笑容何处寻。

母亲文氏勤劳、善良、谦和、公正，常周济受苦人，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所以，毛泽东又写了一篇哀恻动人的《祭母文》，盛赞母亲的美德：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遐尔亲毓，一皆复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逛言，不存欺心。

……

病时携手，酸心结肠，

但呼汝辈，各务为良。

生活的现实和科学的知识，使毛泽东渐渐地放弃了对神佛的迷信。但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在黑暗中探索。他调查社会，体察民情，博览群书，阅读报纸，千方百计地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

1910年秋，十六岁的毛泽东，步行50多华里，来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他写了一篇《救国图存论》，还写了一篇《言志》，表达了对祖国贫弱落后的忧虑，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国图存设想。他文章写得立论有据，气势磅礴，被老师们称为“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的好文章。

在这里，毛泽东读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感到十分新奇。特别是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使他觉得气势逼人，有说服力，便不知不觉地对康有为、梁启超崇拜起来，拥护他们的主张。在《新民丛报》上，毛泽东阅后，曾批写道：“正式而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听抓戴。不以正式而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之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段批语，说明了毛泽东当时赞同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说明了康、梁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也说明了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由一个崇拜孔孟的儒家“秀才”变成了一个崇拜康、梁的变法图强者。

一天，毛泽东从同学萧三那里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认真阅读。他联系到祖国的内忧外患和自己救国救民的志愿，反复阅读，在书上划了许多圈圈点点，写了许多批语。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迎得邻女皇、惠灵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人的传记。还书时，毛泽东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不久，毛泽东为了表示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作为自己的责任，特地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名：“子任”。

1911年春，毛泽东到了湖南省会长沙，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一方面刻苦读书，一方面留心观察社会。很快地，他被革命党人的宣传所吸引，卷进了革命的洪流，他对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十分喜欢，经常订阅。有一天，他从《民立报》看到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的武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消息，心情十分激动。他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热烈拥护，便奋笔写了一篇政见性的文章，贴在学校大门口的墙壁上。文章公开提出：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做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一石激起千重浪！毛泽东的文章在学校里引起强烈的反响。同时，它也说明，十七岁的毛泽东正由一个崇拜康、梁，主张“君主立宪”的年轻人，迅速地向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

后来，在辛亥革命的热潮中，为了表示与反动卖国的清王朝决裂，毛泽东建议大家立即将头上的辫子剪掉。他说干就干，和一位同学当场就剪了辫子，但有的同学犹豫不决，迟迟不肯动手。“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条辫子，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要求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多么能改变人的观点！”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震动全国。毛泽东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十月底，十八岁的毛泽东在长沙参加了革命军，认真操练，准备为革命而备战；同时，又仔细阅读各种报纸，观察社会，探讨救国之路。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革命果实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失败了。毛泽东见“革命已经过去”，便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正如他回忆的：“为了反对清廷和袁世凯，组织了几支军队，湖南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湖南人开始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南京政府被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二、探索面宽，道路曲折。在追求康、梁搞维新、追求孙文闹革命失败之后，1912年春，毛泽东离开军队，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读了半年之后，他感到课程大浅、大旧，不便于探讨救国救民之路，到了暑假，就退了学，寄宿在湘乡会馆，每天到浏阳门外的定玉台省立图书馆去看

书学习，他阅读的范围很广，古今中外的名著，像中国的经、史、子、集，英、法、美、俄等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哲学、文学和古希腊、罗马的书籍，他都找来读。其中主要读的是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代表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肯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严复译著的《天演论》等等。

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毛泽东每天过这里，总是站在地图前细看沉思。他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人民疾苦，深感到必须革命，感到青年人责任重大。后来，他回忆说：“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部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这些认识和决心，是十九岁的毛泽东经过半年的刻苦学习和探索得来的，也是他这半年里最大的收获。

1913年春，毛泽东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在这里度过了五年半有意义的学习生活，被师生们称为“怪杰”、“伟器”、“奇才”和“特殊的学生”。为了集中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和同学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后来，他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意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他曾写过一副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毛泽东在一师学习时，以社会科学为主，以自修为主，以博览群书和重点攻读相结合。他还花钱订阅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经常阅读，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局势。他班的同学周世钊回忆说：毛泽东“每每为我们分析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总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那么有根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

任时，同学们的情绪也随着他的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因此，同学们都赞誉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就这样，毛泽东从探索维新变法到探索辛亥革命，从研究欧美各国的社会学说到直接研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三、面向社会，注重实践，把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读书人信书本，种田人看收成。”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在读了大量的书籍报刊之后，巧妙地把二者结合起来，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从而绕过了一道道暗礁险滩，攻克了一个个难关碉堡，发现了一条条生活的真理，攀上了一座座光辉的高峰。毛泽东常说，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的书，而且要读无字的书。他认为只有书本知识而脱离社会实践的人，担当不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重任。他在《讲堂录》中写道：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

“衣事不理，则不知稼穡之艰难，体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进入第一师范后，毛泽东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附近的工厂、农村进行访问、调查。1916年暑假，他又邀挚友蔡和森一道游历了湖南的浏阳、湘阴、岳阳，绕洞庭湖南半圈返回，历时一个多月。为了锻炼自己，他们不带路费，遇到机关、学校、商店，就用红纸写一幅对联送去，于是，人家就给他们饭吃，或打发几个钱，或留他们住宿。他们利用这“游学”方式，深入农村，了解农民，学会了许多新鲜的社会知识。毛泽东还把沿途的见闻、感想，写成了一篇通讯，寄给《湖南通俗教育报》发表，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

第二年暑假，毛泽东又邀老同学萧子升一道，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个县，历时一月多，行程九百多里。1917年冬，毛泽东又到例阳县文家市一带考察访问。他深入到农民中间，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向农民宣传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道理。

毛泽东在学校里读书的同时，也注重社会活动。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从1915年下学期至1918年上学期，一直担任学友会的文牍、总务等工作，倡导学术研究和体育活动，并且以满腔热忱，主办了工人夜校。

1917年10月底，毛泽东以一师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的身份，召集学友会讨论决定，在一师附近的国民学校继续办工人夜校。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办工人夜校的四条理由的第一条，就是“依据国家现状，社会的中间力量实力大多数失学的国民，即工人和农民”。第四条是“可惜以打破社会和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通过办夜校，增强学生与工农群众的联系。

经过精心筹备，1917年11月9日晚，毛泽东倡导的工人夜校开学了。毛泽东组织夜校工作人员，热情地到门口欢迎工友，把他们领进教室，给他们讲学习的目的、意义、课程、解释“上课说明书”，开始上课。

有趣的是，就在毛泽东主办的工人夜校开学的前两天，即公历1917年11月7日，在列宁的领导下，由斯大林负责主持的布尔什维克党总部，指挥着彼得格勒的革命军队和广大工人起义胜利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轰击冬宫的炮声，报道了十月二十五日（公历十一月七日）是个新纪元，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纪元的开始。斯大林当时是具体指挥起义的党总部的负责人。但他没有想到，就在他指挥起义的第三天，在中国江南的长沙城里，毛

泽东主办的工人夜校开学了。毛泽东当时虽是学生，但他已在探索中认识到工人和农民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开始做城市产业工人的工作了。斯大林更没想到，就是这个毛泽东，顶住了他那照搬苏联模式的指令，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斯大林自己总在怀疑毛泽东“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

在湖南一师，毛泽东还带领同学们开展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1915年，日本为了独吞中国，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袁世凯想当皇帝，要取得日本的支持，在5月9日就全部承认了二十一条。中国人民无比愤慨，到处抗议。同年夏，毛泽东读了一本揭露袁世凯卖国罪行的小册子《明耻篇》后，便在封面上批了四句话：

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以救国为己任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袁世凯为了当皇帝，指使他的爪牙在各地成立“筹安会”，进行“劝进”活动。许多进步人士发表文章、谈话，反对袁世凯称帝。毛泽东以学友会的名义，将反对袁世凯称帝卖国的文章编印成册，到处散发，揭发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局发现小册子后，出动大批军警，到第一师范搜查。由于毛泽东警惕性高，早有防备，军警未查出“乱党”证据，只好不了了之。

毛泽东在探索中形成的这种读书面向社会，注重实践，不尚空谈，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不仅对他个人发现真理、探讨救国救民之路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后来经过他提倡和发展，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对中国革命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目标明确，上下求索，独立思考，分析批判，在实践检验中择优发展。这是毛泽东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吃过迷信的亏，但他后来不迷信，不盲从。他说我们读书、看报，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老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要反复思考，分析批判，实事求是，不能盲从。所以他读过的书，往往圈圈点点，批注很多。有的批了又批，反复推敲。凡是他认为道理对的，文字好的地方，就特别划出记号，写上“此论颇精”、“甚合吾意”等语；凡是道理不通或文字不佳的地方，他又打叉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批语。

对一种主张，一种道理，他决不盲从，而定要究其源，问其本，判明是非才决定弃取。例如救国该从何处入手？学习该学什么？毛泽东曾经考虑了很久、很久。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下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

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在这里，毛泽东强调救国要立足于人民，立足于振奋人心，立足于用“大本大源”去从“根本上变全国之思想。”那么，他说的“本源”是什么呢？毛泽东接着写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宇宙之真理”，还没有找到从“根本上变全国之思想”的“大本大源”，但他正在奋力去找，而且已经认识到它是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教育、实业等一切“枝节”的“本源”。同时，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指出：“怀冲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毛泽东的这种批判分析精神，不仅表现在对待东方思想或西方思想上，也表现在他对自己的思想、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澄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因此，他虽然信过神佛之说，信仰过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受过胡适、托尔斯泰的影响，还信仰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等等，但是，当他把这些学说，人物、思想、主义放在救国救民的社会实践中检验之后，放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标天平上检验之后，立刻就发现了真伪，试出了忧劣，于是他便无情地分析批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劣取优，清除错误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在前进中探索新的真理。这种精神，经过毛泽东长期的坚持、发展和宣传，不断推广，后来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五、发现真理，抓住不丢，结合实际，深入探索，终于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束了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学习生活后，1918年8月间，毛泽东同罗学瓚、萧子升、李维汉等25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到了北京。毛泽东日夜奔忙，组织预备班，送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前往法国。

然而，毛泽东自己并不想去法国学习。他要留在中国，研究中国。后来，他回忆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时，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将他介绍给了李大钊。李大钊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他把毛泽东分配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毛泽东在李大钊的身边工作，能看到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接触到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傅斯年、罗加伦、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毛泽东除在北大旁听一些他所感兴趣的课程外，还参加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研究会，讨论各种哲学和时事问题。

当时，十月革命的影响遍及世界，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毛泽东以北京大学为基地，努力钻研十月革命的经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在1918年冬和1919年春，两次去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进行调查研究。1936年他在和斯诺谈话中，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初，毛泽东和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一起离开北京，绕道保

定、山东到上海，送走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之后。又回到湖南长沙。当时，中国正处在“五四”运动的前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描述过他当时的心情。“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所以，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就更加直接投身到政治中去了。”他在修业小学找了个教员的位置，每周除6小时的历史课外，其余时间全部用来组织和领导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民主运动。

不久，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传到湖南。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到湖南的代表邓中夏，是毛泽东的好友。毛泽东和邓中夏研究后，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开展活动，于5月27日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毛泽东又通过新民学会和湖南学联，发动了湖南学生的“六三”罢课，上街游行。7月7日，又发动长沙人民举行焚烧日货游行示威大会，7月9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在轰轰烈烈的斗争中，毛泽东始终站在革命洪流的前列，成了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为了宣传革命思想，武装人民群众，毛泽东建议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学联很快决定，并推选毛泽东为主编。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了。它为周刊，四开一张，分四版，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和“新文艺”等栏目。它文风新颖，通俗易懂，气势磅礴，尖锐泼辣，富于战斗性、指导性、号召力。毛泽东集中精力，主编这个刊物。重要文稿，他亲自写。第一期的几乎全部，第二期的三分之二，第三期和第四期的约一半稿子，都是他写的。他先后在该刊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政论，评时事，尖锐泼辣，透彻明晰，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明确地写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如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湘江评论》的见解，就是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

毛泽东的文章，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坚信这场革命将“普及于全世界”，他写道：“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成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并且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写道：“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大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

毛泽东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典范，它必将普及于全世界。他写道：“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一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

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

当时的反动政府把马克思主义诬称为“过激主义”，把布尔什维克诬称为“过激党”，当作“洪水猛兽”严防、严禁。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在一篇杂评中写道：你们指为“过激党”的人，“只不过是舍命救国的志士，为国家争权利，从强权索自由的志士。”“其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照字义讲，就是多数党；照主义讲，就是要组织纯粹工民的共和国，以工民办理国家的事务。”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内外的矛盾，明确指出：“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用了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了强权”。又说“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没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同时，毛泽东阐发了民众大联合的战略思想，指出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人民群众的发动与否，是决定一切革命胜负成败的关键。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和真伪为浙”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

毛泽东特别指出，辛亥革命没有实行民众大联合，只是“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的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所以失败了。而十月革命则因为实行了“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

1919年8月中旬，《湘江评论》湖南学生联合会被皖系军阀张敬尧查封。毛泽东即和一批积极分子转入地下，进行驱逐张敬尧的斗争。他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负责人四处活动，多方组织。先后发动了万人大游行，1.3万多名学生的总罢课，又得到1200多名教职员的罢教支持。然后，毛泽东又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广州等地，进行宣传请愿活动。他亲自率领一个代表团去到北京，“组织反军阀的运动”。经过十个月的艰苦斗争，“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在舆论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于1920年6月间逃离长沙。

1919年12月中旬至1920年4月中旬，毛泽东在北京住了将近半年。在此期间，毛泽东东奔西走，搜集了一切当时能找到的马列主义书报和介绍苏俄情况的文章，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他精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认真领会这一部划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掌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后来，他在《关于农村调查》的文章中回忆道：“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1920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和陶毅的信中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又说：“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翻译杨明斋等人来到北京。李大钊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邀集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和他们座谈，举行欢迎会、讲演会，请他们介绍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及对外政策，同他们讨论了中国的建党问题，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等研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之事。于是，在五六月间，由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等人发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陈独秀等人草拟了共产党党纲草案，以进行讨论，统一思想。同时决定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改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在此期间，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会晤，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在上海活动了近三十月，于7月7日回到长沙。这时，他经过长期的探索 and 实际斗争的锻炼，经过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所以一到湖南，他就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应上海共产党发起人之约，秘密进行建立共产党的活动。

后来，毛泽东回忆他说，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他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

毛泽东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然而，斯大林并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他对毛泽东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长期有怀疑，直到1949年12月毛泽东率团访苏和斯大林会晤时，斯大林还称毛泽东为“先生”；而不是称“同志”。师哲对此意见很大，准备当面询问。

注释：

参阅《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369—380页。

参阅《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70—1471页。

马玉卿等著：《毛泽东成长的道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5—10页。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8—21页。

参阅周世钊著：《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载《新苗》1958年第9期。

参阅《湘江评论》第4号。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见《湘江评论》第2号。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十六 胜利伟大，斯大林祝贺毛泽东 心存疑忌，虽尊重但称毛“先生”

斯大林打电话问毛泽东有什么打算和要求。毛泽东笑着说：“等周恩来同志来了再谈吧！”

斯大林虽然对毛泽东有怀疑，对毛泽东的革命道路有怀疑，但他知道，毛泽东是个性格坚强、刚正不阿、自尊自强、敢想敢干的革命领袖。只要是他认准了的真理，选定了的道路，无论有多么大的压力，多么大的艰难险阻，他都敢带领人民去干、去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坚持真理、敢想敢闯的劲头，使斯大林对毛泽东十分尊重，不敢怠慢，甚至可以说有点敬畏，类似人们说的“畏友”。现在，毛泽东来到莫斯科，斯大林更不敢怠慢。会晤后不久，斯大林就打电话问毛主席身体好吗？还有什么打算？什么要求，还准备办些什么事情？很显然，他急于要了解毛泽东的想法和意图。毛泽东却不着急。他拿起电话筒，态度很友好，热情地感谢斯大林的关怀和照顾，但却不肯说出自己的打算和要求。

斯大林再三询问。

毛泽东笑着说：“这些嘛，等周恩来同志来了再谈吧！”

斯大林无可奈何地放下了耳机，心里不是滋味。他不明白：作为中国党政首脑的毛泽东，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后，首先来到苏联首都和他会晤，必然有十分重大的问题要和他斯大林会谈，必然要热烈、迫切地有求于他；可是，这位毛泽东到莫斯科之后，不但没有一点有求于人的样子，没有一点低三下四的神态，反而显得庸洒自如，怡然自乐，不卑不亢，神情泰然。乃至他斯大林几次询问，礼贤敬友，又打电话专门询问，毛泽东还是这么不肯直言，这是为什么？斯大林知道，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自己过去犯错误，多是因为自己太主观，没有真正了解清楚中国的实际，就硬要人家照搬苏联的模式，结果，事与愿违，好心帮助中国革命，反而妨碍了中国革命。现在，毛泽东讳莫如深，不肯直言，自己也只好等一等看，不能像过去那样强人所难了！

毛泽东心里很明白：他这次到苏联来，主要是祝寿、休息，和斯大林建立良好的同志关系；至于有关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所有谈判、签约等事，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都要由擅长外交的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来办。他这位统帅和领袖，只愿意从战略的高度统筹全局，而不愿包揽和干涉助手或部下的具体事务，更不愿意由自己出面和斯大林搞什么具体事务或条约的谈判。他知道斯大林有时比较主观，如果由他和斯大林直接谈判，一方面外交谈判不是自己的所长（他知道在这方面自己不如周恩来），另一方面，很可能由于对某些具体问题谈不拢或争执，会造成两党两国关系的隔阂。所以，尽管斯大林几次热切地询问他要谈什么问题，怎么谈，他都巧妙地作了回避。

斯大林急了，就郑重而恳切他说：“您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委婉他说：“东西不仅要搞，而且要既好看，又好吃，但必须让周恩来来莫斯科来搞。”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是有经验的，如果诚恳地帮助中国革命，就应主动提出帮助的内容；不提，就是缺乏帮助的诚意，我们又何必低声下气地向人家乞讨呢？

斯大林还是不明白，但他又不好再问。因为他曾经当面问过毛泽东：“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让周恩来来干什么？”

斯大林的心里更增加了疑云。

斯大林举杯祝贺毛泽东：“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但他称毛泽东“先生”。

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会谈，气氛热烈，态度友好，互相尊重，关系融洽。可以说是自由的，平等的，发言和谈论的问题，似乎是即兴的，没有固定的主题，没有外来的约束，也没有谁对谁的乞求。

长长的会谈桌上，摆着各种鲜美的菜肴和食品，格鲁吉亚葡萄酒、白兰地酒和各种名贵的伏特加酒点缀其间。每个座位后都贴有姓名，每个座位前都备有各类餐具和酒杯，显得丰盛、高雅而美观。毛泽东的座位后写着“毛泽东先生”。

会谈桌的一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苏联人坐了一长串。另一边坐着毛泽东和师哲。斯大林坐在中间，首先举杯向毛泽东祝贺。他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

大家干过杯，很自然地进入会谈。会谈几乎只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个人之间的对谈，其他人很少插言，只作陪客。两位领袖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群众工作，但涉猎最多的还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经历。

毛泽东知识渊博，谈吐幽默，叙事论理深入浅出，富有魅力。斯大林喜欢理论，逻辑性强，语言考究，十分注意毛泽东的观点和论述。两个人都关心的中国革命，自然成了他们谈论的中心。由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过错误，碰过钉子，所以很喜欢探讨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成功的经验。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取得伟大的胜利，关键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路线。

斯大林认真地听着，时而点点头，或插句话。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尊重事实。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是十月革命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最伟大的胜利，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学习。但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在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他内心深处有一些怀疑，所以他时不时巧妙地提出一些问题。毛泽东认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口头上，而在行动上；不是看他能背诵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是看他能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从学习、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始的。

斯大林抽着烟听着，有时轻轻地点头，有时又眯缝起他那锐利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看毛泽东，似乎是在审视：这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坚持的道路真符合马克思主义吗？

毛泽东知道，斯大林对他和中国共产党有怀疑，但他既不争辩，也不解释。他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尊重事实的。因此，他心底坦然，谈古论今，挥洒自如，没有丝毫的疑惧。

毛泽东侃侃而谈：“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过程。他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的真相，我们不妨把视野从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暂时移向三十年前的中国湖南——

1920年7月7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即以湖南一师附小主事《校长》的身份作掩护，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不仅利用新民学会、湖南学联进行传播，而且创办文化书社，掀起了一个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他还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组织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影响颇大。特别是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培养了不少革命的骨干。因为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和个别进步的教员。学习的是《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并结合中国、湖南的实际，进行讨论，这使会员们的马克思主义觉悟不断提高。

当时和毛泽东在一起从事过革命活动的萧三曾回忆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这个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个别进步的教员。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等，并结合中国和湖南的革命实际，经常开会讨论。这样，毛泽东同志使得团结在他周围的人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和其政党——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毛泽东不仅在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在社会上，甚至在自己家里相机进行宣传。1921年春节期间，他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教育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等学习革命理论。他说，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要勇于舍“小家”为“大家”，英勇奋斗，不怕牺牲。春节过后，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三人就先后离开韶山，主长沙参加了革命。后来，这三人都为革命光荣牺牲了。毛泽东的家里，先后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除上述三位烈士外，还有夫人杨开慧、长子毛岸英和侄儿毛楚雄）。

1921年元旦那天，湖南长沙，风雪漫天。毛泽东召集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9人，在朝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会议由何叔衡主持，由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并介绍了在法国的会员对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方法等三个问题讨论的情况，要求每个与会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积极发言，明确表态，不能含糊其词。

会议上大家发言踊跃，讨论热烈，何叔衡首先明确宣布：主张过激主义。他说：“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泽东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会议经过三天的热烈讨论，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得出了共同的结论：要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

斯大林长期怀疑毛泽东的立场，怀疑毛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说他“连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应该怎样来检验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

列宁曾经提出一个鲜明而易于掌握的标准。列宁说：“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从本章叙述的事实，从毛泽东和蔡和森通讯的内容，从毛泽东在这次新民学会年会上的言行中，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仅是承认或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且是已经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的基础”，即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道路选定了。毛泽东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自觉地集中精力投入工人运动。当时，湖南的工业比较落后，全省只有两个较大的矿区和长沙的纺织厂、造币厂、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几家现代化企业，连铁路、矿山在内，全省的近代产业工人约两三万人。

为了和工人接近，毛泽东下决心脱下学生装，赤脚穿草鞋，粗布短褂，上铁路，下矿井，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一同聊天、谈心，了解工人的疾苦，帮助他们分析受苦受难的原因，组织他们同资本家斗争。他还多次到江西的安源，做安源路矿工人的工作。后来，他又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到安源工作。所以，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十分活跃，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21年5月1日，毛泽东等人发动组织的长沙各厂工人和各校学生，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大会。那天虽下着雨，但游行的人手举着“劳工神圣”、“劳动者应当管理世界”的彩旗，高呼着口号，坚持游行示威，并散发《告工人书》和《社会革命》等传单，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工运开始时，由于干部少，毛泽东曾同时担任八十工会的秘书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他亲自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作为工人代表同军阀赵恒惕当面作说理斗争，驳得赵恒惕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后来，毛泽东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到1922年5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在探索中成长的又一点特点。农民的儿子毛泽东，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学习之后，成了知识分子，但他毫不轻视工农，仍然坚持向工农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大众服务。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就利用假日，经常到农村、工厂去访问；1917年冬，他主办工人夜校，同工人阶级建立了最初的感情；五四运动前后，他两次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考察近代产业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在湖南，他又主动到长沙、醴陵、萍乡、安源等工矿区发动工人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开辟出一条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道路。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毛泽东曾总结经验，深刻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

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这种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精神，经过毛泽东长期的实践、宣传和倡导，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即筹建共产党的发起组，并决定由陈独秀邀约各地的共产主义者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是被邀约者之一。他收到上海发起组的邀约函后，与何叔衡等共产主义者积极协商，抓紧准备，在长沙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0月间，毛泽东收到了从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又立即着手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他建团的主导思想是“注意找真同志”，“不可急进”。由于他注意党员、团员的质量、注意找真正经过革命斗争锻炼、信仰马克思主义、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自愿参加，个别吸收，所以，湖南党和团的组织部比较纯洁、巩固。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了上海党的发起组关于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二十六岁的毛泽东和何叔衡一起去到上海，代表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共的成立大会。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和尼尔斯斯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李汉俊、刘仁静、邓恩铭、李达、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十二名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代表，济济一堂，讨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大事。马林在会上致词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添了一个东方朋友，世界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之职。因为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大会是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举行的。

这次大会讨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纲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大会认为：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积极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大会对中国社会的状况和中国革命的性质还缺乏明确的认识，所以没有提出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和必要的政策、策略。

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因此，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应当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规定，党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直到消灭阶级区别”这实际上是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造成了党的纲领和实际情况的脱节，造成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的孤立主义倾向。

这些都反映了刚刚诞生的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都了解不够。毛泽东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注释：

参阅《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载《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191 页。

毛泽东：1962 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十七 回顾历史，斯大林谈起《孙越宣言》 高瞻远瞩，两伟人同赞《愚公移山》

历史性的会谈，往往谈到历史。毛泽东还讲起了《愚公移山》。斯大林说：“我们要一起挖掉的不只是两座大山！”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会谈十分漫长，不紧不慌，从容不迫；没有主题，即兴交谈，时而论理，谈及哲学、社会、政治、道德、语言、艺术；时而讲情，谈到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谈到同志之间的互助合作；而谈这些问题都围绕着回顾中国革命斗争史。他们有时谈到关系两党两国的重大问题，有时又步入中国寓言的神话般的神秘世界之中。

有一次，在会谈中，毛泽东在谈到中国革命的伟大、艰巨时，讲起了《愚公移山》，很有趣。毛泽东思想深邃，语言幽默，侃侃而谈，能很快地把人引入一个个生动的境界。斯大林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情和不信任的态度，声色不露地注视着自己的交谈者，然而，在不知不觉之中，往往受到了对方的感染，进入对方的意境，发出和对方同样的呼声。

毛泽东谈吐不凡，生动活泼，毫不呆板。在谈论具体问题时，他往往别开生面，撇开一些具体的、当前迫切的问题，诱导着苏联领袖步入中国寓言的神话般的神秘世界之中，求得共识。有一次，在交谈中，毛泽东给斯大林讲了一则中国古代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中国古代有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大山虽然很高，却是下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它也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中国人民。

斯大林认真地倾听着这个富有哲理的中国民间传说，深深地被毛泽东生动的叙述感动了。毛泽东没讲完他就连声说：“好！好！”并且热情地附和说：“我们要一起挖掉的不只是两座大山！”他们的会见，被评价为在整个世界政治棋盘上标志着巨大转变的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被怦为马拉松式的会谈。世界上的两个大国领袖，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领袖达成共识，结力盟友，确实不同凡响。

斯大林也高兴地回顾了历史，说：“我们派越飞到中国，和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孙越宣言》……”

毛泽东那生动而幽默的谈吐，寓理于事中的叙述，使斯大林在不知不觉当中受到了深深的感染，笼罩在心头的团团疑云，像是被一阵煦和的春风，悄悄地吹散了。

斯大林那经常严肃、矜持、似在深思的脸上，渐渐的绽出了笑容。他说，

列宁十分关心中国革命，首先倡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响应。他说：“我们派越飞到中国，和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孙越宣言》……”

原来，1922年，斯大林任俄共（布）中央总书记时，根据列宁积极促进中国国共合作的意图，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马林的建议，很快地派遣副外长越飞为苏联政府的特使，带了一些助手来到中国，和孙中山等人联系商谈。

那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炮击总统府。孙中山逃离广州，处境十分艰险。后虽辗转军舰上，领导海军反击叛军，但收效甚微。又得知北伐军回师失利，夺回广州无望，不得不乘英国军舰“摩轩号”离广州、经香港，于8月14日到达上海。

这时候，孙中山面临着政治危机，军事失利，经济拮据，连人身安全也缺乏保障的艰难境地，心情十分苦闷、仿惶。这是他从事革命以来最力痛苦熬煎的时刻。正如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的《告国民党同志书》中所写的：“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人生，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8月12日，越飞以苏俄政府全权大使的身份抵达北京，一面和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关系，一面派代表携函到上海与孙中山接洽，向处境十分困难的孙中山伸出了友谊之手。

8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越飞的代表，并接受了越飞8月22日的“一封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来函。接着，他在27日的回信中表示：“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

在信中，孙中山主要谈了他和苏俄、吴佩孚、张作霖的关系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认为，资产阶级在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政权”。正如苏俄政府外交代表威连斯基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知道，明天的中国将属于它。历史的行程已经发展到中国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政权。”那么，谁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呢？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一度认为：在南方是孙中山，在北方是吴佩孚。苏联《消息报》1922年7月6日曾明确指出：“吴佩孚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和独立的国家，他反对外部的约束。”越飞来华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推动孙中山和吴佩孚合作——这大概也是斯大林当时的意图。

越飞还推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党组织与孙中山和吴佩孚联系。受其影响，李大钊曾派人到河南洛阳与吴佩孚会晤，并亲自到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各种问题。

经过痛苦的探索和实践，孙中山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和苏俄身上，因而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并当即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早年曾在河北水平府中学、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1913年起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6年回国，曾任《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与编辑《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倡导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论文。1919年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并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1920年起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同年10月创建北京共产党小组，积极进行中国共产党的

创建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织和领导北方党的组织开展各方面的革命工作。现在，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俄特使越飞的建议，来帮助孙中山工作。孙中山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只好以减相见，表示自己是隶属于第三国际的中共党员。

孙中山对李大钊十分敬重，当即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助我。”

孙中山认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认为他与苏俄的合作能使中国摆脱列强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所以热切地希望苏俄能与他本人进行合作，以有效地进行中国革命。因此，孙中山在信中写道：“在过去几十月间，我已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现在，“总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使我现在可以提出一项建设性的政策，即我本人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同你们的政府实行合作。”

孙中山认为：苏俄派越飞与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加强联系是一个失误。他在信中指出：“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苏俄加强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客观上的效果必然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承认等等为它树立威信”。而在中国，“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在的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

在与越飞通讯的同时，12月16日，孙中山又致信列宁，重申了他的基本观点，指出：在曹锟、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奴仆和工具”，“同中国现政府谈判，不仅旷废时日，而且恐怕是冒风险的”，“北京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都可能设计使你在中国人民面前处于难堪的境地”，所以，“此举乃凶多吉少”。

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信中提出的主张十分重视，改变了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措施。1923年1月25日，越飞便奉命亲赴上海与孙中山会谈，1月26日双方签署了《孙越宣言》，共四条。

《宣言》声明：“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越飞重申1920年9月27日苏俄对华宣言所列举的原则：“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这个《宣言》是斯大林任俄共（布）总书记期间签订的，是苏俄对华政策的重要标志，也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确立的标志。

在交谈中，斯大林愉快地回忆了他们派越飞赴华和《孙越宣言》的发表，高兴地自己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和了一大杯，一饮而尽。

毛泽东对此发生了兴趣，低声询问苏方翻译，德林：“斯大林同志为什么要把红白葡萄酒掺着喝呢？”

费德林说不清楚，要去问斯大林……

毛泽东下让问，说这样问不合适。

斯大林坐在一边，敏感地责问翻译：“你们秘密地小声交谈什么？不能说给别人听吗？”

那声音从背后传过来，吓得费德林哆嗦了一下，急忙转过脸来，惊慌的目光，正好碰上斯大林那双透过夹鼻眼镜射过来的严厉目光。费德林明白，这双眼睛随时在瞄准大家，差不多人人惧怕。自己作为一个小译员，命运不

掌握在自己手上，如果被这双眼睛看得不顺眼，定会天有不测风云，随时都有可能大祸临头。想到这些，他更加慌乱了，嗫嗫嚅嚅地说：

“哦，他在问……”

“是吗？问什么呢？……”斯大林冷言冷语地连连追问。

费德林慌忙站立起来，小声地给斯大林解释：“是这样，斯大林同志。刚才，毛泽东同志问，您为什么总把各类酒掺和起来饮，而其他人为什么都不这样做？”

毛泽东平静地坐在二边，点燃了一支烟，抽了起来。他对斯大林这种多疑、冷酷和对部下毫不客气的作风有点看不惯，但作为客人又不便多言，只好悄悄地抽烟。

斯大林那怀疑的目光，从夹鼻镜片后面透了过来，直逼费德林：“那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呢？”

面对斯大林那带有人气的目光，费德林更加慌乱了，又见到贝利亚那笑里藏刀的眼睛也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便急忙解释说：“请原谅，是毛泽东同志坚持不让我这么做，他认为，这样问您，有一点不大礼貌。”

“唔——”斯大林摊开双手，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但又狡黠地问费德林：“而你这位译员觉得在这儿应该听谁的呢？”

费德林急忙立正：“当然是听斯大林同志的话了！”

斯大林这才高兴地笑了起来，转身向毛泽东解释说：“您知道吗？这是我早年形成的一个习惯。我常饮白葡萄酒，但我相信红葡萄酒，在流放中我得了伤寒，一个狱中善良的医生悄悄地给我饮用了少量红葡萄酒，一大概是西班牙酒吧，从死亡边缘救了我。从那时候起，我就深信，红葡萄酒可作药用，有益于健康！”

“哈！您这是经验之谈，也是从实践中总结的知识啊！”毛泽东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斯大林也笑了。他说：“我从来不看医生，也不大相信医生，许多医生看不了病，我们格鲁吉亚许多健壮的百岁老人，一有病就喝干葡萄酒，再披上一件暖和的毡毯就行了！”

“这是群众的经验。”毛泽东哈哈大笑，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然而，师哲没有笑。他本来想要问斯大林，为什么称毛泽东先生而不称同志，但见斯大林对翻译是那样的严厉、冷酷，毫不客气，怕自己的贸然提问，会引起斯大林的反感、怀疑，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等等吧！时机下成熟，等下次再说！”

斯大林“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

斯大林为了弥补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夫误，隆重接待毛泽东，忙活了好几天。他和毛泽东的会谈，也丁像对其他国家的领袖那样随便，几乎是精心安排，全神贯注。但谈话中他再三询问，仍摸丁透毛泽东的底细。毛泽东说要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斯大林琢磨再三，仍搞不清这个东西是什么。斯大林感到困惑而疲倦。

是啊，已到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丁送走毛泽东，他就躺在沙发上休息。

然而，剪不断，理还乱，思绪翻滚，很难入睡。刚才，毛泽东的形象、思想和语言，给斯大林的印象又特别深刻，使他几乎无法遗忘，无法平静，无法入睡。他闭上双目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想在冷静中渐渐入睡，但是，不行。刚才的场面，禁下住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使他不得不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是的，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具有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时，另一种中国人的声音，一种用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斯大林的语言、词句装饰起来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中文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那声音引经据典、振振有词：“毛泽东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出身农民，只相信农民，和工人没有联系，不相信工人，害怕工人，忽视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学说，可毛泽东害怕工人，农民意识强，喜欢钻山沟。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苏联十月革命是工人阶级在城市起义夺取政权，可毛泽东忽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孤立地在农村建立红军，这难道不是抗拒国际指示，轻视苏联经验吗？……”斯大林又觉得，王明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王明的话不无道理。而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所坚持的主要依靠农民革命的道路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他又陷入了深深怀疑之中。

师哲在苏联学习工作过15年，了解王明和斯大林的关系。他回忆说，斯大林怀疑毛泽东，“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明为了争权夺利，为了争得中共领导地位，长期在斯大林身边说毛泽东的坏话。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王明先通过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人给斯大林耳边吹风，后来又以自己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常向斯大林进谗言。耳濡目染，造成印象，从而使他成了斯大林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王明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毛泽东，说毛泽东的坏话，造谣诬蔑，无以复加。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看法，多来自王明。”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由于斯大林长期听信王明谗言，对毛泽东产生了偏见，所以当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在理论上承认，行动上支持，及时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答应给予援助，但在那思想深处，这样那样的不理解、不满意、甚至怀疑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和怀疑，在公开的、外交的场合不便流露，而在背后，在私下里，或者像赫鲁晓夫说的“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国局势”时，往往流露出来。

赫鲁晓夫毕竟曾是当年苏共的领导人之一，毕竟曾是当年斯大林“心腹小圈子”里的重要人物，尽管他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和斯大林进行诬蔑和诋毁，但他谈到的一些事实，却为我们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新的角度。赫鲁晓夫写道：“我记得斯大林常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国局势。他总是翻来覆去地问：‘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斯大林已经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11）。

血写的历史是廓清疑云的秋风，回答质疑的铁证。实际上，毛泽东不但搞过工人运动，而且成绩卓著，曾是湖南工人运动的领袖。1922年，中共湖南党组织建立后，毛泽东任书记。他曾多次深入到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去考

察。为了能够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真心诚意地为工人阶级服务，毛泽东决心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刻苦地改造自己。他下嫌脏、下怕苦、不怕累，脱去学生装，换上矿工服，带着雨伞，脚穿草鞋，深入工棚、坑道、矿井，和矿工们同吃、同住，“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毛泽东的话形象生动，引人人胜，他说：“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工人力大于天”，你看，“工人”二字联合起来就是“天”字，其实，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毛泽东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曾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路上有一块石子，大老板看到了，随使用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入石灰、沙石凝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想搬就搬不动了，工人们听了，豁然开朗，纷纷要求毛泽东帮助他们。毛泽东满口答应。

毛泽东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时，劳工会已有7000多名会员，是当时长沙最大的工人组织，也是由著名的工运骨干黄爱、庞人铨在长沙组织的劳工团体，它的宗旨是“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知识’”。它的组织原则“系会议制，铲除领袖的”。要求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显然是受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劳工会里边确实也混进了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但黄爱和庞人铨思想进步，富有正义感，热心为工人办事，在人民群众中有相当的威信。在五四运动和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黄爱、庞人铨都是激进分子，对毛泽东十分崇敬。黄爱还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思想影响，在创办湖南劳工会的过程中，曾得到过陈独秀的帮助和支持。毛泽东在了解情况后，决定对劳工会采取团结、帮助、教育、扶持的办法，争取他们共同斗争。他多次找黄爱、庞人铨、张理等人谈心，帮助他们分析形势，解决矛盾，支持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同时有理有节地帮助他们克服缺乏严密的组织、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政治目标的缺陷。

当时，湖南劳工会领导的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黄爱、庞人铨怒火中烧、义愤填膺，要带领一些激进的工人，去和军阀和资本家硬拼，要拼个鱼死网破。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谈心，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帮他们分析矛盾，指明出路，并强调斗争要讲究策略，注意方法。从而“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毛泽东还写了一篇《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文章，1921年11月21日在《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上发表。文章指出：“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工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现在要开始写第二页了。愿这第二页上写的要大下同于第一页：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美备。”

针对劳工会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三点意见：“（一）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组织上宜一依西洋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大多，分部太繁，权力大分也要不得。”“（三）工会是工人组织的，所以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更进则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现在不能遽言及此，我以为无论如何第一步要办到凡人会的工人，每人必出至低限度的月捐，少至一个铜元都可；第二步办到自己养活工会。”（12）

经过毛泽东和党组织的说服教育和帮助，黄爱、庞人铨都接受了马克思

主义，申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工作。12月25日，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和湖南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工人、学生，高呼口号，义愤填膺，表达了对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慨。后来，陈独秀在总结这次抗议活动时说，除上海外，全国以“湖南工人最猛烈”。

(13)

工人阶级的觉醒，使反动军阀坐卧不安。1922年、月：6日，湖南军阀赵恒惕派人将黄爱、庞人铨逮捕入狱，翌晨即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

毛泽东闻讯，悲愤异常，立即召开会议，部署稳定工人情绪、组织工人队伍，进一步同赵恒惕斗争。他还主持召开了两次追悼黄、庞的工人大会，要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和军阀斗争，并发了纪念特刊。以后，他又经武汉到上海，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的追悼黄、庞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报告了黄、庞的生平事迹和牺牲经过，号召大家向黄、庞学习。后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

铁路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吸血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控制中国的大命脉，也是中国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因此，毛泽东便派得力干部、中共党员郭亮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的斗争。1921年秋至1922年秋，党领导工人在武昌的徐家棚和长沙的新河等地办起了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并于1921年10月举行了一次胜利的罢工。

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局长王世埏千方百计地破坏工人团结，阻挠工人运动。他利用同乡关系，培植爪牙，结帮拉派，声言“俱乐部是不法团体，工人加入的要送官厅重办”；他还收买流氓，敲诈工人，开除工人，闹得众怨沸腾，要求罢工。

毛泽东得到郭亮的报告，立即与武汉党组织联系，统一了粤汉铁路工人的组织，于9月5日拍电报给交通部，限三日内撤办元凶，否则，要实行全路总罢工。交通部和铁路局置之不理。9日，全路车辆停驶，工厂停工，粤汉铁路大罢工开始了。

盘踞在湖北的北洋军阀萧耀南，企图勾结湖南军阀赵恒惕联合镇压罢工。为了分化瓦解敌人，毛泽东指示新河工人俱乐部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委”，声明湖南境内，除客车、煤车停驶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勿来干涉”。赵恒惕欲动又止，在这次罢工中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中立。

10日晚，王世埏唆使部分工人开车，并用武装押运。郭亮针锋相对，率领罢工工人在岳阳作卧轨斗争。军阀令军警开枪镇压，工人被枪杀，郭亮被逮。

毛泽东闻讯，当即拟出新的斗争计划，派何叔衡到武汉去找湖北党的组织，开展新的斗争；自己则迅速赶到新河车站，召开工人大会，请岳用工人代表报告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军阀残杀工人的罪行，工人们听得义愤填膺，决心斗争到底。毛泽东又派人到湖南、湖北各地组织工人声援、抗议，坚持斗争20天，终于获得了“解除压迫、维持团体、改良生活、提高人格”的大胜利。11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粤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了；这是全国铁路工会中成立最早的统一工人组织。

安源路矿大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安源路矿是帝国主义控制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毛泽东曾先后三次到安源，深入矿井，工棚，

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团体，建立党的组织；又派李立三、蒋先云等去安源，以办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等合法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队伍。到 1922 年 9 月，俱乐部会员已发展到 700 多人，在工人中威信很高。

9 月初，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与蒋先云、朱少莲等安源党支部的同志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决定积极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指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路矿两局内部职员分有派系，可以利用矛盾；工人罢工也不能孤军奋战，要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将绝大多数工人充分发动，严密组织，防止敌人分裂工人队伍。只有坚决罢工到底，敌人才会退让。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面，决不动摇，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群众自然会跟着领头人走。

毛泽东离开安源时，还给在外地的李立三写信，要他立刻回安源，加强领导；同时指出：要“非常注意罢工战术问题”，“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为了加强领导，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工作。

9 月 14 日，安源路矿一万七千名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工人们发布了罢工宣言，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作人”的“哀而动人”的口号。向路矿两局提出了 17 项政治、经济要求。由于领导正确，策略对头，工人们齐心协力地和当局进行了五天激烈的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14)

身在欧洲北部的斯大林，当然不了解在中国江南革命的毛泽东的上述活动，并且往往用自己熟悉的苏联模式，来判断中国革命的是非，因而难免发生一些失误和怀疑。但是，斯大林也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耐下心来倾听毛泽东的话。那天下午在小餐厅里，斯大林和他周围的几个心腹人物，尽管议论了对毛泽东是否依靠工人的怀疑，但他也知道，这只能是怀疑，不是事实，不能在领袖的会谈中正式提出，只能在接触中观察了解。于是，他决定派莫洛托夫到毛泽东的住处去看望他，摸一摸毛泽东的底细。

注释：

参阅〔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 8 月版第 538—539 页。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448 页。

艾伦·惠廷著：《苏俄对华政策，1917—1924》1968 年英文版第 116 页。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见《政治周报》第 5 期第 12 页。见《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 1966 年第 10 期。

〔俄〕尼·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第 64—65 页。

“麦淇淋”是代黄油，不是真正的黄油——译者注。

(11)引自《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大回忆录续集》第 374 页。转引自《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华岳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0 月版第 222 页。

(12)(13)参阅高菊村、陈峰等著：《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 3 月版第 166 页。

(14)李立三著：《看了 燎原 以后》；刘少奇、朱少连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十八 万众欢呼，斯大林庆祝七十大寿 真情表露，毛泽东赞“导师和朋反”

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全场注意的中心，人们鼓掌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七十寿辰。庆祝活动期间，人们以多种方式，祝愿斯大林健康长寿！

寿诞那天，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富丽堂皇的大剧院，被装饰得雄伟壮观，灯火通明，充满了喜庆的色彩。前来参加庆典的有苏联的高级干部，有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有各方面的英雄模范，还有来自世界各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团。苏维埃人把能参加这一庆典看成很高的荣誉，因此，苏联国内的代表都是经过精心组织的。

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全场注意的中心。

当斯大林和毛泽东以及各兄弟党的代表团一同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欢呼声四起。

容光焕发的斯大林，热情地向大家招手致意，并把毛泽东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介绍给大家。

毛泽东热情地向众人招手致意。

人们都注视着毛泽东。当他们发现站在斯大林身边的中国领袖，竟然如此高大魁梧、英姿勃发、气度不凡，禁不住发出了一阵阵议论声和赞叹声。

就座后，毛泽东挨着斯大林，师哲则在毛泽东身边翻译。

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书面祝词。祝词是由费德林代读的，热情洋溢，十分精彩，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紧紧地抓住了全体与会者的注意力。当费德林读到“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广泛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的时候，全场爆发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台下还有人挥舞起帽子和手中，场面十分热烈，十分壮观。

斯大林友好地侧过脸来，对毛泽东感谢地点点头，深情地一笑，也和大家一起轻轻地鼓起掌来。

费德林等会场上平静下来，接着读到：“在这个盛会上，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春，祝福我们伟大友邦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与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

这时，全场又一次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

毛泽东的祝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宣读过程中，全场三次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

斯大林十分重视与毛泽东的友谊。在大会进行中，斯大林多次转过身来，同毛泽东亲切交谈，说说笑笑，非常亲热。

大会以后，宴请宾客并观看文艺演出。斯大林特地请毛泽东和他坐在一起，非常亲密。看文艺演出时，他也特意叫人安排毛泽东同自己坐在一个包厢内，边看演出边交谈，显得格外亲密友好。他们坐的包厢是旧时代沙皇专

用的包厢，豪华而舒适。

精彩的演出结束了，剧场内所有的灯光齐明，照得全场金壁辉煌。观众全都回过头来，皇着中间包厢里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热烈鼓掌，并有节奏地欢呼：

“斯大林！毛泽东！”

“毛泽东！斯大林！”

看到这个场面，毛泽东也非常激动。他站立起来，挥手向观众致意，并高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

这时候，全场的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了一片，经久不息，震荡得大厅轰鸣，更加烘托出热烈的气氛。当时，人们的确都情绪热烈，感情真挚，没有任何勉强的痕迹。

斯大林为什么能博得亿万人民如此的厚爱与敬重呢？

毛泽东为什么对斯大林评价这么高呢？

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能因一时的成败论英雄。太阳虽有时被乌云遮挡，但它终究要大放光芒。

“斯大林”一词的意思是钢铁的人。——他的性格特点，人生真谛、胜利轨迹是什么？

历史对巨人的评价，往往带有时代的特点。

斯大林逝世至今已 40 多年了。世界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人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有褒有贬，说法不一。然而，正如著名的美国作家斯特朗写的：“我们至少知道，他从 1928 年起，在一个国家，在一个为敌人的世界所包围的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当他开始的时候，俄国是一个农业的和文盲的国家；当他结束的时候，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工业强国。他两度这样建设了俄国：一次是在希特勒入侵之前，再一次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这要永远归功于他。他是这项工程的工程师。”

斯特朗也分析过斯大林的错误及其根源。她指出：“他进行工作时是残酷无情的。因为他出生在一个残酷无情的国家里，并且从小就经历了残酷无情的生活。他是抱着猜疑的心情进行工作的，因为他曾经 5 次被放逐，并且多次被人出卖过。他默许了，甚至批准了政治警察对无辜的人的暴行，但迄今为止，还提不出证据来说明他是有意制造这些暴行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沿着斯大林的人生足迹，作一次有益的探寻。

斯大林，这个响亮的名字，并非他本人起的，也不是他的父母起的，而是同志们根据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给他送的绰号。

“斯大林”一词是俄文译音，其意思是钢铁的人。

“斯大林”——钢铁的人，这既表现了他革命意志坚强，性格倔强，百折不挠，坚韧不拔，敢于斗争、不怕牺牲，有为共产主义英勇奋斗的决心，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魄力，又有克敌制胜，办事成功的谋略；但另一方面，这个词中是否又有冷若钢铁，缺乏人情，少点温柔的含义呢？以前多年的解释，只说前者；近几年的指责，多在后两者。其实，钢铁的人，坚与冷，钢与冰，敢斗与缺情，都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种性格的不同表现，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不足为奇。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1879年12月21日，出生于格鲁吉亚的哥里城一户贫苦的小手工业者家庭。父亲维萨里昂诺维奇，是个皮鞋匠。母亲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泽，是个农奴的女儿。夫妇俩都是格鲁吉亚少数民族的下层劳动人民，因家贫失学，目不识丁。叶卡捷琳娜生了三个孩子，都不幸夭亡。1879年12月21日生下的第4个孩子就是斯大林。父母给这个小生命起的名字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后来参加革命，根据同伴们起的雅号改名为约瑟夫·斯大林。

斯大林的母亲想让儿子长大当神父，父亲要让儿子长大当鞋匠。1888年秋，斯大林进了哥里镇的小学读书，母亲就在这所学校里当清洁工，供养儿子上学，但爱酗酒的父亲，硬要儿子到制鞋厂去学手艺，夫妻两因此常闹纠纷。直到1890年父亲在一次酗酒打架中被人用刀子捅死后，斯大林才又按母亲的意愿回到了学校。父亲的惨死，给斯大林那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贫穷和灾难，磨砺了斯大林坚强的性格。他回小学后，按母亲的嘱咐，刻苦读书，争强好胜，加上他天赋聪颖，记忆力强，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894年6月，他以优异成绩从该校毕业，被保送到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

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是座古城，气候炎热，风沙弥漫。当时人口约15万，主要是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人们操着各种民族语言，熙熙攘攘，忙于生什。沙皇派来的总督和外高加索政府就驻在第比利斯。年仅14岁的斯大林在神学院里学习了不久，因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不断发展，神学院改为正教中学。院长和学监为了得到俄国当局的拨款，对学生管制很严，几乎把学校变成了一座大监狱。学生一有过失就被关进地下室的一间小黑屋子里。修道士的迫害，低劣的饭食，引起了斯大林和许多学生的愤恨和反抗。

为了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斯大林刻苦地读书。他不仅读格鲁吉亚诗歌、俄罗斯和西方的经典著作，也读巴尔扎克、雨果、萨克雷作品的译本。萨克雷的《名利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爱看历史、经济和生物方面的书籍，达尔文的《人类起源》、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勒徒努的《民族文学发展史》和门捷列夫的《化学》等书，对他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使他渐渐地由一名虔诚的神学院学生，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当一位同学谈到上帝时，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根本没有上帝，我借一本书给你读一读，它会告诉你，这个世界和一切生物与你想象的有很大不同。关于上帝的话，全是胡说八道。”

当时，俄国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列宁已在彼得堡开展革命活动，并于1894年发表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名著，对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阶级力量作了深刻的分析，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斯大林读后，深受鼓舞。1931年，他与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说：“我参加革命运动是从15岁起，当时我和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成立的一些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这些小组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引起了读马克思主义秘密刊物的兴趣。”

1896年至1898年间，斯大林成了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领导骨干。他向同学们讲解达尔文的学说，还根据手抄本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一些著作。1898年8月，他参加了格鲁吉亚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麦撒墨达西社”，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活动。后来，斯大林回忆道：“我记得，在1898年，那时我第一次指导了一个铁路工厂的工人小组。……当时，在这里，在这些同志中间，我受到了第一次革命战斗的洗礼。”

由于斯大林经常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1899年5月29日，神学院把斯大林开除了。这个沉重的打击，不但没有使他灰心丧气，反而使他更加坚定地以革命为职业，更勇敢地去摧毁沙皇政权。

1900年12月，列宁筹办的《火星报》在莱比锡出版了。斯大林对《火星报》特别感兴趣，对列宁特别尊重。斯大林说：“当我知道列宁从19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1901年以后，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的时候，我就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的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创造者，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才了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需要。当我拿列宁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者比较的时候，我总觉得……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

斯大林遵循列宁的路线建党并领导工人运动。1901年9月，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第一张秘密报纸——《斗争报》创刊了。列宁的《火星报》热烈祝贺，并指出该报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向，在揭露机会主义者和团结工人革命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斗争报》坚持列宁的思想，报上的主要文章多是斯大林撰写的。他指出：“在俄国和一些地方，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负有解放人类并为全世界谋幸福的历史使命。”

斯大林坚决捍卫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牢牢掌握领导权的思想。他写道：“为了这种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必须组成独立的政党。”他认为：必须建立强大的、团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党必须把革命的大旗掌握在自己手里，引导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民走向胜利。在斯大林的积极推动下，第比利斯成立了拥护列宁《火星报》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个第比利斯委员会，并广泛地开展活动，建立了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

1901年11月，斯大林奉党组织之命，去到黑海之滨的重工业城市巴士姆，组织工人斗争，他通过联系先进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在10个大企业中建立了11个社会民主党小组，还办起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印刷和散发传单，领导工人斗争。12月31日，举行了巴士姆社会民主党各小组的代表会议，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拥护列宁《火星报》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士姆委员会。委员会领导巴士姆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和政治示威，沉重地打击了当局的剥削、压迫和专制统治。警察当局逮捕了32名罢工工人。1902年3月8日，斯大林组织了工人大示威，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当局残酷镇压，又逮捕300多名工人，关进监狱。次日，斯大林领导社会民主党巴士姆委员会，组织了有6000多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示威，到监狱前游行。沙皇军队开枪射击，打死15人，打伤54人。斯大林不屈不挠，率领示威队伍，坚持斗争。他写传单，作讲演，鼓舞斗志。3月2日，又主持为被杀烈士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安葬仪式，声讨沙皇政府，对高加索乃至全国的革命运动，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沙皇政府下令逮捕斯大林。1902年4月5日，斯大林在巴士姆委员会会议上被捕，囚禁于巴士姆监狱。在狱中，他继续斗争，通过写信与党组织联

系，写传单、写文章指导工人运动。1903年3月，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斯大林被缺席选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

1903年秋，斯大林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刑期3年。12月间，在流放地他收到了列宁的一封信。后来，斯大林回忆说：“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1903年。固然，这次认识并不是经过亲自会面，而是经过互相通讯。但是这次认识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党内工作的整个时期中，这个印象始终没有消失过。那时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他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做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做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和明确，这样扼要和大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颗打中目标的子弹。这封简单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

1904年1月5日，斯大林从流放地逃回高加索，为执行列宁的战略和策略，为实行列宁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而斗争。当时，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和革命的发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列宁认为，解决党内危机的办法便是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坚决站在列宁一边。在巡视南高加索和格鲁吉亚期间，他为巩固原有党组织，创立新的党组织，同孟什维克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6月间，斯大林奉命来到巴库，解散了孟什维克的巴库委员会，组织了布尔什维克委员会，领导石油城的工人举行了有名的“十二月大罢工”。这次罢工由12月13日一直坚持到31日，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工人与石油业主签订了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集体合同。巴库罢工“是全俄一、二两月光荣发动的信号”，是俄国大革命风暴前夜的春雷。

以斯大林为首的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带领南高加索的工人农民，进行了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并很快地将此斗争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他们购置军火武器，训练红色部队，组织农民革命委员会，废除苛捐杂税，夺取地主的土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这些斗争全面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听取了南高加索代表团的报告之后，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特别决议，向高加索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致敬，并号召各地党委采取最积极的办法，广泛传播高加索的革命经验，支援他们的斗争。

斯大林坚决维护列宁关于武装起义是推翻专制制度和成立共和国的手段的理论。他在《告公民书》中写道：“全面武装起义，这就是近年来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全盘事件在历史上必然走向的那种必然结局。全民武装起义这就是现时摆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亟待解决的伟大任务！”

沙皇政府迫于人民起义的压力，于1905年10月18日，颁布了所谓给予人民“自由宣言”。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工人群众大会上讲话，公开揭露了高喊解除工人阶级武装口号的孟什维克的叛卖策略。斯大林说：“为了真正获得胜利，我们需要什么呢，为着这件事，就需要三件东西：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还是武装。”

南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积极展开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2月上半月，在第比利斯、齐亚土雷、克里维尔、萨姆特烈加等许多城市和地区，都先后爆发了武装起义，南俄大地出现了一派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就在这一月，斯大林会见了列宁。这在俄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塔默尔福斯代表会议上，斯大林作了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作报告，并且发表了维护列宁的积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即议会）策略的演说。他被选入负责编审代表会议决议的政治委员会，与列宁一起工作。他那敏锐的观察力和干练的工作作风，给列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这两位工人阶级的领袖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亲密的合作。

会后，斯大林回到高加索领导革命。“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被镇压之后，沙皇政府对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列宁不得不侨居国外，在那里继续领导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斯大林则在俄国坚持奋斗，常常被逮捕和流放。从1902年至1913年的11年间，斯大林先后被捕7次，被流放6次，从流放地逃走过5次。

1912年1月的布拉格代表会议，选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列宁、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斯维尔德洛夫等人当选为中央委员。为了加强党对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国中央局。尽管当时斯大林未到会，并被流放中。

1912年2月29日，斯大林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再次从沃洛格达流放地逃了出来。他负责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为实现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而斗争。他视察了俄国各个重要地区。在南高加索，他冒着被沙皇走狗逮捕的危险，击败了孟什维克的破坏，取得了维护党性、反对取消派的胜利。

1912年5月，斯大林受党中央和列宁的委托，具体组织了《真理报》的创刊工作。他领导制定了《真理报》的编辑方针，亲自编辑创刊号，实际上是这家报纸的第一任总编辑。在两年半内，《真理报》曾被沙皇政府封闭过8次，但它以新的名称继续出版，成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后在纪念《真理报》10周年时，斯大林写道：“1912年的《真理报》，奠定了布尔什维克1917年胜利的基础。”

1913年2月23日，斯大林在为《真理报》募捐时被捕。列宁闻讯，立即写信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我们的被捕情况是很严重的。柯巴被抓走了……柯巴幸而写完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长文章。很好！要为真理而战，反对崩得和取消派的分裂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

斯大林被监禁5个月之后，于1913年7月2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北部的图鲁汉斯克地区，期限4年，受尽了罕见的磨难。但是，坚强如钢的斯大林，不屈不挠，巧妙地与列宁和党取得了联系，坚持斗争，顽强工作，并写了许多重要文章。

列宁的革命理论，动员了千百万人民群众。1917年2月中旬，彼德格勒的普梯洛夫工厂开始罢工，其他工厂纷纷响应。到24日，罢工工人已达20万，他们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沙皇！打倒战争！面包！”2月26日，布尔什维克号召举行总起义，成立临时政府。工人们积极响应，士兵也转向起义，到27日晚，已有6万多士兵转到起义方面来。起义工人和士兵很快就取得了胜利，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将军，释放了政治犯，并在当晚举行了彼德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推翻沙皇统治。胜利消息，不翼而飞。其他城市和前线士兵相继起义。统治俄国达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被革命推翻。史称“二月革命”。

然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窃取了领导权。他们同国家杜马（议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达成协议，决定成立以李沃夫大公为首的资

产阶级临时政府。克伦斯基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也加入了临时政府。列宁在国外揭露了这个临时政府的性质。他说：“这个新政府并不是偶然凑台起来的一群人。这是已经上升到执掌俄国政权地位的新阶级，即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即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并存的局面。

1917年3月12日，斯大林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参加和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工作，并受党中央委托领导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

为了指导革命斗争，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党的决议和理论。在第一篇文章《论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斯大林提出了一项重要任务：巩固苏维埃并普遍成立苏维埃，以作为人民革命政权机关的工兵代表中央苏维埃为首，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进行统一的斗争。斯大林在《论战争》一文中，拥护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号召俄国劳动人民“撕下帝国主义的假面具”，“使现在这次战争不可能再打下去”。

1917年4月3日，列宁经长期流放生活后回到了彼得堡，斯大林率工人代表团热烈欢迎。4月4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大会上作了战争和革命的报告，阐明了《四月提纲》。这是党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天才计划。斯大林在解释、宣传列宁《四月提纲》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发表了《论临时政府》、《土地归还农民》等许多文章。

1917年4月24日至29日，布尔什维克党举行了第7次（4月）全俄代表会议，讨论了关于战争与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并且定出了党对时局、战争、临时政府、苏维埃、土地、民族等等问题的路线、方针。列宁在报告中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作为党的最近任务。会后，斯大林协助列宁在工人和士兵中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6月18日，组织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群众大示威。斯大林以中央的名义，写了《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真实而深刻地表明了工人和士兵的意愿，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50万人举行大示威，要求苏维埃掌管政权，要求苏维埃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决裂而实行积极的和平政策。

临时政府调来哥萨克队伍和士官生队伍镇压革命群众，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发出了逮捕列宁的命令。斯大林力排众议，千方百计地保护列宁，使列宁安全地离开了彼得堡，并且写了《把队伍团结起来》、《反革命的胜利》等文章，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提出了具体的斗争计划，鼓起了广大劳动者和士兵争取胜利的信心。

1917年7月26日至8月3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第六次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列宁因受临时政府通缉而未出席大会。会议由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人主持。斯大林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提出了对生产和产品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土地转归农民、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归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等问题，号召用暴力推翻临时政府而夺取政权。代表大会批准了斯大林提出的决议草案，强调了列宁认定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联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保证的原理。

在代表大会上，有人对俄国能不能开辟社会主义道路表示怀疑，主张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为转移，斯大林对此作了坚决的反击。他说：“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

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

与会代表热烈支持斯大林的发言，支持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学说，确定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17年10月7日，列宁秘密地来到彼得格勒。斯大林向列宁报告了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在10月10日至16日的俄共党中央委员会上，通过了列宁和斯大林制定的武装起义的计划，批驳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的建议。会议决定斯大林为中央政治局领导武装起义的总指挥。

为了加强对这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列宁、斯大林决定派伏罗希洛夫、基洛夫、卡岗诺维奇、日丹诺夫等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分赴各地组织起义。10月24日早晨，克伦斯基下令封闭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人之路报》，并派装甲车包围该报编辑部和印刷所。临时政府对革命展开了攻势。斯大林闻讯，毫不畏缩，指示赤卫队员与革命士兵针锋相对，英勇反击，很快地击退了反革命军队，并在编辑部和印刷所周围加岗防卫。到上午11时，《工人之路报》又出版了，上面刊有斯大林写的号召推翻临时政府的社论：《我们需要什么？》斯大林写道：“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再拖延下去就会使整个革命事业遭到毁灭。必须以新的工农政府来代替目前的地主资本家政府。”

号角吹响了，起义开始了。起义总指挥斯大林和领导成员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里指挥起义。他们制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布置部队占领了电报局和电话局，打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接着，分派部队把守桥梁，加强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各区的联系。10月24日夜，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起义，指挥部队冲向首都中心，包围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

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赤卫队和革命军队占领了各火车站、邮政局、电报局、政府各部和国家银行。预备国会解散了。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战斗堡垒。“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以其向冬宫轰击的炮声，报道了10月25日是新纪元，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纪元的开始。这天夜里，革命工人、士兵攻下了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人员。起义胜利了。当夜10时，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宣布开幕，宣布起义胜利，“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次日，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规定“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不付任何赎金”。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大会发表的《告俄国公民书》，庄严宣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大地上诞生了。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勾结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要用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扼死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1918年2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上，拥护列宁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主张。3月间，俄共中央在面临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把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

1918年5月至1920年8月，斯大林先后指挥南方战线，保卫察里津，指挥东方战线、西方战线、西南战线作战，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的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1922年4月，斯大林就任党中央总书记。7月间，他派苏联政府全权代

表越飞赴华，与孙中山会谈。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苏联政府重申放弃在华特权，“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同情和援助，对于正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鼓舞甚大。正如毛泽东祝词中说的：“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这种友谊不仅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也鼓舞了中国国民党人，并且使中国人民清楚地看到，世界上真有伟大的友谊、无私的援助，真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续任俄共中央总书记，入驻克里姆林宫。他决心克服千难万险，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当时，俄国并没有多少现代化的生产机器，也没有充裕的财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劫，工业品不多，粮食也缺乏。1920年和1921年两个饥荒的年头，百万人死亡，加上7年战争，俄国有上千万人被夺去了生命。到1924年1月列宁逝世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没有摆脱战前沙皇统治时的那种贫困状况。而党内外、国内外还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对新生的共和国实行经济封锁，而且随时有武装侵犯的威胁。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觉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不敢设想了。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理论家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24年8月提出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思想——这种新思想使革命取得了一个继续前进的目标，鼓舞人们把革命的热情发挥在爱国建国的事业上，用在实际行动中。

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阻力是很大的。但坚强如钢的斯大林决心去探索、去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并运用他的谋略，在后几年的实践中，在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决策中，一个一个地击败了党内的反对派，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每一个反对派都斥责斯大林“专制”，可是每一次斯大林都掌握了政治局中的多数，运用种种手法，得到了广泛的群众支持，取得了胜利。在每一次胜利之后，斯大林都微笑着向被击败的反对者伸出手去，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就把他们接纳回来，重新分配工作。当托洛茨基表示决不退让时，斯大林就建议把他赶出了俄国。

斯大林关于“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十分强调党的领导和人民的主人翁精神。他认为党和人民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他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人民群众的努力，英雄们的业绩去创造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崭新的社会。他的理论和号召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农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响应，激起了一股苦干和奋发向上的热情。人们为了在俄国尽快地建成社会主义，并为全世界开创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火热的运动，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斯大林对落后的俄国工农业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尝试。它为工业确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设想了农业的大规模社会主义集体化。这个计划被当时西方世界看作“莫斯科的一个狂妄荒诞的计划”。由于全国人民的苦干巧干，仅仅用了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就于1932年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5倍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设的新工业以及对整个经济的技术改造，也提前完成了。

后来的历史证明：斯大林关于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此期间，斯大林先后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重要著作，继承和捍卫了列宁主义的事业。

1941年5月开始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先后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领导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中国革命，斯大林热情地支持，积极地帮助。虽然由于情况了解不够等历史的局限，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斯大林也有过不少缺点、错误，但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错误毕竟是次要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

注释：

见194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美]斯特朗著：《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76—177页。《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48页。

1913年，斯大林根据同志们送的雅号，自称“柯巴·斯大林”。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74页。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72页。

十九 听信谗言，斯大林态度改变 刚正不阿，毛泽东破浪向前

斯大林看了柯瓦廖夫的报告后态度改查。毛泽东发脾气说：“难道我毛泽东来莫斯科，就是为给你斯大林祝寿吗？！”

斯大林的祝寿活动结束后，欧洲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团都回去了。毛泽东则按他原定的计划，继续留在莫斯科访问、参观、休息、游览。

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对于考察、了解苏联这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趣更浓。早在1920年的二三月间，他就曾和李大钊等商量，要组织一个游俄队，到俄国这个“世界第一个文明国”访问、参观，并写信告诉同学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30年过去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历史的发展，使毛泽东不是以一个“游俄队”的成员，而是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来到莫斯科，他怎能不抓紧考察参观呢！因此，当他和斯大林初次会晤，斯大林问他有何愿望和要求时，毛泽东就直率地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同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现在，祝寿结束了，毛泽东便抓紧考察、访问，了解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况，参观了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受到了热烈欢迎。为了调剂毛泽东的生活，师哲找了几十部苏联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片，给毛泽东放映。其中有《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涅夫斯基》等等。

斯大林闻讯后十分赞赏。他对师哲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量简捷的办法。”

12月23日，毛泽东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并告：“已与斯大林约好二十二或二十四日谈一次。”

这时候，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1949年12月24日，陪同毛泽东赴苏的苏联铁路专家柯瓦廖夫向斯大林作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会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苏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无根据的批评；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据说，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这说明高岗从那时候起就在制造党内纠纷，并且“里通外国”，企图依靠苏联的支持篡党夺权。这份报告，对中共中央高层的政治生活作了不真实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是中共中央、中苏关系进行挑拨离间，起了很坏的作用。

柯瓦廖夫是一位铁路专家、技术人员，斯大林说他“削尖脑袋向政治里钻”。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派他去指导满洲铁路的重建工作，兼任苏联驻满洲中东铁路的全权代表。1949年春米高扬访华走后，柯瓦廖夫成了当时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入中职务最高的政府官员。3月下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进驻北平香山后，柯瓦廖夫从东北来到北平，也住在香山附近的一个小山沟里，他曾使用阿洛夫使用过的苏联军部的电台，陆续向苏联报告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

几天后，柯瓦廖夫又把苏联领事齐赫文带到香山，要求拜会毛泽东。一天傍晚，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他们，并向他们简要地介绍了解放军的战略部署，进军计划，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针对斯大林害怕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引起美军大批入侵、美苏交火、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顾虑，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说：不用多久，你们就可以看到淮海战役的胜利战果。下一步，就是渡江南下，解放江南。只要没有意外的变化，我们有胜利的把握。有人担心美军直接参战，至今为止，尚看不出发生这种情况的迹象。例如，我们不允许美军在秦皇岛登陆，也不许他们的舰队靠岸，结果，他们溜走了。在天津郊区，美军出城试探了一下，与我们的武装力量发生了一点冲突，打了几下，他们就缩回城里去了。在青岛郊外，美军也出来过几次，虚张声势，叫得很凶，但一受冲击，就龟缩到城里去了，而且，很快地把他们的军舰撤离了青岛。在其他港口，如烟台，威海等地，就没有遇见美舰。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美军真正要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没有看出他们有阻挡我军前进的征候或试探，因此，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人民解放战争，推行着我们的政策。可以断言，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交谈中，毛泽东神采奕奕，谈笑风生。而柯瓦廖夫总是提出一些具体问题，请求解释。为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还多次和他见面、谈话，介绍、解释当时中国的情况和问题，帮助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重大政策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如此不厌其烦，其用意虽没明说，实际上是希望柯瓦廖夫能向斯大林及苏共领导正确地反映情况，如实地介绍中国革命。

不久，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会见斯大林，由柯瓦廖夫陪同前往。出发前，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南海特意约见柯瓦廖夫，同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特别向他谈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发展变化及前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基本特点和任务；解放战争一定要进行到底，不得到彻底胜利，决不收兵。他强调指出：尽管发展的道路总是曲折的，我们的革命也要分阶段进行，但胜利是有把握的。中国革命是一条较长、较远的路程，由人民民主阶段的各项革命走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得相当长的时间，同时，这是要有条件的，即人力与物力，这两者缺一不可。我们目前所要准备的和要争取的，就是这么两条。

毛泽东还关心地对柯瓦廖夫说：这次你陪同代表团回国，虽辛苦些，但可以同家人团聚，这也是一次好机会。谁料，这一次，柯瓦廖夫陪同毛泽东访苏，不仅向斯大林作了不真实的口头汇报，而且无端造谣，给斯大林写了那份挑拨离间的书面报告。斯大林看了信以为真，不仅将《报告》让苏共中央的领导人传阅，而且疑心加重，“一连几天都不去看”毛泽东。由于斯大林的态度变了，“别人谁也不敢去看他”。因此，毛泽东闭门不出，不大高兴。

有一次，柯瓦廖夫和苏方的中文翻译费德林到代表团驻地来看望毛泽东，询问毛泽东身体怎样？生活习惯否？还有什么要办的事？

毛泽东正在火头上，当即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他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干什么？我是来干什么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柯瓦廖夫十分紧张，站得笔直，低着头，头也不敢抬！只是嗫嚅地说：

“斯大林同志要我来看看你，看你有什么事要办……”

不等柯瓦廖夫把话说完，毛泽东又接过活茬，说：“我有什么事？我一天就是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难道我毛泽东来莫斯科，就是为给你斯大林祝寿吗？”

柯瓦廖夫等战战兢兢地走了。

毛泽东对师哲说：“对这种人，就得狠狠教训一番！这样，他才会向斯大林去反映情况，去汇报！”

师哲解释说：“柯瓦廖夫只是个副部长，不会见到斯大林的。他不会反映他受到的训斥，也不敢去说。如果他这样说了，他会受到指斥和处分的！”

毛泽东淡淡一笑，未置可否。

西方的资产阶级宣传机关乘机造谣、挑拨离间。他们对新中国的成立本来就疑惧，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会见，更使他们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见这一段时间，报刊上对毛泽东的行止报道较少，他们便大造谣言、挑拨离间。

英国的一家报纸竟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

消息不胫而走，谣言到处流传。

苏联的领导人都有些着慌。斯大林问毛泽东要不要去外地走一走？看一看？毛泽东理解这是他们为了发表消息，通过报道他的活动来辟谣。毛泽东当即表示，愿到列宁格勒去看看；并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对此表示惊讶，问：为什么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他来干什么？

毛泽东听了不大高兴，认为斯大林对他不够诚恳。

由于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找新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询问，希望他了解一下毛泽东的意见和要求。

王稼祥过去曾和斯大林接触过几次，有良好的个人关系，见此情景，安慰了斯大林几句，又去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这时候，毛泽东的脾气发过了，火气也消了。他心平气和地说，把我弄来就是为祝寿，未免太简单了嘛，应该搞个政治文件。

王稼祥心中有了底，就以新中国驻苏大使的身份去苏联外交部点破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毛主席到莫斯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不是考虑中苏之间签个文件。

苏联方面反应很快，次日即作出答复，同意签个文件。斯大林并主动地约请毛泽东再次举行会谈。

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后来，他对师哲说，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有时候耳根子软，误听谗言，上了人家的当。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曾多次上过国民党的当。先上了蒋介石的当，吃了大亏；后来又上了王明的当，吃了大亏；再后来又上蒋介石的当。看起来，阶级分析不能忘啊！

的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斯大林时刻关注着中国革命，热情帮助中国革命。然而，在本世纪上半叶，要帮助中国革命，必不可免地要碰到一个大问题：如何看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认识如果有偏差，往往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而斯大林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而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特别是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和国民党右派会下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的问题，

作了错误的估计。

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大会上，发表了《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的演说。在这次演说中，斯大林断言：“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决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

同年，毛泽东在国民党广东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却与斯大林完全相反。毛泽东指出：在革命高潮中，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决斗中，中间派必然向两极分化。像戴季陶那种“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的所谓“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他们的实质是“要做修改孙先生的革命理论与策略的尝试。他是违反了党，违反了孙先生。他现在即无诚心要做反革命，无诚心要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他将来定要变成反革命，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

毛泽东的观点，鲜明、准确。这和斯大林认为资产阶级的妥协派“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的论断，不是完全相反吗？

毛泽东的这种论断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后作出的。过了不到40天，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又一次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他明确指出：“这个阶级对于革命具有两面性，即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赞成革命，当革命迅猛发展，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感觉着威胁时，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级又分为左右两翼，其右翼“只要国民运动的斗争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买办资产阶级做着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无缘青”，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这一派“对于所谓赤化时怀着恐惧，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所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担负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毛泽东在分析了当时世界上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后，强调指出：“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

斯大林和毛泽东对于国民党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论断莫衷一是，究竟孰是孰非呢？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的社会实践，西山会议派的公开反动，戴季陶主义的出笼，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整理党务案》，直至蒋介石、汪精卫的相继叛变革命，都说明了毛泽东上述论断的正确性、科学性，说明毛泽东的论断是符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实际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民党的实际的。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长期的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一直过高地估计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革命作用，而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作用却估计不足，支持不力，有时甚至作了一些不必要的干涉和限制。

这是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然而，斯大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认识到。甚至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共产国际和苏共党内的同志对他的错误提出批评后，他也没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并且继续按照自己的错误认识去指导中国革命。因而，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

冲突和矛盾斗争，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尽管毛泽东在公开场合谈话、公开发表文章，都十分尊重斯大林，尽量维护斯大林的威信，然而他们的分歧和矛盾却在不断地发展、激化。

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民党蒋介石在中国失败已成定局，在和中共代表团刘少奇等人的会谈中，斯大林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妨害了中国革命。

斯大林作自我批评的态度是严肃的、诚挚的。他还说：“现在看来，还是毛泽东同志对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了正确的估计，并且实施了正确的指挥，将革命引向了胜利。”

另外，据南共书记铁托的主要助手卡德尔的回忆说，1948 年 2 月 10 日，斯大林召集保共季米特洛夫和南共卡德尔等人在莫斯科举行三党会议，讨论巴尔干联盟和希腊革命问题。在会谈中，斯大林严厉地批评了保共和南共支持希腊起义之后，坦率地承认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斯大林说：“战后，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但以后毛泽东开始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

斯大林有点苦恼：大国主义的倾向加粗暴，曾使他火冒三丈，陷入被动；在“南斯拉夫的失败”又使他冷静下来，尊重毛泽东。

毛泽东那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毛泽东那不卑不亢的态度和柯瓦廖夫的秘密报告又引起了斯大林的深思。

共产主义是人类的伟大理想和美好制度。当共产国际诞生的时候，它的领袖们都相信一个世界革命即将来临。特别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坚信不疑，再三鼓吹，然而，当革命洪流过去以后，旧世界的牢固基础不仅显露出来，而且显示出它还有高度的生命力。显然，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受到各国政权的制约。来自一个中心的领导严重地破坏了共产主义的威信，这就使得所有的评论家和敌对势力以谴责“莫斯科之手”为借口，攻击世界共运。

斯大林对此十分苦恼。他深怕这会断送苏联和世界共运的前途。因此，他经过长期的思考，选择了一个有利的时机——1943 年春天，当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以苏联的胜利告终，美国、英国对此作出积极评价，可能尽快开辟第二战场的关键时刻，宣布解散了存在了 24 年之久的共产国际。

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冷战”之风愈刮愈烈。斯大林意识到，世界的两极性，两大阵营的形成，把各国共产党相互支持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同时他也知道完全回到、哪怕是形式上回到原来的样子，也是不好的。

根据波兰同志提出的而且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倡议，1947 年 9 月 22 日至 27 日，在什克拉尔斯卡——波列巴市（波兰）召开了欧洲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受斯大林委托代表苏共（布）的日丹诺夫，在会议召开前夕，给领袖拍来一份密电，在这一文件中报告了工作小组拟定的初步方案。他说与会者对以下的看法一致：

会议的工作可以从与会各国共产党的情况报告开始。然后安排会议日程。我们将提出这样几个问题：

- 1、国际形势——我们发言。
- 2、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建议由波兰同志作报告。

结果应当是建立一个协调中心，驻地设在华沙。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特别强调自愿原则。

请指示

安·日丹诺夫

斯大林表示赞同。经过交换意见，在共产国际解散四年之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了。而西方马上就把它叫做“共产党情报局”。在日丹诺夫给斯大林拍来的报告情况的密电中，介绍了与会各国共产党代表所作的报告。按照日丹诺夫的话来说，南斯拉夫最积极，也最持肯定态度。而他们哪里会料到，这一新组织会在1949年11月通过一项“南斯拉夫共产党受杀人犯和间谍统治”的决议。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细节，即日丹诺夫根据各国共产党报告的内容、方向和结构，对以下两个报告评价最高：一个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卡德尔的报告；另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兰斯基的报告；然而，过了不到一年，日丹诺夫就痛斥卡德尔是“帝国主义的间谍”，而斯兰斯基没过几年，就由贝利亚导演的一次可耻审判砍下了脑袋。

在日丹诺夫得到斯大林赞同的《论国际形势》的报告中，扼要地表述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就是后来成为苏联多年宣传中心内容的“世界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这也许就是对反共的“杜鲁门主义”的答复。报告对“马歇尔计划”——“奴役欧洲的纲领”也作了评价。日丹诺夫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给它扣上了一顶又一顶的侮辱性帽子。斯大林一直坚持他的这些错误。

南斯拉夫人民在粉碎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始终没有停止过反对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苏联同东欧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的条约，就是1945年4月在铁托访问莫斯科期间同南斯拉夫签订的。斯大林曾同铁托会见过多次，并且和他进行过热情洋溢的交谈。由于举行了这些会议，决定把能够装备12个步兵师、2个航空师、坦克旅和炮兵旅的军事技术和装备转交给南斯拉夫人民军。看来，友好关系在不断发展。有一大批苏联军事专家被派往南斯拉夫人民军中工作，也有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军官派往苏联进修，联共（布）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的合作非常紧密，可是冲突却突然爆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由于一系列当前问题（筹备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友好条约；南斯拉夫的一个航空团派往阿尔巴尼亚；季米特洛夫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关于将来建立欧洲人民民主国家联邦式邦联的原则可能性的声明）没有同莫斯科商量，结果激怒了斯大林。荣誉、权力、实力使他失去了理智。斯大林以为他不仅可以自己家里，而且也可以在自己的盟友中发号施令。

斯大林建议进行有苏联、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三方参加的会谈。这次会谈于1948年2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三十国家的代表团的首脑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苏联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

科夫、日丹诺夫以及苏斯洛夫；保加利亚代表团中还有著名活动家科斯托夫和科拉罗夫；南斯拉夫的代表还有德热拉斯和巴卡里奇。会谈一开始，斯大林就非常气愤地对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出现的分歧表示不满。他认为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某些措施都是“特殊的对外政策路线”。于是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就声明，这些责难是毫无根据的，对他们的指控是片面的。针对这些声明，斯大林突然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关于有必要建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邦的建议。斯大林已经习惯于把他的愿望看作是决定，现在一下子明显地意识到遇到了反抗。无论是季米特洛夫还是卡德尔，虽然都没有在原则上否认结成联邦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建立联邦的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卡德尔声明，在国家的政治领导尚未作出决定之前，他不能给予比较肯定的答复。习惯于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对任何事务都要进行干预的斯大林，多年来恐怕这还是头一次遭到了共产党人的反抗！真是闻所未闻！

斯大林火冒三丈！当他知道贝尔格莱德决定不忙于建立联邦并认为这个问题只是历史远景的时候，他一下子就爆跳起来了。

德热拉斯描述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团同斯大林进行谈判的情景。他回忆说，在季米特洛夫发言之后，领袖就对着季米特洛夫破口大骂：“胡说，您像一个共青团员一样，一味蛮干。你想要世界大吃一惊，好像您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关于你们自己的事情，您和南斯拉夫人什么也不告诉我，这些我们都是从别处听到的，您就是要我们面对既成的事实！”（11）

对卡德尔，斯大林实际上是根本不让他发言的。斯大林虽然对他不像对季米特洛夫那样进行侮辱，但也同样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讲话：“胡说！分歧是有的，而且非常深！你们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都讲了些什么呢？有关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的问题，你们一点也不告诉我们！”（12）

卡德尔反驳说，这是得到阿尔巴尼亚政府同意的。

斯大林喊叫起来：“这可能使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你们根本不征求意见，对你们来说，这不是错误，而是原则，是原则！”

德热拉斯继续写道：“过了三四天的一个清晨，我们启程回国，用车把我们送到弗奴科沃机场，没有举行任何欢送仪式，就把我们塞进了机舱……

这次谈判并不像一次对话。斯大林一下子就想把谈判者置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书记的位置上。

权力是能够腐蚀人的。个人专权使斯大林丧失了起码的自我批评精神。斯大林习惯于人们害怕他，服服贴贴，完全同他保持一致。因而他相信他的要求一定会被采纳。可是突然——遭到了反抗。

一时冲动的制裁行动相继发生了：苏联从南斯拉夫召回了军事顾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南斯拉夫领导发出了措词尖锐的书信。铁托准备了一封经过慎重考虑并得到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赞同的回信。他驳斥了关于不友好的行动，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诽谤。他特别在信中写道：“我们中间不论是哪一个人，他们都热爱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同样热爱自己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5月，他们收到了一封长达25页的莫斯科回信。以其沉着镇静和善于思考而闻名于世的斯大林，现在却不再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竟随心所欲地行动起来了。自尊心掩盖了理智。一些机关根据贝利亚的倡议，迅速地收集了大量的“事实”，证明铁托和整个南斯拉夫的领导有“背离”和“变节”行为。而斯大林却没有理解到他已

经遭到战后第一次非常明显的失败

措施迅速升级。斯大林决定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卷入争论。从莫斯科接连寄往贝尔格莱德的两封信，邀请南斯拉夫派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情报局会议。南斯拉夫人很有礼貌地、但又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一邀请，认为这是干涉他们的内政，同时他们也表示了使关系正常化的愿望。

斯大林决定召开没有“被指控者”参加的情报局会议。但是，这已经是分裂了。1948年6月15日，即会议前夕，斯大林审阅了日丹诺夫准备在布加勒斯特所作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现状》的报告草稿，亲自作了几处修改。日丹诺夫在报告的附言中写道：“报告全文已经过我、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三人看过。”他们三人按照斯大林的决定来到了布加勒斯特。在日丹诺夫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些论点：“造成目前这种局势的责任应由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和兰科维奇来负。他们的手法来自托洛茨基的军火库。在共产党内不允许有这样可耻的、纯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对这样的制度应当予以消灭。南斯拉夫共产党一定会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的……”

斯大林不仅失去了现实感，甚至宣称：“我只动了一下小指头，铁托就不再存在了。他就要倒下去了。”

尤其是日丹诺夫从布加勒斯特电告说，我们同科斯托夫、契尔文科夫、陶里亚蒂、杜克洛、拉科西、乔治乌——德治等同志进行交谈，从这些交谈中可以看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站在同南斯拉夫不可调和的立场上”。施加冒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国压力，显然是为了向怒气冲天的独裁者讨好。斯大林废除了同南斯拉夫的友好条约，召回了大使，断绝了经济联系，但未就此罢休。1949年11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杀人犯和间谍当权》，这样就使冲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成了中央书记的苏斯洛夫这一次却对条文进行了精心的“修改”。简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把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比作希特勒分子，谴责他们是“间谍”、“同帝国主义结盟”，是“富农的蜕化变质”等等，南斯拉夫国内政治发展中具有独创的特点，采取了一些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步骤，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南斯拉夫的领导又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予以回击，所有这些都视为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行径。甚至在今天也难以想象，斯大林的傲慢自负和大国主义竟使苏共（布）和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走得那么远！在整个这段历史上非常鲜明地留下了一长制具有极大缺陷的印记。

胜利和成功鼓舞人们的斗志，失败和挫折却是人们英明的教师。在对待南斯拉夫和铁托问题上遭到失败的斯大林，如今面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显然谨慎了，聪明了。他知道，用那种傲慢自负、颐指气使的态度和大国主义的压力，连欧洲的一个小国也不能压服，如今，怎么能使亚洲的大国大党屈服呢？！他心里更明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成长起来的领袖和革命党，他们不信邪，不怕压，坚持真理，所向披靡，把那个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帝国主义赶出了大陆，建立了新中国，如今怎么会在压力下屈服呢？！所以，虽然时间过了还不到半年，斯大林在对待铁托的不同意见和对待毛泽东的不同意见上，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采取了友好、尊重、平等协商、耐心等待的态度，甚至采取了把部下的秘密报告送给毛泽东的特殊办法，“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情”。(13)

莫洛托夫奉命探察底细，说，“毛主席如果要办什么事，斯大林表

示愿意出面出力。”毛泽东没有提任何要求，却谈起了中国革命史……

那是个多雪的冬天。

纷纷扬扬的雪花，漫天飞舞，铺天盖地。皑皑的白雪，罩住了大地，覆盖着屋顶，压弯了树枝。

毛泽东喜欢赏雪。饭后，他常要走出暖融融的屋子，迎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孔策沃别墅的林子里散步。鹅毛似的雪花，落在他的身上、脸上，他不抖也不擦，舒心地微笑着。有时他抬起头来，举目远眺，欣赏那寥廓壮美的北国风光；有时又低头凝思，触景生情，审视那雪压冰坠的条条嫩枝……

几辆卧车来到别墅的厅前。

莫洛托夫来了。他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又是斯大林十分器重的苏联著名外交家，受斯大林的委托前来看望毛主席。

毛泽东迎上前去，热情地和莫洛托夫握手问好。莫洛托夫说，他是受斯大林的委托专程前来拜访毛主席，看望毛主席的。他说莫斯科气候寒冷，希望毛主席多多保重，注意休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关心照顾，表示感谢，然后陪同莫洛托夫进入客厅，亲切交谈。

寒暄之后，莫洛托夫委婉地表示：毛主席这次远道而来，不辞劳苦，加深了苏中两党两国的了解和友谊，斯大林和他本人都十分感激。毛主席如果要办什么事，请提出来，不仅他本人愿意尽心尽力，斯大林同志也表示愿意出面出力，加深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毛泽东笑着表示，这里招待局到、热情、友好，没有什么困难。要办的事情，那天和斯大林同志当面谈过了，最好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办。至于什么事情？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联方面有经验，既然想帮助中国，就应该主动提出，以示友好；如果不提，没有诚意，我们提也无济于事，反而落个乞求的口实。他说，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对中国最大的帮助。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接着，谈起了中国革命历史、中共党内斗争的情况等等。

莫洛托夫听着，起先还点头称是，渐渐地就流露出一不感兴趣的样子。在打了两个呵欠之后，他只是点头聆听，既不表态，也不提任何问题。这也难怪。莫洛托夫是斯大林在外交方面的主要助手，他忙于外交方面的具体事务，很少研究中国革命，更缺乏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研究和哲学思考，因而对毛泽东的话不能充分地理解，他的任务是探听毛泽东的底细。听着听着，他突然问：“你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吗？”毛泽东坦然地答：“没有。”莫洛托夫的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

后来，莫洛托夫在他的《忆旧》中说：“毛泽东在莫斯科时请我喝过茶，谈到要会见斯大林，不知何时更方便。斯大林一连好几天都没有接见他。当时，毛泽东住在斯大林的近郊别墅。斯大林对我说：‘你上他那儿去一趟，看看他是个什么人。’”

莫洛托夫回忆说：我同毛泽东谈完后对斯大林说，此人值得一见，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毛泽东向我承认，他没有读过《资本论》。(14)

莫洛托夫的《忆旧》证实了斯大林当时的怀疑和冷淡态度。

毛泽东对莫洛托夫强调：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必须同各国的实际情况

相结合。并说自己在湖南搞过工人运动，对中国工人比较了解。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有自己的鲜明特点的。毛泽东谈得很精彩，谈的时间也长。大量的事实说明，在中国革命的早期，毛泽东和斯大林虽然远隔万里，互不认识，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他们不约而同，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毛泽东力促国共合作，斯大林帮助中国革命，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莫洛托夫对这些表示淡漠，不感兴趣。听完了毛泽东谈中国革命之后，他未置可否，只是淡淡地表示，他将很快向斯大林汇报。

毛泽东对此并不生气，也不失望。他知道斯大林统观全局，重视理论，对中国革命问题十分关心。他今天谈的这些问题，只要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及时转告，斯大林是会感兴趣的。至于斯大林现在不同意让周恩来来莫斯科来，协商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也许是他心有猜疑，缺乏诚意；也许是一时疏忽，没有意识到搞那样一个东西的重要意义。不过，他相信斯大林是会意识到的。他记得在上次会谈时，斯大林不仅几次请他谈中国革命的经验，而且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每当他谈到中国革命时，斯大林都凝神静听，全神贯注，从来不打断毛泽东的话。他相信，真正关心中国人民命运和世界共运前途的斯大林，是会表现出诚意，主动想办法的。

注释：

师哲著：《陪同毛主席访苏》，载《人物》杂志 1988 年第 5 期第 14 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7 月版第 40 页。

《新中国外交风云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 5 月版第 11 页。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123—124 页。

见 1925 年 10 月 20 日广州《国民日报》。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 页。

见《卡德尔回忆录》，新华出版社 1981 年 7 月版第 130 页。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 71 全宗、第 5 目录、第 54 卷宗第 14—15 页。

(11)(12)密·德热拉斯著：《同斯大林会谈》，1962 年纽约版 169—176 页。

(13)《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5 月版第 369—380 页。

(14)参阅〔苏〕莫洛托夫《忆旧》，载 1992 年 7 月 20 日《参考消息》。

二十 心回意转，斯大林拜会毛泽东 山隐峰露，训翻译似有多疑症

斯大林拜会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对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并把科瓦廖夫的“秘密报告”送给了毛泽东。

斯大林识大体、顾大局，努力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英国报纸、电台的造谣中伤，西方资产阶级的挑拨离间，立刻引起了她高度的警惕。他知道阶级、政党、领袖的原理，明白他和毛泽东关系的好坏，不仅关系着中苏两党、两国的利害，而且直接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衰。事关两个阶级、两种制度斗争的大局，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在听了有关毛泽东发脾气、有意见的汇报之后，斯大林进行了冷静的深思。他觉得在中国革命这个事关世界格局的重大问题上，自己由于了解情况不够，偏听偏信，强加于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毛泽东虽然未曾到过苏联，但他坚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力挽狂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壮举，多么来之不易的胜利啊！如今，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他不远万里来到苏联首都为自己祝寿，为建立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而奋斗。这是多么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多么深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啊！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往往以“老大哥”自居，对兄弟国家兄弟党吹毛求疵，鸡蛋里边寻骨头，指手划脚，这怎么能不使兄弟党的同志发脾气、有意见呢？想到这些，斯大林立刻派人找来柯瓦廖夫写的那份《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重新审阅。

随着审阅者思想情绪的改变，柯瓦廖夫的秘密《报告》，立刻变成了适应西方资产阶级的需要，离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坏国际共运团结的谤文。斯大林决定，要把这份绝密的内部《报告》，当面送给毛泽东，以使用行动表明：斯大林和苏共领导对毛泽东和中共领导是诚挚的，信任的，是不容许挑拨离间的。

为了密切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消除疑虑，加强团结，斯大林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想法——这对固执、倔强的斯大林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多年少有的。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周恩来来到莫斯科来谈判。

1950年1月2日晚8时，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孔策沃别墅，询问毛主席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

毛泽东见斯大林态度改变，十分尊重中国同志，自己也就采取灵活的办法，不是讲一种方式，而是提三种方案，请苏联同志选择。他讲的三种方案是：

（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的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条约交换了意见。

（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

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

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毛泽东当即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答：“是的。”但他又对周恩来能不能尽快赶到莫斯科表示怀疑。

毛泽东笑了。他点起一支烟来，边抽烟，边搬着指头算了一下说：“我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恩来一道回国。”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都为毛泽东周密安排所折服。接着，他们和毛泽东具体商定了毛主席晋谒列宁墓、赴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游览、参观的日程安排。然后，就回去向斯大林汇报。

斯大林听了汇报十分高兴。他认为一切条件都准备好了，应该主动去拜会毛泽东，进一步消除误会，加深友谊。一天夜晚，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等苏共主要领导人，驱车去到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去拜会在那里下榻的中国领袖毛泽东。

顶着漫天飞舞的雪花，长长的车队到了孔策沃别墅。毛泽东走出客厅，迎上前去，和斯大林及苏共领导人握手问好，陪他们进入客厅，举行会谈。

夜幕，悄悄地罩住了大地。飞舞的雪花，又织成了一张巨大无边的白纱，轻轻地罩住了山川，罩住了别墅，给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再次会晤商谈，增加了不少神秘的色彩。

斯大林喜欢深夜长谈。毛泽东更有个特殊的生活习惯，喜欢夜间工作。每当更深夜静，人们都进入梦乡的时候，他们两人的头脑却格外清醒，因此，他们约定夜间长谈。

客厅里，一排长桌。斯大林坐在长桌的顶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等苏共中央的领导成员坐在一侧；毛泽东坐在靠近斯大林的位子上，翻译坐在中间。中国同志自然坐在自己的领袖一边。桌面上摆着各种菜肴和食品，白兰地、矿泉水、格鲁吉亚葡萄酒和几色伏特加酒如花似地点缀其间，整个桌上，显得丰盛、高雅而美观。这是苏联方面特意布置的。

莫洛托夫首先代表斯大林向毛泽东祝酒，向大家祝酒。

干过杯后，在友好的气氛中，双方进入会谈。斯大林首先问毛泽东身体怎样？莫斯科气候寒冷，生活能不能过得惯？表示希望毛主席注意休息、多多保重。他说：我们都是东方民族，互相了解；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外国欺侮，深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之害；中国是个大国，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有古老的文化；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党，有大批成熟的干部，特别是有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袖，领导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确实来之不易！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还要保护自己的领袖。人民之间要团结。

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苏联政府的帮助、支持和理解表示感谢，并提出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建议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可以搞一些贷款、通商、民航等协定。

斯大林说：“过去，我们对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现在，签订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很好，并具体建议：“就由我和毛泽东先生签字。”

毛泽东笑着说：“你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文件，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

斯大林当即表示同意。他说，周恩来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很有才干，请他来一起商谈更好。苏方的领导成员都同意请周恩来总理来进行具体谈判。

毛泽东指出：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中苏友好关系的建立，使西方帝国主义者十分不安。他们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妄图破坏中苏两党、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对此，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粉碎帝国主义者破坏阴谋。

斯大林说，列宁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我们遵照列宁主义，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围攻和武装侵略，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当然要破坏。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更大了，帝国主义的末日快到了。阶级斗争必然更加尖锐、复杂，敌对势力必然更加疯狂地顽抗、破坏。在革命势力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正是敌对势力常用的手段。

说着，斯大林把柯瓦廖夫那份《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顺手递给毛泽东，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柯瓦廖夫是铁路工程技术人员，不懂政治。在政治上完全是门外汉。可是他削尖脑袋向政治里钻。你看看，他写了些什么东西？！”

毛泽东接过文件，看也没看，顺手递给坐在身边的翻译师哲，接着指出：“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斯大林对于毛泽东深刻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灵活运用，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表示赞赏。他希望毛泽东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以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接着，毛泽东和斯大林就饶有兴趣地谈起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过程，探讨革命的成功经验，一直谈到深夜。谈得非常融洽。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并请周恩来、李富春等尽快赶到莫斯科。

师哲将斯大林给的“绝密文件”翻译出来，送给毛泽东，说：“这是一份暗地告我们状的小报告。”

毛泽东看了看文件，笑着说：这真是挑拨离间！不过，斯大林能把这样的材料给我们看，说明他是识大体、顾大局的，说明他不仅警惕性很高，不轻易中人家的离间计，也说明他虽然对我们有些怀疑，但总的来说，对我们是信任的，诚恳的，愿意友好合作的。

师哲说，这是一份难得的文件。斯大林这样坦诚地处理，不仅很快戳穿了离间计，而且增加了我们相互的了解和信任，加深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友谊

和信赖。

毛泽东尊重斯大林，重视斯大林的论著和意见。就在斯大林送给他“秘密文件”、表示歉言之后，他对师哲说：斯大林的不少意见是正确的，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例如1928年的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们党的有些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等基本理论搞不大清，争论不休。斯大林指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这些，对指导当时的中国革命，都起了重要作用。

1953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饶漱石都很活跃，他们“批薄射刘”，把攻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刘少奇同志。会议开了好几天，气氛很紧张。

师哲问毛主席：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一直攻击薄一波？

毛泽东淡淡一笑，说不是攻击薄一波，而是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并要师哲把斯大林给的那份文件找出来。

这时，斯大林那浑厚的声音，又在师哲的耳边响起：“看看吧，这些东西也许会有用的！”

毛泽东再一次看了斯大林转来的材料。那是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联系到高岗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是赏识他高岗。于是，毛泽东对高岗就比较注意了。

1953年12月下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来中国参加鞍钢扩建的落成典礼。

当时，高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政治委员。捷沃西安在东北时，高岗不仅亲自作陪，而且利用接待外宾的机会，有意识地突出自己，压制别人，抬高自己的地位，特别是利用一切机会，私下进行反对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非组织活动。

毛泽东消息灵通，很快地了解到高岗的活动，更加戒备了。当时，他正在杭州休养，捷沃西安到北京后，毛泽东就邀请他和尤金一起到杭州去会谈，并指定师哲陪同前往。

1954年1月2日，师哲陪同捷沃西安和尤金到达杭州。在杭州车站，师哲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长王凡，感到奇怪：上海的公安局长，怎么到杭州来了？因为他和王凡在延安时期就比较熟识，关系颇好，一见面，便开玩笑地问：“你怎么把上海丢了，到这里来？”

“我来保卫毛主席！”

王凡说着，表情严肃，并没有笑。

师哲心里嘀咕：毛主席不是好好的吗？怎么把上海的公安局长调来保卫？有什么情况吗？

果然，事出有因。第二天，毛泽东接见捷沃西安和尤金。师哲任翻译。会客厅里，不像往常那样生动活泼、轻松愉快，毛泽东也不似往常那样态度和蔼，谈笑风生。客人就座后，毛泽东和客人寒暄了几句，简单地问了问他们访问、工作的情况，便话锋一转，严肃地谈起中国党内和国内的问题来了。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

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着他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师哲听着，笑着，翻译着，并不紧张。因为他知道自己虽是陕西人，是秦人，但并无灭六国之志，更无灭楚之心，只是老老实实地作个共产党员，从来没有想打倒谁。毛泽东虽然指着他说话抒情，但意在言外，并非指他。所以他态度自然，笑得真切，译得准确，毫不慌乱，翻译得连一个拌子也不打。

捷沃西安和尤金听着毛泽东的湖南话和师哲那流利准确的翻译，禁下住抬起头来，用那质疑的、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态度从容、心底坦然、毫不慌乱的俄文翻译。

毛泽东笑了。他心中有数，不肯明讲。

师哲知道，毛泽东所说的“陕西”是指高岗。高岗是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第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年初调到北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由于个人野心权欲膨胀，勾结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要求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政务院总理。但是高岗是高岗，怎么把他说成“陕西”，并且指着师哲呢？

回忆此情此景，师哲心里难受起来。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奋斗了几十年，跟着毛泽东也奔波了十多年，不怕艰苦，不惧牺牲，老老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毛主席了解自己。可是，今天当着苏联客人的面，他指着我说陕西人要打倒他。我虽知他指的是高岗，但客人不知道，对我也疏远了！

这怎么办呢？事关党的机密，不能说明。既不能给毛主席去提意见，也不好去给客人作解释。聪明过人而又刚正不阿的师哲略一沉思，又轻松愉快地给客人讲起了秦灭楚的故事。

师哲说：秦灭楚时，秦人意见并不一致，不是铁板一块。据我们韩城的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当时，秦人的内部矛盾也很大。秦始皇要灭楚，问他的大将王翦，灭楚需要多少人马？王翦答：六十万。

秦始皇想，我秦国共有六七十万人马，都交给你王翦带走，岂不国内空虚？万一你王翦中途叛乱，反戈一击，社稷江山岂不成了你的？另一位将军王陵，说他带二十万人灭楚，足够了。好！秦始皇当即拍板，给了王陵二十万兵马。

准料，王陵本事不嘉。二十万兵马很快被楚国吃掉了，还引来楚兵压境，威胁秦国。

没办法，秦始皇只得硬着头皮再去请王翦。那王翦见秦始皇疑心太大，不肯出山。秦始皇又坐着车子亲自到频阳（当今的陕西省富平县美原镇）去请。王翦说，要臣灭楚，非六十万兵马不可！秦始皇咬咬牙，说：行！给你六十万！

王翦带着六十万兵马出发了，秦始皇亲自送行，并问王将军还有什么要

求。王翦见皇上对自己不放心，就说灭楚之后，要良田千顷，告老还乡。秦始皇见王翦没有野心，便满口答应。这样，后方巩固了，王翦很快地灭了楚国，并且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了。

有趣的历史故事，客人听得笑了。后来，师哲才知道，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时，已经在修改决议草案，准备召开四中全会了。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3月，中共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了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会上，毛泽东说：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的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关于斯大林把高岗提供的情报拿给毛泽东看这件事，毛泽东没有具体地讲。但是，很显然，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此举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赫鲁晓夫显然是同情高岗反对斯大林的。他写道：“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主贵情报的人。”他进一步分析：“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驱使。正像他自己说过的那样，他信不过任何人，甚至也信不过他自己。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

毛泽东一贯反对搞阴谋诡计，反对里通外国，更不允许把自己国家的重要情报提供给外国人。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指出：

“对于我们党来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起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对于斯大林处理高岗情报的问题，有着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毛泽东的观点是共产党人的观点，要做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要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赫鲁晓夫则十分同情高岗，埋怨“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惋惜使他“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对苏联“提供主贵情报的人”。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远隔千山，言传其人。是非曲直，一看便知。过了一年半，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

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讲到了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毛泽东没有具体叙述斯大林给他传递材料的经过，接着说：“1953年12月24日，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曾经宣布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人，叫刮阴风，烧阴人。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阳风阴人，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人。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毛泽东对里通外国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提出了警告，明确他说“这是不好的”。接着，又解释说：“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那种情报毫无用处，只有害处。这是破坏两党两国关系的。干这种事情的人，自己也搞得很尴尬。因为你背着党，心里总是有愧的。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要给适当的处分。”

在这里，毛泽东把不许里通外国的理由，纠正的方法，都讲得十分透彻。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只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从谋取“领导党”、“老子党”的霸权主义出发，从控制、操纵兄弟党的阴谋出发。

偶然是必然性的特殊表现。毛泽东的讲话，意在从高岗的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其实，他不仅对斯大林的行为作了必要的说明；也对赫鲁晓夫的观点作了必要的批判。

斯大林疑心太重，虽心回意转，仍山隐峰露，当面质问翻译：“你是不是想使我陷入中国学的迷魂阵？”

斯大林见多识广，性格坚强，神态沉稳凝重，目光犀利敏锐，但往往有一种病态的多疑症，一种不大正常的神经过敏。在把科瓦廖夫的秘密报告送给毛泽东以后，他的疑心渐轻了，会谈气氛融洽了；然而，他有时仍神经过敏，显得多疑。

有一次，毛泽东在回忆同国民党军队战斗的艰苦岁月时，介绍了共产党的军队被敌军包围的情形。当时的形势十分危险，革命军多次冲锋而未能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于是，指挥员号召战士：“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苏方翻译费德林听不懂那种概括性的口号，听不懂那种从文言文里摘录的句子，更听不懂毛泽东那种浓重的湖南口音，便请毛泽东用汉字写在纸上，让自己看。毛泽东拿起笔来，用他那豪放的笔划写出了八个汉字。费德林接过字条，仔细体会，但对于“视死如归”的“归”字的含意一下子吃不准，就不得不请毛泽东再解释一下“归”字的意思，以及如何与上下文联系解释。

不懂汉语的斯大林，看见自己的翻译和毛泽东说说写写，谈来谈去，心生疑忌，立刻用威严的声音质问费德林：“你的秘密活动要搞多久呀？”

费德林听见斯大林威严的声音，浑身一震，像是被电击中了一样。他知道，斯大林喜怒无常；而说他搞“秘密活动”，后果不堪设想，连忙解释道：“不，不，不是秘密活动，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是这么回事，是我在理解上有了困难……”

“可你的困难拖得太久了些吧？”斯大林用他那老鹰似的锐利目光，直射费德林，语气又冷冰冰的，令人发凉，使费德林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有一个字弄不懂……”费德林又忙解释。

“你是不是想使我们陷入中国学的迷魂阵？”斯大林还不罢休。继续追问。

“就只一个字，它的意思我一下子译不出来……”费德林解释说。

斯大林说：“那就劳驾把这个字和整个句子部按字面直译吧！”

费德林遵命照办。可是中文和俄文不同，把“视死如归”，译成看见死了像回家。斯大林作为语言专家，也听不懂是什么意思，接着追问：“毛泽东同志是怎么解释的？”

。费德林更难了：作为一名苏方的翻译，可以在两国领袖谈话中随便去向中国领袖提问吗？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向斯大林解释：“我也想知道呢，不过他什么都没有说。”

斯大林没有转过头来，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那就继续搞你的秘密活动吧！”

这时候，幽灵一般的贝利亚也轻轻地哼了一声，他那鹰鸢一样犀利的目光透过夹鼻眼镜朝费德林闪了几眼。费德林更紧张了。他知道贝利亚并不参加讨论，他在场纯粹是监视别人的言行。费德林似乎感到，贝利亚那两束尖利的目光很快变成了两把锋利的刺刀，一下刺进了他的胸膛，使他感到绝望、窒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候，坐在一旁的毛泽东倒悠然自得地笑了。那笑声是那样的淳朴、憨厚、善良、宽容，一下子把费德林带进了温馨、祥和的意境，使刚才紧张的气氛很快又轻松了下来。

费德林再次向毛泽东求教。

毛泽东笑着说，“视死如归”这话最先出自中国古代名将岳飞之口。你知道吧，岳飞是南宋的爱国英雄，是十二世纪征伐女真族的名将。中国南部的杭州市至今保留着宋代杀害岳飞的奸臣秦桧夫妇下跪请罪的雕像。

毛泽东说：“归字，在这里不作通常的‘回来’、‘再来’解。在中国历史上，‘归’字的原始含意是‘回到原本状态’，因此，在这里，这个成语应该理解为，‘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听完了毛泽东的解释后，沉吟了一下，轻轻地说：“这位将领真是有勇有谋啊……”

费德林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他仿佛感到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把他的脑袋从断头台的刀口上轻轻地拉了出来。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明朗了，都随着毛泽东那谈笑风生的语言变得明朗了。那种所谓“秘密活动”的幽灵，被毛泽东那襟怀坦白、神态自若、谈笑风生的神韵赶得无影无踪了。

费德林院士是苏联著名的汉学家和外交家。30年代末，他从莫斯科东方学院毕业不久，进入外交部门，被派到苏联驻华使馆工作。当时还不到30岁的费德林雄心勃勃，在从事外交工作的同时，还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他和周恩来、郭沫若、夏衍、茅盾、丁玲、曹靖华等交往颇深，先后在苏联出版了《屈原的生平与创作》、《离骚》、《论鲁迅文学创作的特征》、《中国文学史概论》、《中国古典诗歌——唐诗》、《郭沫若》、《论中国的新兴文学》等三四十种著作。他曾经担任过苏联驻华使馆的代理大使，在中国

一呆就是十几年，在新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五十年代中期，他已由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晋升为外交部副部长了。后来还曾任苏联驻日大使，苏联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等职。

他是一位治学严谨的教授。在毛泽东和斯大林这次晤谈之后，他回到家里已是凌晨。他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翻阅中国成语词典。核对岳飞的那句格言。词典里说，“视死如归”，源于汉武帝时代，当时，中国人正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交战，李陵答苏武书中谈到，“要，使三军战士视死如归……”

岳飞在《满江红》词中写到：“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战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也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费德林觉得；在毛泽东身上也洋溢着这种光明磊落、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正是这种英雄气概冲散了那无端猜疑的团团疑云。

毛泽东是哲学家和诗人。斯大林是语言学家。在交谈过程中，他们往往谈论到思维和语言的问题。

斯大林喝了一口那红白葡萄酒合成的酒汁，停了一刹那，详细地向毛泽东阐述了他那本著名的语言学著作的精华，然后，又反复地比划着对毛泽东说：“我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是不带有阶级性的。您认为对吗？毛泽东先生。”

“是的，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毛泽东说着，长长地吸了一口香烟，慢慢地抖着烟灰，不紧不慢地说：“各民族的文化 and 各民族的语言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汉字和汉语尽管不太容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会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学，只要愿意学和不断地提高，就可以掌握它，这也是不分社会地位和阶级的。”他说：“我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可我照样掌握了汉学和汉语”。

毛泽东那联系实际的论述，使费德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禁不住停住了笔，抬起头来，凝视着和蔼可亲的毛泽东。斯大林不满地盯着自己的译员，突然叫了一声：“费德林同费德林突然一怔，忙转过身来，只见斯大林眼露凶光，直盯着他，用冰冷的语调命令说：“请拿着你的盘子到我这儿来！”费德林莫名其妙，但又不敢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只好拿起自己面前那只盘子，小心翼翼地走到斯大林跟前，听候发落。

斯大林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看也不看费德林，不屑一顾地说道：“请把这儿的这一道菜拿去吧！”

费德林不知斯大林要干什么，呆呆地站着，没有动手。斯大林这才傲慢地说：“这是一道非常难得的菜肴，你可能是第一次品尝它吧！”

费德林哭笑不得，手足无措。

“请拿去！”斯大林的口气虽然是平静的，但却是命令式的，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常言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斯大林的话，特别是“最后一次”的话，使费德林的额头上顿时冒出了冷汗。他知道，这位大无帅掌握着生杀予夺的一切大权，“最后一次”，往往预示着极大的灾难。他记得刚才上菜时，女服务员曾轻轻地对斯大林耳语了几句什么，然后，她没有把这盘菜放在斯大林面前，而是放在了他的旁边。现在，斯大林要他费德林当众品尝这盘菜，是何用意？是何居心？他猜不着。但是，在中国客人面前，他又不敢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只好硬着头皮把这盘菜吃了下去。

毛泽东看着这个场面，一句话不说，只是抽自己的烟。

费德林吃完了那道菜。

斯大林这才转过脸来，问道：“怎么样？费德林同志，你喜欢这道菜吗？”

费德林满脸通红，却又强装欢笑，结结巴巴地说：“不错……不错！斯大林同志，这道菜嘛……哈哈，做得很精美……”

斯大林这才高兴地笑了：“哈，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毛泽东跟着笑了。

中苏两国的同志也都跟着笑了。

费德林也跟着笑了，但眼眶里却噙着晶莹的泪花。那道菜确实好吃：火鸡的肝，加上辣椒和盐，完全是高加索风味。不过，菜味掩盖不了人情味，中国有句古话：“醉翁之意不在酒……”费德林写道：斯大林“虽然款待了我，我仍然惶恐不安”。

赫鲁晓夫来了，他对斯大林拍马逢迎，鼓捣出的一个问题，使毛泽东哈哈大笑。

毛泽东访苏期间主要和斯大林晤谈，但苏联方面的领导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等领导人有时也出席作陪。其中，赫鲁晓夫虽然出面很少，但他在斯大林面前那奴颜早膝、见风使舵、拍马溜须、阿谀逢迎的言行，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和毛泽东会谈。苏方出席作陪的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贝利亚、赫鲁晓夫等几个人。中方则只有毛泽东和师哲。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友情，斯大林让在桌上摆了丰盛的酒菜，并招呼客人边吃边谈，同志间交换意见，下拘形式，吃自己想吃的菜，说自己想说的话。宴会上的气氛亲切而友好。

厨师的手艺的确不错，做出的菜色美味香。斯大林看着那香喷喷的鸡翅，想要吃点，但那浓重的疑心，又使他放下了叉子。他有个习惯，为了防止别人暗地下毒，每次吃东西之前，往往要别人为他品尝一下，作个验证，这时他想吃鸡翅，却不直说，而是用关切的语气问：

“尼基塔，你瞧！这是鸡翅，你尝过没有啊？”

善于察颜观色拍马逢迎的赫鲁晓夫，立刻明白了斯大林的意图，赶紧晃动着他那光溜溜的脑袋，凑过身来，显得十分忠顺的样子，说：“喔，我没有注意！让我先尝尝！”说着挟起一块鸡翅，自己先尝了一点，然后又请斯大林品尝。

斯大林吃着鸡翅，笑着说：“味道不错！”

赫鲁晓夫又吃了一口鸡翅，说：“哈，香极啦！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你说味道不错，的确香极啦！你的赞扬，是对厨师的最大赞赏……”

接着，赫鲁晓夫又借题发挥，说了许多奉承的话。

斯大林见毛泽东不太高兴，忙过来招呼客人。

赫鲁晓夫很健谈。他从鸡翅、宴会谈到了吃饭，又从吃饭谈到了上海，问上海有多少万人口？

毛泽东说：“约有600万。”

赫鲁晓夫说，600万人口，吃饭就是个大问题。

在一旁沉思的斯大林突然问：“你们在攻开南京后，为什么下马上拿下上海？”

毛泽东哈哈大笑。

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等人都惊奇地望着毛泽东，感到莫明其妙。

毛泽东笑了一阵，又吃了一口饭，才慢慢地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你要一口吃个大胖子，非把你憋坏不可！”

当时，人们没有注意这些谈话的背景。后来，直到1988年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出笼后，人们才看到了这些话并不是随便的交谈，而是含有复杂的背景和重要的政治内容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阶段（但在中国共产党人于1949年取得胜利之前），斯大林曾派米高扬同志到南京去同蒋介石会谈，让他夫了解蒋介石需要什么，以便向他提供援助。我记得斯大林常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国局势。他总是翻来复去地问：“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斯大林已经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斯大林这样怀疑的主要根据是对攻打上海的做法。当时蒋介石已经守不住那个城市了，可是毛却不让红军前进，拒不拿下上海。

“直到1949年底毛到莫斯科来的时候，斯大林才听到了毛对攻打上海的做法的解释——而他的解释完全证实了斯大林的怀疑。

“你当时为什么不拿下上海？”斯大林问。

“‘我们为什么要拿下它呢？’毛答。拿下上海，我们就得负责养活600万居民。”

“很显然，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战争中，毛更多依靠的是农民，而不是城市工人。由于某种原因，他认为农民比工人更革命。他不是打进上海去争取那儿工人的支持，而是担心向上海提供粮食的工作会牵制他的反蒋斗争。”“

很显然，“怀疑毛泽东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实质上，是怀疑中国革命的道路。因为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依靠工人阶级，不存在任何“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的问题。这是数十年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了的，毋庸置疑。引起斯大林怀疑的，实际上是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斯大林有过分歧，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首要的问题是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中国，谁要是忽视广大农民，孤立地搞“城市暴动”，谁必然要遭到失败。

然而，固执的斯大林并不这样看，他虽然承认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有错误，毛泽东“伟大，真伟大”，但他总怀疑毛泽东没有按马克思主义的依靠工人阶级在城市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去办事，而是过多地依靠了农民。因此，在他和毛泽东会晤时，就直接了当地问：“你当时为什么不拿下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工人聚集最多的地方。当时，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守不住上海了，斯大林以为，只有立即组织部队攻占上海，争取上海工人的支持，才算依靠城市工人，才附台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则，就是“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许他根本就不想懂这些道理。”

斯大林的这些看法，是不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的。赫鲁晓夫言而无信，他的回忆录很不准确。因为第一，当时毛泽东不是“不拿下上海”，而

是不能孤立地去先拿下上海。早在：1949年初，蒋介石就下令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的军事，统率45万人马，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一线，修筑工事，层层设防，并有海空军配合。美英帝国主义还在上海至青岛一线，部署了兵力和军舰，蠢蠢欲动。英明的统帅，不可能不看实际，令部队先拿下上海，去符合某种教条。第二，毛泽东力主中央军委，早在1949年3月17日就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决于4月10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60个师举行攻击。”5月23日，中央军委就渡江后的进军问题又作了具体部署：“以第二野战军在协同第三野战军占领宁、沪、杭等地后，主力集结于皖南、赣东、浙西地区，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4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的总前委制订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也明确规定，第二、第三两野战军歼灭沿江防御之敌后；向南发展，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没有毛泽东不愿拿下上海的史实。事实是，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之后，只用了34天（1949年4月23日至5月27日）就解放了上海。其间，4月27日至29日于郎溪、广德山区歼敌8万余人；5月3日解放杭州；5月16日，17日解放武汉三镇等地，都为解放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第三，为了达到既要歼灭敌人，又要完整接管上海，以利于今后建设之目的，中央军委指示：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因而攻上海部队不要过于迫近上海，以免吓跑敌人；对英美侨民及各国侨民和外交人员，应教育部队予以保护；“令部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并抽调5000名干部组成各系统接管机构，学习政策。上海地下党组织团结上海工人、市民护厂护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不是斯大林怀疑的“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

事实上，斯大林和毛泽东经过莫斯科近十个星期的会谈，消除了疑云，消除了隔阂，加深了友谊，结成了盟友，并且主持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和《回忆录续集》，洋洋洒洒，近百万言，不仅多处失实，自相矛盾，而且对这两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只讲怀疑、分歧、矛盾、冲突，不讲经过会谈、协商，消除怀疑，消除分歧，解决矛盾，加深友谊，互相帮助，结成盟友，以及签订中苏条约协定等主流和本质方面的东西。

这不可能用一时疏忽、片面、偏激来解释，是不是卖主求荣，怀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是个谜。

注释：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440页。

伍修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经过》，载《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1页。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11页。

(11)《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369—38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0页。

〔俄〕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7月

版第 49—51 页。

二一 以诚相见，斯大林知错改错“ 自知之明，毛泽东要请恩来

西方造谣说：“毛主席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毛泽东、答记者问。

毛泽东是统筹全局、处理各种矛盾的高手。他认为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那种把事物看成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不符合事物运动规律的。他说：“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然而，毛泽东特别强调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认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他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解释说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千千万万的学问家和实践家，不懂得这种方法，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是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共同愿望。所以，毛泽东一到莫斯科，斯大林就热烈欢迎。两位领袖的亲切会晤，成了苏联及世界的重要新闻。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报导了毛泽东和斯大林亲切会晤的消息。一时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晤面、会谈，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主题，也成了举世瞩目的大事。

然而，斯大林的多疑，柯瓦廖夫的“秘密报告”，英国报纸、电台的造谣中伤，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使两党两国间的矛盾更加复杂化了。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中间有中苏两党之间认识上的矛盾，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也有斯大林对他和他坚持的革命道路的怀疑，亦即斯大林和他关系的矛盾；从更深的层次上看，甚至还牵连到历史上沙俄侵略中国遗留下的不平等条约，大国沙文主义和新中国之间的矛盾。那么，这么多的矛盾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该怎么处理呢？毛泽东毫不慌乱。他安然地住在斯大林的近郊别墅里，只是当着表面谦恭、背后告状的柯瓦廖夫毫不客气地发了一阵脾气，问了一句“我毛泽东来莫斯科就是为给你斯大林祝寿吗？”斯大林闻讯后反躬自问，主动拜会毛泽东，送上了柯瓦廖夫的报告，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同意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由于毛泽东抓住了他和斯大林关系的这个“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主要矛盾，所以“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这样处理，是出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正确认识。他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他的缺点、错误，只要“顶一顶”，他还是知错改错的。这样，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在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又向前发展了一步，毛泽东说的那种“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正在逐步地形成。

为了戳穿西方资产阶级造谣诬蔑，说明中苏关系形成的情况，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公开回答了塔斯社记者的提问。

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势如何？

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

问：毛泽东先生，你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

问：你所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毛泽东的谈话使西方资产阶级的谣言不攻自破了。

在此期间，有人曾建议毛泽东同斯大林谈谈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问题。毛泽东摇摇头说，这样不好，人家的问题让人家自己去讲，我们的手不要伸得大长了，更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是的，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有过错误，可是，人家承认了，不仅这次有过“内疚”的表示，上次和刘少奇会谈时，也曾表示：由于不了解情况，曾经给你们（中国）出了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干扰了你们。斯大林实际上承认了错误，他的话是对我们的道歉。我们不能揪住不放，更不能以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

毛泽东强调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我们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么，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么？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

毛泽东的话使听者心悦诚服。

斯大林让步了，同意整个文件。毛泽东却说：“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整个文件，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

毛泽东按照他和斯大林商定的安排，准备到列宁格勒等地去参观。他有个习惯，参观一个地方之前，总是要先找点材料看看，要对那个地方作个概括的了解。因为他认为人的认识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接触外界事物，属于感觉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并且符合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参观、访问，时间较短，不可能全面地、深入地去接触那些事物，因而，先看点材料，了解个概况，借助于别人的认识进行参观、访问，可以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1950年1月2日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具体商谈了周恩来的来苏日期及签订条约的时间。莫洛托夫问，新中国才成立，周恩来日理万机，能很快来吗？毛泽东笑着说，这没有问题，会如期到的。

在此之前，斯大林曾多次表示愿与毛泽东会谈并签订条约，毛泽东却坚

持要周恩来赴苏出面与苏方谈判、签约。毛泽东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比自己更合适，更在行，周恩来是卓越的外交家。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有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生于江苏淮安。1913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至1924年先后赴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1924年秋回国，先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1926年冬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8月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后，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遵义会议后，当选为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周恩来是出类拔萃的外交家，是谈判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能手。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团结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8月，周和毛一起参加重庆谈判。1946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多次对人夸赞过周恩来。他说：“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把强将高手用在新中国首次大型外交活动的第一线，是毛泽东再三坚持要周恩来出面对苏谈判的首要原因。毛泽东认为：一个领导者不可能样样精通，行行都行，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于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现在，他不但出好了主意，而且和斯大林已口头约定了原则，下边，“必须善于使用干部”，不能自己包办，应放手让周恩来这位“比我强”的外交家去谈判、签约。

其次，毛泽东强调做事要“留有余地”，不赞成一下子顶到头，搞“最高级”谈判。他知道斯大林对他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有怀疑，有看法，而斯大林有时又比较“粗暴”、“武断”，自己直接出面和斯大林作具体条约的谈判，如果在某些问题上谈不拢或谈崩，别人就只好收拾，没有回旋的余地。而让周恩来和苏方的政府领导人谈判，即使发生某些分歧和争议，他和斯大林可以从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协调、斡旋，妥善处理。

第三，“要对口”，要合法，“要好看”。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哲学家，好进行高度的概括，往往把十分复杂的事物，概括得十分简明扼要，具体形象，一目了然。这次要搞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就属于这种高度概括、具体形象的典型事例。难怪斯大林始终理解不了。其实，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拟、签订之后，人们便会恍然大悟：哈，这不就是那个“既好吃、又好看伪东西吗？”“既好吃”，就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有使新中国在

世界上健康成长不受侵犯的作用：“又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中国和苏联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了同盟，互助友好，反对侵略，促进世界和平，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为此，条约的谈判和签订，都应该是对口的，合乎国际法律和惯例的。所以，当斯大林作了让步，同意签订个文件，并且建议说由他和毛泽东签字时，毛泽东还不答应。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你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文件，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斯大林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就这样，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毛泽东泰然自若地到列宁格勒等地去参观游览，调查研究，了解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情况。

列宁格勒，原名圣彼得堡，曾是沙皇俄国的首都。1917年10月，“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宣告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宣告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纪元的开始。时过32年，中国革命宣告胜利，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里又夺得了政权。1950年10月15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领袖的资格，乘火车来到列宁格勒，受到了当地领导人和群众的隆重迎接。当地领导人原计划安排毛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毛泽东神采飞扬，游兴正浓，要直接乘车去波罗的海参观。

当地领导人十分尊重毛泽东，按照毛的愿望，汽车直奔波罗的海芬兰湾。

天寒地冻，一片白银世界。大海和陆地都被白雪厚冰连在一起，白茫茫的，分不出水陆的界限了。

毛泽东喜欢宽阔的海洋，更喜欢银白的雪原。他乘坐汽车在那一望无垠的海面冰层上奔驰了一个多小时，毫无倦意，不时的向当地的陪同人员询问各种景观。当远远地看见那雄伟的喀琅施达特要塞的时候，他走下汽车，在冰层上漫步，举目眺望，激情满怀他说：“革命使江山更雄伟！这里真是千里冰封啊！”

喀琅施达特要塞，是苏联十月革命时工人们和士兵们暴动的要地，在历史上立下了不朽的业绩！苏联同志介绍说：“此刻，我们正站在波罗的海海面的冰层上，冰下面就是海水，冰层的厚度约1米至1米5。”

毛泽东望着那广袤无垠的冰原，高兴他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一大西洋的东岸，然后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

陪同的中苏两国人员，都为毛泽东的豪情诗意和宽广胸怀所感动，禁不住欢呼、鼓掌！

在列宁格勒，毛泽东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参观了冬宫展厅及沙皇的寝室、办公室、休息室、藏书等。苏联同志说：本来还有一间中国厅，但因内部整修，不能参观。

毛泽东对帝国主义侵华很反感，一听此话，即对身边的师哲说：“其实是不便对我们开放，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因为沙俄盗窃中国的东西太多了！”

毛泽东特地参观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赞赏那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革命壮举。参观了苏德战争中苏军保卫列宁格勒的防御工事。晚上，又到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列别杰娃主演的芭蕾舞《巴亚捷尔卡》。演出相当精彩。结束后，毛泽东派王稼祥、陈伯达等代表团成员登台给列别杰娃献了花篮。此时，台上台下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响成一片。列别杰娃谢幕达五六次，观众仍不散场。列别杰娃意识到这是观众对于中国人民的友谊，是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爱，也是对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敬慕，于是，她改变一般的敬

礼谢幕为向毛泽东鼓掌，用手送吻好几次，得到了群众的欢呼！

斯大林对毛泽东歉然一笑，点头说：“对，是同志，应该称同志。从现在开始，都改称同志。”并率先垂范……

“人贵有自知之明。”

一个人，特别是领导人和领袖人物，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要真正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恰当地发挥自己的特长而不过限，机智地用人之长补己之短，做到自强而不自大，自尊而不自专，自爱而不自私，坚定而不固执，勇敢而不鲁莽，沉着而不寡断，机警而不多疑是很不易的。

毛泽东在早期、中期，颇有自知之明，多次批评、拒绝别人企图把他说成“全才”、“天才”、“超人”、“神人”的尝试，反对为他“祝寿”、“颂功”，并不许自己的妻子儿女以自己的名义外出活动。

毛泽东信任周恩来。估计周恩来快到了，他就返回莫斯科，次日，周恩来从辛比尔斯克打来电话，因传音不良，听不清楚，他约定周恩来到了乌拉尔山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再通话。

这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还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这样，周恩来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即可开展工作。

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苏联方面在莫斯科车站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周恩来面带微笑和苏联的领导人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他那从容大方的举止，巧妙含蓄的语言，气宇不凡的外交家风度，赢得了苏方人士的钦佩与赞扬。周恩来在车站发表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

这是十年后周恩来的再次赴苏。上一次是在1939年6月，周恩来因骑马摔伤，从延安到苏联来治病，在莫斯科住了八个多月。现在，他是以新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出现在莫斯科车站的。同车到达的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国家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工业部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以及赖亚力、何谦、沈鸿、苏农官、欧阳钦等。周恩来一到就来见毛泽东，商量如何开展工作等事。过了一天，周恩来从较远的别墅搬来，住在毛泽东楼上的一间房子里，这样，便于及时与毛泽东商量问题。

周恩来不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一到莫斯科，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一方面到克里姆林宫谈判条约；一方面指导李富春率领的那一批人进行工作，还要及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

这时候，斯大林又打来电话，询问毛泽东对下一步会谈的意见。

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谈吗？！”

生性多疑的斯大林，这时更加谨慎小心。他派人把师哲叫到他的办公室，要师哲把他的的话重新翻译给毛泽东，再了解一下毛泽东的打算和愿望。毛泽东笑着说，他只是要周恩来出面谈判，别无他意。师哲把毛泽东的话翻译给了斯大林。

斯大林哈哈大笑。是的，他对这位中国领袖的知人善任、放手用人表示

赞赏；对于毛泽东的性格、气派和作风，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按照毛泽东和斯大林商定的安排，1950年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会谈，莫洛托夫、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师哲任翻译。

会谈开始前，照例由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向毛泽东祝酒，向周恩来祝酒，向大家祝酒。

之后，斯大林又破例地举起酒杯，再一次向毛泽东、周恩来祝酒，表示欢迎毛泽东、周恩来到苏联来，希望大家同心协力为中苏友谊而努力，为中苏友谊而干杯！

斯大林喝了两杯他的特制酒，精神焕发，神采飞扬。他说他和毛泽东先生过去没有见过面，这次一见如故，谈得很好。又说他对中国革命问题很感兴趣，十分关心。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这是继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是无产阶级在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加重了世界天平上革命力量的法码，不仅值得庆贺，而且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值得学习。希望毛泽东先生能够多谈谈。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侃侃而谈。他认为斯大林说得很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的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伟大胜利，是苏联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他说他过去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形象的概括，是指革命的开始，实际上，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很不容易的。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探索过程。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人曾不顾中国的实际，照搬苏联的模式，几乎使中国革命走入了绝境。所以中国革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论述表示赞赏。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斯大林在提到毛泽东时，又一次在名字后边，加了“先生”二字。

师哲忍不住了。他译完斯大林的话之后，紧接着提了个问题。“斯大林同志，我有一个问题，想当面请教一下，可以吗？”

斯大林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泰然自若地笑着，点点头说：“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师哲谦和地笑着说：“斯大林同志，我们中国的同志非常尊重您和苏联领导人，一直称您和苏联领导人为‘同志’。可我不知道，您为什么称毛泽东同志为‘先生’呢？”

斯大林一下子怔住了。问题提得这样尖锐，这样明确，这样直截了当而没有回旋的余地。而且，这是当着毛泽东的面、当着中苏两国许多领导人的面当场提出来的，沉着老练的斯大林，一时也显得有点窘迫。

在场的人都有点紧张：几十年了，谁敢向斯大林这样“将军”呀！

苏联领导人都注视着毛泽东。

毛泽东吸着烟，微笑着，泰然自若，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聪明、机敏的斯大林，向四周扫了一眼，看了看毛泽东，又看了看师哲，立刻笑了。这次会见后的多次交谈，使双方都增进了了解，自己怎么能继续

无端地怀疑同志呢？！只见他的眼睛一亮，很快扫去一刹那间那紧张的窘态，对毛泽东歉然一笑，认真地点头说：“对，是同志，是同志！”

接着，斯大林转过身来，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苏共领导人说：“对，是同志，应该称同志，从现在开始，马上改称同志。”

说着，斯大林又转过身来，率先垂范，对毛泽东笑着说：“毛泽东同志，我们继续谈吧……”

会谈的气氛更活跃了，更融洽了。

会谈中这段小小的插曲，不但证明了周恩来对斯大林的论断：斯大林的“怀疑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斯大林还是讲道理的”，而且也证明了斯大林确实怀疑过毛泽东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害怕工人”，是不是真正的“同志”。同时说明斯大林曾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注释：

见 1950 年 1 月 3 日《人民日报》。

参阅廖盖隆主编的《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3 年第 341—342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02 页。

二二 苏美对抗，斯大林笑谈蒋介石 义正词严，毛泽东怒斥卖国贼

斯大林说：“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除伯达得意忘形，喧宾夺主。毛泽东严厉斥责。

存在决定意识。

人们的思想、观念、理论、意见，都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领袖人物也是一样如此。

毛泽东和斯大林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他们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往往存在差异。斯大林总想用“苏联模式”、“切身经验”来套中国革命。他下明白“苏联的十月革命，是在彼得格勒、巴库等中心城市，通过工人罢工、武装起义等革命取得胜利的，而中国为什么不这样干？他更下明白：“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而毛泽东为什么非坚持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可？！这难道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这些问题、怀疑、忧虑，不便直言。因此，在莫斯科会谈中，斯大林拐弯抹角地提了许多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两个人正谈到兴头上，斯大林突然问：“毛泽东同志，我真不明白，在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失去了对上海的防守能力时，你们为什么不马上夺取上海呢？”

被问了几次后，毛泽东深深感到，必须系统地向斯大林说明：各国各有各的情况，各党有各党的实际。在中国，有人照搬苏联的模式，大搞“城市中心”论，“大干”工人暴动，结果，因为脱离中国实际，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只有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于是，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理顺了思路，准备从和蒋介石的斗争谈起，阐明这个道理，以便进一步和斯大林统一认识。

当时，毛在毛的秘书陈伯达也参加了会谈。他坐在毛泽东的身边，边听边记，态度谦恭。可是，当毛泽东谈到蒋介石时，斯大林忽然眼睛一亮，朝陈伯达说话了。“哦，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

一直坐在一旁静听的陈伯达，听到斯大林提及他的著作，受宠若惊，非常高兴，马上活跃起来。他曾在苏联学习过，懂得俄语，因而，未等师哲把斯大林的话译成汉语，他先高兴得大笑起来，并向斯大林连连点头。

真是喧宾夺主！

斯大林立刻把注意力从毛泽东转向陈伯达，他笑着说：“你的书里头所讲的宋美龄和小罗斯福的故事，很有趣，很有趣！”

其实，那不是陈伯达自己的创作，而是他引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子——小罗斯福的一段回忆：“我……代父亲出席蒋氏夫妇的鸡尾酒会。他们的别墅离我们的住所约一二里远，当我走进门的时候，我发现丘吉尔的女儿撒拉正和我扮演同样的角色，可是我没有机会和她谈话；蒋夫人走到我身边，毫不停留地把我带到两张并排放着的椅子上坐下。我觉得她像一位颇为老练的演员。差不多有半小时之久，她生动地、风趣地、热心地谈着……她把身子靠向前来，闪耀着光彩的眼睛凝视着我，同意我说的每一句话，她的子轻轻地放在我的膝盖上……我相信蒋夫人多少年来始终是以一种征服人的魅力与假装对她的谈话对方发生兴趣的方式来应付人们——尤其是男人。”

斯大林的记忆力特别强。由于他对小罗斯福的这段故事感兴趣，读过很

久之后，在和毛泽东会谈中，居然能对大家重述一遍。

然而，这么一来，作为政治秘书的陈伯达，一时间竟成了谈论的中心——一把主席毛泽东摞在了一边。

毛泽东下悦地瞪了陈伯达一眼。

斯大林谈兴正浓，眉飞色舞，越说越高兴，居然拿起酒杯，站起身来，走到陈伯达面前，举杯祝酒：“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

陈伯达受宠若惊，得意忘形，高兴得连他平日说话的那种结巴劲儿也没有了，急忙举起酒杯，向斯大林点点头，说：“力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

陈伯达为人乖巧，善于伪装，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装得十分谦恭、老实、不争名利，连他给毛泽东起草的文稿，也是用后销毁，从不保存，并且遇人问及，都说那些思想、文章全是毛泽东的，以此邀宠。然而今天，在斯大林面前，他受宠若惊，忘乎所以，根本把坐在身边的毛泽东忘了，自己和斯大林谈史论哲，举杯对饮起来。

面对会谈中的这种反常现象，毛泽东心急如焚，怒火中烧，但在斯大林面前又不好发作，只好坐在一边，不动声色，看着自己的秘书陈伯达在这关系重大的最高级会谈中大出风头，喧宾夺主。

深夜，会谈结束了。毛泽东设想的会谈计划，由于陈伯达的干扰、耽误，没有全部完成。毛泽东对此感到惋惜和愤怒。

大出风头的陈伯达，回到卧室，仍然兴高采烈，取来了酒，自斟自饮，回味着和斯大林祝酒的幸福。然而，随着敲门声，进来个人，给他送来了毛泽东的通知：“下次会谈，你不要参加了！”

陈伯达像当头挨了一闷棍，当时头昏眼花，跌倒在了床上。

过了几天，毛泽东要起草文件，叫陈伯达，却不见人。

机要秘书叶子尤报告毛泽东，说：“他搬走了！”“搬到哪里去了？”“搬到大使馆去了。”“他为什么搬走？他到大使馆去干什么尸毛泽东余怒未息，问了两句，又克制感情，平静他说：“他是我的秘书，他的工作在这边呀！他搬走，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毛泽东说罢，停了停，又叮咛叶子龙，通知大使馆：陈伯达必须立即搬回来。

无可奈何，陈伯达只得灰溜溜地搬了回来。他向毛泽东解释说，他的儿子陈晓达在苏联学习，十六岁了，多年不见，想在大使馆跟儿子一起住几天……

毛泽东仍继续追问：“你为什么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搬走？你的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你还有没有组织观念！”

面对毛泽东那温怒的表情，耳听毛泽东那严厉的批评，陈伯达知道事态严重，再下回头，后果不堪设想，慌忙低头认错，当场向毛泽东赔下是，作检查，表示永不再犯。

毛泽东有个特点：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无论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他就要设法“给出路”，给机会。现在，他见陈伯达认真地作了检查，就仍把他留在身边工作。谁知过了没几天，又发生了《红罂粟》风波。

据苏方翻译费德林写的《历史的篇章——夜间会谈》一文介绍，毛泽东到莫斯科后，苏联的文化主管部门热情地为中国友人安排了一些文艺节目演

出，其中的首场演出，就是大剧院上演的苏联芭蕾舞的骄傲——舞剧《红罂粟》。剧情与中国的生活有关，至少该剧的作者和导演是这么认为的。为了加深印象，《红罂粟》的乐曲作者格里爱尔应邀亲自参加演出。

尽管大家都希望毛泽东能来观看演出，但他没能到大剧院来。前来观看演出的几位中国朋友，“由著名思想家陈伯达率领”，坐在贵宾席上。演出开始前，陈伯达对演出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演出中，不断向费德林提出各种问题，有时是相当微妙的问题。

费德林对此作了具体的叙述，写道：演出中间，陈伯达突然发问：“请问，这个怪物是于什么的？”他所问的剧中角色是上海夜总会里的一个妓女的情夫。

我尽量作了解释，但他一直不说话。

“难道这个怪物是中国人吗？其余这些也是中国人吗？你们是这样认识中国人，这样描绘中国人吗？似乎你们感到开心，是吗？”

我不得不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看法。外国人很难扮演中国人，所以不得不化妆。

“难道仅仅在于化妆吗？请看，他是个什么样子，是如何表演的，简直是面目狰狞而可怕……”陈伯达激动地说。

剧情越发展，陈伯达的问题和疑团越多。他在演到中场时，竟提出想离开大剧院。

我不想详细地描述，为了使中国客人不退场，正如外交官们所说的避免丑闻，我们作了多么大的努力。演出结束后，我们应邀来到大剧院经理办公室，在那里为招待中国贵宾已摆好了酒菜。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只是加深了本来就令人尴尬的局面。富丽堂皇的家具——镀金桌子和丝绒安乐椅、周到的服务、主人的殷勤，这一切看来都没有使陈伯达及其陪同人员产生丝毫兴趣。

不言而喻，主人期待着中国客人说几句恭维话和赞扬的话，因为他们专门为中国人安排了《红罂粟》的演出。但是，中国人却令人不可捉摸地沉默着。于是，我以陪同人员身分请陈伯达谈谈观感。

“请原谅，”陈伯达说，“《红罂粟》这个芭蕾舞剧的名称本身就使我们有些不快。原因在于，我们中国人认为罂粟这种植物就是鸦片。也许你们不知道，鸦片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因为它曾毒害了我们好几代人……请原谅，我并不是想责怪你们……”

中国朋友自此以后再也不愿去欣赏莫斯科那些戏剧艺术的杰作了。

作为当事人，费德林的叙述和陈伯达的回忆大体相同。陈伯达说，他去看芭蕾舞剧《红罂粟》，是经毛泽东同意后才去的。他过去在苏联读过书，可是从来没有看过芭蕾舞。进剧场后，看到女演员足尖，以为仿中国女人的小足，心里已觉不快。看下来，中国革命完全是由苏联一些船员领导，而发展，而胜利。剧本写的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事，剧情却不像中国革命中所发生过的。因此，在剧场中，他一直纳闷，没有鼓掌。剧场指挥者在剧终后询问意见，他坦率他说，以一个亲身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来看，他觉得剧情不真实。

这次看戏，就这样不欢而散。

陈伯达说，实际上，那回要他去看这个剧，不过是先试一试中国人的态度，是请毛泽东去看戏之前做的一种准备。随后，苏联人还是要请毛泽东去看《红罂粟》。

毛泽东听了陈伯达、师哲的汇报，知道了剧情，同意他们的态度，就没去看戏。

“《红罌粟》事件”，当时曾在莫斯科掀起了一阵风波，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猜测。但毛泽东不管这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严格地按照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办事，绝不委屈求全，看别人的眼色办事。

毛泽东说：“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又谈起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的问题。斯大林表示坚决支持。

蒋介石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个具有决定性因素的人物，也曾到过苏联，在莫斯科会谈中，毛泽东和斯大林曾多次谈到蒋介石。

蒋介石是中国的大独裁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的国民政府，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主席等职，控制了党政军大权，对内实行独裁专制，对外投靠帝国主义，造成内战连绵，外敌入侵，政治黑暗，经济萎缩，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俚无数事实说明，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历史舞台上，在一系列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只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国民政府相抗衡，才能够打败蒋介石，制止蒋介石卖国害民的罪恶勾当，才能够维护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必然要向人民进攻，镇压和屠杀人民。我们必须唤起人民，使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毛泽东说：“1927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

毛泽东说：“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要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毛泽东特别指出：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是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经验。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没有这个调查研究，烈士的鲜血就白流了。看见蒋介石手里拿的刀，要杀人民。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动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这就有办法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这样办。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取消了他的发言权。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蒋介石再来屠杀人民，人民就拿起刀枪和他斗，结果，气势汹汹的蒋介石，连续纠集了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大军，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大围剿”，都被人民打败了。

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实事求是，令人深思，实际上含蓄地批评了斯大林对蒋介石的错误方针。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毛泽东和蒋介石是两个重要的对手，重要的人物。

他们 50 多年的反复斗争、生死较量既是两种主义之争，也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集中体现，是人类历史上最激烈、最生动的一幕活剧。它不仅为苏联领袖斯大林十分关注，而且也力美国总统杜鲁门时刻萦怀。

1949 年 12 月 6 日，当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带着胜利的微笑，登上北去的专列，奔向莫斯科去与斯大林会晤的时候，蒋介石正愁云罩眼，仰天长叹，怨天尤人！这时候，他的首都南京，早已被人民解放军占领。那支英勇的人民军队，高唱着毛泽东那“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战歌，穷追猛打，使蒋家王朝的残部土崩瓦解，树倒猢猻散。11 月 14 日，年逾花甲的蒋介石，不顾“引迟”之诺，厚着面皮，飞抵重庆，部署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保卫战。但到 29 日，解放军已逼进重庆，蒋介石又慌忙飞往成都。12 月 10 日——当毛泽东乘上苏联领导人给他特用的专列胜利奔向莫斯科的时候，蒋介石眼看大势已去，哭丧着脸，登上飞机，由成都飞往台湾。从此，蒋介石永远离开了大陆，在那个海岛上度过了他的晚年。

毛泽东虽出国访问，却运用电波指挥解放军在 12 月 27 日胜利结束了进军西南作战，在成都战役中，全歼胡宗南集团。接着，又挺进滇南、西昌，肃清西南残敌；又向西北进军，解放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强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解放东山岛，解放舟山群岛。至此，大陆上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基本上被肃清了。

其实，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就选中台湾作为他“反共复兴”的基地，企图与毛泽东继续较量。为此，他首先召见他的嫡系俞鸿钧、席德懋两人，令其将国库 3.7 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往台湾；同时将中央、中国银行在美国的存款，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便以后提取。其后，他又任命他最宠信的草包司令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司令，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主任。任命爱将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任命长子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其目的都是为蒋家小朝廷保留“一线生机”。后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作报告时说：“就算是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持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将不顾一切，毅然决然的下野。”

针对蒋介石经营东南沿海、确保台湾作为“反共复兴”基地的部署，毛泽东决定集中主力部队，先华东华南沿海，后西南西北内地，进行大纵深迂回的进军战略，首先攻占上海、青岛、福州等沿海港口城市，封闭海上通道，力求在大陆腹地消灭国民党的有生力量，为争取早日解放台湾做好准备。同时，要求尽快建立人民空军，争取海上制主权。为此，早在 1949 年 7 月他委托刘少奇访苏同斯大林晤谈时，就通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告诉斯大林，根据作战计划 1950 年占领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7 月 26 日，刘少奇收到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给他的电报，要他向斯大林提出购买 200 架飞机以建立空军。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之后，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此后，中共中央军委组建空军的计划进入实施阶段，具体工作由刘亚楼负责。如今，毛泽东谈起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的问题，斯大林表示坚决支持。

毛泽东强调指出：“美国帝国主义经由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殖民地统治很快就要灭亡了，因此它急欲直接攫取中国的一块领土——台湾，作为将来对中国大陆发动侵略战争的跳板。”“中国人民一定

要解放台湾，一定要解放全中国！”

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会谈中、特别分析了亚洲和远东的局势。

毛泽东说，蒋介石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是真正的卖国贼，卖国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引狼入室，屠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又勾结日本战犯和美国帝国主义，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我们对此作过坚决的斗争。

事实十分清楚。1949年1月28日，毛泽东就严正指出：又据南京中央社26日上海电称：“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26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16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无罪，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等情。据此，中共发言人表示下列诸点：“1、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区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许你们这样做。我们有权命令你们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其他日本战争罪犯，暂由你们管押，听候处理，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仍然坚持卖国求荣政策，一意孤行，竟将日本侵华战犯遣回日本。为此，194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国民党卖国政府将日本侵华战犯遣回日本的声明》，严正指出：1949年1月31日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的中央广播电台宣布：“1月31日东京讯：据确息：最近在我国军事法庭开释而为中共要求引渡的冈村宁次，已在返日途中。”同日，该政府的中央社东京英文电称：“业经中国法庭判罪的260名日本战争罪犯，订于2月4日乘遣俘轮船抵达横滨，并在巢鸭监狱执行徒刑。中国代表团沈副团长称，日本战犯的移交日本，是中国政府应日本遣俘当局及战犯家属的请求而采取的措施。”此项消息，于本月2日复由国民党卖国政府伪国防部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予以证实。另据法新社东京1月31日电称：麦克阿瑟总部法律组组长卡尔潘特上校承认：将日本战犯自中国移交给美国方面的决定系由麦克阿瑟将军本人所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中国国民党卖国政府和美国麦克阿瑟总部在关于冈村宁次及其他260名日本侵略战犯问题上所采取的旨在保护日本侵华势力再起的悖谬行动，是完全违反中国人民意志和中国人民所不能承认的。中国人民曾经不顾浩大牺牲，向日本侵略军队作战八年之久，对于应对日本侵略军队各种严重罪行负主要责任的冈村宁次及其他260名战犯，决不能听任事实上已不能行使职权的中国国民党卖国政府和无权过问此项问题的麦克阿瑟总部狼狈为奸，纵其逃逸。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声明：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应即将冈村宁次及其他日本战犯追回移交于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起主要作用者和在现时中国国防上负实际责任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如果此项要求未获实现，则中国人民解放军保留对于追回冈村宁次予以重行审判，并追回被移交日本的其他 260 名日本侵华战犯的完全的权利。此外，对于被麦克阿瑟总部擅自释放的日本侵华罪魁前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前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前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安藤利吉，前日本驻上海海军特务机关长儿玉誉志夫，前日本驻南京伪政府大使谷正之，前日本企划院总裁、大东亚省大臣及南京伪政府最高经济顾问青木一男，前日本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鲇川义介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样保留要求重行审判的权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及不顾对日战争状态尚未结束而积极扶助日本侵华势力再起的行爲，乃是对于远东和平的威胁。只有从各方面努力制止美国政府的这些反动措施，才是符合于中国、美国、日本三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1949 年 3 月 15 日，新华社时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一文中指出：“美国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省的活动。”美国的合众社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向杜鲁门建议：“必须以一切代价在台湾和海南岛建设防务”。自此以后，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台湾的活动，即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特务等各种形式更加加紧地进行。美国经济合作署在台湾的侵略计划已经扩大；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于本月初到达台湾，“巡视”高雄、基隆等海空军侵华基地；美国驻日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最近经过台湾省汉好美国奴才廖文毅之流发出了所谓要求“台湾独立”的狂吠；麦克阿瑟公然发出“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台湾仍属于盟军总部”的荒谬声明。时评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这一切阴谋活动的目的，就是妄图吞并台湾。美帝国主义经由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殖民地统治很快就要灭亡了，因此它急欲直接攫取中国的一块领土——台湾作为将来对中国大陆发动侵略战争的跳板。与此同时，以蒋介石力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梦想托庇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军事保护下，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

毛泽东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打算像日本在 1895 年那样来强占台湾，不过是在做梦。今天的中国，不是 54 年前的中国了。今天的台湾人民也不是 54 年前的台湾人民了。为了抗议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1947 年 1 月 9 日，台北万余学生举行过雄壮的游行示威，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去！”为了反对美国傀儡国民党的暴政，两年以前台省人民曾进行了“二·二八”运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台湾的武装起义。台湾人民的这种斗争和中国其他各省人民求解放斗争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奴役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所谓“台湾独立运动”，乃是对于台湾人民的绝端侮辱。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会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犯，同样地亦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观点，同意强调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再起，维护新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并主张将此写入中苏条约。因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

条约》的第一条写道：

“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的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

注释：

参阅叶永烈：《陈伯达其人》，载《南方周末》1991年4月5日第二版。

〔苏〕尼·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7月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26—1127页。

《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93—1394页。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卖国政府将日本侵华战犯遣回日本的声明》，载《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社编1949年7月版第79—8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册第75页。

二三 运筹帷幄，毛泽东决胜万里外 商谈条约，斯大林尊重毛泽东

运筹帷幄，决胜于万里之外。毛泽东会谈余暇，给林彪复电：同意四野关于演海作战的建议，准备相机夺取海南岛。

白雪铺地，寒风刺骨。

莫斯科的冬天和北京的冬天不一样，据说能把人的耳朵冻掉，脚手冻僵。但毛泽东住的孔策沃别墅里，却是暖融融的，不冷不热，温馨宜人。

毛泽东到莫斯科后，斯大林特别重视，请他住在当时苏联最好的住处之一——孔策沃自己的别墅里，并且叮嘱有关方面一切从优，热情接待，让毛泽东他们生活得舒适、愉快。然而，在豪华宽敞的房间里，在柔软舒适的沙发床上，毛泽东仍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觉得他到莫斯科以来，斯大林对他是热情的、尊重的、友好的，尽量想听取他的意见，满足他的愿望和要求，然而，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他不想求人，更不愿向人乞讨，靠别人的施舍生活。他一贯主张自力更生，希望有外援，但要把基点放在自己的力量上，依靠人民群众，建设美好的独立富强的国家。因此，在晤谈中，斯大林再三问他有什么想法和愿望，要办什么事情，他都没有提要求，只是说应该搞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

这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是什么呢？人们作着各种猜测。毛泽东当时没有明言，也不便明言，但他认为，凡是研究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凡是了解中国革命斗争史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因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英勇斗争、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孜孜以求的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吗？1840年前后，英国帝国主义者，把毒品鸦片说成提神好吃的东西，大量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林则徐等禁烟销毒，要他们做正当买卖，他们不干，发动了鸦片战争，用军舰和大炮打开了清朝天国的大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八》。

洪秀全、冯云山等爱国英雄领导农民起义，经过艰苦战斗成立了太平天国，严禁鸦片，抵御外侮，实行土地“天下人”共有。然而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入侵天津，掀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直打到北京城，火烧圆明园，将园内一百多年汇集的金银财宝、珍贵文物劫掠一空，并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沙皇俄国也趁机掠夺，强迫清朝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掠去了中国的大片领土。

此后的近百年间，清王朝、袁世凯、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卖国政府，先后和英、美、法、俄、德、日、意、葡萄牙、西班牙等列强签订了一百多项条约、协定，差不多都是丧权辱国，给中华民族丢脸的东西。只有苏联十月革命后，由列宁斯大林派往中国的特使越飞和孙中山先生签订的《孙越宣言》，废除不平等条约，热诚帮助中国人民。这是第一个冠冕堂皇、人民实惠、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因此，孙中山先生在逝世前留的遗嘱中写道：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此刻，毛泽东住在了世界上第一个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国家首都莫斯科，又住在苏联领袖斯大林的别墅里，受到主人热情、友好、平等……甚至谦恭的接待，怎能不心潮翻滚，难以入睡呢？看起来，新中国的诞生，在外

部，有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支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是不成问题的，和斯大林的会谈有了良好的开端，以后等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到来再深入细谈；而在内部，防止黄炎培先生说的那种“周期律”，防止胜利后骄傲、腐化、堕落的斗争刚刚开始；而国民党蒋介石卖国集团，又在美帝国主义的庇护下，以台湾、海南岛作基地，妄图反攻大陆，我们又怎能不秣马厉兵、枕戈待旦呢？

毛泽东心潮翻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干脆起床，走到桌前，取来新收到的两份电报，审阅起来。

一份电报是刘少奇从北京发来的，说毛主席出国后，江青同志要到新解放区去看一看，请示该如何办？

毛泽东知道，江青爱出风头，特别爱以“毛泽东夫人”的名义出外张扬，影响不好。他听说7月间，他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会见斯大林时，苏方知道江青在苏联养病，也请她参加了第四次会见，并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及江青。

斯大林见中国同志都这么年轻能干，十分高兴，相互问好之后，招呼大家入席就座，并触景生情他说了一些诙谐有趣的话，使宴会上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但是，江青表现反常，态度拘谨，一言不发。师哲心里嘀咕：江青今天怎么啦？她过去爱出风头，好表现自己，今天怎么一反常态？后来他才知道：刘少奇事先给她打过招呼，让她不要多讲话。其实，江青对斯大林也十分敬佩，为了准备向斯大林祝酒的动作和祝酒词，她考虑再三，并和林莉等同志讨论了一整天。

演员出身的江青，准备好了动作和祝酒词，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见斯大林转了一圈，刚刚坐下，便胸有成竹、态度从容、潇洒大方地举起酒杯，走到斯大林跟前，热情而恭敬他说：“同志们！我请大家一起举杯，共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

江青那潇洒而大方的举止、简短明快而又颇具韵律的祝酒词，引起了全场人的注意。大家都抬起头来，望着毛泽东这位年轻漂亮的夫人。这时，江青又接着说：“请大家举起杯来，请大家同我一道为斯大林同志干杯！”

斯大林听了江青的祝酒词，禁不住开怀大笑。他和江青碰杯之后，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众人都高兴地碰杯，饮酒。

斯大林端着酒杯，走到中国同志的身边，笑着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就是你们的幸福！这恐怕大高抬了！”

刚才还为自己的表演沾沾自喜的江青，听到斯大林的后一句话，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红晕。

斯大林说罢，转过身去，走到宴会厅的另一角。过了一会儿，他又转回来，若有所思地带着一种沉思、伤感和含有隐情的口气说：

“我们（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时候，大家都异口同声他说：斯大林会健在！愿斯大林永远健康！

良好的祝愿，并没有使斯大林高兴起来。他举起酒杯，对中国同志说：“祝我永远健康的美词和良好的愿望，使人听了高兴！但事实上，人总是要死的，人总有一死！没有人能长生不老！”

“我这人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但别人却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很厌烦！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也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将移到中国和东亚。”

说着，斯大林放下酒杯，严肃地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国都应当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他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他们参考和吸收，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这个道理是明显的，正像中国难以像苏联那样在欧洲产生影响一样。

江青对于能给斯大林祝酒十分高兴，但毛泽东后来闻讯，却不高兴。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苏联养病的江青专程回国，要上天安门，毛泽东不让；接着，毛泽东访苏会见斯大林，江青又要去，毛泽东仍不允许。

现在，毛泽东出国访问刚十多天，江青又要到新解放区去看。是要去干什么呢？又是要以什么名义去呢？刘少奇发电请示，毛泽东也认为这不是个小问题，于是毛泽东拿起笔来给刘少奇复电并让转江青，表示同意江青去新解放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不仅如此，毛泽东的电报还说，如果少奇同志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要江青去和当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的“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同时还特别叮嘱江青：“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从毛泽东的这份电报中，不难看出，当时的毛泽东对自己的妻子江青，要求是多么严格呀！而这种要求，正是从加强人民民主专政、防止胜利冲昏头脑，防止腐化堕落，防止历史上“兴亡律”的再演出发的。

另一份电报，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发来的，说的是四野关于渡海作战相机夺取海南岛的建议，当时，毛泽东根据广西全省解放后，两广连成一片的实际情况，明确决策，给四野司令员林彪发去一封电报，同意四野关于渡海作战的建议。电文强调：“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既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万五千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的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

电报还指出，你们必须研究金门战役失利的教训，向粟裕调查了解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不可轻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四野以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三军共10万人组成渡海兵团，由第十五兵团司令邓华、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开赴雷州半岛，准备相机夺取海南岛。

海南岛是中国的第二大岛，它的面积仅次于台湾岛，约有3.2万平方公里。该岛与雷州半岛有20—50公里的琼州海峡相隔，而琼州海峡又是世界上流速最高的海峡之一。在国民党残部所控制的四个岛屿中，海南岛比金门与

舟山群岛距大陆都要远，加上流速高，从渡海攻岛的难度看，远比打金门、舟山更为困难。由于该岛还具有远东潜水艇基地的最高潜水价值，如果该岛为国民党控制，就可以在未来的“反攻大陆”的军事战争中作为跳板。作为人民解放军一方而言，能否打下海南岛，不仅关系扫清台湾外围屏障，夺取台湾的大问题，而且关系到新中国政局能否稳定的大问题。故而毛泽东特别关注四野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他在苏联访问期间还从莫斯科发电报，要林彪“争取于春夏两季解决海南岛问题”。电报特别告诫林彪，海南岛作战与主门作战有很大区别：“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差。只要一次能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

狗急跳墙，蒋介石利用日本战犯图谋反攻大陆。毛泽东再电四野渡海兵团，指示制胜原则，准备解放海南岛。

1949年，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年，也是蒋家王朝的覆灭年。随着毛泽东那魁伟的身影登上天安门城楼，蒋介石父子逃亡台北，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较量进入了新的阶段。

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期间，仍紧紧地掌握着中国革命的航舵。按照他的部署，中共中央在1949年12月31日发表的《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提出的1950年的战斗任务之一是：“解放台湾”，“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残余，完成中国统一的大业”。次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1950年的四大任务，其中首要任务就是：“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肃清中国境内的一切残余敌人，解放台湾”。2月4日，毛泽东致电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要求其加强对起义的国民党伞兵第3团的训练，并同意粟裕调4个师演习海战，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

这时候，落荒台湾的蒋介石父子，外则强敌压境，兵临隔水；内则腐化透顶，人心惶惶；靠山美国曾经但言：在美国不出兵的情况下，台湾将在1950年陷落。蒋介石痛心疾首，仰天长叹：“过去北洋军阀被打败是他们本身腐朽”，但在北伐以后，“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的军队如出一辙！”虽在1949年10月下旬金门岛的战斗中侥幸取胜，但失败主义的空气仍笼罩着整个台湾，连蒋介石本人也在圣诞节的日记中写道：“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

树倒猢猻散。曾经追随蒋介石多年的党国要员们纷纷逃往海外，另谋出路。蒋介石的大舅哥、中国最大富豪之一宋子文，已于1949年1月24日辞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职，偕夫人张乐怡转道香港、巴黎，抵达美国定居（1971年病逝于旧金山）。蒋介石的连襟、中国头号敛财专家孔祥熙也于1948年与蒋介石不告而别，偕夫人宋霭龄到美国纽约里弗代尔的乡间别墅，过起了流亡生活。孙中山的长子、前行政院长孙科挂官去职后，携家外逃，经香港、法国，定居于美国西海岸的一个小镇。眼下国民军腐败透顶，成分复杂，官多于兵，而且有许多从大陆裹挟来的农民、渔民、学生，成为未经整训的乌合之众，在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政治、军事攻势面前已成惊弓之鸟。

与陆军相比，台湾的海空军还有些实力。海军由蒋介石的嫡系桂永清控

制。约 3.5 万人，战舰 50 艘，但实际能发挥攻击能力的仅不过半数而已。空军为蒋介石的同乡同至柔掌握，约有官兵 8.5 万人，各型飞机 400 架，但真正能作战的也仅有半数。

上述兵力分散在南起海南岛、北至舟山群岛的万里海疆之上，战线大长，兵力分散，供给困难，防务松弛，士气低落。蒋介石虽然大肆宣传已在美国的支持下筑起了“万里海上长城”，但自己也心惊底虚，知道这是欺人之言。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想起了原日本侵华大将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在蒋介石的心目中，这些日本战犯都是些训练有素、才能出众、指挥有方、意志坚强，往往能够转败为胜的英雄；如果能把这些“英雄”请来台湾，帮助他蒋介石把这些乌合之众训练成反共的精锐之师，帮助他蒋介石实现反攻大陆的宏图大业，岂不妙哉！于是，蒋介石派人找来了原在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任职的曹士澄将军，要他到日本后设法召集日本正规官兵，并组织国际反共联盟，向共军进攻，同时想法促成日本军事顾问团到台湾助战。

曹士澄到日本后，立刻到医院去探视正在养病的冈村宁次，并传达了蒋介石的意图。冈村宁次知道，蒋总统是日本战犯的救命恩人。早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他冈村宁次是日本对华派遣军总司令，何应钦是盟军中国战区的陆军总司令，于 9 月 9 日在南京中央军校代表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受冈村投降。签字投降的第二天清晨，何应钦又召见冈村宁次。一见面，冈村说：“日本已经没有军队了，现在我们两国可以下受任何阻碍地携手合作。”何应钦说：“我们一同努力做吧！”这时说的：“合作”，就是一同对付与国民党争夺受降权的中共。原来，8 月 16 日，蒋介石曾电告冈村宁次，要他继续坚守岗位，并且负责维持秩序，把所有武器装备移交给重庆中央军，若遇到不法扰乱者，还可以作自卫反击。何应钦后来回忆说：“在蒋总统以德报怨的指示之下，中国曾经在短短几月内，大量动员国内仅有的交通工具，共遣返在华日本军民达 200 万以上。而为了减少他们回家后的生活困难，更允许每人携带行李 30 公斤。”

还有，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力主保留天皇制度；二次大战后的胜利国如菲律宾等要求日本赔款，蒋介石则以那将造成日本贫困而使共产党坐大，因此不要日本赔款；原来各国还打算以美国在北海道、英国在广岛、中国在名古屋等地划分军事势力范围，但蒋介石坚持不派兵，同时也要求其他各国不要派兵，以保持日本的领土完整，更有甚者，按照国际惯例，战败的国家应缴械，军官与士兵将被分别拘留，分别受战俘待遇，但国民党政府却不这样对待日本人。因此，冈村宁次很感激地对何应钦说：“我们打了败仗，但是中国派遣军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没有武装的军人”在八年中国战争中，日本军阀屠杀了数千万中国军民，公私财产损失上千亿，而作为日本派遣军最高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在蒋介石的庇护下，竟被判“无罪释放”，这怎能不使冈村等杀人魔王感恩呢？

由于对蒋介石的感恩，冈村宁次听了曹士澄的介绍，立刻表示赞同，并愿为蒋总统效力。7 月，冈村又收到国民政府驻东京代表送来的信，说拟将“江南地区的兵力及要人撤至台湾，以图重编。关于重整军力，希借日本旧军人同志之力”。

曹士澄与冈村宁次经过详细研商后，写成具体建议书，然后飞回台湾，当面呈给正在台南视察的蒋介石。又经过几次协商，蒋介石决定先聘请日本

将校若干人来台办理军事教育的训练工作，并给冈村写了亲笔信，拨了款。曹士澄带着蒋介石的信和钱，见了冈村。

冈村宁次十分高兴，很快找来旧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大将、旧第五军司令十川次郎中将、小笠原清中佐三人共商计谋，物色人选，筹备组织了一个“白团”。团长是前日本陆军驻广东第一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因为共产党是红的，所以团长就姓白，整个团就叫“白团”。

1949年10月的一天，白团第一批19名日籍军官在东京高轮一家小旅馆秘密签约，并听取曹士澄说明各种保密规定、行动暗号与联络方法。这19人共同结下的盟约内容力：“值此赤魔逐日风靡亚西亚大陆之际，当是尊重和平自由、坚信与××合作为要之××××同志奋起，共同保卫东亚，联合反共，更密切携手迈向防共之秋……”

结盟以后，他们化名、偷渡，分批密运到台湾。

第一批日本顾问团的工作，是对大陆到台的国军指挥阶级进行再训练，两个月一期，每期约百人。一年后，就有数百名国民党指挥官接受了日本战犯的训练。蒋介石对此极为重视，经常亲自视察，慰问白团军人，他说：“武器靠美援，士气靠日军重振。”后来参加“白团”工作的日军军官83名，从少佐至少将，多数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或日本海军大学，都是侵华日军的干将，都是杀害过不少中国人的日本战犯，因此，蒋介石重用他们也是十分机密的。

然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莫斯科会谈中，毛泽东谈起蒋介石卖国求荣、勾结日本战犯、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再来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时，义正词严，表示一定严惩这些民族的败类、和平的死敌！

斯大林也明确表示：一定要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再起！

毛泽东主张自力更生，主张实事求是，主张积极进攻，但不打无把握之仗，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再电四野渡海兵团，明确要求：“以运输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的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

四野渡海兵团认真研究了毛泽东的指示，认真训练，并与地方共同组织了“船工船只收管委员会”，征集到2000多只木帆船，动员了大批船工，并在木帆船上配备了较强的火力，加强练兵，提出了“把陆军相对地变为海军”、“敢于近战、夜战打敌兵舰”等口号，练出了新的威力，提高了运输能力，准备夺取海南岛。

1950年3月5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偷渡，并强行登陆，遭到了守岛薛岳部的猛烈反击。当时，岛上国民党军队有陆军5个军、海军1个舰队、空军4个大队，拥有舰船50艘，飞机约40架，共10万余人，组成了陆海空军“立体防线”。4月16日，四野渡海兵团8个团作为第一梯队，分乘数百只木船，强渡海峡，与敌舰发生遭遇战。在击沉一艘敌舰、击伤两艘敌舰后，17日凌晨船队大举登陆成功，23日攻占海口。其后，第二梯队顺利登岛，4月30日解放全岛。薛岳在22日急电蒋介石批准后，下令撤退台湾，7万余人逃脱，3万余人被歼。

海南岛战役的胜利，开创了人民解放军陆军乘木帆船大规模横渡海峡登陆作战的先例，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以海南岛作为“反攻大陆”跳板的梦幻，也粉碎了蒋介石利用日本战犯“反攻大陆”的图谋。这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运筹的一次胜利。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去管它。”

1950年春签订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的重点，是毛泽东说的“要搞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的法律体现，也是中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关注的大事。

斯大林起先没想到要签订一个条约，经过和毛泽东的几次会谈，他不但同意签订条约，而且建议“就由我和毛泽东同志签字”；毛泽东不肯自己出面，坚持要周恩来赴苏谈判，苏方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于1950年1月20日到达莫斯科后，很快就同苏方举行了实质性会谈。第一次会谈中苏条约的那天，克里姆林宫内气氛融洽，双方领导人平等友好地商谈了条约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会谈中，毛泽东首先发言，他分析了国际形势，特别是亚洲和东方的形势，认为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应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给东方，给亚洲，特别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东方的安全。所以，条约的内容，应是加强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方面的合作，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斯大林抽着烟，认真地听着。毛泽东刚讲完，他当即表示同意，并具体地谈了友好同盟条约、中长铁路、旅顺大连、贸易及贸易协定、借款、民航合作等问题。

毛泽东提议将中长铁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斯大林表示赞同，他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期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泽东同意前一种办法，同意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撤兵。

谈到大连问题时，斯大林表示，大连是中国内政，“可由中国自己处理”。关于中长铁路，因为中方缺乏管理经验，事先又无改变中苏共同经营的意思，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中方略多一点，即51：49和由中国同志担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然主张资本各占一半。并提出双方人员改力按期轮换，轮流担任正副局长。谈到这里，斯大林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公民进入中国东北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这是因为，二战后，美苏均注视中国，斯大林对美国人进入中国东北特别敏感。在1945年，斯大林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蒋经国谈判时，就曾提出过不许一个美国人进入东北，并将此作为援助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条件。现在，在中苏商谈新的友好同盟条约时，斯大林又将此事提了出来。但是，中共从未“亲美”过，也从未允许美国人进入东北，所以问题显得唐突，毛泽东有点反感，场面顿时冷落。

足智多谋的周恩来当即反问道：“第三国公民的涵义是什么？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被问得张口结舌，一时无言回答，忙取出他那特制的烟斗，点火吸烟，以掩饰短暂的尴尬，可是，一根火柴连划了三次也没有划着……

坐在一边的毛泽东笑了，他取出火柴，划燃了火，递给斯大林，才幽默他说：斯大林同志，新中国和旧中国根本不同了。美帝国主义在东北，早被我们打跑了那些靠侵略中国吃饭的所谓‘公民’，不用说，早溜走了，不存

在什么居留问题。”

斯大林接过毛泽东递来的火，点燃烟，深深吸了一口，解除了一时的尴尬，笑着说：“我不想干涉中国内政。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本意，是希望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现在，现在中国的同志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好了。”接着、双方谈起聘请苏联专家问题。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要开展各项建设，需要聘请大批苏联专家，但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如给予苏联专家高待遇，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由苏方审理，等等。

当然，斯大林的这些主张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沿袭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援助的惯例，不仅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也表现出一种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这正如列宁在批评斯大林时说的，那些“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斯大林这样做，是为了使俄罗斯人看到他在为他们的利益着想。但是，适得其反，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苏联人说：斯大林的大俄罗斯精神表现得比俄罗斯人还要强烈。斯大林的这种错误倾向，还表现在《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所以，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1954年第一次访华时，就主动提出取消所有的四个中苏合股公司。

在会谈中，还谈到了苏联在我国新疆边境贮存的大量武器移交中国问题，在东北设苏联领事馆，在海参威、赤塔、伯力等地设中国领事馆问题，及苏联侨民问题。十月革命后，许多白俄逃到中国东北，在那里办了许多企业，这时苏联决定将这些企业收归国有并统归秋林公司。会谈中，对上述问题都作了原则性的讨论，事后，由李富春带领的中方工作人员同苏联方面作具体研究，拟订各项协定。关于新疆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调赛福鼎随后到莫斯科，就是为了签订这些协定。

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是中方的主要发言人。毛泽东则在关键的地方插上几句有分量的话，使会谈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顺利进行。毛泽东特别强调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友好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重要性。他说，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长期而深重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给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强烈的反抗，使得袁世凯签了字的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无效。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又开始了日本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以蒋介石为总头子的大土豪、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他们撤去民族的界限，勾结帝国主义，说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因而命令东北军不许抵抗，把东北军从抗日前线调到西北“剿共”，派兵镇压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将领的抗日斗争。“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

斯大林特别注意毛泽东的观点和论述。毛泽东观点明确，毫不含糊，边叙边论，有理有据，语言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斯大林听着，禁不住微笑点头，低声称赞。

毛泽东可不是那种看别人脸色说话的人。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谈，镇静自若，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谈得更生动、更具体、更服人了。斯大林听着听着，又取出了他那烟斗、装满烟丝，燃火吸着。在不知不觉之中，他又被毛泽东的言谈吸引住了，征服了，忽然，他“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会谈的气氛更活跃更亲切了。

这次会谈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性问题很快地达成了协议。条约的具体内容和文字表述，主要由周恩来和莫洛托夫、米高扬谈判。会后，一位苏联人士感慨他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真是少有的领袖人物呀！”

当时，有人对斯大林在这次谈判中态度微妙变化感到迷惘，不知为什么谈到蒋介石卖国求荣时，斯大林显得不悦？后来，读了《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才了解了其中的奥妙。赫鲁晓夫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同蒋介石有过一些接触。尽管他和中国共产党有冲突，但他正在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因此，斯大林——因而也是苏联政府——认为蒋是进步力量。日本是我们东方的头号敌人，所以支持蒋符合苏联利益，”

在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战后，要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当时中苏两党、两国的共识，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认识是统一的、一致的。但是，对待蒋介石的看法上并不一致。如上所述，斯大林和苏共的一些领导人认为蒋介石一直是抗日的，是“进步力量”。而毛泽东和中共则认为以蒋介石为总头子的大土豪、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镇压人民的抗日斗争，“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

注释：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12 页。

参阅何仲山、李松林等著：《毛泽东与蒋介石——半个世纪的较量》，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第 235 页。

《一段肮脏的历史曝光——蒋介石重用日本战犯图谋反攻大陆》，载《参考消息》1995 年 11 月 24 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143—144 页。

二四 挑拨离间，艾奇逊无端造谣言 辟谣差异，斯大林惹恼毛泽东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演讲，大造谣言：“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斯大林毛泽东共议驳斥。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亲切会谈，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关系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严重不安。特别是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答记者问中透露的中苏正在商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更使一些帝国主义政治家惶惶不可终日，坐立不安。他们知道，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蓬勃发展，日趋强大；如今又和五亿人口的新中国携手结盟，将改变世界的格局，不仅使一向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不能为所欲为，推行强权政治，而且会使亚、非、拉美等地的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和人民迅速觉醒，群起抗争，这将敲响帝国主义的丧钟。因此，他们迫不及待地采用种种手段，破坏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演讲——《美国的亚洲政策》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他企图以谣言作武器，在中苏正在商谈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关键时刻，挑拨离间，破坏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

艾奇逊的讲演很长，谎言很多。为了骗人，他首先用谎言掩盖历史，用谎言掩盖美国侵略政策的事实，把自己打扮成亚洲人民、中国人民利益的“保护者”、“朋友”，然后，大造谣言，挑拨离间。艾奇逊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作，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艾奇逊的挑拨离间，首先引起了斯大林的不安和警惕。他派英洛托夫等人与毛泽东商议对策。1月17日，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到孔策沃别墅来看望毛泽东，谈起了新中国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边抽边说：我们这个国家，过去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过，解放后，我们必须打扫一番，加以整顿。等屋里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真正的朋友们可以早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作点清理工作，像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和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别的客人还得等等。我们知道，有些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仅想进来抓几把，甚至想把水搅浑，浑水摸鱼。我们就得警惕，不忙于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

莫洛托夫认为中国的作法十分正确。他说，这样，帝国主义就不敢轻视中国，对新中国就不得不刮目相看，说罢，他取出一份美国国务卿1月12日的讲话材料，交给毛泽东，并建议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份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无耻谰言。

毛泽东看了看艾奇逊的演说稿，表示义愤，当场同意了莫洛托夫的建议。送走客人之后，他就考虑如何驳斥艾奇逊的谰言，撰写文章。

1月19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文章写得简明扼要，犀利泼辣，有理有据，直劈要害，严厉驳斥了艾奇逊的谣言和离间阴谋。为了在约定的21日见报，文章连夜发回国内，叫有关部门按时发表。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常以某一方面负责人向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评论员发表文章的形式对某一事件表示态度，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月21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声明中指出：“艾奇逊冒充为中国的保护人。关于苏联及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说了许多荒谬的言论，他显然忘记了还有完全驳倒他的事实存在。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的利益，它的领土，它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

声明针对艾奇逊所说“苏联正在夺取中国北部的四个地区”的谣言，特别指出：“所谓‘外蒙古’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一直存在三十多年了（这件事实在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中，曾特别指出过）。这是常识。远在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中国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谈话》，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声明》，再加上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的《声明》，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的漫画：《互打嘴巴》，犹如一排排炮弹，一把把利剑，飞向华盛顿，驳得艾奇逊原形毕露，谎言揭穿，狼狽不堪。世界各国的许多报纸、电台，都纷纷发表电讯、评论，斥责艾奇逊大白天说梦话，无端造谣。有的还转载、摘发了中国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谈话》，说它“尖锐、泼辣”，“用事实驳斥谎言，入木三分”。

斯大林说：“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毛泽东被激怒了……宴会，舞会，不欢而散。

斯大林十分重视这件事。过了几天，斯大林邀集毛泽东、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晤谈，并特别说明，主人方面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客人只邀请毛主席和周总理，无须再邀请别人参加。翻译也只要师哲一人。

毛泽东不知什么事，届时应邀前往。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见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态度友好，但却没有往日那种热烈的气氛。

斯大林请客人入座后，首先说：“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在这个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我们先听听他的吧。”

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泽东当即回答：“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斯大林接着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答：“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说：“按照国际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

以；以个人身份(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接着说：“我们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明。但是，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机关，它代表不了政府；新闻总署署长对记者的谈话也代表不了官方的观点和意见。中国方面没有按照商定的那样去做，这就违背了我们的协议。这个做法没有获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中国方面是怎么考虑的，我们不清楚。但既然是我们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那就必须遵守，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今天也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

民族自尊心很强的毛泽东，听着莫洛托夫那虽然态度谦和却语气越来越重的谈话，心中不快。他的表情，由微笑而冷漠，由冷漠而轻蔑，到后来，几乎显得有些温怒了。

斯大林又接着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

说到这里，斯大林抬起头来，见毛泽东脸上露出温怒的表情，正在气呼呼的抽烟，大口大口地抽烟，也怕惹恼了这位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斯大林笑了笑，用更亲切、更友好的态度说：“毛泽东同志，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次的事情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了不起，但我们没有按照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

毛泽东只是大口大口的吸烟，一言不发。他的态度严肃而矜持。尽管斯大林在笑着，谈着，劝说，希望今后加强合作，但毛泽东的脸上有一丝笑容也没有，一点情面也不给，一个字也不吐。

周恩来作了一些解释，说中国这样做，是由于历史形成的。过去，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乃至对于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我党都用类似的方式进行评论、批驳，效果也是很好的。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毛泽东写的评论：《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也只用了“新华社编辑部”的名义，为什么批驳艾奇逊的谣言，就不能用这个方式呢？！

斯大林听着摇了摇头。

周恩来见解释无效，又见毛泽东态度依旧，毫不退让；他也表现得严肃认真，十分矜持。

毛泽东坐在一边，不反驳，也不解释。抽完了一支烟，又取出一支来，划火点燃，吸着沉思。他知道，莫洛托夫的发言，肯定是斯大林授意的，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不管怎么样都得讲出来，要中国党从此就范，当面认错，一切按斯大林的意思办事，“不再超越雷池一步”，这怎么能行呢？！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办事，有权采取具有自己特点的斗争方式。我们采纳苏联的建议，答应发表一项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谰言，我们不是已经按时发表了吗？并且辽让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也发表了声明。至于是用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还是用别的什么名义？难道都得按你苏联的模式来办、不能有任何变通吗？联系到1946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本来都

是平等的，独立的，应该自主的，可是，斯大林和苏共乃至苏联政府，往往以“老子党”、“老大哥”自居，不虚心听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意见，唯我独尊，唯我独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这怎么能行呢？

毛泽东深知：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美帝国主义是反共的，艾奇逊造谣诬蔑、挑拨离间，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他们抓住了苏共、苏联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或失误，大作文章，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对此，作为苏共、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同志，应该一方面组织力量，批驳帝国主义的无耻谰言，分清敌我；一方面检查、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分清是非，团结同志，继续前进，可是，现在不但不是这样，在我们积极协同苏共批驳艾奇逊的无耻谰言之后，你们不但没有认真克服自己的老大小国自居、大国自居，甚至有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缺点、错误，反而因为我们没有按照苏联的模式办事，就这样无理指责，无端责难，这是平等的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态度吗，这是尊重兄弟党、兄弟国家的主权吗？！毛泽东越想越深入，越想越生气。在这个事关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他绝不让步，绝不妥协。因而，不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怎么说，他都硬着头皮顶着，毫不让步。

斯大林见谈话得不到任何积极的效果，只好宣布谈话结束，并请毛泽东一行到他的别墅去赴宴。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短，不欢而散。

聪明过人的斯大林，觉察到自己的这一行动惹恼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很强的毛泽东，特地离开克里姆林宫，陪毛主席前往孔策沃斯大林的别墅。

毛泽东离开克里姆林宫，还是面色严峻，一言不发。

斯大林特地把毛泽东、周恩来都请到自己的专车上，让他们坐在平时只有斯大林才能落座的后排主位上，而斯大林和中方翻译师哲则坐在加座上。斯大林的屈尊俯就，殷勤招呼，试图使中国客人高兴。然而，“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车上，尽管大家身挨着身，肩靠着肩，离得很近，但是，谁也不说话，只有汽车马达的声音轻轻地传了进来。车里的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凝重。

为了打破那沉闷的局面，师哲先同斯大林闲聊了几句，然后问斯大林：“斯大林同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作客吗？”

斯大林当即回答：“我是说过这话，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师哲的话，也不是随便问的。因为毛泽东曾经表示要请斯大林到中国代表团来作客、赴宴，而且让有关人员准备好了厨帅、用具、佐料，甚至连具有中国风味的烤鸭、火锅、茅台酒等等，都准备好了。在这一僵持、双方沉默、气氛紧张的行车途中，师哲把这个可能缓和气氛，从而导致关系融洽的话题提出来，希望从此打开僵局。机智老练的政治家斯大林，立刻抓住良机，表示出更加积极的态度，说他不但说过这个话，而且，现在也有这样做的愿望。就是说，现在虽然有点小摩擦，我斯大林并不介意，还愿意到中国代表团住处来作客赴宴。

然而，火气未消的毛泽东仍不买帐！

斯大林的话还没有说完，聪明过人的毛泽东，虽不大懂得俄语，但他从斯大林和师哲对话的神态、语气中，已经猜出了意思。于是，他绷着脸，立刻问师哲：“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再到我们那里去做客。”

师哲当即承认：他和斯大林谈的正是这个问题，斯大林还想到我们的代表团住处去作客。

毛泽东断然地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不懂中文的斯大林，好像也听懂了毛泽东和师哲谈话的意思，急问师哲：“他说什么？”

富有经验的翻译家师哲，当时不好回答。他如果把毛泽东的话翻译给斯大林，必然会加深矛盾，引起冲突；不说吧，两个人都在当面，耳濡目染，不好掩饰。急中生智，师哲告诉斯大林：“是我们私人之间的话，没有什么。”

斯大林不知底里，不便再问。

沉默，沉默，还是沉默。

无声的沉默，有时比争吵还强烈。

沉默的汽车在前进。

沉默的车里，气氛沉重，马达轰鸣，沉重的像灌了铅。

一分钟，两分钟……汽车奔驰了30分钟，似乎长达了3小时。

汽车离别墅只有几里路了。斯大林亲自从车上给守卫人员发出信号，让他们打开大门，迎接客人。

斯大林的专车跑得很快。莫洛托夫的车落得很远。进入别墅客厅时，后边的服务人员还未来。斯大林微笑着，以主人的身份，热情招呼毛泽东、周恩来就座。过了半个小时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和维辛斯基、罗申等人赶来了。他们是应邀前来参加聚餐、联欢、助兴的，个个神采奕奕，兴高采烈，并不知道前边那一幕不大愉快的事。

晚宴开始了。餐桌上酒菜丰盛，杯盏交替，主人十分热情。

毛泽东余怒未息，情绪不悦，他坐在餐桌旁，仍然沉默，一言不发。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毛泽东的情绪，很快感染了宴会上的人们。晚宴上笼罩着冷清、无聊的气氛。尽管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设法使气氛欢快，然而，均未成功。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去问举行宴会的目的和毛泽东不悦的原因，只是跟着斯大林张罗。

为了打破沉闷的僵局，饮宴间，斯大林离开座位去放留声机，先让大家听音乐，然后，又动员大家跳舞。

音乐是优美动听的。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全都响应斯大林的号召，离座起舞，并热情地邀请中国客人跳交谊舞。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及中国客人，都只坐在一旁观看，不肯跳舞。后来，热情的主人硬把周恩来和师哲托进舞场。毛泽东还是沉默地坐在一边，尽管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三四个人轮番地拉毛主席跳舞，毛泽东都摇摇头，不肯跳舞。这期间，为了礼貌待人，他的脸上虽然有时也露出一丝谦和的微笑，但整个来说，神态严肃，不苟言笑。毛泽东的不悦情绪，和宴会、舞会的气氛格格不入，并且不断扩大，渐渐地感染了人们，使宴会和舞会笼罩上下不快之感，最后竟不欢而散。

周恩来不愧为机智、灵活、颇有气魄的外交大师，在毛泽东和斯大林意见不合、一时僵持的宴会上，周恩来虽然有说有笑，也吃也喝，甚至当主人邀请他唱歌跳舞时，他也歌也舞，但他的每一举动，每一个步骤总是紧跟着毛泽东的步法和情绪；并且总是和毛泽东的行动相得益彰，配合默契，形成合力。

在那气氛紧张的宴会上，周恩来表现出高度的原则精神和机智、灵活的外交才能。他见一时气氛紧张，就想方设法调节气氛，引开话题，转移视线，使人们在自然的谈笑中，造成一种比较宽松、活泼的环境，比较融洽、和谐的氛围。他的言行自然而得体，理智而高雅，既尊重自己的领袖，维护民族的尊严，又表现出个人的立场、意志、见解、风格，显得高雅大方，机智多谋，令人信服。他的举止，既符合他的身份及礼节，又没有丧失尊严和原则，容易使争执的双方接受。当然，毛泽东和斯大林是两位性格倔犟、意志坚强、从不轻易妥协的人。在这两位伟大领袖的矛盾纠葛、性格冲突中，调节、缓和是不容易的。周恩来的努力有时是成功的，有时也不如人愿，收效不大。苏联的有些领导人曾说：“周恩来真是伟大的外交家、政治家，处事有方，机智灵活，把最复杂难办的事情，往往举重若轻，在谈笑中轻而易举地办成了。”

毛泽东明白了斯大林的意图。但他不肯亦步亦趋，决心“走自己的路”。

夜深了。毛泽东一行才回到住地。

劳累了一天的毛泽东，感到有些疲倦。可是，他躺在床上，闭着双眼，怎么也不能入睡。斯大林的神态，莫洛托夫的声音，时不时映入他的眼帘，响在他的耳边，引起他的深思。是我们错了吗？1949年，美国国务院为中国问题而发表的白皮书，我们仅仅以新华社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章，加以驳斥。效果不是很好吗？那不但引起了国内人民的重视，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良好的反响。现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快要签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吃不开了，日子混不下去了，派出艾奇逊这个“最低能的政治骗子”出来发表什么演讲，进行无耻造谣，挑拨离间，我们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记者发表谈话的方式，进行严厉的驳斥，这有什么错误呢？何况，我们不仅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驳斥，还让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代表新疆530万人民发表声明，对艾奇逊的谣言进行严厉驳斥。这是我们对帝国主义斗争不力吗？不，不是，决不是。可他们为什么要小题大作，借题发挥，在这样一件小事上大做文章呢？是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企图通过这件事使我们就范，听从苏联的指挥、摆布呢？不，决不，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决不允许的。

毛泽东心似平原奔马，任意驰骋。他从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谈话，想到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的声明，又想到蒙古外长拉姆苏伦的声明，考虑《谈话》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想到这里，他禁不住又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桌前，拿起那几份《声明》、《谈话》细看，深思其中的内涵和问题。

这几份《谈话》和《声明》，都是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主权的。各有各和特点。就胡乔木的《谈话》来看，其特点主要有三：

第一，对美国的侵略政策揭得深，批得透。《谈话》一开始就说；艾奇逊在长篇演讲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了什么样的程度，艾奇逊的通篇讲演都是以谣言掩盖美国侵略政策的实际。”《谈话》引用艾奇逊的一些话后指出：“这里没有一个字不是撒谎。用一切办法钻进中国来，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这就是美

国的基本政策。用六十万万美元在最近数年中帮助蒋介石杀害了几百万中国人，这是所谓‘美国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背’”。

第二，用事实驳斥谎言，一针见血。对于艾奇逊造谣说：“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的谎言，《谈话》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角度，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谈话》指出：“美国国务院对于中苏关系上的说话有它自己的历史。苏联帮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是1948年以前美国国务院的老爷们常说的话，这是因为那时候在国务院老爷们看来，美国在中国的战争赌博还有希望和原故。苏联企图控制中国——这是1949年国务院为中国问题而发表白皮书中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这时候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的原故。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这是1950年1月12日的话，这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赌博已经彻底输光，剩下一个台湾，似乎还想在那里打点什么主意的原故。”《谈话》接着入木三分地挖苦说：“谢谢上帝，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更好办法了。”

在现实方面，《谈话》只举了一件有趣的事实：“在艾奇逊低演说后的第二天，即1950年1月14日，被中国人民政府逮捕审判并驱逐出境的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瓦尔德返美后，曾与国务院官员谈话，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除掉行使共管铁路的权利以外，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瓦尔德同时指出：“并未看见苏联有吞并满洲的任何迹象。”“满洲乃系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谈话》辛辣而幽默地指出：“人们可以看见，在西半球的土地上发生了有趣的故事。一个说：满洲与苏联合并。一个说：并未看见。这两个人不是别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有名官员。”

第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无官样文章的空话、套话、“外交辞令”，又无脱离实际的阿谀奉承，无端吹捧。《谈话》没有专门谈中苏关系，没有称颂“无私的友人苏联”，没有批驳艾奇逊下述论断：“俄国人在中国北部以及其他那些地区的利益，远在共产主义之前就存在了。这绝不是从共产主义发生的东西，它的存在远在共产主义之前。”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的声明中，引用并且驳斥了这段言论。说“艾奇逊的这段言论是这样的荒谬透顶”。“乍一听来，我们还怀疑它的可靠性，以为必定是报纸把国务卿艾奇逊错认为某一个不负责任的新闻记者了。然而，加以审查之后，原来国务卿艾奇逊竟然的确作了这样虚妄的粗制滥造的诽谤言论。”

维辛斯基从《声明》中，专门批驳了“所谓‘外蒙古，’问题。而以胡乔木名义发表的《谈话》中，对此事只字未提。既未批驳艾奇逊的这些言论，“并无丝毫真实性”，也没有说“所有这些荒谬言论都是由艾奇逊堆砌起来，在竞赛失败了的时候保持面子的，企图用来诽谤苏联的外交政策，并从而把他们自己政策失败的责任推诿给苏联。”

这些问题，并不是毛泽东的疏忽或遗忘，而是严峻的历史，客观的事实，以及他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使他不肯完全按照斯大林和苏联的调子说后。毛泽东的思想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办事的思想，而绝不屈服于某种权势或政策。现在，经过一段深入、具体的分析，毛泽东更加明白了，斯大林和苏共领导人之所以抓住胡乔木《谈话》大作文章，共实质仍然是要中

共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办事，按照苏联的模式办事，按照苏联的调子发声明，那将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不，不行！绝不能这样干！毛泽东断然拒绝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这种主张和建议，并且用严峻的态度、无声的抗争，顶住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批评、规劝、宴会、舞会，表现了对这种作法的强烈不满和毫不妥协的态度。这正是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的魄力。

毛泽东出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但他不喜欢那种安于奴隶地位的奴颜媚骨，不喜欢那种逆来顺受的奴才性格，而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提倡人们作鲁迅那种“硬骨头汉子”，作“独立支撑的大树”，而不要作那“左右摇摆的小草”。斯大林当时是世界人民公认的革命导师和领袖，威望很高，才华出众，性格坚强，有点骄傲，对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大部有些看不起，而对毛泽东则很尊敬。在这件事情上，尽管他不想惹毛泽东，尽管他十分谨慎地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向毛泽东委婉地谈了些意见，然而，民族自尊心和革命自豪感很强的毛泽东还是被激怒了，发火了，以至他斯大林急忙亲自请他上车、让坐，急忙设宴请客，急忙组织舞会，缓和气氛，毛泽东还是怒气难消，不给面子，不露笑容。

其实，毛泽东的发火、抗争，不仅仅是因为斯大林对《谈话》的指责，也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指责牵涉到中国党和政府的主权和尊严，而且是因为这种指责触发了他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憎恶和深思。

毛泽东深知：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凌辱、剥削、压迫。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日俄战争，八国联军、日本入侵……多少英雄的中国人民，死在了帝国主义者屠刀之下！多少祖国美丽的山河，被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践踏！幸喜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取得一个又一个革命的胜利。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过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并且宣布废除了帝俄侵略中国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对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人民是多么大的教育和鼓舞啊！“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得出的结论！

然而十分遗憾！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在苏联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谈判期间，斯大林同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对艰苦抗战八年的中国人民，居然搞起了大国沙文主义，软硬兼施，利用多种手段，强迫当时当权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接受屈辱的条件，签订了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据《中国雅尔塔文件》记载，在与国民党代表团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在莫斯科会谈中，斯大林曾保证，“苏联将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在谈判中，斯大林拿出了四个关于中苏关系的文件草案：一份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份有关中国东满和南满铁路的协议，一份关于旅顺港和大连的协议，还有一份关于所谓“外蒙独立”的宣言。这些文件，经过一段讨价还价、修改、补充，终于公布了。这些条约的性质是什么呢？作为共产党人应该怎么看待它？

毛泽东记得很清楚：1949年7月刘少奇率团访苏，和斯大林会谈时，曾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斯大林当时态度很明朗，他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那么现在，怎么能要求中共和中国政府来说这些条约是平等的，公正的呢？不行，这绝对不行。“我们走自己的路，让别

人去说。”

当然，中国党和政府是通情达理的，是尊重事实而顾全大局的。例如关于所谓“外蒙古”问题，的确，远在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睦相处，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作法，还要加以肯定和赞扬吗？

不，毛泽东绝不于这样的事。于是，他硬着头皮顶着，在《谈话》中没有谈这些事。

斯大林见毛泽东如此认真，态度严肃，毫不含糊，只好不了了之，不再重提。

革命的友谊，需要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取长补短，互相支持。从这件事情上，斯大林不仅意识到自己对毛泽东不够了解，而且对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那博大精深的文化不够了解。有一次，在闲谈中，斯大林细心询问了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物品、用具、阴阳五行、自然现象的称谓、含意等等。他仔细地品味着中文中的桌、椅、板凳、日、月、星辰、阴历、阳历，和一些科学、哲学的概念、判断。感到深刻、准确、形象、有趣。他说：汉语、中文，都具有自己民族的、独特的风格，而且丝毫听不出与欧美语言相同的语音。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而毛泽东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儿子！谈到这里，他对他的同僚们说：“听见了吧，要尊重中国文化，尊重毛泽东！”

斯大林在和毛泽东晤谈了几次之后，对毛泽东的思想、性格、魄力、作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和毛泽东交谈，特别喜欢倾听毛泽东用那生动、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语言，谈论中国革命的风风雨雨。在双方商谈中苏条约期间，时间紧，任务重，工作很紧张；然而，在那紧张的会谈期间，有一次，会谈正在进行，斯大林却将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单独请到另外一个房间里，亲切地请毛泽东说说心里话。

毛泽东又一次向斯大林谈起了自己在中国土地革命期间，受过错误路线的打击、排挤。“他们剥夺了我的发言权，不许我工作……”

斯大林认真地听着，脸上露出了同情而又愧疚的神色。

毛泽东越讲越生气，突然，他站起身来，指着王稼祥，说：“他，他们，就是他们打击我，排挤我！他就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个！”

周恩来和王稼祥顿时紧张起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斯大林接着毛泽东的话茬，惊讶地说：“啊；王大使！你还这么厉害，你也是犯错误的一员！”(11)

王稼祥坦然地点头说：“对，是的。”

毛泽东意识到自己说话走了火，立即接着说：“他早改正了，而且现在还是得力的干部。延安整风以后，我们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犯了错误，改了就好，既往不究。我自己也是犯过错误的，只是知错就改，偷偷地改嘛！”(12)

说得大家又笑了起来。

斯大林没有笑。他点起他那特制的烟斗，边抽烟边陷入严肃的深思，通过和毛泽东的全面晤谈，通过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师哲等同志的介绍，他真意识到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自己把许多事情办错了。而这些错误的实质，就是“揠苗助长”、“越俎代庖”。中国这个有五千年文化和二亿里大陆的古老大国，博大情深，变幻无穷。而自己对中国的事理，中国的社会，

以至中国的文化、阶级状况、意识形态、人情风俗、生活习惯。民族特点等等，都缺乏深入的了解，深入的调查。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自己没有调查，就凭着革命热情出主意，想办法，指导革命，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造成损失！

这个经验教训，不能不认真总结啊！

斯大林想到这里，又和毛泽东进入了更深地交谈。

注释：

《新华月报》1950年2月号第856页。

(11)(13)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56页、451页。

二五 释疑诚服，斯大林建议出版“毛著” 中苏缔约，两大国结成友好同盟

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该把你自己的文章尽快编辑出版，这是一件大事情。”

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按实际情况办事。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前头。

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斯大林由于调查研究不够，在某些问题上犯了错误。经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多次会谈，斯大林了解了真实情况，对中国革命的经验十分重视，并提出了革命中心东移的观点。

1950年1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商定了中苏条约、协定的原则、内容之后，交由李富春带领的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和米高扬带领的苏联方面的工作人员具体研究，拟定条文。

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师哲作翻译。在这次会见中，斯大林非常热情。由于中苏条约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双方的会谈显得十分投机，气氛融洽，斯大林用最好的酒菜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多次劝毛泽东吃格鲁吉亚式的烤羊肉串、羊肉汤、红菜汤，询问毛泽东的著作情况。

菜虽然不算太多，但烹调精美，味道可口，女侍者不停地端来热腾腾的新鲜菜肴，请斯大林过目。

周恩来介绍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

斯大林十分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知道，马克思当年献身工人运动，斗志昂扬，但当他看到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工人运动裹足不前时，就宣布退出会议，走进书斋，刻苦钻研，终于写出了《资本论》这部远远超出具体决定、跨越时空、震撼全球、推动历史前进的名著。列宁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深深感到了理论的重要性，所以无论在繁忙的工作中，还是在艰险的流放中，都在努力进行理论探索，著书立说。他继承、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的特征和规律，提出并阐明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现在，听了周恩来的介绍，斯大林认真地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文章文件尽快整理出来，编辑出版，这是一件大事情。”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深深感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深深感到用正确理论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性。他点点头说：“我也在考虑办这件事情。如果斯大林同志能帮助办这件事，我将十分感谢。”

斯大林转了转手上的烟斗，认真地问：“你需要哪方面的帮助？”

毛泽东坦率地说：“如果能派一位理论上强一点的、精通马列主义哲学的同志协助我们编辑，就太好了。”

“唔——”斯大林沉思一刹，决然地说：“我想派尤金同志去协助你，他是位哲学理论家，有理论修养，你看合适吗？”

“那太谢谢你了，斯大林同志。”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样的人最好。”

斯大林也高兴地笑了。他对毛泽东接受他的建议，准备出版毛泽东著作感到高兴；更对自己能派入协助出版毛泽东著作感到得意。这是他近日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落实了，他感到欣慰。斯大林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谈到这里，他又说：“这是我们答应了。但尤金愿意不愿意去中国，还不知道，等他回来我再问问。”

这时候，毛泽东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斯大林同志，在条约签字以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

“当然。”斯大林点了点头。

毛泽东明确地说：“地址不在我们现在下榻的孔策沃别墅，而是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

斯大林有点不理解地问：“为什么不放在克里姆林宫呢？这里一切都很方便。”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毛泽东语气虽很平和，但把“我们这个主权国家”讲得很明确很清晰，毫不含糊，态度也相应的有些强硬。

斯大林脸色一沉，显得有点不悦。他沉思片刻，抬起头来，强笑着说：“是的，是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出席过在外边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过。”他强调了一句“从来没有过”。这也是事实，表示若在外边饭店举行招待会，虽盛情难却，但他是无法去出席的。

毛泽东没有理会斯大林的态度变化，坚持说道：“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恐怕是很难想象的……”说到这里，毛泽东的话也加了力度，显得软中有硬，柔中带刚，进一步说：“斯大林同志，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参加！”

谈话突然停顿下来。周围静悄悄的，没有声响。斯大林像在考虑什么，而毛泽东则在冷静地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的答复。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是这样希望的，让我考虑考虑，再向政治局请示一下……”斯大林终于做出了让步的表示。看来，他是准备打破自己数十年恪守的信条，准备破例地参加中国同志在外边饭店举行的招待会了，但话未说定。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面前这位高大健壮的中国领袖，对他来说是一位非同寻常的盟友。他领导的中国革命，他领导的新中国，他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他都有无限的魅力和无比的吸引力。他再次叮咛毛泽东尽快编辑出版他的著作。

毛泽东点头应诺。他知道，这是斯大林对他由怀疑、不信任转变为信任、信服后的郑重建议，也是斯大林第一次建议出版外国共产党领袖的著作。

斯大林把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看作“一件大事情”，不是随意的应酬、恭维，而是在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多次会谈之后，是在对中国革命作了长期地观察研究之后，是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做了多次了解之后，也是在他强调革命中心东移的问题之后提出来的。1949年7月斯大林曾经说过，世界革命中心从欧洲移到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并为此向刘少奇祝酒。刘少奇非常紧张，不肯接受。斯大林又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刘少奇还是没有喝那杯酒，现在，斯大林进一步提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出版毛泽东著作，并把这作为“一件大事情”提出来，是否和他的革命中心东移思想有关呢？

毛泽东回国后，1950年4月致电斯大林，正式邀请尤金来华帮助他作这项工作。5月初，毛泽东在丰泽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建议。

中央政治局认为，斯大林的建议很重要。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指定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件，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审定；责成师哲和苏联翻译费德林组织中文译俄文的工作。

7月，尤金应邀来到北京，开始看毛泽东著作稿，进行编辑。9月，中文稿件整理速度减慢，妨碍了俄文的翻译进度。毛泽东建议尤金到各机关讲学。9月21日，应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邀请，刘少奇主持讲演大会，尤金作了《苏联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讲演，受到了热烈欢迎。月底，尤金访华时届将至，毛泽东于9月30日致电斯大林，请求延长尤金在华工作时间。毛泽东写道：“尤金在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但是，关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并且我们希望他能到山东、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汉口、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地参观。并向我们的干部做一些政治理论报告、讲演等，以上两项工作，共需四个月时间。因此，我请求您允许尤金同志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延长至1951年1月底或2月底。是否可以这样做，请于复电为盼。”

1950年10月9日，斯大林回电：“……现通知你，尤金留中国可以到今年年底，以便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准备工作及在中国各城市党的干部会上的讲演。”

随后，尤金便按毛泽东的安排，到上海、广州、西安等地参观、游览、讲学。他的讲演稿于当年12月上旬，陆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尤金回京后，看了毛泽东的《实践论》译稿，赞口不绝，连连称好。他又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说他将准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译文都看了，觉得很好，非常有趣，引人入胜，有许多独到之处。同时指出：个别篇章，作为理论性文献，有些语句或许欠严谨，有些语意虽明确，但“难登大雅之堂”，是否可以修改或删节，如“一屁股蹲下，坐在炕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辩证法中的“生与死”的关系等等。尤金谈的意见不多，并一再声明，这是从照顾外国读者的角度提出来的，仅供改时参考。

尤金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特别推崇，要求毛主席把这几篇文章寄送给斯大林阅读。

毛泽东接受了尤金的建议，将《实践论》译稿转送给斯大林。

斯大林看了毛泽东的《实践论》，认为很好，它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发展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本原理，发展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并且交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社。

1950年12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23期上，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并转登了中文编辑部的题解。这篇题解说明了毛泽东发表这一哲学著作的原因：在中国共产党内，曾有过一些教条主义者，也曾有过一些经验主义者，他们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观点，曾在1931年至1934年使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斯大林看过这篇题解，并推荐其在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上转登，说明他此时不仅承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承认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正视了自己在30年代，指导

那些“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的观点”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苏联《真理报》也发表编辑部文章，向苏联广大读者介绍并推荐毛泽东的《实践论》。文章写道：“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的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和基本原理”，“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原理，关于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在认识中统一的原理”。文章指出：“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1951年1月，苏联又出版了《实践论》单行本。

《毛泽东选集》俄文版在苏联出版前，斯大林曾主持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讨论。据当时参加会议的费德林回忆说，讨论是认真的，斯大林问：“你们谁知道毛泽东选集的规模，有几卷？”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没有人回答。大家一言不发，似乎这事同他们无关，谁都不愿当出头鸟。

“怎么，难道这是秘密吗？不便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出来？”还是斯大林的声音。

沉默变得令人压抑，给人以下祥之感。

“拉夫连季，你熟悉毛泽东的作品吗？”看见与会者全部不作声，斯大林冲着他对面的贝利亚发问，后者忽然像刺猬一样缩着脖子。

“这个问题是莫洛托夫同志管辖的范围。”贝利亚有点紧张，两眼恭顺地瞧着斯大林。他总算把问题应付过去了。因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

“维亚切斯拉夫，你知道吗？”又是斯大林在问。

“我们的中国专家、费德林教授在此，他了解。”莫洛托夫拿费德林作挡箭牌。

费德林坐在后边，默不作声，观察形势，静候着说话的时机。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不便于太主动。若是问到他，当然尽力回答。现在包围圈合拢了。马上就要轮到他了，他准备发言，但见斯大林别有所思，谈话的时候眼睛不看他，心里更紧张了。

“费德林同志，你能为我们解开这个秘密吗？”当时费德林坐在最末端的一个位子上，斯大林问话的时候，眼睛还没有朝这边看。

“他的中文版一共是……”费德林开始说。

“我不是问中文版，你明白，我问的是俄文版？”斯大林的声音中有点火气。

“我想，一共是……”

“你爱想不想，这是你的事。我要你简单地回答我，毛泽东选集一共是多少卷？喂，我的问题清楚了吗？”

“计划出四五卷，”费德林总算说了出来。

“四卷还是五卷……还是不肯定，大而概之的数字，”斯大林嗔怪了一句，便转到下一个议题上去了。

费德林认为，让斯大林恼人的无非是两种情绪，一种是担心，一种是嫉妒。令他不安的是，如果毛泽东选集超过别人的书，就是说超过斯大林本人的作品，人家会怎么看？人们会不会无意中倾斜到中国领导人方面去，而最

终影响到“各国人民的导师”的威信？何况，这个时期已经频频提出要提高中国新领导人的地位，有的甚至说，理论思想的中心有可能移到北京。

这时，鬼使神差地，费德林忽然对领袖说“我这里有个问题”。

“什么事？”他威严地问。

“对不起，是个非原则性问题，但是……”费德林鼓起勇气说。

“什么叫非原则性？你还没有说出来？怎么知道它没有意义？”斯大林打断了费德林的话头。

“毛泽东名字的译名需要更正一下，它的拼音不是 u3e，而是 u，这是两个不同的音，汉语的写法也不一样。名字一写错就成了另一个人。”

“你是行家，那就改好啦。”

“我曾经同《真理报》编辑商量过，请他改一改。”

“他怎么说？”

“他怔了一下，说现在这种译法已经用惯了，不好改……”

“那你再跟他说一次就是了。”斯大林随口说了一句。

费德林拿着领袖的上方宝剑又去说，这回报纸编辑完全变了态度。“没问题，有错必纠么，既然这是个明显的错误……明天就改第二天果然改了过来，俄文版的选集也是用改过来的拼音：Maou yH。

1952年苏联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反应很好，引起轰动，受到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普遍重视。1953年翻译出版了第三卷。

签字仪式照相时、斯大林向前移了一步，所以在照片上他和毛泽东一样高。

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隆重的中苏条约签字仪式。

毛泽东和斯大林亲自出席。他们两人见面后亲切握手，互致问候，然后仪式开始。

代表中国签字的是中国政府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苏联签字的是苏联政府外长维辛斯基。周恩来和维辛斯基都发表了讲话。

这天签订的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同时，还签订了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毛泽东访苏获得了巨大成功。

斯大林原打算在这大同时签订中苏贸易协定。由于苏方工作人员粗心，出了差错，修改、纠正耽误了时间。直到签字仪式开始时，苏方仍然未能将贸易协定拿出来。斯大林严肃地查问此事。他的下属竟说：“中文本没有准备好。”

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反讥地说：“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身上！”

敏感多疑的斯大林，看出了毛泽东的不满情绪，再三追问师哲：“毛主席说了什么？”

师哲不便直译，只好搪塞：“是我们私下的话。”

斯大林不懂中文，但仍质疑地摇摇头，不便再问了。

毛泽东个头比斯大林稍高些。但在签字仪式上照相时，斯大林轻轻向前移动了一下，所以在照片上，他就显得和毛泽东一样高了。至于斯大林当时

为什么要向前移动，谁也说不清楚。

签字仪式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热情地宴请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宴会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杯盏交替，气氛热烈，关系融洽。斯大林热情地举起酒杯，向毛泽东祝酒：“毛泽东同志，祝贺您访苏圆满成功！”

毛泽东干过杯，又热情地举杯祝酒，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盛情款待和热情帮助，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

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人在给毛泽东敬酒后，特别去给周恩来敬酒。他们曾受斯大林的委托，和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一起谈判中苏条约和协定。在谈判中，他们对周恩来深刻的政治见解、杰出的外交才能和严密的工作作风十分钦佩。所以，米高扬在给周恩来敬酒时，十分幽默地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了。”

周恩来爽朗地笑着，风趣地说：“米高扬同志，不久，你还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拟，是按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商定的原则进行的。起先，苏方根据周恩来讲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中国代表团看。周恩来看后，说：“不对，我讲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

周恩来把王稼祥、李富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泽东看了苏方起草的文稿，摇摇头说：“这不行，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于是，周恩来整整花了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师哲很快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联方面看了表示满意。他们没有料到，中国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提出内容这么好、表述这么精确的条约，没有改动多少，就表示同意。

中苏条约的名称，原先叫《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1945年苏联同蒋介石国民党签订的条约名称相同。后来，周恩来建议加上“互助”二字。毛泽东说：“加‘互助’两个字好，平等互利，互相帮助嘛！”这样，条约的名称就变成了后来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个条约是在毛泽东和中方的积极争取下签订的，有效期为30年。应该说，它对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再起、维护新中国的独立都起过积极作用。条约签订后，有一次，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客人，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应邀参加。席间，胡志明主席很羡慕中苏签订的条约，他向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也要向您请示。”

斯大林笑道：“你怎么能向我请示，我是部长会议主席，你是国家主席，官比我大，我应向你请示。”

胡志明半开玩笑地说：“你同中国同志签订了个条约，趁我在这里，咱们也订个条约吧！”

斯大林说：“你是秘密来的，怎么同你订约？否则，人家要问你是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呢？”

胡志明幽默地说：“这很简单，你派架飞机把我送到天上去转一圈，然后再派些人到机场迎接我，再在报纸上发个消息不就公开化了，然后我们两国就签订条约嘛！”

斯大林下好回答，用他那特制的烟斗抽了一口烟，笑了笑，幽默而风趣地说：“哈！你们东方人的想像力太丰富了！”

斯大林破例地参加告别宴会。毛泽东一行胜利回国，畅谈中苏亲约。

1950年2月14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盛大的招待会。

下午6时许，来宾陆续来到，包括苏联的党政要员、高级干部和各国驻苏使节都蜂拥而来，先后达500多人。按照惯例，斯大林从来不出席这样的招待会。所以人们都不知道斯大林今天会来。

6时30分整，一队长长的高级轿车在旅社前停了下来。斯大林带领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走下汽车，前来赴宴了。前厅大门敞开。当斯大林那威严而颇有风度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时，许多人都惊呆了，因为在在场的大部分苏联人都从未在这么近处看过斯大林呀！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门口迎接贵宾。毛泽东和斯大林亲切握手，互致问候，然后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

宴会大厅欢呼雷动。许多苏联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这么贴近的看过斯大林，今天贴身照面，心情激动，禁不住热烈鼓掌、欢呼，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穿过客厅就座之后才停息。

王稼祥告诉师哲，斯大林今天来参加宴会，在苏联是破例的，是经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

斯大林笑着对毛泽东说：“听说你们有个愿望，希望我能来参加这个宴会。这在苏联是破例的。我们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同意我破例，所以我也高兴地来参加宴会。”

毛泽东关切地说：“你年龄大了，如果身体支持不了，出出面就行了，不一定要参加到底。”

斯大林说：“你们来一次不容易。政治局同意了，我也乐意奉陪。”

宴会厅是玻璃板壁隔成的一大一小两个厅。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在小厅，其他来宾均在大厅。到祝酒讲话时，因玻璃板壁隔音，大厅里的人听不清讲话，都拥向小厅。眼看玻璃快要挤碎了，周恩来忙叫人将活动板壁拆去，两厅合成一厅，才使激动的人群安定下来。

宴会祝酒重新开始。费德林给周恩来翻译，师哲给斯大林翻译。周恩来事先把自己的讲话稿给费德林看过，费德林译成俄文拿在手里。周恩来临场讲话，未拿文稿，可是宣布开会和祝酒词共两千字，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令费德林十分惊讶。周总理讲的主要内容是：中苏友好要世代传下去；中苏两党两国兄弟般的团结对世界革命是最大的贡献；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等。

周恩来的祝词言简意赅，激动人心。

全场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斯大林讲话很轻松。他简短地说，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了，也代表了他的意思。社会主义阵营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可惜今天与会者缺少了一员——南斯拉夫未被邀请，原因是南斯拉夫自己把自己划到外面去了。斯大林表示惋惜，接着，讲了团结就是力量。

席间，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主席、周总理健康。

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

2月17日，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莫洛托夫到毛泽

东的住处把毛泽东送上汽车，又先于毛泽东赶到火车站，迎接毛泽东并送上火车。莫洛托夫告诉毛泽东说，要爱护身体，在路上，到国内，都要保重，这是斯大林再三要我告诉你的。另外，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要大意。这是临别赠言。

在莫斯科车站，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谈到了他这次访苏的成果和意义。他说：

“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人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人们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毛泽东接着说：“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史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在这篇演说中，毛泽东不但定下了中苏友好与团结牢不可破的调子，而且定下了“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的调子。毛泽东特别预言：“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毛泽东的演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莫洛托夫等和毛泽东握手告别。

列车缓缓开动了，然后加速疾驰。沿途欢迎欢送，气氛热烈。2月26日，列车到了我国边境城市满洲里。毛泽东给斯大林发了致谢电，周恩来给维辛斯基发了致谢电。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和保卫人员、工作人员一起陪送到这里，并将火车上的物品移到中国的火车上，其中有斯大林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辆小轿车。

1950年3月4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受到了在国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人们都祝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亲切会晤，祝贺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成功。

毛泽东回国后，4月11日，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中苏条约的报告》。会议经过讨论，批准了这个条约。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订这个条约的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反动派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也赶出去了，基本上赶出去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

在谈到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时，毛泽东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

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总之，“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11)

当然，事物都是矛盾统一的。在西方，这一条约被视为中国和苏联把日本及其保护者美国当作假想敌的证据。1950年3月1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对此条约进行评论，对北京终于走上与苏联结盟的道路表示遗憾和不满。西方以此为口实，1951年，日本与西方同盟国缔结和约，又缔结了《美日安全条约》。

斯大林曾经怀疑毛泽东和他所坚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但在莫斯科谈判期间，他对毛泽东及其代表的新中国表现得十分尊重，不仅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且在中苏之间的某些问题上作出了明显的让步。俄国人同意在1952年底把中国长春铁路无偿地移交给中国；在对日和约缔结后，不迟于1952年底从旅顺港撤走苏联军队，并把该地设施移交给中国（条件是在战争情况下这些设施应由两国共同使用），并无偿地移交苏联在北京的经济机构所获的财产。苏联同意在5年之内给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有息贷款。这与1945年苏联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注释：

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名字。——译者注。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名字。——译者注。

[俄]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06—108页。

师哲：《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经过》，载《新中国外交风云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5—6页。

伍修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经过》，同上书第12—13页。

毛泽东：《在莫斯科车站的临别演说》，载1950年2月20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册第75页。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42页。

后 记

文有姊妹篇，书有兄弟册。《毛泽东与斯大林》和《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纪实》，就是写两位历史巨人的既有共同点又有许多不同点的两部书。

为这两部书，我几乎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时间和精力。1933年10月7日，我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老庙乡东刘堡的一户贫农家里。高小毕业后，因家贫辍学，13岁就给地主放牛，扛长工，打短工，受尽了剥削压迫。听说陕北有毛泽东、共产党能救穷人，我于1948年（15岁越过敌人封锁线奔向陕北，参加革命。随之在延安工作了15年。我热爱陕北的山山水水，更热爱陕北的人民群众。我利用一切机会下乡调查访问，走遍了陕北的大部分地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刘志丹、谢子长及无数革命英烈的事迹和精神，使我激动不已，夜不安寝，总想把他们写出来。然而，文化太低，知识大少，一次又一次地写作都失败了。

面对那一叠又一叠退回的废稿，好心的同志劝我说：“别白费劲了！你个小学毕业的穷娃，要写伟大领袖，有点像白日作梦。我不服气地说，那不一定，“有志者事竟成”。我们二人在南泥湾的路上边走边说，争执不下。我将“有志者事竟成”六个字写在了一块桦树皮上，并刻在了南泥湾的一棵白桦树上，作为誓言，更加刻苦地调查、写作。1959年，我的处女作《刘志丹少先队》先在北京《红色少年》刊上连载，后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书，被评为全国少年儿童优秀读物。然而好景不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此书被诬为“反党黑书”，我被当作“反党，黑作家”批斗、挂白旗、抄家，把我长期访问调查的数十个笔记本抄去烧了，使我痛不欲生。

在那困难的年月里，我继续调查和撰写有关毛泽东、周恩来、刘志丹等人的故事。为了整理史料、练笔练艺，我当了十年《革命英烈》刊主编，编辑发表了有关革命领袖、英雄烈士的书刊40多部（本），字数约近600万；创作发表了《爱国名将杨虎城》、《华岳魂》、《上山记》、《赵兴龙》、《边区生产歌》、《军民纺线线》、《王泰吉将军传奇》、《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各种体裁的传记、小说、剧本、诗歌等作品80多部（篇、首）。后来，《刘志丹少先队》被平反，并再版多次，还被译成了朝鲜文；《边区生产歌》、《军民纺线线》等剧本由陕西省歌舞剧院上演，赴京演出，受到了周恩来、朱老总、叶剑英、王震等领导同志的赞赏。我与延安作家丁工等同志创作的12集电视连续剧《刘志丹和谢子长》，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刘斌等执导摄成电视片，1995年在中央电视台先后两次向全国播映，后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我知道，上述作品，只是练兵习武，预考初试。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要准确地、完整地塑造他的形象，展现他的思想，难度是很大的。首先是核实核准史料。我虽搜集了大量史料，但真伪难辨。我访问过数十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干部、战士、群众，核实未成。1982年，我找到了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18年的师哲同志访问，听说他曾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等职，毛泽东和斯大林会晤时他担任翻译。我高兴地请他作指导。师老非常热情，十多年来，先后和我谈了一百多次，让我录音、笔记，帮我核实史料、指导写作，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并先后用数十天时间，听审书稿，指导修改，字斟名酌，一丝不苟。像谈到斯大林怀疑毛泽东，称毛泽东为“先生”时，他亲笔给我写俄文的“先生”一词，

解释含义、用法和后来改称“同志”的复杂过程。对于师老的话，有时我不理解，不敢照用，师老耐心教诲。如第一次审稿时，师哲说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而是苏军情报机关派到中国东北对付日本间谍的情报人员。但在第二次审稿时，我怕出问题，没有按师老说的改。师老发火了，问我为什么坚持这样写。我拿出了八本有关李德的词典和书籍，说这都是权威部门出版的书，都说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你一个人说不是，我怎么能改写历史呢？！师哲笑着说：“搞历史，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又经过多方调查，找到了王明、王稼祥等几个当事人的证明，才按师哲同志的观点，把中共党史上这个长期以讹传讹的重大问题改写了过来。

核实核准史料，只是写伟人的基础工程之一。更大的难关，在于如何写，选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避免落入一般化、公式化的窠臼，真正把人物写真、写准、写活。为此，我长期构思，反复酝酿，多次将稿子推翻重来，光提纲就写过五六个。最后，确定《毛泽东与斯大林》以他们长达30年的思想交往、相互比较、理论探讨为重点进行全面概括、以史为鉴，描写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革命友谊、性格差异、矛盾冲突、相互评价、理论比较等等，因而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描写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争取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通俗、形象而生动有趣的读物。而《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纪实》，则以1948年4月毛泽东准备赴苏与斯大林会谈，斯大林复电婉言谢绝，新中国成立后二人会晤，到1950年3月会谈结束，毛泽东回到北京，以这不到两年的世界风云为背景，选取他们二人交往中最生动、最感人、最直接、矛盾冲突最激烈、思想火花最绚丽、故事情节最精彩的精华部分，深入开掘，展开描写，从而争取在国际舞台上，在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杜鲁门、丘吉尔等世界著名政治家的比较、冲突中，塑造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形象，展现毛泽东思想的国际风采。这是一种题材的两种体裁，一个计划的两个阶段。

为了实现这个“伴树誓言”，“白日之梦”，二十年来，我几乎每天要工作十至十二个小时，占用了大部分周末和节假日时间，从事写作。长期的过度操劳、使我患了心脏病，心绞痛。有一次，心脏病发作，医生要我住院治疗。我害怕突发的心脏病，破坏了我的计划，便与死神抢时间，上午躺在病床上打吊针，手不能写，心里构思，下午边吃药边爬在病床上写作，晚上还偷偷夜战。

1993年1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拙作《毛泽东与斯大林》一书之后，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与好评。《人民日报》先后两次发表评论性文章，说它是近年来领袖传记文学中“颇具影响的作品”之一。《广州日报》、《福建日报》、《陕西日报》、《黑龙江日报》、《沈阳日报》、《中流》杂志、《党史博览》等报刊先后连载、选载，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肯定与鼓励。有的来信说它是“材料丰富、真实感人的作品”，有的来信说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富有教益的精神食粮”、“是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的最珍贵的礼物”，“是正面介绍毛泽东同志伟大革命实践的力作”（见《中流》1993年第4期）。据此，《中流》杂志副主编麦辛等领导同志建议，尽快编辑出版《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纪实》一书。广大读者的鼓励支持，麦辛等老师、朋友的建议，是我振作精神，编著此书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与斯大林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他们的会晤，震

动寰宇，举世瞩目。近年来，随着苏联的解体，英美等国重要档案的公布和许多当事人回忆录的发表，史料越来越充实、丰富，使人有可能全方位、多侧面、多视角地来观察、描述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历史性会晤。这是我写此书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对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再认识，使我不得不再次拿起笔来，重新写此《会晤纪实》。例如，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什么地方开始的？表面看来，会晤是从1949年12月16日下午6时在克里姆林宫开始的。实际上，这次会晤从1948年4月就开始了。当时，毛泽东要去莫斯科会晤斯大林，方案、路线、班子都准备好了，只等斯大林复电。复电来了，斯大林说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形势发展变化很快，毛主席离开指挥岗位，恐对全局有不利影响，是否还是留在国内指挥战争为宜。说如果你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我们准备派遣一位老练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往听取你的意见。“总之，我们认为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你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是不适宜的。”话写得委婉恳切，关怀备至，但实际上是因为中国当时的局势还不明朗，国共两党、两个武装集团、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刚刚开始，谁胜谁负？还不一定。毛泽东去如何接待？怎么晤谈？会不会引起美国干涉，美苏公开对抗？会不会引发蒋介石经常叫嚷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等等问题，都是斯大林不可能不考虑的。后来的大量事实说明，斯大林当时确实“有难处”。

毛泽东虽然没有立即动身去莫斯科会晤斯大林，但他滞领革命军民决胜东北，使斯大林不得不调整决策；接着，接连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使斯大林不得不逐步放弃“走钢丝”的政策；还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号称“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驱逐出中国，把美国武装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打得上崩瓦解，逃出大陆；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而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冲散了“遏制苏联”的力量，使处在十分孤立、困难中的社会主义苏联和斯大林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援和帮助。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斯大林正式邀请毛泽东赴苏会晤才是历史性的会晤，才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才准确地表现了斯大林的性格和毛泽东思想的特点。这中间，斯大林派米高扬到西柏坡和毛泽东等会谈，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赴苏和斯大林会谈，都起了重要作用，也可以说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的重要准备阶段。

事实很明显：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不仅是他们两个人的晤面会谈，也不是一般的国家元首或党的领袖的晤面会谈，而是一个复杂的，曲折的，包涵着诸多因素，关系着世界格局，各国重视、举世瞩目的伟大的历史事件。因此，这次写《会晤纪实》，我不是从毛泽东到莫斯科与斯大林握手写起，而是从1948年4月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准备与斯大林会谈写起，不是仅仅从两个领袖、两个大党、两个国家的角度来写，而是纵览世界风云，探索巨人足迹，绘制历史画卷。这是第三。

第四，毛泽东访苏是他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出场，或者说是在国际上正式亮相。他和斯大林的晤谈则是毛泽东思想的形象体现，是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写好此书，是在国际舞台上塑造毛泽东形象的一次尝试。会晤之前，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斩断帝国主义侵华的魔爪，驱逐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高瞻远瞩，文韬武略，英雄虎胆，但往往以“中共发言人”、“中国人

民解放军发言人”，甚至以“新华社社论”的名义出现。例如，《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举世瞩目的论文，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的新年献词；《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等文章，都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的评论，当时并没有用毛泽东的名义。

处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事件，是毛泽东正式登上国际舞台之前的重要表现。1949年4月，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英国“紫石英号”等4艘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长江，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并向解放军开炮施暴。解放军毫不畏缩，开炮还击。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对此，毛泽东才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声明，严厉驳斥丘吉尔，抗议英国军舰暴行。

处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等人殴打中国工人齐玉衡事件，也是毛泽东思想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体现。当时，革命当局按照毛泽东的原则，不理睬列强的“治外法权”，关押了长期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打人凶手，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尽管美国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和国会忙得团团转，提出了各种意见、方案，有的威胁，有的利诱，有的要和，有的要战，有的要用飞机空降将沃德等人撤出沈阳。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扬言：他准备“在有必要和有把握的情况下，采取最强硬和可能的手段，包括使用武力。”而毛泽东呢？“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以大无畏的革命胆识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又怎么能不令那位曾经“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的斯大林感到欣慰呢！？

至于在莫斯科和斯大林的晤谈中，毛泽东从提出要“搞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到训斥科瓦廖夫，到顶住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把他那远见卓识、斗争艺术和强烈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鲜明生动、淋漓尽致，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形象体现，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

这两部书有共同点也有许多不同点。共同点是，两部书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是在写他们的思想、事业、性格特点、友谊合作、矛盾、冲突，乃至有些章节都是相同的。不同点主要有：（1）主题不同。《毛泽东与斯大林》是用比较的手法，描写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会晤纪实》则是描写毛泽东思想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体现，或者说是在国际舞台上塑造毛泽东的形象；是在和世界名人斯大林、赫鲁晓夫、杜鲁门、丘吉尔等的比较、矛盾、斗争和性格冲突中，塑造毛泽东的形象，体现毛泽东思想。（2）体裁不同。前者属于人物传记，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史学范围的考证、比较、鉴别、记叙；而后者则属于纪实文学。虽然人物、事件都是真实的，但又有相当的艺术构思，文学描写，形象塑造；（3）事件不同。前者以中国革命为主线，几乎涉及到半个世纪来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只是诸多事件中的一个；后者以两伟人的会晤为主要事件，浓墨重彩，探根究源，展开描写。（4）主要背景不同。前者以中国革命斗争为主要背景，后者则以世界风云为主要背景，在国际舞台上塑造毛泽东的形象。（5）时间不同。前者概括了两巨人思想交往的30年；后者则主要描写两伟人的晤面会谈前后不足两年。（6）陪衬人物不同。前者的陪衬人物，主要是中国人，

如刘少奇、朱德、李大例、陈独秀、李立三、王明、蒋介石等；后者则主要是外国人，如斯大林、莫洛托夫、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费德林、杜鲁门、艾奇逊、沃德、丘吉尔等等。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见证人、专家、教授的热情指导和帮助。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薄一波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同志为本书题词；中国党内少有的“苏联通”、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时的俄文翻译、历史见证人师哲同志不仅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作了多次热情而具体的指导，并且写了《序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伍修权同志为本书题了词。全国革命烈士传编委会主编温济泽同志，国防大学历史学教授马玉卿同志，原《光明日报》副总编马沛文同志，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我的老师党佩中同志，解放军总参谋部离休干部杨进诚同志，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南云瑞同志、中共党史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金松林、副社长朱兴堂，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崇信、副主任熊美杰、李彬、赵俊忠、薛文华同志，中共中央党校总编室主任王杰同志，西安新城区医院副主任医师王爱珍同志，都对本书的写作进行了具体有力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在写作过程中，主要采用了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的有关资料，参阅了周恩来、聂荣臻、胡乔木、汪东兴、师哲、伍修权、胡绳、逢先知、马玉卿、胡华、高菊村、陈峰、唐振南、田余粮、高光厚、曹军、李银桥、权延赤、宋平、解力夫、赵振军、温瑞茂、解红、叶永烈、黄丽铺、何仲山、李松林、陈玲、姚小玲、康矛召、师秋朗、李越然，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R·特里尔、斯图尔特·施拉姆、爱德温·W·马丁，日本友人不破哲三，俄罗斯友人莫洛托夫、费德林、维辛斯基、赫鲁晓夫、德·安·沃尔科戈诺夫等的有关著作，同时，还尽量吸收了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论文和专著中的新资料和新成果。特此说明，并向以上诸位作者、老师表示深切的谢意。

由于题材重大，作者水平有限，错误缺点在所难免，敬希批评指正。

刘杰诚
1996年4月

